

台灣光復史春秋

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

曾健民◎著



台灣戰後史的原點・光復史的真相

■ 日據時期（抗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

■ 日本殖民統治的終結及其遺留的「債務」

■ 《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序文

■ 戰後出發的地方—《一九四五·光復新聲》導言

■ 奪回我們的歷史

■ 學術的出發點—談台灣光復後最早出現的一份報紙副刊

■ 台灣光復初期語言的復原與轉換

■ 台灣光復初期的教育—去殖民·祖國化與現代化

■ 記六十年前（一九四六年）兩岸共同的魯迅熱潮

■ 《雷雨》讚歌—記相隔六十年的兩場《雷雨》

■ 《南天之虹》—湮滅與再生的歷史

■ 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社會

■ 談「查緝私煙」的社會實相

■ 為了前進的紀念—《新二二八史像》序文

■ 台灣光復歷史辯證—可悲的分離主義文學論

ISBN 978-986-6480-15-7



9 789866 480157

聯經學術出版社

NT420

台灣光復史春秋

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

曾健民 著



「學習」 朱鳴岡 作，1946年《新台灣畫報》

台灣光復史春秋：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
曾健民著。

-- 初版. -- 臺北市：海峽學術，2010.07

面：公分

ISBN 978-986-6480-15-7(平裝)

1. 臺灣光復 2. 臺灣史 3. 文集

733.2907

98012505

台灣光復史春秋

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

曾健民 著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發行人 黃溪南

(116)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 電話(02)8663-2559 傳真(02)8663-2466
劃撥帳號 19389534(戶名：海峽學術出版社)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100)台北市師大路165號 電話(02)2367-7878 傳真(02)2367-7431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
電話(02)2219-2080 傳真(02)2219-2180

印刷排版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226-4796 傳真(02)2226-5250

2010年7月初版 定價420元

ISBN 978-986-6480-15-7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序言

這本書是十幾年來分別在研討會上或書刊上發表過的許多文章的結集。這些文章雖然各篇發表的時間不一，但都圍繞著一個主題——台灣光復前後史，而且每一篇都是分別對這一段歷史的不同階段或面向進行了探討。集在一起比較完整地論述了台灣光復的歷史，因此編集成書就教各方。

然而，本書所論及的時期僅限於日據末到二二八事件，雖然這時期是台灣光復史的主要部份，但並不是全部。在我的看法，光復史應該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為止。至於其他部份時期，作者有另書討論。

十幾年來全力投入台灣光復史的研究，有二大動機：一是為了解明台灣戰後史，特別是戰後社會經濟、文化史；二是，為了批判鋪天蓋地的分離主義的「偽歷史」。特別是為了後者，使本書每一篇文章多少都透出一點批判的煙硝味；在一個充滿以虛構、扭曲歷史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年代，這是一個還有一點良識良知餘溫的知識份子不得已的時代課題。

我以為，歷史問題批判必須以客觀的史料為出發點。要有論也要有據，不能只有論沒有據。沒有科學的調研，沒有充分掌握史料，就沒有說話的權利。特別在針對「偽歷史」，只有堅實的史料為據才能發揮最大的批判力。因此，本書是作者以十數年來辛苦積累的史料為基礎，建構起來的光復史

論。

光復史是台灣現代史的黎明，雖然，在黑夜與白晝的交替期總是充滿著矛盾、動盪，但是白晝畢竟是主調。這個主調就是本書的副題——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這是光復史最動人之處，也是這段歷史留下來的最可貴的精神遺產，甚至對今天台灣的困境也充滿了啟示性。「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不是今天台灣未竟的時代主題嗎？

六十年來歷經數度的政權興替，以及快速的資本主義化，台灣光復歷史早已湮滅荒廢；再加上近十數年來分離主義勢力把「光復」顛倒為「終戰」或「再殖民」，完全否定了「光復史」的真義。使光復歷史的復原或「再光復」更為困難。意識型態的障蔽和史料的湮滅是光復史研究的最大障礙，因此，本書的每一章節，每一字句，可說是經過長期蒐集出土第一手史料和克服意識型態的結果。

感謝曉波兄和宜勇兄慨然出版這本書。也感謝梅丁衍教授提供木刻畫「歌唱黎明」，以為小武出色的封面設計。

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拋磚引玉，開啟台灣光復史研究之門，並成為後來者的墊腳石。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四日

目錄

序言

第一輯——光復運動和「八·一五」

一、日據末期(抗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

9

第一節 二〇到三〇年代的抗日反殖運動(1920-1937)

第二節 「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光復運動」(1937-1945)

第三節 以「民主」建設台灣

二、日本殖民統治的終結及其遺留的「債務」

65

第一節 日本殖民統治的終結

第二節 殖民者遺留的「負債」

三、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

95

四、台灣作家的「八·一五」

1 0 1

五、奪回我們的歷史——追悼台灣革命先烈

1 1 5

六、來到台灣戰後出發的地方——《一九四五。光復新聲》導言

1 2 7

第一節 光復文學

第二節 台灣光復的意義

第三節 新台灣的建設

第四節 台灣教育的再出發

第五節 請愛護台灣這片淨土

第二輯——

光復文化重建

七、新台灣的「文化重建」

1 5 3

第一節 看到台灣的「中國民族性」和「現代性」也看到其變質

第二節 台灣歷史的整理發揚以及台灣文學的傳承發展

八、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復原與轉換

175

第一節 戰爭精神總動員下的「日語普及」真相

第二節 奪還我們的語言

第三節 國語運動

第四節 日語問題

九、台灣光復初期的教育——去殖民。祖國化與現代化

245

十、「光復文學」的出發點——談台灣光復後最早的報紙文藝副刊

289

十一、談「魯迅在台灣」——以一九四六年兩岸共同的魯迅熱潮為中心

313

十二、《雷雨》讚歌——記相隔六十年的兩場《雷雨》

341

第三輯——新二二八史像

十三、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社會——百病齊發的春天

353

十四、談「查緝私煙」的社會實相——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

385

十五、為了前進的紀念——《新二二八史像》序文

393

十六、《南天之虹》——湮滅與再生的歷史

427

第一輯——

光復運動和「八·一五」

【一】

日據末期（抗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

台灣的日據時期抗日歷史，從一九五〇年的「反共戒嚴」體制開始，一直被「失憶化」；第一次被大量出土與介紹，始於七〇年代初的鄉土思潮興起之時。由於台灣抗日歷史帶有民族的、反抗的和追求社會正義的歷史形象，因此構成了鄉土思潮「回歸鄉土」、「回歸土地和人民」的重要理念內涵。然而，到了八〇年代中期，以省籍情結和去中國為實質內容的「本土化」浪潮，取代了鄉土思潮而成了社會意識的主流，使得台灣殖民歷史不但被導向「去中國化」的方向，還被詮釋為台灣「現代化」的起源，走向殖民肯定論，而使得台灣抗日歷史再度被失憶；自此，日據史的研究和論述便失去了大歷史視野，失去了與世界史、東亞史，和中國近代史的聯繫，而偏向集中在島內材料的深掘。然而，只要我們放開眼界，就歷史事實來看，台灣日據史的本質，其實是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歷史的產物，因此它與日本帝國主義史有很緊密的關係，就某一層面來說，它屬於日本帝國主義史的一部份；同時，它更是中國近代史不可分的一部份，台灣是中國淪為次殖民地起點，也是中國最早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土地；在台灣被滿清割讓淪為日本殖民地後的三〇年，日本帝國主義又控制了中國東北，接著華北、華中逐次成為淪陷區。在這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過程中，台灣人民曾淪為「既是中國人，又是日本臣民」，「日本不信任，中國也不信任」的「亞細亞的孤兒」的苦境。這正是作家吳濁流最深沉的嘆息，反映了台灣日據史最真實的一面。然而，切斷了台灣日據史與日本帝國主義史和中國近現代史聯繫的所謂「本土」史觀，是無法諦聽到的。只有走出當今盛行的這種「孤島史觀」，把日據史放回東亞的大歷史地圖來看，才能看到台灣歷史的全貌，才能真正的體會到吳濁

流的嘆息。

本文討論的日據末期「台灣光復運動」，是屬於台灣抗日運動史的第三期。抗日運動史的第一期（1895-1915）是屬於前現代性質的武裝抗日行動，據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台灣年鑑》〈抗日篇〉統計¹，在這時期，前後共發生過一百多次的「血戰」，這部分已有許多研究成果，本文不另贅論。眾所周知，第二期（1915-1937）是屬於現代範疇的反抗運動，它主要通過文化啟蒙、工會、農組、政黨等社會運動的形式進行反抗，但是這部分的研究與論述有一個共通的盲點，眼光幾乎全集中在島內的部分，卻忽略了同時期在大陸各地有許多由台灣青年所組成的抗日反殖運動，因此，本文在第一節將對這部分作一概括的綜述。至於一九三七年以後的抗日運動第三期，由於這時的殖民地台灣已被編組入日本戰爭總動員體制，像第二期一樣的大規模島內反抗運動已不可能存在（雖然有一些小規模的反抗），一般人都以為這時期台灣的抗日運動完全偃息了，實際上，並非熄滅而是轉往中國大陸的抗日戰線上與祖國并肩對日作戰。就像當時日本國內的反戰反帝運動或者朝鮮的民族解放運動一樣，當時在日帝嚴酷的戰爭動員體制下在其國內已沒有活動空間，只有匯集到當時成為全亞洲抗日大支柱的中國抗日戰線上繼續活動。這時期，活躍於中國抗日統一戰線上進行「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台灣革命團體及其活動，屬於第三期（1937-1945）的台灣抗日運動，是本文主要的議題。

本文就是試圖把這幾乎被遺忘的台灣抗日史實，做一次初步的、整體的整理，冀望補足一個更完

整、更寬闊的台灣日據歷史圖像；這個在中國抗戰中的台灣革命隊伍，由於它的新任務在「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已不只是如第二期的反抗日本殖民主義，而是進一步要與祖國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收復台灣。因此，它與台灣的光復有直接的關係，也是台灣光復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實際上，這部分的歷史早已有一些先行的研究。包括有：呂芳上先生的〈台灣革命同盟會與台灣光復運動〉²、國民黨黨史會所編纂的數冊資料集³、澳洲學者家博（J. B. Jacobs）的〈台灣人與中國國民黨（1937-1945）——台灣人「半山人」的起源〉⁴，以及日本學者近藤正己的巨著《總體戰與台灣》中的第二部分「台灣光復運動的展開」⁵。本文就是在這些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廣泛參考其他資料，全面整理這時期的台灣光復運動。除了依時序對歷史過程做介紹外，也著重考察這些在祖國大陸的台灣革命團體，在國民黨政府領導的抗日戰爭的形勢變化中，其每一階段的台灣革命任務的重心；特別從一九四三年底開羅宣言發布後，在國民黨政府直接主導的戰後台灣接收與重建的工作中，這些台灣革命團體的角色和主張。

第一節 一〇到三〇年代的抗日反殖運動(1920-1937)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進一步取得了在中國的特權（透過「凡爾賽合約」取代德國繼續占有山東的特權），擴大蠶食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激起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使中國的反帝民族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另一方面，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戰爭景氣」，使日本經濟得到飛躍的發展；資本快速積累，進入了由四大財閥（三井、三菱、安田、住友）所構成的獨占資本主義階段。在這同時，日本形成了大量的中產市民階級以及工人、農民等無產大眾，社會貧富差距加大，階級矛盾加深；在這樣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社會主義、民本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想百花齊放，階級運動和市民運動也蓬勃發展，並催生了日本首次的政黨內閣，此即所謂「大正民主期」。⁶日本的這種政治經濟、社會的新變化，也促成了它對台灣殖民政策的轉變。台灣出現了第一任文人總督，原有的「律令立法」改為「敕令立法」（行政立法），並頒布了「新教育令」等等，此即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當然，造成這種日本殖民政策的轉變，還有另一層原因，由於台灣殖民地經濟的重心——糖業的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殖民地式的榮景，使日本的獨佔資本產生了進一步擴大對殖民地支配的需求；為了因應這種殖民資本的需求，不得不對殖民地的政治、制度進行

一系列的改革。

一、在台灣島內的抗日反殖運動

在這種政治、經濟新階段，台灣殖民地本地資產階級以及近代知識份子，也逐漸登上了台灣社會的舞台；與全世界的殖民地歷史一樣，他們成了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新生力量。他們不但受到了一九一九年朝鮮爆發的「三一」獨立運動以及同年中國「五四」運動等民族自決思潮的衝擊，也受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再加上一九二〇年起日本蓬勃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及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等社會主義浪潮的激盪，產生了殖民地台灣的近代民族運動及社會運動。在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首先，一九一九年在東京的留學生蔡惠如、彭華英、林呈祿等，與居留東京的中華青年會總幹事馬伯援等共同組織了「聲應會」，取祖國大陸與台灣民族運動「同聲相應」之意；接著，在林獻堂的影響下，集合了台灣留學生百餘人，組織了「新民會」以及「東京台灣青年會」（重要幹部有彭華英、謝春木等人），並於一九二〇年創辦了《台灣青年》雜誌。一九二一年，林獻堂領導在東京發起了「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由原本有殖民同化主義色彩的「六三法撤廢運動」轉向民族自治主義運動。同年，以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為中心，在台中創建了「台灣文化協會」，開啟了影響深遠的自主的文化啟蒙運動。另一方面，以反抗殖民經濟壓迫的台灣階級運動也隨之展開，由李應章（後改名李偉光）領導的「二林蔗農事

件」(一九二五年)打開了序幕，而於一九二六年組成了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同時全島各地也紛紛組成了勞工團體，一九二八年成立了「台灣工友總聯盟」。同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發生左右分裂，舊文協幹部組成了「台灣民眾黨」，創建了台灣的第一個政黨；該黨領導人蔣渭水深受孫文中國革命的影響，主張民族階級運動，以達成民族獨立為目標，並積極參予領導勞工運動。但蔡培火等人則主張殖民地自治運動，而於一九三〇年組成了「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分裂後的新文協，以工、農、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展開了激烈的反抗活動，受到日警的鎮壓，又因不斷內訌分裂，以致活動逐漸停頓。

殖民地台灣的社會運動有左右之分，這是由於殖民統治本來就具有民族與階級兩重壓迫的性格所致。就如當年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所指出的：「所以台灣的階級運動，一方面是以其殖民地的事實為基礎，同時又帶有民族運動的性格；而在另一方面，也使台灣的民族運動帶有階級運動的性格。」⁷

由於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急速發展，引起日本支配階級的恐慌，而於一九二八年動用了「治安維持法」(此法專為對付階級運動的惡法，於一九二五年立法，並同時施行於殖民地台灣)，大舉搜捕了數千名日本的左翼運動者並解散主要的三個左翼政治團體。接著，日本殖民當局也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動員了大批警察特務對台灣的社會運動進行了全島性的鎮壓；當日各地文協、農組、工會、民眾黨以及所有的幹部都遭到搜查和逮捕，這是有名的「二一二」事件。鎮壓行動一直持續到

一九三一年，直到台灣的抗日反殖運動消沉下去為止。這時，許多運動的領導者或參與者紛紛西渡大陸，成為下一階段台灣革命運動的主要力量，譬如農組的李應章、民眾黨的謝春木等人皆是。

二、在祖國大陸的台灣抗日團體⁸

在這期間，先後西渡祖國大陸的青年，學生，也聯合了國內有志之士或同在日本殖民壓迫下的朝鮮志士，在各地組織了許多抗日反殖追求民族解放的團體。它們一方面聲援島內的運動，另一方面則努力喚起祖國同胞對台灣處境的重視與支持，並積極擴大對祖國大陸的影響。

(一)北平

一九二二年留學北平的台灣青年學生鄭明祿、蔡惠如等組成了「北平台灣青年會」。在一九二三年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進行大檢舉，並逮捕了二十九名領導者下獄時，該會召開了「華北台灣人大會」，發表宣言呼籲：「用實力援助貧弱而幼稚之台灣民選議員請願團……暴露日本帝國惡辣政治於世界：推翻一切強權，打破一切不自然制度……全島被壓迫悲苦的諸同胞們！起來！」

(二)上海

一九二三年，熱心的民族主義者蔡惠如與許乃昌、彭華英等，召集上海的台灣學生組成了「上海

「台灣青年會」；聲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反對台灣殖民當局舉行的「始政紀念日」和「有力者大會」。另外又組織了「台灣自治協會」，主張民族自決的自治運動。值得一提的是，該協會曾發表聲明，以台灣的被日本殖民經驗為證，忠告祖國的青年學生：要警覺外戴「中日親善」假面、「內心包藏侵略野望」、「甘言行惡」的日本對華政策；它鄭重告誡祖國青年：「諸君如再不醒，將不免陷入與我等同為亡國奴隸之命運」。一九二四年，前述兩組織之部分成員，又與上海的朝鮮革命志士共同組成了秘密社團「台韓同志會」；其規約第一條為：「本會以完成台韓獨立，建設自由聯邦，為唯一目的」，首次提出了台韓獨立共組聯邦的主張。該會以地下行動鼓吹民眾反日，揭露日本對華政策的野心。同年，社會主義者彭華英結合中國大陸、朝鮮、台灣的左翼知識份子組成了「平社」，出版「平平」旬刊運回台灣散發；該社反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主張聯合東亞各弱小民族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⁹另外，一九二五年有「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的成立；一九二七年，謝雪紅、林木順、翁澤生等左翼運動志士，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上海台灣讀書會」；一九二八年，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創立了「台灣共產黨」（全名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提出「反帝反封」的政治綱領。¹⁰

（三）廈門

台灣對岸的廈門，舟船朝發夕至，一衣帶水，是台灣與祖國大陸關係最密切的地方。從經濟、文

化乃至各種政治社會運動都互有緊密的關係。同時，廈門也是台灣殖民當局監視台灣人民最嚴厲的地方，「以總領事館為中心，附設警察署，遍布巡查與密偵。一面監視台灣人在祖國之行動，一面唆使歹徒，藉事生端，而干涉祖國內政。」¹¹雖然環境險惡，也有各種台灣反日反殖的革命團體在此地活躍。一九二三年，廈門大學的李思禎組成了「台灣尚志社」；一九二四年，他進一步與翁澤生、洪朝宗等組織了「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出版刊物「共鳴」，聲援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反對台灣總督府之壓迫政策。一九二五年，中國與台灣學生共同組成了「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該會揭露了日本殖民當局「限制台人回祖國，妨害同胞間相愛互助」的惡行，又抱有併吞福建的野心，且「利用台灣人中的敗類，於廈門無惡不作」；該會還進一步呼籲在廈門台胞：

「我們台灣人並不是日本人，日本人是我們的仇敵」、「我們台灣人是漢民族，是中國人的同胞，應該相提攜，不該相殘害」、「我們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豈可徒受日本人利用」

更向中國同胞呼籲：

要「收回旅大，取消二十一條，撤廢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同胞啊！要振作須從台灣做起……當然也要負起援助台灣的義務」

該會顯示了台灣的抗日反殖民族運動，不但要批評台灣同胞中的「敗類」，喚起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與中國同胞相提攜「相愛互助」；更要鼓勵中國同胞要努力廢除與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條件，且「要振作須從台灣做起」，積極幫助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他們體認到台灣的解放與祖國大陸的民族解放的不可分，台灣的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環。

（四）南京

當時，有三個在祖國大陸活動的台灣革命團體，受到台灣殖民當局的密偵檢舉，而遭大舉搜捕判刑震驚了台灣社會。這三個團體就是南京的「中台同志會」、廣東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以及「台灣民主黨」。

一九二六年，羅東青年吳麗水、李振芳等與中國愛國志工在南京共組了「中台同志會」。該會的宣言指出：

「在歷史上看台灣之滅亡，此滅亡，即中國民眾開始受控制於帝國主義之日，中國完全屈服於日本之日，亦即台灣民眾被剝削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時，故中台兩地民眾，實有共生共死之關係，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又同時為兩地民眾之公敵。」

因此，「各弱小民眾，若非結成堅固聯合戰線，帝國主義將永無崩壞之日，而弱少民族歸於絕滅。」該會第一次提出了台灣的殖民化即中國的次殖民化的開始，這樣的觀點；並特別強調，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中國與台灣實有「共生共死」的共同命運，只有兩地民眾結成堅固的反帝的聯合戰線，才能免於滅絕之命運。這種看法，實為日後抗日戰爭中的台灣革命團體的基本看法和先聲。不料，他們返台準備廣募同志之時，為日本警察密偵搜捕，遭判刑入獄，受牽連者眾多。

(五) 廣東

一九二六年，在廣東的台灣學生，深受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影響，成立了「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並在中山大學校長戴季陶的暗中支持下，於一九二七年秘密組織了「廣東台灣青年革命團」，發行了《台灣先鋒》雜誌，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筆墨的總攻擊。不幸為台灣殖民當局的密偵檢舉，台灣總督府下令各領事館抓人，並依黑名单在台灣各地追緝逮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震驚。後來在抗日戰爭中領導台灣義勇隊的李友邦，即為創會成員之一。

另外，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意圖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時，在全國上下反日感情高漲之際，劉邦漢在廣東組織了「台灣民主黨」，得到許多台灣民眾的支持。幾經波折，終因數位黨員於一九三四年搭船赴汕頭之際，為日本密警捕押回台灣，並依黨員名簿全島大肆搜捕，該黨受到重大打擊，無法再復建。

第二節 「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光復運動」(1937-1945)

一九三七年，日本開始對中國發動全面的侵略戰爭，隨之台灣也被納入日本的戰爭總動員的體制之下，成了日本侵華戰爭的南向基地。台灣除了原有的殖民主義壓迫之外，又多加了一個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壓迫，窒息於雙重的高壓下。自此，連在三〇年代初被殖民當局鎮壓下去後集結到文學陣線來的一點反抗力量，也消沉了下去。在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全民族進行全面抗日戰爭，也給台灣的革命運動打開了新局面，帶來了新希望；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上，使台灣的民族解放

運動與全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結合了起來。就如台籍「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先生，在〈由「七七」說起〉一文中的開頭所說的：

「『七七』抗戰是中國復興的起點，也是台灣解放的起點」¹²。

因此，從三〇年代初開始，許多滿懷革命熱情的台灣青年紛紛西渡祖國，尋求台灣解放之路。一直到日本戰敗投降為止，雖然島內在令人窒息的高壓下仍發生了一些反日事件，但是主要的抗日反殖革命運動都活躍在祖國大陸的抗日陣線上。而且，由於日本侵略戰爭的擴大，整個東亞已形成了侵略與反侵略、支配與反支配的兩個陣線，日本人民的反帝反戰運動以及同為殖民地的朝鮮民族革命運動，也都站到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來，與台灣的革命運動攜手共同反帝追求民族的解放。

可以說，從中國全面抗戰起，日據時期的台灣革命運動進入了第三期。它主要活躍於華南與重慶等地，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與國民政府抗戰策略的變化，在組織型態上以及革命目標上有不同的內容。下面依時間順序對這些台灣革命團體進行討論。

另外，在這期間，雖然先先後後成立了許多抗日組織（譬如，領導「二林蔗農事件」的李應章

（李偉光）就曾於一九三七年在上海組成了「台灣革命大同盟」，但「八、一三」上海淪陷後，只得轉入地下），但在日軍逐步佔領大半中國領土的情況下，許多團體很難有大的進展。只有在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日戰線上活躍的團體，才能得到重大的實質作用。就如謝南光在一九三八年創立的「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的成立宣言中所指出來的：「台灣現在已經不能離開祖國的反日反帝運動而求得解放」。在國民政府協助下成立的台灣革命團體，主要有：台灣義勇隊、台灣革命同盟會以及台灣黨部。

一、台灣義勇隊

台灣義勇隊的靈魂人物是李友邦先生，下面先從李先生組成義勇隊之前的簡歷說起：

一九二四年初，改組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土地改革的三大政策，展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的革命露出了新的曙光。同年，因參加台北師範學校學潮、襲擊日警而逃離台灣來到上海的青年李友邦，見到了這道新曙光而南下廣州進了黃埔軍校第二期。在廖仲愷等進步的國民黨人的影響下，以及國民革命的浪潮中，奠定了台灣革命的思想基礎；他在一九二七年與張深切、張月澄等台灣學生共同組成了「廣東台灣青年革命團」，主張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的殖民統治，並積極援助中國的革命，以求台灣的解放。然而，旋即因蔣介石發動了全面清黨，國民黨向右急轉，李友邦不得不潛離廣州；幾番波折，一九二九年終於在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

找到一份擔任日語教師的工作，但因與一批熱血的愛國青年投入地下革命活動，¹³而於一九三二年被國民黨特務偵獲，被逮捕投獄杭州陸軍監獄。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致電全會，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提出了五項要求並做了四個保證¹⁴，開啟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大門。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李友邦於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被釋放出獄。

出獄後，李友邦得到獄中友人共產黨人駱耕漠的支持，開始準備組建一支台灣人的武裝抗日隊伍。首先，他於一九三八年恢復了在廣東期間成立的「台灣獨立革命黨」的公開活動；為了適應抗戰形勢，他把黨章作了適度修正，黨章規定了該黨的宗旨是：「為團結台灣民族，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國家。」¹⁵對於宗旨所揭示的台灣革命理念，李友邦在〈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一文中¹⁶說的很清楚：他認為台灣曾是中國的一省，滿清不得已才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這一事實「決定了台灣革命目的的兩面性」，一方面要獨立，另一方面要返歸祖國，而台灣的獨立是指在國家關係上脫離日本統治，「是對現在正統治著台灣的統治者而言」。由此可知，在那個時點，意即國民政府未正式提出「收復台灣」的宣言之前，李友邦對台灣革命的想法是先解決「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脫離其統治」的問題，然後再「返歸祖國」、「共建三民主義新國家」，亦即台灣革命的「二階段論」。

雖然，蔣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的國民黨臨時全代會上，曾提及當前革命對策就是要「恢復

高台（高麗與台灣），鞏固中華」，「因為高麗（朝鮮）原來是我們的屬國，台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¹⁷，間接地表示了要恢復台灣為中國領土的意思，但並無明確地宣示要「收復台灣」。因此，李友邦在〈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之中也說：「因為馬關條約以後，祖國政府不得不把台灣認為日本所有，所以台灣革命已不得不成為台灣五百萬民眾自己的事，而祖國政府不能是主動的，除非他提出「收復台灣」的口號」；其意即，除非祖國提出了「收復台灣」的口號，台灣革命的任務首先必須是台灣民眾自己向日本殖民者爭取獨立。

另一方面，在一九三九年一月舉行的台灣獨立革命黨第一次中央會議上討論的〈論台灣革命的新階段〉中，李友邦也指出：「無疑地，台灣革命，必須在這次祖國抗戰勝利之後，始能成功，……而台灣革命，除了因為割讓之久與中國本部略有區別外，亦即中國革命，所以台灣革命必定要和中國的革命力量連在一塊，才能達到最後的勝利」¹⁸。這句話表明了，李友邦在面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新形勢，同時面對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之時，深深體認到「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兩重目標的台灣革命，也是當今中國革命的一特殊部分；台灣的革命只有與祖國的革命連在一塊，「祖國抗戰勝利之後，始能成功」。即便如此，在國民政府未明示「收復台灣」之前，亦即一九四〇年之前，李友邦的台灣革命仍是兩階段論，至少，在表面上是不說「光復」台灣的。他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的〈三年來之台灣復省運動〉文¹⁹中也說：「誠然台灣復省運動這一名詞的提出，卻在三年前才有」，

意指一九四〇年之後才有「復省運動」名詞的提出；但是他又接著補充說：「不論今昔，台灣復省運動是始終和台灣革命運動密切結合的，它隨著整個台灣革命運動而產生，在台灣革命運動中成長起來」。另外，他在提到抗戰中的台灣各革命團體的問題時，也曾說：「他們雖然沒有明白地提出台灣復省運動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革命行動中，卻是朝著這個方向走的。」

一直要到一九四〇年六月，因為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正式向台灣的各革命團體表明了要使台灣「復歸祖國」「成為一省」後，「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台灣復省運動才正式成為台灣的革命目標，才成為行動綱領和公開的口號。這經過，待後文再進一步說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得到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以及福建省主席陳儀的協助，李友邦以台灣獨立革命黨主席的名義，與秘書張一之（張啟權，今名張華來，為中共地下黨員）一同到了福建崇安縣，向當時由晉江、福州及其他地方強制集中在閩北崇安的四、五百名台灣同胞號召，募集志願參加台灣義勇隊的成員；接著，又轉往廣西桂林，與更早成立的朝鮮義勇隊商計籌組台灣義勇隊，並得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行營政治部的核可由李友邦負責籌組台灣義勇隊。²⁰同時，由日本左翼作家、反戰人士鹿地亘所領導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也恰好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桂林成立，²¹因此，李友邦得與鹿地亘以及朝鮮義勇隊，共同在桂林成立了「日韓台反法西斯大同盟」。這行動實踐了台灣獨立革命黨「行動綱領」第九條所揭示的：「組織日朝台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目

標；這個結合台、韓、日共同反日帝的行動也一直是台灣義勇隊重要工作。本來，在共同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包括中國在內日、韓、台的反帝反殖民革命運動，就不斷地尋求彼此間互相的聯合與團結，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台灣義勇隊」正式在浙江金華成立，同時也組建了「台灣少年團」。它隸屬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接受第三戰區（蘇南、浙江）司令官的指揮。台灣義勇隊的重要地位及其革命任務，就如李友邦在〈三年來之台灣復省運動〉文中所言：

「台灣義勇隊是第一個抽芽、滋長和活躍於祖國東南各戰場的台灣革命部隊，同時它也是台灣復省運動的發端，它不論是在過去、現在以至將來，仍要繼承著台灣革命的光榮傳統，義無反顧地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而鬥爭！」

根據《總力戰和台灣》一書的分析²²，台灣義勇隊總人數約有三百人。其中，90%以上屬台灣省籍，大多數是中產階級、知識層；且20%的成員是醫生；其中80%受過中高等教育；約四分之一是女性，因此可以說是台灣的菁英隊伍。台灣義勇隊的組織架構是：總部設有總務組、指導訓練組、編

輯通訊組以及駐渝通訊組、閩南通訊組；下設三區隊及一個少年團，每區隊有三分隊，每分隊編制為十五人。平常的訓練課程包括有：抗戰理論、台灣史、中國革命理論、軍事、生活以及宣傳訓練。它的主要工作內容包括有：醫務、生產、宣慰以及對敵政治工作四大方面；首先，它活用隊員的職業優勢成立了台灣義勇隊醫院，並陸續成立了第二、第三醫院，為友鄰部隊醫治傷病員、為當地民眾治病，或派員到友鄰部隊或地方單位擔任醫生或協助醫務工作。²³在缺乏醫療設施的抗日前線進行後勤醫療戰鬥，樹立了義勇隊的口碑。其次，便是指導各地樟腦的生產，以及生產戰地缺乏的瘧疾藥、皮膚膏或健胃散等。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從事「對敵政治工作」，義勇隊隊員勇敢地活躍在各地戰場，活用台語日語，進行收集敵情、策反、對敵宣傳工作，並教導國軍對敵宣傳、敵情調查的方法等等。為了宣傳與思想訓練，台灣義勇隊也從一九四〇年四月開始，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出刊了十期的〈台灣先鋒〉雜誌。

一九四二年四月，日軍開始發動浙贛會戰；六月金華被日軍所攻陷，台灣義勇不得不往閩西撤退，十月遷駐龍岩。一直到抗戰勝利為止，台灣義勇隊以龍岩為中心繼續開展台灣革命運動。一九四三年一月，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在龍岩正式成立，並創辦了〈台灣青年〉旬刊（後改為週刊），組訓國民黨的後備力量。在這期間，參加了在重慶的「台灣革命同盟會」的台灣義勇隊，曾與其他台灣的革命團體共同襲擊了占領廈門的日軍設施。開羅宣言發布後，因收復台灣在望，

國民黨政府更進一步看重台灣義勇隊，而正式改稱為「台灣義勇總隊」。到台灣光復返鄉時，總人數已超過四〇〇人。²⁴

二、台灣革命同盟會

自從中國進入全面抗日戰爭後，在大陸各地較為人知的台灣抗日革命團體，除了前述在浙江的「台灣獨立革命黨」所領導的台灣義勇隊之外，其他還有：「台灣青年革命黨」（陳友欽、林士賢）、「台灣國民革命黨」（宋斐如、柯台山）、「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謝南光）、「台灣革命黨」（張邦傑）等四團體。當然，其他還有無數的小團體。就如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其十大行動綱領中最後一條所揭示的追求「統一台灣革命組織」的目標一樣，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各革命團體便積極尋求結盟或組成統一戰線。

首先，謝南光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聯合了在華南的「台灣民眾黨重建委員會」、「台灣反戰同盟」、「台灣光復團」及「台灣眾友會」等五團體，共同組成了「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它的共同綱領指出：「本同盟的共同目的在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各民族平等的民主革命政權，台灣革命乃中國革命的一環，中國抗戰成功之日，即台灣各民族爭得自由解放之時，故必須發動台灣各民族參加中國抗戰」。²⁵該同盟的成立宣言也表明：

「台灣的解放運動和祖國的民族革命，是具有不可分離的關聯：台灣現在已經不能離開祖國的反日反帝運動而求得解放，祖國的抗戰領袖，與英勇將士，也不要忘卻台灣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重要性」。²⁶

另外，謝南光也著文呼籲「未參加的台灣同志，希望其參加與合作」、「對於日本和朝鮮革命同志，亦已切實合作」。²⁷

從這些內容來看，謝南光所組成的「總同盟」，從其對台灣革命與中國革命中國抗戰的關係的看法，到組成台灣革命團體的統一戰線，乃至結合日朝革命同盟等等的行動來看，與李友邦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在綱領上可以說幾乎無甚差異。

謝南光（1920-1969）原名謝春木，曾任台灣民眾黨「主幹」（秘書長）及中常委，參加過文化協會、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工友總聯盟、台灣民報編輯記者並主編過左翼雜誌《洪水報》，可以說遍歷了台灣二〇年代的反日抗殖運動。由於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社會運動的鎮壓，而於一九三二年前往上海，在上海參與了對日本的情報收集活動。一九三八年參加重慶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抗戰勝利後，曾往日本擔任盟軍中國代表團政治組副組長。一九五二年再回大陸，曾任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九年病逝北京。是一位一生騁馳於台灣殖民地解放運動與中國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戰線上的典型

革命家，著有《台灣人如是觀》、《台灣人之要求》、《日本主義的沒落》等書。²⁸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任職於重慶軍委會政治部的劉啟光（原名侯朝宗，原台灣農民組合幹部）的推動下，李友邦與謝南光所領導的團體在重慶共同組成了「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²⁹「革聯」（簡稱）的成立宣言³⁰，除了重申「祖國抗戰與台灣革命乃一物之兩面，非相輔為用，不足以速其成也」等一貫主張，並進一步指出了將來台灣在祖國的「海上國防」上的重要地位；另外，反映「革聯」與國民黨政府的進一步關係，該宣言在最後出現了以「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為運動總則，以及「在我民族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的內容。

依「革聯」秘書長劉啟光在〈「革聯」半年來工作的檢討〉³¹一文所說：「革聯」的最主要工作是促成台灣革命的統一戰線。因此，在「革聯」的推動下，一九四〇年七月，「台灣青年革命黨」和「台灣國民革命黨」加入了組織；接著，在當年十一月七日，由張邦傑（原名張錫齡）所領導活躍於福建沿海的「台灣革命黨」也加入了「革聯」；依劉啟光的說法是：「它已完成了台灣革命戰線的初步統一……蛻變為統一革命黨政的前夜」。另外「革聯」的工作成果包括有：「促進了祖國人士對台灣之注意，提高了祖國政府人民對台灣問題的關心」，「加深了台灣同胞對祖國的向心力」。該文展望未來的中心工作有二：一是加緊推動統一革命政黨的誕生，二是與「祖國當局」建立正常關係。

實際上，「革聯」的這些工作成果與對將來的展望，相當程度地反映了一九四〇年國民黨政府在

抗戰「政略」上的大變化。

該年四月，汪精衛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操控下，在南京成立了偽政府，並改編了一部分國民黨投敵部隊命名為「和平建國軍」，進行維護偽政權以及協助日軍作戰。³²面對這種新形勢，蔣介石於一九四〇年三月三〇日，命黨組織部長朱家驊等，研擬「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及「鼓動敵國人民群起革命如罷工等等以騷擾敵之後方」、「以減其侵略勢力」；³³依日本學者近藤正己的說法，就是推展「敵後方革命運動」。³⁴於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擬定了方案，謂「台灣本我轄地，茲擬迅速成立本黨黨部，為工作便利計，暫用化名」，開始秘密推動「台灣黨部」的籌設。

在這同時，「革聯」也向國民黨中央提詢了幾個有關國民黨中央對台灣革命的政策與態度的根本問題，因為這些問題關係到台灣革命今後的行動綱領與路線，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在這些根本問題的「問與答」中，國民黨中央明確地向「革聯」回答了：(1)台灣「當然復歸祖國」；(2)有關復歸祖國後的政制，「可成一省或一行政區，依照地方自治原則組織各級政府」；(3)對台灣革命運動的具體意見，在組織方面「可暫稱為台灣國民黨」，在統層問題上「可暫保獨立性」……等等。³⁵

國民黨中央對台灣革命前途的明確回答，拉近了台灣革命者與國民黨的關係，增大了向心力，大大鼓勵了台灣革命運動的信心。自此，「收復台灣」的「復省運動」，便成了台灣革命運動的中心目標；李友邦在一九四〇年八月的〈台胞未忘祖國〉一文³⁶的結尾，開始公開指出台灣義勇隊以「保衛

祖國，收復台灣」為鬥爭目標。結束了「台灣獨立與復歸祖國」的革命二階段論，一舉把台灣革命的目標提到「收復台灣」的高點，而且把「保衛祖國」當作「收復台灣」的最高前提。這也促成了「革聯」向更緊密的統一組織發展——「台灣革命同盟會」的成立。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在蔣介石指示了「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的新「攻略」後，台灣各革命團體幾經協調磋商的結果，在「革聯」的基礎上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簡稱「革盟」）。使數十年來分散在祖國大陸各地的台灣革命團體終於有了一個統一的機構，在新的抗戰形勢下，以這個機構為中心，集中一切力量統一腳步，共同推動「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目標。該會的宗旨為：「本會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以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與祖國協力建設三民主義之新中國」。從這宗旨來看，「革盟」的新特徵有二：首先，它正式納入國民黨的領導，（實際上，「革盟」先是隸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成為受其資助的民眾團體；要遲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國民黨中央才正式公開承認「革盟」的地位）。其次，便是第一次提出了「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目標。

「革盟」的組織形態，隨著抗日戰爭的推移，「收復台灣」的目標日愈接近，為了適應新形勢，可以說每年一變。創立之初，總會設主席團採委員制，分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總會下設總務部、組織部、宣傳部及行動部，並分別在金華、漳州設北方執行部和南方執行部；在地方則設地方分會、區

分會及直屬區分會。但經過一年的運作，因大陸幅員遼闊、交通不便、聯絡不易，功效不彰。因此，在第二年（一九四二年三月）的全體代表大會中決議變更組織形態，取消主席團制與南北執行部，改設常務委員制，加強總會領導力，下則加強分會制以強化執行能力；因此成立了西南、福建兩地方分會，四直屬區分會及兩直屬地方分會。一九四三年底因國際局勢漸趨有利，抗戰勝利在望，收復台灣指日可待。為了進一步推動台灣黨務，以及建政、建軍等「建設台灣」的工作，並擴大國際宣傳，在該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開羅宣言發布後），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決定改常務委員制為主任委員制，設總務、宣傳、組織三組，並增設「建政委員會」、「建軍委員會」、「文化運動委員會」以及「行動總隊」、「工作視導室」。³⁷在組織關係上，自設立迄抗戰勝利，「革盟」隸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一九四〇年一月開始秘密籌備一九四三年四月正式成立的台灣黨部，並受其資助。在平行關係上，則與「台灣黨部」、一九四四年四月陳儀主持的「台灣調查委員會」和謝南光任職的「國際問題研究所」之間，不論在成員上和業務上都有緊密的關係。³⁸

自從一九四〇年六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回答「革聯」有關台灣政策的提問時，表示了台灣將「復歸祖國、建省或行政區」後，隨著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進展，國民黨的主觀政略構想逐步化為現實條件，使「收復台灣」的目標也逐步接近。首先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發動了珍珠港奇襲，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第二天，中國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發布「對日宣戰文」曰：

「茲特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特此布告」；亦即通過對日宣戰，包括「馬關條約」的一切對日不平等條約一律廢止，因此台灣也從受縛為日本殖民地的「馬關條約」解放。李友邦在〈三年來之台灣復省運動〉³⁹中說：「由於祖國的宣戰……腐敗的滿清政府所給台灣寫下賣身契——馬關條約，當然也在廢除之列，這一舉使台灣復省運動獲得了法律的依據」。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國際宣傳記者招待會上，在回答記者詢問「戰後之我國，在領土方面是恢復到九一八以前之狀態？抑恢復到甲午以前之狀態？」時，回答說：「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台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對於這個答問，李友邦在前舉文中也如此說道：「祖國對收復台灣，台灣革命運動將有更重大的措置和扶助。這一談話鼓勵了無數台灣革命工作者，打動了無數台胞的心弦，澄清了前此一部份人對台灣革命的誤解。」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發表了「開羅宣言」，該宣言表明：「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至此，台灣復歸中國已成了對日作戰的同盟國的共同誓約，得到了國際的法理地位。李友邦看到了國民政府在開羅宣言後進一步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又聽聞到行政院將成立「接收台灣委員會」，因此在〈紀念「六一七」的意義和任務〉一文中，⁴⁰指出了國民政府的這些具體行動所引起的政治作用有：

- (1) 打擊日寇的「中台離間政策」；
- (2) 粉碎「國際共管」論；
- (3) 號召台胞參加革命工作；
- (4) 激勵在祖國

革命同志。

一直到抗戰勝利為止，「革盟」的主要革命目標與工作成果，有下面幾個方面：

（一）推動復台（光復台灣）宣傳

為了促進祖國同胞與政府加深認識台灣、了解收復台灣的重要性；以及為了號召包括台灣、大陸各地的台胞積極加入「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行列，在重慶的「革盟」推動了各式各樣的宣傳；以招待記者會、舉行「四一七」（馬關條約簽字日）和「六一七」（日殖民當局開始統治日）島恥紀念日、發起台灣光復宣傳週和宣傳大會、進行對敵宣傳和對台廣播以及出版書刊等方式，掀起了「收復台灣」的浪潮。特別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為了使祖國民眾切實了解到「收復台灣」的意義，舉行了大規模的「光復台灣宣傳大會」。會有國民黨政府黨政軍相關單位出席並演說，千餘民眾參加；且各報都特闢專欄介紹各方有關「光復台灣」的言論，把台灣光復運動推到高潮。另外，「革盟」也先後出版了「台灣問題小叢書」、「新台幣畫報」、「台灣民聲報」（從一九四五年四月開始發刊，共出版十期）等宣傳刊物。⁴¹

（二）推動台灣「建省、建軍運動」

一九四二年四月召開的「革盟」第二屆大會發表的宣言，曾疾聲呼籲：

「吾台灣革命者用敢大聲疾呼：在情在理在勢，祖國都應早定收復台灣大計。其最重要一著，就是應該設立台灣省政府，正式承認台灣為淪陷省區。台灣設省，則在台灣的同胞相信祖國決心收復台灣，將起而抗日，將連袂而起。台灣設省，則國內潛伏的台灣力量，可以表面化而用為恢復台灣的生力部隊。台灣設省，則戰爭結束時，同盟國家不能視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無論國內國際乃至台灣省內的觀念，將因此完全一變。」⁴²

「革盟」體認到，單單以「收復台灣」、「復歸祖國」的承諾與口號，不足以號召人心，應該有更具體的籌畫和行動。應早日「建省」以確立台灣在祖國的地位，「建軍」以建立台灣光復軍充實武裝力量，如此才能一舉激發和確立台灣主動的革命力量。該宣言言要情切，充分表露了在祖國從事台灣革命的人士，對「收復台灣」的直知灼見。在該宣言之前的大會決議案中，也具體提到了要「建政」、「建軍」、設立「台灣光復軍」、「組訓幹部」、「設省黨部」、「設三青團台灣支團部」、「增設台灣參政員名額」等建議；最後，決議案把這工作歸結到：「總之，台灣革命工作千頭萬緒，歸結於光復一點。在光復的前提下，建政建軍都要黨國的祖國的熱誠指導。」亦即，這個「建省」「建軍」的構想雖好，沒有「黨國」的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二年，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七日發表的〈台灣革命同盟會為紀念「六一七」台灣淪陷的宣言〉

中⁴³，也再度剴切指陳了早日「建省建軍」的必要性，以及它在「光復台灣」運動中的積極意義；該宣言指出：

「在祖國要擴大建省建軍運動，建省以準備戰後的復原，建軍以參加祖國抗戰及建設戰後的國防，建省建軍運動乃光復台灣的一個階梯，乃引導戰後台灣政治走上與祖國梓鼓相應的一個準備，乃實現民族自決，保存民族生命，擁護大西洋憲章的一支力量。」

最後，該文幾乎用懇求的語氣說：

「最後請讓我們這個被摒棄了的中華民族的兒子，再向祖國陳情，戰爭愈益接近最後勝利了，祖國對付台灣的政策，也就必須愈益明朗：作戰復原均須兼籌並顧：」。⁴⁴

同樣的要求，也在「革盟」第三屆代表大會宣言中再次被提出⁴⁵。在擬呈國民黨中央的〈台灣革命同盟會工作報告書〉中⁴⁶，在「檢討」的部分，更特別舉出了「因祖國不明定台灣為淪陷區，不建

立政制，將台灣編入行政區，在對敵思想戰中，不能取得有利之根據」、「台灣革命工作缺少武力基礎，現在只得依賴宣傳及祖國之武力收復或外交勝利以決定命運」、「經費極端困難，更談不到台灣及淪陷區工作之擴大」等等，實際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在開羅會議之前，亦即還未取得戰後台灣復歸中國的國際承諾之前，「革盟」已不斷請求國民黨政府要儘快確立台灣在中國憲政上的地位。儘速建省、建軍、組訓幹部，以有利於推動「收復台灣」的革命工作。特別是，「革盟」再三要求建立「台灣光復軍」，希望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協助國軍或盟軍收復台灣；因為沒有建立自己的武裝基礎，「革盟」只不過是一個政治宣傳機構，沒有實際的力量。再加上經費短缺，處處依賴「黨國」，沒辦法自己展開工作，最後只得「依賴祖國武力收復或外交勝利以決定命運」。早已呈露「力不從心」的無奈和不满。

在〈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⁴⁷一文中，李友邦指出了台灣革命的新任務，將是「建設台灣，保衛祖國」。他說：「台灣革命的內容，必然隨著世機國運急遽的轉變，將由『保衛祖國，收復台灣』而進入『建設台灣，保衛祖國』」；他認為，在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尚未廢除，日寇末日尚未操算以前，「乃以『保衛祖國』的方式來達到『收復台灣』的目的，即以求得領土完整、民族自由為『保衛祖國』的內容」；今隨著勝利接近，台灣革命的新任務，「即將以『建設台灣』為『保衛祖國』之方式，以『保衛祖國』為『建設台灣』之內容」。而「建設台灣」必然以「建省、建政、建

軍」為其起點，亦即「建省建軍」已成為台灣革命的新任務。

在同一時期（一九四四年六月）發表的另一篇〈台灣復省與收復台灣〉中，⁴⁸李友邦明白指出了「台灣復省」與「收復台灣」兩者在不同層次上的意義。他認為「台灣復省，乃為目前對日寇之政略打擊；而收復台灣，則為盟國對日寇之戰略進攻」；他進一步說明了台灣將來對祖國的安全和海上國防的重要性，對遠東和平也舉足輕重，因此，為了「縮短反法西斯日寇的路程，就必須將『台灣復省』與『收復台灣』的工作雙管齊下。」

可見得，開羅會議之後，台灣的革命者更把「台灣復省」、「建設台灣」等工作，放在新的位置、新的奮鬥目標，與「收復台灣」齊頭並進。

（三）堅決維護台灣戰後地位與主權

一九四二年，美國遠東戰略小組提了一份機密備忘錄，主張戰後台灣應由「國際共管」。同時，美國著名三大雜誌「幸福」、「生活」、「時代」，也於該年的八月共同隨刊印發了有關戰後和平方案的備忘錄；其中有關太平洋關係部分，在題為〈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文中，提議戰後在太平洋建立一條防禦地帶，將台灣列入國際共管。⁴⁹這個違背中國民族意願、損害中國民族利益的謬論傳來，引起了各方的憤慨。首先，時任立法院院長的孫科發表了〈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⁵⁰駁斥其謬論；其次是，大公報社論（主筆是台灣籍的李純青先生）以〈中國必須收復台灣——台灣是中國

的老淪陷區」為題，以三大理由駁斥了美國的謬論：（一）根據國際公法先佔主義，（二）日本從中國手裡奪去台灣，台灣應該歸還中國，亦即自從中國對日宣戰以後，廢除馬關條約，台灣主權已無條約束縛，台灣已是中國的老淪陷區，台灣與東北四省及「七七」以後的淪陷區性質完全相同，（三）根據大西洋憲章，台灣也該歸還中國。他警告說：「盟國之中如有人做此想頭，必受中國人的強烈反對」，他並乘機向國民黨中央呼籲：「對台灣問題最好即做具體的措施，以淪陷省區待遇台灣，坦直宣佈合理的志望，杜塞歧議，減免將來的爭論」。該社論等於替台灣革命者說了公道話。代表台灣革命團體的「革盟」，則先在一九四三年三月發表了〈戰後台灣問題的聲明〉，嚴正表明：「戰後處理台灣問題，除將台灣之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辦法，均為台灣人民所反對」；接著，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為馬關條約四十八週年紀念宣言〉中痛陳：

「本會希望世界有識之士，為便實現世界和平，必須一致主張台灣應即歸還中國，……無論任何異族統治台灣，均為吾人所反對，誓必反抗到底，雖再犧牲百萬頭顱，十年歲月，亦必爭得民族之自由解放」；同日亦發表了〈告同胞書〉，指出：「惟近來有人在主張戰後台灣由國際共管，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事啊！如果這個主張實現，不但台灣同胞永無翻身之日，則中國國防亦永無建設之期」。

51

「革盟」代表了台灣人民，以堅定的態度，悲憤的決心，駁斥了美國部分野心家的台灣國際共管論，是台灣反對托管論的先鋒。

三、台灣黨部

中國國民黨的革命與台灣革命的關係，最早可追溯到一九一〇年代。當時就讀台北醫學校的台灣殖民地第一代知識菁英翁俊明、賴和、蔣渭水、杜聰明等人，因受閩籍同學王兆培之影響，而於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會，同年九月三日在醫學校成立中國同盟會台灣通訊處，宣傳革命。據說共有會員七十六人⁵²。而最慘烈且最為人知的，莫過於一九一四年中國同盟會會員羅福星在苗栗的革命事件，參加這事件而被日警逮捕者多達五百人以上。另外有一九三四年的眾友會革命事件，其中人物蔡淑梅乃國民黨黨員，該事件共被日警逮捕四百二十七人。⁵³

一九四〇年四月，蔣介石決定了「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的抗戰方針後，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隨即與任職軍委會政治部的劉啟光、宣傳部的林忠、謝東閔等人商量，開始籌組台灣黨部；並商請在香港行醫的翁俊明擔任籌備會主任。於一九四一年初在香港秘密成立了中央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劉啟光任秘書，設組訓、宣傳、總務三科。台灣島內的工作，北部由周天望、南部由莊孟侯負責，另設重慶連絡站（林忠），桂林連絡站（謝東閔）。工作內容為：「在敵軍中發展組織」、「在台灣各地從事秘密活動」，⁵⁴「先從沿海一帶台人工作著手，徐圖深入島內，以島內工

作為主」，⁵⁵「以注意吸收台灣島內黨員，準備策應收復為工作重心」⁵⁶。同年（一九四一年）香港為日軍佔領，遂於一九四二年春撤往廣東曲江，後遷往江西泰和，同年秋開設「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翁俊明擔任班主任，宋斐如任教育長，廣招台、閩、浙籍學員六十人接受訓練。⁵⁷完成了黨務人員的訓練後，國民黨中央認為時機成熟，而於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在福建漳州正式成立了中央直屬台灣黨部。它相當於省級黨部，但因為當時台灣政制仍未確定設省，故無「省」字。仍派翁俊明為主委，林忠任執委兼書記長，下設宣傳、總務、組訓三科，以「中正醫院」為掩護展開工作。除派大批工作人員潛赴大陸各淪陷區做宣傳策反工作外，並聯絡島內工作同志竊取情報，鼓勵台胞在敵方軍政機關「乘機反正」⁵⁸。依據一九四四年一月台灣黨部擬呈的《台灣黨務工作意見書》，⁵⁹其中有關黨務工作概況記載：「以陳邦基等四委員駐島內，分負督導任務，並在香港、廈門、上海設聯絡站」，黨員共新徵得四一人「分佈島內各地參加組織」（如果再加上前引林忠的〈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文中所說的，在大陸敵方軍政機關吸收了台籍黨員共有六百八十九人，由此可推計，包括大陸和島內，吸收的黨員總數當在千人上下），在島內曾以「思宗會」名義進行組訓，且運用「北京語研究會」名義，建立了二十五個據點小組云云。

然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發生了主任委員翁俊明遭人食物下毒斃命的離奇事件。翁殉職後派林忠暫代主委，一九四四年春林忠辭去各職後，⁶⁰派旅菲華僑王泉笙繼任主委，廣東平遠人蕭

宜增任書記長，並把黨部遷往閩北福建臨時省會永安。但主委王泉笙一直未到職。迄抗戰勝利台灣光復設省後，中央立即決定將「台灣黨部」改組為「台灣省黨部」，另派李翼中為主委，張兆煥兼書記長。

在宣傳工作方面，台灣黨部曾編印「台灣問題參考資料」供國民政府參考；也利用台語廣播對台灣從事抗日宣傳工作。在為紀念馬關條約四十九週年的《告國內外同胞書》中，⁶¹台灣黨部曾呼籲：希望「全國同胞」須認識「台灣的特殊性」以及「台灣在國防經濟上關係的重要性」，也希望「台灣同胞」須徹底認識「自己是中華民族之一份子」、「須作一切準備」、「須認識三民主義」等；與「台灣革命同盟會」一樣，台灣黨部也曾呈文中央黨部「明令宣佈台灣恢復省制，始足以正內外視聽，而促同胞內向」⁶²，積極推動台灣建省建政運動。

然而，這個在抗日戰火中匆匆設立的「台灣黨部」，從籌備開始就與國民黨內各派系之間的鬥爭，以及在祖國大陸的台灣革命團體革命人士之間的分歧內爭問題脫不了關係。譬如在籌備初期，翁俊明從香港到重慶諮商期間，特務頭子戴笠就曾打小報告懷疑翁的身分，還想限制翁的出境；⁶³在「革盟」的工作報告書⁶⁴中，也曾明文提到：「因台灣黨部籌備處用收買與分化政策對付本會」云云；另外，為了台灣黨部洩密事件，李友邦、謝南光、宋斐如、林士賢、柯台山等「革盟」領導七人，曾以《擁護翁同志及不信任劉（啟光）同志之議決案》上書國民黨中央，理由是劉「在外招搖走

漏黨內消息」、「散布謠言阻礙同盟會工作」等等⁶⁵。一九四四年八月台灣黨部執委丘念台在上呈中央的《台灣黨務改進管見》函中，曾痛陳台灣黨部歷年的缺失包括有：暗樹小組、紛爭暗鬥迭起、疑訐叢生；對於遠遷永安後的黨部，則直陳：「太遠隔工作實境，自只有多事表面文字功夫」，且有「無群眾少黨員、拘束行動、任黨職者多不知台、台島政治人才不參加」等等問題。台灣黨部從漳州遠遷永安，本來就脫離了台人群聚的社會，復又以非台籍人士任主委、書記，更與台胞的實情隔離；再加上內部紛爭，使得台灣黨部很難再發揮其應有的功能。雖然如此，在戰爭末期，它對島內以及散在大陸各地的台胞仍有一定的政治號召力。

四、台灣調查委員會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張厲生，曾呈文蔣介石建議在行政院下設「台灣省籌備委員會」，以為統籌台灣建省的機關。⁶⁶但是蔣否決了這提議，而在統合黨、政、軍的「國防最高會議」下的中央設計局內成立了「東北調查委員會」和「台灣調查委員會」；並派其心腹陳儀接掌「台灣調查委員會」主委，總掌戰後台灣的接收與復員工作。雖然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台灣革命同盟會」以及台灣革命家就不斷呼籲請求「黨國」早日實施建省建軍、組訓幹部等「建設台灣」的工作；期望以此確立在祖國的台灣革命在「復台建台」工作上的正當性，以便號召更多的台灣革命力量加入，以主觀的力量積極參與收復與建設台灣的工作；然而「黨國」並無意於此，而於一九四四年四

月十七日另外設了一個「台灣調查委員會」，主導戰後台灣的接收與建設。從蔣不顧台灣革命團體的呼籲，否決行政院的建議，而囑意以「國防最高會議」主導台灣的收復工作來看，可知蔣對戰後台灣的構想，完全是出於主導戰後軍政的角度出發的。這與出身台灣的台灣革命團體、革命者，從台灣的實情、台灣人民的願望出發，兩者之間有很大的落差。雖然，在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十一名委員中，「革盟」的李友邦、謝南光、黃朝琴、游彌堅、丘念台等台籍人士佔了五名，宋斐如、李萬居、林忠、連震東等也擔任了專門委員，但是卻起不了主導性的作用，只算是「參與協助」了戰後收復、建設台灣的工作而已。

依據《台灣調查委員會一年來的工作狀況》的報告書⁶⁷可知，該委員會有六大工作：（一）擬訂計畫：著手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核定）；⁶⁸（二）訓練人才：設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及「台灣警察講習班」；（三）蒐集資料；（四）編輯刊物：先後編齊了行政、教育、交通……等，十九種類共四十餘萬字的台灣概況叢書；（五）選譯法規：擇要翻譯，共得一百五十萬字分四十七冊，以供台幹班學員及各機關參考；（六）專題研究：成立行政區畫、土地問題、公營事業等三個研究會。

第三節 以「民主」建設台灣

在收復以及建設台灣的工作，完全由「台灣調查委員會」所主導後，「革盟」幾乎只剩下「建言」的力量。從長期投身台灣革命的革命者團體的立場，對於戰後台灣的接收、建設的問題，不斷地提出近乎「逆耳」的「忠言」，希望藉此能使戰後台灣的接收工作能朝更積極的方向發展。從台灣戰後初期多舛的歷史來看，正好驗證了當時這些「忠言」的先見性、正確性。這些「建言」幾乎都登載在「革盟」機關報《台灣民聲報》上（從一九四五年四月創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光復的第九、十期合刊止，共出版了十期）。

從該報上有代表性的文章，⁶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當時台灣的革命者對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工作的真知灼見；今日讀之仍具有啟發性。總括這些言論的要點，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民主」建設台灣，從台灣的實情，台灣人民的願望出發。下面依其議題別概述如下：

（一）要認識台灣，信任、愛護、尊重台灣人

謝東閔在〈認識台灣研究台灣收復台灣〉⁷⁰文中，率直地歷訴了在台灣與祖國的政治關係變化

中，台灣人的處境與心情。他說：

「四十餘年來，祖國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威脅下，最初為打倒滿清不便刺激日本，後又因內憂外患無暇顧及，以致對台灣人未能予以正當的看待。日寇把握了祖國的這些弱點，便盡量用領事裁判權與對岸政策來破壞台灣人與祖國的傳統關係。自此以後，祖國一部份人士對台灣人便由『疏而遠之』一變為『恨而惡之』，於是台灣人便陷於『既不容於敵人又不容祖國』的苦悶中。這種苦悶，尤以戰前（按：指全面對日抗戰的一九三七年）歸回祖國的台胞體驗最深刻。抗戰軍興的頭一年，歸國台胞的這種『苦悶』曾一度變為『恐怖』，因為在『寧錯殺百人，不輕放一人』的口號下，他們的生命隨時都會成為問題的緣故。」

接著他進一步說：

「抗戰的大火逐漸把台灣與祖國的隔膜燒掉。……在今天，台灣的命運已和祖國的命運一致了，然而，光是『提起』或『談起』還是不夠，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去研究它、認識它。」

他建議大家至少要認識到台灣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按：指台灣對祖國安全的重要性，這與李友邦曾提及的，要以收復台灣、建設台灣來保衛祖國的意思一樣）。

台籍大公報記者及社論主筆李純青，在一篇題為〈由「七七」說起〉⁷¹文中，由台灣革命的「民族主義」說起。他說：台灣民眾為不做日本奴隸，為反抗其榨取與壓迫，曾長期進行革命鬥爭，

「但如無中國『七七』抗戰，則其解放固邈不可期，縱使解放，也未必是歸宗中國。在由中國抗日到世界大戰的大時代中，台灣問題被解決了，並且是與中國共享勝利，獲得民族主義的解決，這一解決實與台灣人民的革命目的相符。」

因此他認為，台灣人民「自動願意回返中國，非僅靠血統可辨，需有不可消滅的『民族意識』」。而他們為什麼要回中國呢？「在某種意識上，因為不做殖民地，是要求平等」，亦即，他認為台灣人民願回返中國，是因為同樣反抗日帝，基於不作殖民地、要求平等的民族意識所致。接著，他把這種「民族意識」歸結到戰後台灣的建設問題，他主張：「解放後台灣在中國的政治地位該獲享完全平等，不能公然或下意識再看台灣是個殖民地，如此則違背民族主義」。另一方面，他也強調：

「不能以台灣人的血統與我們相同，把台灣問題看做一般問題」，應該要重視台灣革命團體的號召力，只有台灣人的革命團體，「才能親切地打進台灣島內及鼓動台灣民心」。

李純青清楚地指出了，在收復台灣時，要充分正視台灣人民不願再做殖民地、要求平等的民族主義願望，更要重視台灣人革命團體的號召力。

謝南光在台灣光復時寫的〈光明普照下的台灣〉⁷²中提到：現在，原來為反對帝國主義統治「抗日」的革命目的已完成，從此以後的任務不再是「抗日反帝」運動，而是參加「建國大業」，而建國的中心便是實施憲政，完成地方自治，建設民生主義新經濟，為實行社會平等民族平等而奮鬥。他反覆強調：「民主政治是台灣人五十一年來追求的政治理想，不要讓台灣人失望。我們帶進去的政治必須比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舊制來得進步，來得光明」。他認為：台灣的教育程度高、人民奉公守法、法治基礎已具有，「只要信任台灣人，愛護台灣人，尊重台灣人，幫助台灣人達成它們的政治願望，一切的問題都可以很容易解決」，他告誡台灣的「軍政負責人」：「不要將政治光明前途斷送於官僚手中。」

（二）對於台人「奴化」論以及「嚴厲再教育」論的批判

許多文章都一致批評了認為台灣人受日人「奴化」很深的論調。因為「奴化」論者，經常持這種理由主張台人不適合實施憲政和地方自治，而應該實施「再教育」、「嚴厲管理」，宜先實施軍政訓

政後再實施憲政。對這問題，李萬居也特別為文〈台灣民眾並沒有日本化〉，反駁了「奴化」論。有一署名「如紹」的作者，更憂心地指出：倘若如此，則台灣之歸還中國就與台灣人民真正的自由解放有很大的差距，台灣復歸祖國就不意謂著同時台灣人民的自由解放了，他打比方說：「這正與推倒滿清並非中國即已自由解放」，是完全一樣的道理；因此他特別羅列了過去的台灣解放鬥爭的真正動機和目的，說台灣人民熱望排除日寇歸宗中國，是因為「希望在同族民主政治下，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希望復歸祖國不僅是形式的解放，而是要「實在的自由的獲得」。

他更嚴厲的批判了「只看到台灣美麗的肥地，而看不到怒髮衝冠的台灣人民」的錯誤看法；李純青也在前舉文中批評了這種視台灣遍地黃金，「憧憬挾雜著邪念」的錯誤想法。

謝掙強在〈憲政實施與台灣〉文末，剴切呼籲：「最後我們衷心希望台灣問題或準備接收台灣的人士，對於台灣實情和台灣人的特性及其願望，應該更進一步去研究和了解，將來一切政治設施，才不致南轅北轍，使同胞陷於絕大失望的深淵。」

（三）爭取參與民族解放戰爭，光復台灣

即使到了最後時刻，「革盟」的成員都還在積極爭取參與軍事武裝收復台灣的戰鬥機會，他們紛紛表明：「給我們以更大的流血流汗的機會，同時這也是我們的權利」（謝南光），「咸願成為摧毀敵人力量的先鋒」（謝南光）。「中央應准許同胞以參加國軍或盟軍從事收復台灣的工作」（李

萬居)。署名孟萱的作者在〈爭取台灣解放是時候了〉文中，特別指出：對台灣工作的任務，不應「看作是單純的復工」，「準備一些戰後的接收措施就夠了」，而應該當作「民族解放戰爭」的一部份，絕不能「用事務的處理來代替解放的戰鬥」，因為「台灣的歸宗與台灣的解放，都必須是人民的、民主的，和革命的戰鬥」，不能「只著眼於收復後的接管」，那是消極的、有害的，「對戰局是很容易發生等待」，這「很容易使解放後的台胞誤認為不是自己的政權，而是大批來自祖國的行政官員，加以收復人員未盡諳語言、習俗及已被日寇近代工業化了的台灣行政與社會，難免不因技術上的措施失當，而招致政治上的不滿」。作者主張，只有通過由台灣人民自己參與的民族解放戰爭，經過戰鬥，由台灣人民的手來解放自己，而不是完全由祖國大陸來台接收，如此，才不會因戰後初期的困難，而把責任歸究於祖國的接收。這種看法，指出了不戰而「復」的台灣光復所潛在的根本問題，光復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以及今天盛行的「外來政權說」，不就是根源於此嗎？

(四)以「民主」建設台灣

《台灣民聲報》上的每篇文章，幾乎都不斷呼籲：

1、提早宣布台灣在中華民國憲法上的地位，給台胞參政機會。

2、收復後應與國內同時施行「憲政」，並制訂「省憲」，實施地方自治，立即給予台胞以政治、經濟、教育、工作的平等，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四大自由。

3、經濟上實行民生主義、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獎勵公營共營事業。

4、社會上實行男女平等與民族平等，廢除社會歧視及民族偏見。

5、尊重台灣實情，推行「做的」而不是「講的」三民主義。

6、應「具體而切實」，決不應「虛偽空洞」，應顧全苦難民眾的福利，尊重淪陷區同胞的民意。推行「做」的三民主義而不是「講」的三民主義，要杜絕假主義之名而行取利之實的弊病。

7、「要祖國上下以留東（按：指日本）五十年的『老留學生』來看待台灣人民，倘如以日本殖民或日本奴隸（一般台灣人都具有反抗精神的），看待台灣人，那麼中國之收復台灣，無異中國之殖民台灣了」⁷³

8、必應使軍事權與行政權分立，始可防專橫獨斷於久遠。

9、莫以為台灣產業豐富而視為可重稅以裕國庫。⁷⁴

10、語言與文字的改換，宜採用「緩進暫替」政策，一方面普及國語國文，但一方面仍須承認與閩南語相同的台灣語為暫時公用語。⁷⁵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民聲報》最後一期，有署名「臬紹」者著文〈公理勝利聲中提論台灣人民合理要求〉⁷⁶，文中列舉了十條台灣人民合理的要求後，在文末如此說：

「最後『抗戰勝利』之後，還有艱巨的最後『建設勝利』。前者雖已來到，而後者則遙遙不可期。台灣人民雖然無法全體參加爭取最後勝利的抗戰——因遭日閩從中阻隔，但卻要求全體參加最後勝利的今後建設，我們希望台灣人民這一要求能被採納！」

但是，由於「我們這次勝利，是同盟國（按：指美國）的勝利，而不是單獨勝利」⁷⁷這樣的國際條件的制約，以及依「團結統一」的中央心態所制定出來的戰後台灣政制——「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⁷⁸，所表現出來的中央獨裁作風，使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背離了「革盟」當初的期待。「革盟」所指出的問題，一一在光復後出現，積鬱的矛盾，終至造成了二二八的不幸事件。「革

盟」的奮鬥歷史和建設台灣的言論思想，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很深刻的現實意義。

結語

從一九三八年李友邦的「台灣獨立革命黨」重新恢復公開活動，並組建了「台灣義勇隊」以來，在中國抗日戰線上活躍的台灣革命團體，它們的革命任務，從「獨立，返歸祖國」的革命二階段論開始，歷經「保衛祖國，收復台灣」，到「建設台灣、保衛祖國」。開羅宣言發佈前後，勝利在望，他們的革命中心任務，明顯地已轉移到如何「建設台灣」的問題，開始積極向國府爭取「建省建軍」；然而，國民黨政府對他們的願望並無積極的回應。到了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另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直接主導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後，台灣革命團體只得到從旁參與協助的角色；他們一方面積極爭取參與收復的工作，一方面不斷地提醒、批評國民黨政府主導台灣工作的人員，要尊重台灣現實，主張創立「省憲」、實施地方自治……等，極力呼籲以「民主」建設台灣。然而，即使國民黨政府也必須依靠美軍支援才能順利接收整個中國遼闊的淪陷區的政治現實中，以及國共內爭的新的戰後現實下，台灣革命團體的「民主」建設台灣的呼籲，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無論如何，台灣終於脫離了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這個歷史結果，可以說基本上已達成了台灣革命團體的歷史任務，以及革命志士們民族解放的心願。只不過，他們對戰後台灣「民主」重建的心願並沒有得到實現，而抱著未實現的願望匆匆走進了台灣光復後的新歷史階段。

對於台灣光復後，逐漸顯露出來的行政長官公署的「集權」體制與台灣社會的「民主」願望之間的矛盾，省籍詩人、美術家、評論家王白淵先生，曾在〈給青年諸君〉⁷⁹一文中，如此冷靜分析道：

「中國好不容易才剛從長期的半殖民地型態解放出來，台灣也剛剛從典型的現代殖民地解放出來，從歷史來看，兩者都只不過才剛踏入現代國家的入門口；雖然為政者和人民一開口都是『民主』、『民主』，但是，不管從現實的那一方面來看，都看不到具有可能實現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對我們來說，民主政治仍然屬於理想的境界，現實上，半殖民地的或是殖民地的殘渣仍然深深地纏繞著我們，形成令人窒息的空氣，這是歷史課予我們的現實。……現在我們處於中國的一隅，台灣的現實正是全中國的縮影、它的一斷面……希望好好看清歷史的方向，朝向建設民主主義中國邁進。」

謹以王白淵的這段話，鑑照前述的「台灣光復運動」諸問題，希望有助於提高歷史的視野。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七日完稿

註釋

1. 《台灣年鑑》黃玉齋主編，一九四七年由台灣新生報出版。二〇〇一年由海峽學術出版社再版。參閱 P.1982。
2. 《中國現代史專題報告》第三集 P.255 P.313，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三年。
3. 《中國現代史史料叢書》第一、四集，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一九九〇年。
4. 該文刊登於《台灣風物》第四十卷第二期，另參閱《台灣、中國、一二八》，夏梁和等譯，稻鄉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5. 《總力戰と台灣》，近藤正己，刀水書房，一九九六年。
6. 《日本の歴史》（下），井上清著，岩波書局，一九八五年。
7.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P.183，帕米爾書店，一九八七年。
8. 這部分的各抗日團體宣言，主要引自《台灣省通誌》卷九革命誌，台灣省文獻會編，眾文圖書公司印行。以及《台胞抗日文獻選》，王曉波編，海峽學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9. 《台灣各黨派與海峽兩岸關係》，沈駿、趙玉蘭主編，華中師大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10. 《台灣人民歷史》，陳碧笙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11. 參閱註 8，P.104。
12. 《抗戰時期收復台灣之重要言論》，秦孝儀主編，P.277，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一九九〇年。

- 13 · 《李友邦與台胞抗日》，陳正平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P.28。
- 14 · 同前註，P.34。
- 15 · 《台灣先鋒》第一期，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台灣義勇隊。
- 16 · 同前註。
- 17 · 《台籍志士在祖國的復台努力》，秦孝儀主編，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一九九〇年，P.305。
- 18 · 參閱註 5，P.484。
- 19 · 同前註 12，P.64。
- 20 · 《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編，北京出版社，一九九六年，P.64。《中華民國實錄》(二十一)，吉林人民出版社，P.2254。
- 21 · 同前《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P.81。
- 22 · 同前註 5，P.458。
- 23 · 同前註 13，P.47。
- 24 · 同前註 13，P.81。
- 25 · 同前註 12，P.14。
- 26 · 同前註 2，P.264。
- 27 · 同前註 12，P.14。
- 28 · 《謝南光著作選》，海峽學術出版社。

- 29 · 同前註 5，P.531。
- 30 · 《台灣先鋒》月刊，第二期，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P.6。
- 31 · 《台灣先鋒》月刊，第六期，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P.11。
- 32 · 《中華民國實錄》（三上），吉林人民出版社，P.2429。
- 33 · 同前註 17，P.305。
- 34 · 同前註 5，P.493。
- 35 · 同前註 17，P.307。
- 36 · 同前註 12，P.15。
- 37 · 同前註 2。
- 38 · 同前註 2。
- 39 · 同前註 12，P.64。
- 40 · 同前註 12，P.198。
- 41 · 同前註 17，註 2。
- 42 · 同前註 17，P.125。
- 43 · 同前註 17。
- 44 · 同前註 17，P.134。
- 45 · 同前註 17，P.216。

- 46 · 同前註 17 · P.139。
- 47 · 同前註 12 · P.204。
- 48 · 同前註 12 · P.220。
- 49 · 同前註 2 和註 6。
- 50 · 同前註 2 · P.279。
- 51 · 同前註 17 · P.133。
- 52 · 同前註 17 · P.298。
- 53 · 同前註 8。
- 54 · 同前註 17 · P.308。
- 55 · 同前註 17 · P.304。
- 56 · 同前註 17 · P.383。
- 57 · 《台灣光復前後史料概述》，林忠著，皇極出版社，一九八三年，P.27。
- 58 · 同前註 17 · P.302。
- 59 · 同前註 17 · P.59。
- 60 · 《口述歷史》四，「林忠先生訪問記錄」，中研院近史所，P.25。
- 61 · 同前註 17 · P.377。
- 62 · 同前註 17 · P.354。

- 63 · 同前註 17 · P.143。
- 64 · 同前註 17 · P.316。
- 65 · 同前註 5 · P.521。
- 66 · 《光復台灣之籌畫與受降接收》，秦孝儀主編，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一九九〇年，P.41。
- 67 · 同前註 66 · P.144。
- 68 · 同前註 66 · P.109。
- 69 · 同前註 12 · P.324。
- 70 · 同前註 12 · P.223。
- 71 · 同前註 12 · P.277。
- 72 · 同前註 12 · P.319。
- 73 · 同前註 12 · P.267。
- 74 · 同前註 12 · P.299。
- 75 · 同前註 12 · P.308。
- 76 · 同前註 12 · P.315。
- 77 · 同前註 12 · P.242。
- 78 · 同前註 66 · P.150。
- 79 · 《新新》月刊，一卷七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原發表於夏潮聯合會主辦「台灣殖民地史研討會」（二〇〇三年三月廿九日）

【二二】

日本殖民統治的終結與其遺留的「債務」

第一節 日本殖民統治的終結

一、日落末日

就像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是中日甲午之戰日帝戰勝中國的結果一樣，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終結，也是由於日帝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敗戰所致。因此殖民統治的終結，我們必須先從日本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的末日開始講起。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國納粹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雖已結束，但是在亞洲的中國戰場和太平洋戰場仍在激戰中。只是，在盟軍的戰略總反攻中，日本軍國主義已陷於四面楚歌的狀況，表面上高叫「本土決戰」，暗地裡卻不斷透過蘇聯和瑞士等國向盟軍乞降。

在這同時，經過八十二天的激戰，美軍攻克了日本最後的要塞——琉球島（在這次戰役中，美軍傷亡三萬五千人，日軍傷亡十一萬五千人，琉球島民的死傷更慘重，共有二十萬人傷亡，幾乎是全島人口的一半），可以說，美國大軍已兵臨日本本土的城下。而在中國戰場上，中國抗日軍也開始展開全面大反攻；當年五月湘西會戰後，乘勝追擊，即刻向桂柳地區潰退的日軍進擊；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游擊隊有力地配合正面戰場，切斷了日軍的交通線，包圍日軍占領的都市。到了七月，百萬的侵華日軍已處於戰略被動，陷入遼闊中國戰場的泥淖中。另一方面，蘇聯也於四月五日通知日本，廢除「蘇日中立條約」，這使日本如芒刺在背再度處於北方憂患的狀況。再加上美軍B-29的轟炸機，日夜對日本本土各大都市進行疲勞轟炸，日本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被切斷交通線的日本帝國圈也形同潰解，不但兵源和軍用物資日漸枯竭，生活用品和糧食也消耗殆盡，生產停頓，經濟瀕臨崩潰，民心不安，治安日趨惡化。大多數日本軍國主義的領導者，已開始籌劃如何收拾戰爭的殘局。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當沖繩戰役正激戰之中，幸運地避過美軍登陸作戰浩劫的台灣，也受到了美機最慘烈的空襲；總督府被炸毀了一半，主要都市、港灣幾乎陷入麻痺狀態，都市居民紛紛「疏散」（疏散）到鄉下去。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一直到日本戰敗前的八月十日，台灣受美機空襲的「被害」如下：死亡者五五八二人、傷者八七六〇人，被毀房舍有四五三四〇棟，總計罹災者高達三十萬人。

當時在台南鄉下行醫的作家吳新榮，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底美軍攻上琉球島時，在日記中已透露了「無疑已到了最後關頭」的看法；到了六月六日，他在日記上寫到：

「於是，想到東洋的未來，便非研究中國的政治思想與文學思想不可，所幸藏書中有《中山全集》與《胡適文存》，便著手研讀。」¹

在這最黑暗的時刻，僻處鄉間的吳新榮已看到了曙光的徵兆，而開始秘密地為迎接曙光作思想準備。

七月十六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秘密進行試驗的一種「能徹底扭轉戰局，而且能改變歷史和文明的方向」的新武器——原子彈，試爆成功。這大地加快了日本敗亡的進程。

七月廿六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了「波茨坦宣言」，促令日本盡速投降，宣言的最後，警告日本說：

「吾人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佈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

毀滅」。

在日本仍寄望於莫斯科能代為斡旋講和，以爭取有利的投降條件之時，八月六日，原子彈已在廣島投下，造成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傷亡；接著，八月八日夜，蘇聯對日宣戰並宣布加入「波茨坦宣言」；八月九日凌晨，一百五十萬的蘇聯大軍進軍東北（舊滿洲），追擊被稱為日本最精銳的百萬關東軍；同日，美國又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當天深夜，日本的戰爭領導者齊聚日皇宮地下室，緊急召開「御前會議」，在主戰派和主和派爭持不決的情況下，由日皇「聖斷」接受「波茨坦宣言」。在盟國與日本經過數天有無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問題的折衝後，八月十五日，日本以日皇廣播「停戰詔書」的方式宣布無條件投降。

二、從日本宣布投降到「台灣省受降典禮」

「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明記：「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七日由中、美、英三國領袖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中記載：「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三省、台灣、澎湖等群島，歸還中華民國。」依此，在日本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件投降後，在法理上，台灣澎湖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且將復歸祖國。

日本戰敗投降不但結束了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禍，而且結束了日本侵略中國、殖民台灣五十年的民族悲劇。五十年間中國人民的血淚終於得到了歷史正義的報償。

對於當時超過五十萬在台灣和日本官、軍、民來說，八月十五日的天皇「玉音放送」，真如青天霹靂。因衝擊太大而目瞪口呆，有人數日間呈現虛脫狀態，有人懷疑消息的真偽，認為日本帝國不能做這種事，全體日本殖民者落入驚愕與不安的狀態。一夕之間，他們從跋扈不可一世的殖民統治者、支配者的地位，跌落入戰敗國民、無條件投降的「日僑」、「日俘」的深淵；本來是可以恣意享樂的夢土台灣，瞬間成了四周充滿著異民族復仇怒火的地獄。他們在台灣用殖民高壓積累的財富、地位瞬間成為泡沫，甚至連最起碼的人身安全也不保，將來何去何從也不可預知。依據八月份的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治安報告書記載，當時在台日本人最不安的問題有三：一是，對「本島人」動向的不安，害怕「本島人」報復；二是，擔心「本島」被「割讓」給「重慶政府」後，他們會不會受到「壓迫」、「迫害」；三是，如果將來台灣在「重慶政府」的統治下，在台日本人的「國籍」將如何、私有財產如何、子女教育如何……等等²。

支配者終於嚐到了被支配者的苦汁；當時，台灣人律師、評論家陳逸松對日本人說：

「今後我們立場完全顛倒了，將來日本人可能會嚐到的苦汁，我們台灣人早已嚐過了」³。

另外一面，從八月十五日到當月底的兩星期之間，有少部分的日台「有力者」企圖拒降或推動台灣自治（獨立），以保住其財富或對台灣的統治地位。這些「有力者」，包括了少數的台灣人皇民化大資產階級，因為其利益、地位、思想感情已完全依附日本的殖民、軍國體制，早已成為殖民結構的一部分。他們擔憂台灣復歸中國後將失去一切，或者因他們的皇民身分而受到迫害，為了自保，他們產生了台灣自治（或獨立）的想法或行動。而在他們的背後，以權力和實力慫恿策動的人，就是在台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和居間穿針引線的日軍少佐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少壯軍官。諫山在八月十五日就向安藤總督建議，拒絕敵人登陸並做本島決戰的準備，但遭安藤拒絕⁴。其後，他們轉而策謀由台灣人的御用士紳出面，用民族自決的招牌，以「自治」之名行拒降之實。

這個台灣自治（獨立）的行動，很快就遭安藤總督的斥退而失敗。關於這件事，安藤在八月廿四日的《台灣新報》上，以「本島有力人士來訪」的新聞方式，發表了「時局的急變與本島的今後」為題的談話，他表示：

「還有如『本島獨立運動者』，不管他們是「內地人」或「本島人」，不論採取怎樣的方法，絕對是禁止的；因為它將加重『本島』的災難，而且陷『帝國』於危難中。」⁵

對絕大部分台灣人民來說，八月十五日帶來了天大的驚喜。不但恐怖的戰爭結束了，高壓的殖民統治也將終結；殖民解放後，台灣人將成自由之民獲得平等的地位，而且台灣復歸祖國後，台灣人在一夕間就從殖民地人民變成了戰勝國的國民，大家都沈浸在重重的驚喜之中。雖然如此，最初，大家都還不敢把這驚喜完全流露出來，表現出狂歡的慶祝。因為，日本雖已投降了，但行政、治安的權力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戰時動員體制仍存在，日本警察還在四周逡巡，且二十萬的精銳日本軍隊也還未解體，眼前的一切並未有大的變化，因此大家內心仍存在著不安。

在台南家鄉佳里行醫的吳新榮，八月十五日晚間經友人告知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也頗感驚訝。日記中他記道：沒想到一夕之間，自己已變成歷史的主人，今晚不必再如往常偷偷閱讀《中山全集》，而能公然放在桌面上閱讀了，心中不禁高聲歡呼，「我們正逢著歷史的新頁！」第二天晨起，他從防空壕拿出長期蔽藏的祖先牌位，焚香警告祖先，日本已投降，祖國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隨後，他與友人驅車到河邊脫下衣服跳入溪中，在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中他寫到：

「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汁，上了岸，各人面向海大聲絕叫，自今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

從八月十六日起，吳新榮不再用日文而開始用中文寫日記，當天日記的最後，他用流利的白話文寫道：

「自今日起雖是和平的第一日，但難免有一種不安，無限的動搖」。

他以「不安與動搖」和「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結束了當天的日記。「謹慎與靜觀」，說明了八月十五日到九月初，他和台灣人民的共同心情。

進入了九月，兌現波茨坦宣言和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歷史性場面，正一幕幕地上演。八月三十一日，大批盟軍進駐日本本土；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的美軍密蘇里艦上舉行了日本對盟軍的投降典禮；九月九日在南京舉行了中國戰區的受降典禮；還有，九月一日有十八名美軍和國府軍政人員首次登陸台灣以來，美軍、美機、美艦以及國府人員也接踵而至。當時台灣唯一的一份報紙《台灣新報》，從原先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的態度，驟變為民主開放的態度，不但對這些歷史性的事情逐一報導，連國民政府於八月廿三日任命陳儀為中國戰區台灣地區受降主官的消息，以及陳儀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治台方針的談話等等，也都如實的報導。這使幾乎處於信息「孤島」狀態的台灣居民，不分

日人或台人，通過《台灣新報》或廣播，真正體認到日本已經戰敗且台灣將復歸中國的事實，開始務實地面對未來。

在台日人從驚愕、抗拒的心理，轉為憂慮個人的生計和出路，普遍興起繼續居留台灣的念頭，開始改變對台灣人的態度，並心存「日華親善」的想法。

這些歷史性的快速進展，使台灣民眾真正感受到日本帝國已徹底戰敗，原本高高在上的日本殖民者已淪落成「日僑」、「日俘」，台灣復歸祖國已成了鐵的事實。原本害怕日警、日軍而不敢表露的民族感情，一夕之間突然爆發出來，迅速匯聚成昂揚的光復意識。全島各地紛紛成立「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到處懸掛國旗搭建慶祝光復牌樓；各家店舖都擺出了應有盡有的商品，每個人都穿著新鮮亮麗的衣裝，臉上充滿著喜慶的表情，舞龍舞獅，徹夜鳴放鞭炮。對於台灣社會的這種大轉變，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治安報告書，有點酸溜溜地記載著：

「台北已完全成了『支那町』（按：指中國街）。」

「街上的情況，顯然已回復到『支那事變』（按：指七七蘆溝橋事件）前的樣子。」

同時，新生台灣開始萌芽；自發的民眾組織，如「三民主義青年團」和「台灣學生聯盟」等，很快地發展到各地方鄉鎮，並開始取代日漸崩解的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用自己的力量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防止日軍日人蠢動，並積極宣揚三民主義建設新台灣。

十月五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抵達台灣，開始準備接收工作。十月十日，台灣民眾已在台北舉行了第一次慶祝中國國慶大會。接著國府的軍政人員陸續抵台。十月廿五日，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會上，陳儀交付安藤總督第1號命令，剝奪了安藤的「台灣總督及第十方面軍司令官」的職權和名銜，並任命他為「台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且受台灣行政長官的指揮；命令安藤「對所屬行政軍事等一切機關部隊人員，除傳達本官之命令、訓令、規定指示外，不得發布任何命令」。

陳儀即席廣播宣佈台灣日軍投降，廣播詞鄭重宣告：

「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群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

經過了受降儀式，台灣正式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復歸中國。緊接著便是對日本殖民者的行政的接管和軍事的接收，以及日資日產的接受與處理，還有將五十萬日僑日俘的遣還。這個龐大且徹底的「去殖民」工作，一直持續到一九四七年才完成。

第二節 殖民者遺留的「負債」

在政治上，日本殖民統治已終結，台灣已復歸為中國的一省；行政長官公署接管了政權機關，接收了軍事，接收和處理了日資、日產，遣返了日僑、日俘，進行了徹底的「去殖民」和「民族化」⁹。就如省籍評論家、詩人王白淵所說：「台灣光復是徹底的民族革命」；省籍菁英代表林茂生也說，台灣光復使他發覺了夢寐以求的「民族社會」和「民族國家」¹⁰。

然而，從社會層面來看卻並非完全如此。政治軍事可在一朝一夕間改變，也可能使社會文化的部分樣貌產生飛躍的變化，但除非繼續深入進行社會文化的結構性改造，改變是有限的。也就是說，雖

然政權改變了，但是，大部分的社會結構卻無法快速改變而延續下來。特別是，台灣社會不但經歷了日帝長期的殖民化，更遭受了日帝十數年的戰爭動員化和皇民化、法西斯化，這在世界殖民地史上也是罕見的多重的社會扭曲。台灣社會就是背負著這種多重的沉痾復歸中國的。雖然日本殖民統治終結了，殖民者也被遣返了，但在台灣的社會、經濟、文化上卻遺留殖民的負債；遺留下來的是沉重的、無形的社會負債。它包括三個方面：

1. 戰爭體制「竭澤而漁」，使台灣社會「貧困化」。
2. 台灣產經結構高度「殖民地化」、「依賴化」。
3. 皇民化運動遺留的精神負債。

一、高度殖民化經濟的崩解

一般而言，帝國主義占有殖民地、統治殖民地的最根本目的，不是別的，就是在榨取殖民地的經濟利益。為達到這目的，殖民者必然會改造殖民地的傳統經濟，使殖民地生產殖民宗主國經濟所需求的產品，結果使殖民地經濟高度依附宗主國的經濟結構。同樣地，日本殖民台灣的早期到中期（一九三〇年止），其主要目的也在經濟榨取。早期是強制把台灣傳統經濟特化成蔗糖經濟；到了中期（一九二四年以後），又致力於蓬萊米的移植和生產，使台灣經濟特化為供應日本的一米糖經

濟」。不管是蔗糖或是蓬萊米，都是為了供給日本在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龐大都市人口消費所需，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結果，台灣成為日本的「米倉糖庫」，造成了「工業化日本、農業化台灣」垂直分工的架構。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經濟的底邊，高度依賴日本。

日據末期（一九三七年以後），特別是一九四〇年以後，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南侵政策下，台灣轉變為日本的南侵基地。在日本殖民者的最高戰爭國策下，為了提供日本侵略戰爭所需資源，台灣的「軍需工業化」取代了原來的「米糖經濟」。為了達成這目標，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社會進行了法西斯的統合強制，集中全社會的生產資源於軍需工業的擴張。這種殖民地的軍需工業化，並非台灣自足的工業體系，而只是日本壟斷資本垂直分工的一部分末梢；台灣只生產粗製品或半成品，精製階段則在日本進行。這使得台灣的產經結構更加依附日本；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台灣本地資本的萎縮、衰退和依賴化。

不管是糖米經濟或軍需工業，台灣的殖民地經濟完全依賴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圈（包括日本本國、朝鮮、舊滿洲、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等）。因此，日本戰敗，日本帝國經濟圈崩潰後，台灣的殖民地經濟也自然隨之崩潰，生產停頓。譬如：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化學肥料和中國東北豆粕肥的台灣米糖生產，在日本戰敗後，甚至早在一九四四年台灣對外交通被盟軍切斷後，立刻受到嚴重的打擊，生產量快速減少到戰前的一半以下，成為光復後米荒和糧價暴漲的原因。其他如各種軍需工廠，因為缺少零

件，沒有原料和市場，無法繼續開工生產，以至於造成嚴重的停工和失業問題。

台灣總督府的最後一任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在其日記《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我的終戰秘錄》中，對這問題有很清楚的紀錄。他在日記中記道：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二日，帝大出身的台灣青年郭（秋煌）君與邱（永漢）君來訪，一起談到：因為台灣曾是日本唯一在熱帶圈的土地，所以台灣有了超過其實質以上的繁榮景象，今後在美國支配下的世界，在產業上台灣將會面臨異常衰退的現象，蔗糖業幾乎不可能重建，特種作物也會衰頹，稻米則不敵西貢米。我認為台灣經濟將落入疲憊的深淵。九月十四日，與陳逢源君會談：

台灣經濟的未來，必然陷入異常疲憊的狀態。

工業方面：除了特殊的雜項工業外，即將全面停頓。只有以鹽為原料的工業和硫酸肥料工業，有一點將來性。

礦業方面：除了煤礦以外都沒有希望，金、銅、石油等礦業也一樣。¹¹

這位前殖民政府的重要經濟官僚，在日本戰敗後對台灣經濟前途的看法，清楚地指出了台灣殖民

地性質的產業和經濟，在殖民統治終結後，「必然陷入異常疲憊的深淵」的真相。其原因，除了戰後世界普遍的經濟蕭條以及戰爭動員後的物資匱乏等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殖民地經濟的大的結構性問題；亦即五十年間依附日本帝國經濟圈，從一開始便被強制為日本帝國經濟底層的一部分，不管是糖、米或是軍需工業都屬於殖民地性質的經濟結構；其輸出入也完全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一旦日本戰敗、帝國經濟圈崩解，台灣的殖民地經濟當然也隨之崩潰、衰頹，使新經濟的重建十分困難。光復後國民政府雖然接收了許多日資工廠，但都荒置無法開工；許多人批評這是由於行政長官公署的無能，但長官公署有能無能是一回事，這並非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其實是台灣殖民地性質的產經結構隨著日本戰敗而崩解，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重建的。這也正是日本殖民統治遺留給台灣社會的最大負債。

二、戰爭動員體制對台灣社會的「竭澤而漁」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次年日本政府公布實施「國家總動員法」；為了供應侵略戰爭所需，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包括「生產力擴充計畫」、「物資動員計畫」等。台灣總督府也即時對殖民地台灣施行了同樣的政策，對台灣社會進行了各方面的「戰爭總動員」，實施法西斯式的管制，集中整個社會的資源擴充軍需工業，徵調台灣的財力、勞力、人命供應日本侵略戰爭所需。它包括三方面的「竭澤而漁」。

（一）強制性的「國民儲蓄運動」

台灣總督府從一九三八年開始，自上官公署、公司、工廠，下至保甲末端，建立了各種「儲蓄組合」。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以皇民奉公會為中心，進一步推行強制性的儲蓄運動，依每戶的課稅額強制分攤「儲蓄額」。名為「儲蓄」，實質上是變相的「徵稅」。

據統計，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在台灣強制徵得的「儲蓄」，總額達二十億五千六百萬圓。這些被集中在銀行體系的巨款，其半數用於購買日本中央政府為侵略戰爭而發行的「國債」，高達十一億三千萬圓¹²；另外一半，總督府用強制的手段優先轉貸給「軍需工業」。不管是哪一方面的用途，結果這些從台灣社會徵集來的「儲蓄」，都匯集成了供給日本侵略戰爭所用。

（二）軍事性的「財稅」榨取

從總督府的「財稅」收支額每年直線上升，就可以知道，殖民者如何透過「財稅」手段，榨取殖民地的財富，將侵略戰爭的開支轉嫁給殖民地人民了！

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四年，總督府財稅收入膨脹了四倍，支出則膨脹了三·八倍。而台灣人民每人每年的財政負擔額，則由一九三六年的十五·八六圓增長到一九四四年的一五六圓，足足膨脹了十倍之多¹³。其中，以支應日本侵華戰爭的名目，直接對台灣民眾課稅的戰爭稅有：一九三五年

以處理「九一八事變」為名目，開徵的「臨時所得稅」；一九三八年開徵了「支那事變特別稅」；一九四三年開徵了「台灣大東亞戰爭特別稅」等。

除了上述課稅的軍事性之外，台灣總督府的財政支出也是軍事性的。「七七事變」後，總督府的財政支出中增列了巨額的特別預算，撥款給日本中央政府，分擔日本的軍事費。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四年，共達三億八千円（一九四四年，這支出就占了台灣總督府財政支出的30%左右）¹⁴。

如果把這部分上繳日本中央政府的財政負擔，加上前述強制儲蓄所得款項的一半購買了日本中央政府的「國債」來看，我們可以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日本政府在發動侵略戰爭期間，透過「國債」以及總督府財政負擔的方式，間接榨取了台灣人民的財富總額高達十五億三千多萬円。如果把這個巨款與這期間台灣總督府的財政支出總額二十五億三〇〇〇萬円來比較的話，則高達60%左右¹⁵；以當時美元匯率折算，則高達三億五九〇〇多萬美元之鉅。另外，總督府也透過通貨膨脹間接榨取了台灣人民的財富。以台北市躉售物價指數來看，如果以一九三七年的指數為一〇〇來算，一九四四年上漲到四六〇，一九四五年更上漲到二二六〇，物價飆漲了二二六倍¹⁶。同一期間，通貨（台銀券）發行量則由七五四九萬円，膨脹到十四億三千萬円，可見得通貨膨脹的嚴重。

由此可知，台灣總督府通過強制儲蓄、軍事性財稅、通貨膨脹等金融、財稅手段，榨取了台灣社會的巨額財富，這些都轉化為日本推動侵略戰爭的物質力量，最終化為煙硝。

(三) 勞動力和人命的軍事動員

從一九四〇年日本發動「武力南侵」東南亞後，殖民地台灣從日本的「米倉糖庫」轉變為日本的「南侵基地」；同時，也成為勞動力和人力的供應地。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為止，日本對台灣的「軍事性勞動力動員」有四部分：

1、「勞務戰士」：應日軍南侵作戰需要而派遣的各種「台灣特設勞務團」，協助日軍的後勤作業，緊急狀態時也充當作戰士兵。

2、供應日本本土或台灣島內的「軍需工業」所需的勞動力。

3、戰爭末期動員全島學生、婦女參與「要塞化」工事作業。

4、一九四五年六月，日本戰況危急的敗戰前夕，總督府宣布廢止保甲制度，公布「國民義勇兵役法」，規定男性十六到六十歲，女性十七到四十歲有服兵役或受徵召的義務，並組成「台灣國民義勇隊」，進入「全民皆兵」的階段。

另外，依台灣總督府所編《台灣統治概要》記載，在一九四五年，總督府對台灣的勞動力軍事動員狀況如下：

動員到島外的人數共有十萬一百六十七人，其中在南洋各地的軍伕（勞務戰士）有九萬

二千七百四十八人；在日本國內兵工場的「少年士」有八千四百一十九人。在島內被動員的勞動力，從事軍需工廠作業以及各地防衛工事作業者，每日高達三十萬人¹⁷。

根據日本厚生省統計，這期間被徵召到「南方作戰」的台灣人軍人與軍屬共有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三人，其中戰死者高達三萬三百零四人¹⁸。

如此看來，短短數年間，日本軍國主義在殖民地台灣進行的勞力、人命的戰爭動員人數，幾乎等於全島的青年人口（大約六十萬）。可以說徹底地動員了台灣青年，供日本侵略戰爭所役使。日本戰敗後，日本「皇軍」潰解自顧不暇，拋棄了這十多萬台灣青年流落在南洋各地戰場，自生自滅，等待救援。

（四）「竭澤而漁」後的「米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的短暫一個月期間，台灣市面上曾經有過極短暫的榮景；由於戰後商人囤積的商品大量釋出，軍用米流出以及舞弊盜賣等，各種商品源源流出，市面上商品堆積如山。在台日人、日軍，因為總督府已先發放了退休金以及一年的津貼，在金錢上頓時富有了起來；另一方面，由於淪落為戰敗國民、前途難卜的焦慮狀態下，產生了「自暴自棄」的浪費行為，紛紛闊步於繁華市街。

然而，沒有以生產為基礎的大量消費是不可能持久的，這個榮景很快就化為泡沫。由於戰爭動員的竭澤而漁，一九四五年台灣各生產事業的生產指數跌到一九三七年的一半以下，特別是米糧不足的問題更為嚴重。到了九月下旬，物價開始上漲，市場上一斤米原來已跌到二元以下的價位，現在開始節節上漲。十月十日漲到二元以上，到了十二月更飆漲到八元，而且還不一定買得到；這大大壓迫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薪水遠遠趕不上暴騰的物價，已到了「米荒」的地步。

陳儀蒞台之前就已創刊的《民報》，在創刊後第五天（十月十五日）的社論便指出了有關米糧不足的問題。題目是「吃飯的問題 第一要費心」，該社論對糧食問題表達了憂心的看法。還有，十一月創刊的《政經報》也特別舉辦了一次「糧食問題對策」的座談會，會中有人提到：「現在的保有量和第二期的收穫量，絕不能維持到明年五、六月，到明年二、三月就會進入飢餓狀態……這二百五十萬石食米，能否維持七百萬人口的糧食到明年五、六月？」¹⁹原來是「米倉糖庫」的台灣，竟然出現了米荒。

實際上，一九四五年台灣稻米的總產量只達到七百四十七萬公石，未及一九三七年的一半²⁰，是絕對不足的狀況。其根本原因就是前述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戰爭動員體制所遺留下來的「負債」，當時有人稱之為敵人「預伏的炸彈」。譬如，光復後「米荒」的原因包括：日本帝國經濟圈崩潰，交通中斷，使高度依賴日本本土的化肥和滿洲的豆粕有機肥無法進來；其次，台灣的青年勞動力幾乎全被戰

爭動員去了，使農村勞動力極端不足；而且農業生產資材全被集中動員到「軍需工業」，灌溉水利荒廢，生產資材不足；再加上，盟軍空襲使交通、設施嚴重破壞，一時不及修復等等。

三、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精神負債

日本殖民統治遺留給台灣社會的「負債」，除了前述經濟、物資方面的問題之外，還有精神、意識層次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皇民化運動」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負債」。

日本敗戰，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光復之初，由於亢奮的光復意識籠罩了一切，大家忙著歡迎祖國、學習白話文，回復漢民族社會的生活習俗；使殖民以及軍國主義戰爭動員中被扭曲的社會意識（皇民意識），暫時被掩蔽了下去。雖然，報刊以及有強烈民族自覺的台灣文化菁英，一開始便努力推動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運動」，積極進行精神文化的「去殖民」工作；而國民政府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也明載「接管後的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²¹，且逐步施行；但是經過殖民者長期且徹底扭曲的台灣社會意識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全改變；如果殖民後社會公平、安定富足的話，它會潛在化，但是一旦社會不公、混亂貧困，它便會被激化、政治化，甚至意識形態化。

這個問題很清楚地表現在台灣戰後六十年的社會精神史上，譬如前「總統」李登輝，在數年前以「台灣精神就是日本精神」為題的演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使經過了半個世紀、幾度大的歷史

變動，「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殖民者意識形態，其幽靈仍然盤踞台灣社會，且頑強健在。

一般人所說的「皇民化運動」，大致是指一九三七年以後，日本殖民者強行推動的廢報刊漢文欄、改姓名以及皇民奉公會等一連串的措施；實際上，這只是狹義的「皇民化運動」。廣義的「皇民化運動」，應該包括從一九三一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件」起，在台灣實施的「普及國語（日語）運動」；接著在一九三四年推行的「台灣社會教化運動」；一九三五年的「民風作興運動」；一九三七年起廢止新聞雜誌的漢文欄；一九四〇年的「改姓名運動」；以及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期的「皇民奉公會」等一系列的文化、精神改造措施。可以說，所謂的「皇民化運動」，是在日本的十五年侵略戰爭期間，隨著戰局的變化與需要，在不同時期強制推行的各種文化精神動員運動的總稱。雖然各個運動有個別的特徵和內容，但是它們之間也有共同的內容和聯繫。

譬如「普及國語」運動，便貫穿了各個時期，是「皇民化運動」最早且一貫推行的中心內容。從一九三一年開始，除了學校教育加強「國語運動」之外，在社會各角落，針對一般民眾在市、郡、街、庄、部落都普設「國語講習所」和「簡易國語講習所」。一九三四年實施的「社會教化運動」中，「國語普及」仍然是中心內容；這時所謂的「國語普及」除了有學習日語的語言教育的意義之外，又多加入了強制「社會教化」的意義，開始規定公共場所限用日語，企業、機關雇用條件限懂日語者……等，企圖以社會生活的限制達到普及「國語」（日語）的目的。從當時的「國語」教材內容

來看，裡面全是崇敬皇室、崇拜神社、發揚國體精神等日本軍國法西斯的中心思想。因此，所謂的「國語普及運動」，並非單純的語言學習或一般的語言普及教育，而是利用語言學習為工具進行精神、意識的改造。到了一九三七年的「廢漢文欄」，殖民者用更強制的手段，使漢民族的語言從公共生活中消失，以加速其國語（日語）的普及，使台灣漢民族的語言、思維意識萎縮到家庭內部。一九四〇年的「改姓名運動」，以及所謂是否「國語常用家庭」的名目，把台灣人家劃分為兩個階級；如果屬於「國語常用家庭」，就可得到比非「國語常用家庭」優厚的社會待遇，如較多的食物配給，子弟可進日本子弟就讀的「小學校」等等。此即，用歧視性的手段強制推行「國語普及運動」。

其結果，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十五年間，殖民地台灣的國（日）語普及率竟然從一九三〇年的12%快速成長到70%，當然，其中有很大的比率是僅僅得日常打招呼的日語程度的人，但慣用日語而忘了母語者的比率也高達19%²²。

日本戰敗後，台灣作家、歷史學家楊雲萍首先針對這問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二日的《民報》上，發表了「奪還我們的語言」一文，他說：「日本統治台灣最大的成績，就是造成了許多兒童和青年忘了他們的母語」，他進一步描述到：「台灣光復後，河山雖依舊，但事物全非，而全非的事物中，『語言問題』最嚴重、最厲害」，可見得，所謂國語（日語≡偽國語）普及是日本殖民統治留給台灣社會最沈重的「負債」。特別是「國語」（日語）背後的皇民意識問題，更一直纏困著台灣社會

直至今日。這問題特別集中在當時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兒童這個年齡層，因為他們都是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戰爭期，在戰爭精神動員體制下受教育、人格形成的世代，這個世代不只在語言上，甚至在精神、感情以及價值觀上都受了日本法西斯觀念深刻的影響。這個占台灣人口19%、直接承受了日本殖民文化、語言、負債的世代，在光復後有許多人只會講日語而忘了母語。而他們又是台灣光復後六十年的歷史發展中最有社會能量的世代，他們特別在語言與意識價值上與祖國有重重隔閡，這深深地影響著台灣光復後出現的「省籍隔閡」或省籍情結的問題。

「皇民化運動」的本質，是日本為遂行其侵略戰爭而在殖民地台灣施行的精神總動員運動；其目的在改造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從語言、信仰、風俗到價值認同），灌輸日本法西斯思想（如皇國意識、神社崇拜、效忠國體等），進而從精神上徹底動員台灣的財富、物力、人力供應其戰爭消費。日本戰敗後，遺留給台灣社會的，除了被榨光而衰頹的物質世界外，便是經過二、三個世代也難以解決的被扭曲的精神世界。

註釋

1. 張良澤主編：《吳新榮全集 卷六 吳新榮日記》，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大詔渙發後に於ける島内治安狀況及び警察措置」（第一報），昭和二十年八月。
3.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四号《池田敏雄氏追悼紀念特集》，東京，綠蔭書房，一九八二年。
4. 北條儀兵衛著 海客節譯：「台灣尋夢錄」，台北《台灣春秋》半月刊，一九四九年一月（新年號）第五期～第八期。據譯者的說明，該文原刊載於一九四八年福岡地方報《日本新聞》。
5. 《台灣新報》，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四日。
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終戰後に於ける島内治安狀況及び警察措置」（第三報），昭和二十年九月。
7. 台灣省文獻會編：《台灣省通志》卷十（光復志），台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〇年四月再版。
8. 參閱註7同書。另外請參閱《台灣民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六日。
9. 王白淵：「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二卷二期社論，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五日。
10. 林茂生：「祝詞」，《前鋒》光復紀念號，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

- 11．鹽見俊二：《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我的終戰秘錄》，日本，高知新聞社，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
- 12．李瑞祥：《台灣財政之研究——從殖民主義財政到民主主義財政》，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七〇年六月。
- 13．黃通、張宗漢、李昌權：《日據時代台灣之財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七年。潘志奇：《光復初期台灣通貨膨脹的分析》，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
- 14．參閱註12以及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P.132~138，台北，人間出版社。
- 15．參閱註12和註13。
- 16．袁穎生：《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一九九八年七月。另外可參閱註12、13。
- 17．台灣總督府：《台灣統治概要》，一九四五年台北初版。一九九七年南天書局復刻出版。
- 18．加藤邦彥：《一視同仁の果て》，東京，勁草書房，一九七九年。
- 19．《政經報》半月刊，一卷二期，台北，政經報社，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
- 20．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出版。

21·錄自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庫藏史料；轉引自秦孝儀主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

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一九九〇年十月。

22·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三年五月。吳守禮：

「台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一日。

原刊載於許介麟編著《台灣史記——日本殖民統治篇3》（文英堂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七月）

【三】

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

這是一段台灣史上一直處於空白的時期，至今幾乎未有人涉入過；它就是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翌（一九四六）年一月，一百多天的歷史。這段歷史是台灣的戰前與戰後的交接時期，也是所謂台灣戰後的起點。短短的一百多天，卻是最複雜、最激動，且充滿豐富內容、富有多元歷史啟示性的一段時期。然而，除了十月廿五日的光復節之外（現在連光復節也被取消了），我們一無所知；不但一無所知，甚至還被扭曲了，因為最近分離主義勢力的抬頭，八月十五日幾乎已被「終戰」論所取代。

在「八·一五」六十週年的今日，全面整理這段歷史，呈露這段歷史的真相，應該會使我們的紀念更有意義。重新回到戰後歷史的出發點，聽聽歷史現場的歡呼與嘆息，告誡與啟發，更有助於我們向前邁進。

就在三個月前，台灣媒體連日地報導了歐美各國紀念歐戰結束六十周年的盛況，一時間大家似乎又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氣氛裡；腦際浮現的是好萊塢電影的畫面；英勇的美軍、殘酷的德國納粹、悲慘的猶太人，以為英美軍諾曼地登陸就直接打敗了納粹德國等等。大家好像也一齊度過了「全球化」的歐戰六十周年紀念日。

大家當然不可能想到，當六十年前（一九四五年）的五月八日，納粹德國投降，歐美各國都在熱烈慶祝歐戰勝利的時刻；五月卅一日，如烏雲遮日般的美軍B—二四轟炸機群，正在對台灣進行著最慘烈的轟炸，象徵殖民地威權的台灣總督府也被炸毀了一半。台灣「皇民奉公會」被改組成「國民義勇隊」，台灣人全島上下連兒童也不可免，被訓練拿竹槍竹刀誓言擊退「鬼畜英美」，進行「本島決戰」、「全島玉碎」。也正在那時刻，近在咫尺的琉球，在美軍登陸的激烈戰鬥中，有半數的琉球居民喪命，作了日本皇國「本土玉碎」的代祭品。在同時刻，中國抗日戰爭正進行著堅苦的「湘西會戰」；東南亞各地的抗日游擊隊也正苦戰中。整個東亞洲還在二戰的黑夜中。

亞洲的破曉，要遲到當年的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才來臨；也就是，對亞洲人而言，二戰的結束是八月十五日，而不是五月八日。

同時，對亞洲人民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除了含有世界共同的反法西斯戰爭的意義之外，更重要的它還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對中國人民而言，它是歷經八年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這一點與歐美各國的二戰有很大的不同。

當時，台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徹底的軍事總動員；台灣人民從人力、人心、人命到財力、物力，都被動員成日本侵略戰爭的一部分；台灣被迫處於日本帝國主義圈，甚至成為日帝南侵東南亞、華南地區的基地。

因此，日本宣布投降時，台灣的八·一五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八·一五有很大的不同；是一個十分複雜且充滿矛盾的時刻。八·一五時刻的台灣島上，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當然有尖銳的對立，甚至日本人中的有權者和無力者之間以及日人、日軍和台灣人之間，台灣人內部的皇民化階層與大多數台灣人之間，也各有不同的八·一五；可說是陷入兩極的精神世界。

能夠清楚認識台灣的八·一五，才不會陷入以歐美為主的「全球化」的二戰史觀。

四十年來的國民黨制式的「光復」史觀，在十幾年前被民進黨的「終戰」史觀所取代。台灣的八·一五的歷史真相和意義已被掩蔽了近一甲子，早已喪失了八·一五的觀點；誤解、扭曲、偏見取代了一切。每當全世界都在紀念二戰、反省二戰，從二戰中汲取歷史教訓以作為向前進的火炬時，台灣卻茫然無知；不是靠消費歐美的二戰史觀，就是消費日本的史觀。因此，使我們看不到自己的立腳點，也看不清自己的方向。

六十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把被隱蔽的一段歷史還原其真相，更有必要把充滿偏見、誤解的歷史觀矯正過來。因為這段歷史，雖然是過去的歷史，但乃時刻作用於我們的現實世界。

我們仍生活在八·一五、戰後的世界秩序中；雖然我們已在新的二十一世紀，但仍活在美國霸權的世界秩序中；而其開端，就是在上世紀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彼時，美國取代了戰前的英國霸

權下的世界秩序，而主導世界至今。只有認清自己的八·一五，才能認清自己的命運。

對台灣而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有三個層次的歷史意義：首先，是戰爭結束和平來臨；其次，是日本殖民統治終結，民族得到解放；還有，便是復歸祖國，作為中國民族國家的一省重新出發。因為在同一時刻有這三層次的大變革，因此台灣的八·一五是複雜的，在世界殖民地史上也是罕見的。再加上五十多萬日人日軍的因素，使歷史又變得更複雜。因為複雜，所以很難用一個角度、一個觀點去理解；全面掌握史料，全面的、辨證的歷史觀照是很必要的。

歷史就像混聲大合唱一樣，有主調也有和音；八·一五後一百多天的台灣歷史主調，就是台灣民眾高昂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被日本殖民統治壓抑了五十年的民族情感，隨著日本投降而爆發出來；在八·一五後的數週，先是歡欣中帶著不安和謹慎（因日人、日警還在），進入了九月，隨著日本投降的局勢已明朗，不安消失了，光復意識完全顯露並漸高揚；到了十月，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舉行了慶祝台灣光復大會，熱烈的民族情感達到了最高潮，是台灣現代史上難再復現的一刻。之後，隨著公署在接管、接收工作中產生的問題，以及米價物價騰漲，和人事任用的問題、省籍摩擦問題浮現，批評和失望之情開始出現。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台灣戰後初期的歷史主調開始轉到「民主」問題上去了，開始與大陸上海等地戰後的時代問題有相同的性質和內容。

台灣八·一五後一百多天的歷史意義，就像詩人、美術家、評論家王白淵在一九四六年一月的一

篇評論文〈告外省諸公〉中所說：「台灣之光復，其本質，是徹底的民族革命。」在政治經濟上，國民政府（其代表行政長官公署）接管了日本殖民政權及資產，接收了日資和日產，並遣返了五十萬「日僑」、「日俘」，台灣完全成為中國民族國家的一省。

另一方面，台灣民眾紛紛自發地組織了許多社會團體，從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人民協會、台灣人文科學會，一直到婦女運動等等；報張雜誌也如雨後春筍般創刊，呈現百花齊放的榮景，一時出現了市民社會的雛形。並進行了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運動」，以及中國近代歷史、革命、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出現學習國語的熱潮等等。

可以說，這期間，從政治、經濟到歷史、文化，全面地進行了「去殖民化」和「祖國化」的熱潮，而這兩者是互為表裡、一體的兩面。這是八·一五後一百多天歷史的重要內涵，也是其未完全達成的時代任務。當然，其原動力主要來自高昂的民族情感。

曾健民著《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序文（聯經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八月）

【四】

台灣作家的「八·一五」

一、吳新榮——成為歷史的新主人

在台南家鄉佳里行醫的吳新榮，早就預料到日本將戰敗。在日本戰敗投降的前二個月，便開始偷偷研讀《中山全集》和《胡適文存》。八月十五日那天，有人告訴他中午將有日皇的重大廣播，但因停電無法收聽。到了晚上，友人從台南市回來，才帶來真正的消息，日本果然投降了。稍前，他曾向友人預言日本將戰敗投降，果然料中，自己也感覺驚訝。沒想到一夕間，自己已變成歷史的新主人。偷偷閱讀的《中山全集》只讀到下冊，還剩三分之一，日本竟已投降了。當晚，他再拿出《中山全集》來，繼續讀未完的幾頁。這次他能夠公然將《中山全集》放在桌案上，而不須偷偷閱讀；心中不禁高聲歡呼，我們正逢著歷史的新頁！

第二天朝起，梳洗後，從防空壕中拿出長期蔽藏的祖先神位，焚香祭告祖先日本已投降，祖國得到了最後勝利。隨後與友人驅車到將軍鄉探訪父親。日記中，吳新榮特別記道：

「於此四人各脫衣裝，跳下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起了岸，各人向海面大

聲絕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

從八月十六日起，吳新榮不再用日文而開始用中文寫日記。當天日記的最後，他用流利的中文寫道：

「咳，悲壯乎！歷史的大轉換是一日之中，是一時之間，咳，感慨哉！自今日雖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有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為要光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

吳新榮以「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數句，結束了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他所說的要「謹慎」，就是指雖然日本宣佈投降了，但日本殖民威權仍在。當時台灣尚有二十萬的日軍駐在，僅在數日前，這些日軍仍在不斷叫囂「本島決戰」和「玉碎」，且這些日軍從未交戰過，裝備精良，還有旺盛的戰力。此外，台灣總督府的中央、地方機關還在，各地憲兵、警察、特高等過去日日監視壓迫台灣人的鷹犬仍在四周。日人的動向未卜，二十萬日軍也恐有不軌之舉，世界大勢仍未可測，因此大家表面上雖無限的歡喜，但「內心上都隱存著一種的不安」。同時，數日來也有各種各樣傳言，

謂盟軍將登陸日本，「台灣省主席已定陳儀，副主席謝春木，軍司令是蔡某或李某」等等。

實際上，吳新榮記述的這種氣氛與心理，並非吳新榮獨有的，而是八·一五以後一直到九月初戰後局勢逐漸明朗為止，台灣人普遍的心理與表情。戰爭結束了，「和平」降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府投降了，台灣得到解放，大家都有無比歡欣的表情，這是全世界都一樣的；然而，大戰中台灣並未成為戰場，日本殖民政府和軍隊與戰前一樣，並未有立即可見的大變化，威嚇的氣勢仍在，在這氣氛下，人們都普遍抱著不安的態度，還不敢公然表現欣喜的慶祝。因此，八·一五後二、三週間，台灣人欣喜在心頭，卻不敢公然表現，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種怪異的氣氛中，並未有像中國大陸的重慶、上海等地爆發性的普天同慶的狂歡場面。

吳新榮為了要探究日人的心理動向，應邀到戰時負責特務工作的日本人家去，一同在他家裡的防空壕中吃飯；在物資奇缺的戰後，竟然有豐富的酒菜，吳新榮大感驚訝，自嘲說自己「不客氣地大享這戰後的『餘祿』」。他從這位日人特務口中證實了，在戰爭末期曾流傳的一種說法，說日人有一份黑名單，到戰爭最後階段時，將把台灣各地的反日指導份子集中監禁起來，進行「最後處置」。這位日人表示：「日本到底輸了，自今日起我們變成了敗戰國民」，「軍部也已經無力了，所謂帝國主義也已經消滅了」。

吳新榮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記道：「看此情勢，在台灣的日本人已無他意也是當然之事」。

二、吳濁流——作夢也沒想到的一天

八月十五日，作家吳濁流在鄉下。當天傍晚有朋友來說，中午時刻有日皇廣播，只是聲音沙啞，雜音多、聽不清楚。街上的日人都聚集在街長宿舍，正在商議什麼，好像發生了重大事。吳濁流判斷，不是美軍在台灣登陸，就是日本已經投降，但日本投降的可能性較大。他告誡友人此刻最重要的是要「謹慎」，言務必小心。翌日，他整裝上台北，到了竹北車站，號外已出來了，果如所料，日本投降了。但車站上依然有日本警察炯炯的厲眼監視著，「人們儘管不發一言，臉上卻浮現著無法抑制的喜色」。

吳濁流在《台灣連翹》中，對這個巨大的變化生動地寫道：

「波茨坦宣言威力是偉大的，靠它，台灣終究獲得解放，一切不平等都告消除，和日本人平等了，不再畏懼日本人了。」

「在台灣的四、五十萬日本人，就像警察一樣，經常以猜疑的眼光去看台灣人。」

「在台灣人眼裏等於是警察的在台四、五十萬日本人的優越感，隨著波茨坦宣言一下子解除了，他們都恢復到人本來的樣子。」

吳濁流激動地讚美《波茨坦宣言》的偉大力量，解放了強加於殖民地台灣、恢復了台灣人做為一個人應有的平等地位，也使殖民地的日本人「恢復到人本來的樣子」。對於八·一五他真心感激地說：「我作夢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在這連作夢也夢不到的卻突然來臨的八·一五，吳濁流像站在惡夜盡頭的破曉時刻，對未來私自許了這願望：

「從今以後，一定要建設成比日據時代還要美好的台灣，成為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理想，也是全台灣的民眾，六百萬島民的熱望。」

三、陳逸松——「山水亭」上的一幕悲喜劇

律師、文化人陳逸松的八·一五，是在當時台北文人雅士經常聚會的餐館「山水亭」經過的。他在當天正午按時打開收音機，因收音機老舊不靈，很多雜音而聽不清楚，只微弱地聽到「一心一意」、「奮戰」等字眼，以為又是在鼓吹「聖戰」，不以為意；遂前往近處的「山水亭」找「山水亭」主人、戲劇家王井泉聊天。忽然一位熟識的台北州特高警察倉皇衝上樓來，氣急敗壞地問他們對「這次的事」有什麼感想，陳逸松以為他又來套消息，遂敷衍道：「只有遵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繼

續堅定作戰而已！」特高驚道：「我聽到的是日本戰敗宣佈投降了，怎會繼續作戰呢？是不是我聽錯了，你們稍候，我回州廳打聽，馬上回來。」過不久特高回來了，他激動地說：「日本輸了，日本輸了！」遂邊哭邊下樓去。特高走後，王井泉泡了一壺好茶出來，兩人對品共嚐。陳逸松寫道：

「幾十年來，我們從沒有這樣輕鬆過，今天，也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品嚐到真正的茶香。」

陳逸松在回憶錄中，稱此為「山水亭」上演的一幕八·一五的悲喜劇，令他畢生難忘。

當時台灣人的歡欣是連筆墨都難於形容的，戰爭的災難解除了，日本戰敗投降了，五十年黑暗的殖民地生活結束了，自此可以平等做人，當家作主了。但因長期懾於日本警察的淫威，街上到處是日警、日軍，八·一五當天只有把喜悅埋在心頭。雖然破曉了，但天邊黑夜未褪，大家還不敢把難忍的喜悅爆發出來。

然而，歷史並不是直線發展的，它總是在時而前進時而後退，迂迴曲折中前進的。歷史也總不只是一面的，它包攝著正面和反面、主要面和次要面等複雜的面向。因此，八·一五也正是處在光明和黑暗、前進和保守、邪惡和正義、腐朽和新生的交界；鬥爭最激烈的時刻，也是黑暗、腐朽的力量作

最後掙扎的時刻。即便如此，破曉的亮光也正在天際浮現。

四、楊逵與《一陽週報》

日本投降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的八月份「本島治安報告書」，揭示了日本警察最擔心且持續監視的台灣人有二類，一是「思想要注意的人物」，另一則是「有濃厚民族意識的人」。該報告書把楊逵列為「思想要注意的人物」，並且這樣描述了八·一五後楊逵的思想和行動：

「楊逵預想到了台灣被接收後，重慶軍閥政權專制橫暴的情形，認為作為牽制重慶政權的策略，必須先鞏固同志之間思想上的基盤，在這種意圖下，他有少許的行動」。

如果日本警察的這份報告的內容沒有錯，那麼楊逵在八·一五以後的積極行動，其意圖是一方面歡迎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實際上他和許多左翼同志早已認識了國民政府專恣腐敗的一面，因此他藉創辦《一陽週報》鞏固同志間的思想，以牽制專恣的國民政府。

就如楊逵在其手創的《一陽週報》第九期，所寫的一篇短文〈紀念孫總理誕辰〉中所說的：

「未戰而得勝的台灣光復，雖是可慶可祝，總是因此若抱著中國革命為如桌頂取柑之安易感，那就慘了。光復後的新建設目前多難，民權民主徹底解決尚有多端。」

楊逵並未如一般文化人，完全沉醉於台灣光復的單純民族解放的喜悅中。他早已認識到中國的革命並非如「桌頂取柑」那麼容易；而台灣的光復是「未戰而得勝」，並非經過自己之手的革命鬥爭而取得的，殖民地性和封建性成份仍深深纏繞著台灣社會；台灣的新建設將是多難的，除了民族解放之外的民權，民生問題的徹底解決也是多岐多端的。楊逵是在這樣的先覺思想中展開了光復後的新活動。

首先，楊逵把「首陽農場」改名為「一陽農場」，據說是取《易經》中的一句話——「一陽來復」而得的。他很快地成立了「一陽週報社」，出版了一份八·一五以後台灣最早的刊物《一陽週報》。該報第一期的出版日期不明，據池田敏雄日記的紀錄，池田是在九月十八日收到三份楊逵寄來的《一陽週報》，因此可推測，正式的出版日期應是九月十日左右。因為此報迄今尚未被公開出土，無法窺其全貌，現在只有第九期（最後一期）的一部份可以看到；從第九期的目錄來看，該期出版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一份有二十四頁的中日文合刊，在當時可算是一份相當正式的刊物。該期是「紀念先總理誕辰紀念專刊」，刊有胡漢民、蕭佛成等人的紀念文，還有楊逵作品〈犬猿鄰組〉

和矛盾的作品（創造）。

由此可知，《一陽週報》出版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前後，於十一月十七日停刊，共出版了九期。以宣揚孫文思想、《三民主義》為主要內容。

同時，一陽週報社也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了一本楊逵自己編的《三民主義》。可見得，八·一五後包括楊逵在內的台灣進步力量，很巧妙地運用了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進行宣傳；一方面《三民主義》是國民政府的招牌，另一方面，對台灣當時的情況來說，它是一種進步的思想。因此，《三民主義》成了八·一五以後一直到翌年（一九四六年），光復後的社會矛盾還未完全顯露出來的五、六月之前，台灣社會官民共同高舉的玫瑰色思想。

事實上，《一陽週報》在台中地區一直被認可當作一份正式的報刊。譬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軍一五七師政治部在招待新聞界時，《一陽週報》也與《新生報》、《民報》同列出席者名單。可見得，它在當時的台中地區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五、王白淵—首度的「雙十節」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陳儀還未履台受降典禮還未舉行之前，而台灣的軍政大權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時刻，台灣民眾已經迫不及待地自己舉行了第一次雙十國慶日。慶祝大會於當天上午十時在

台北公會堂舉行。會堂上正面高掛著的黨國旗臨風招展，兩旁貼著紅色對聯：「欣逢雙十、薄海共慶、恢復故土、萬民騰歡。」壇上左列坐著前進指揮所副主任范誦堯、林茂生和盟國代表等；右列坐著林獻堂、杜聰明、黃朝琴等。會堂內外擠滿了三、四千名的民眾，熱鬧踴躍幾無立足之地。十時正式開會，由代替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出席的副主任范誦堯領導行禮，並代為宣讀開會詞；接著由主席團代表林獻堂、林茂生等相繼演說。台灣《新生報》形容這一天「祥雲靄靄白日騰空」、「歡呼之聲震動天地」；在這一創刊的《民報》，用了醒目的標題：「祥瑞瀾天萬眾歡騰」來形容。

當天入夜更呈熱鬧，各家各戶懸掛國旗，張燈結綵，由歡迎牌樓照射出來的輝煌燈光和百家千戶的燈火相互輝映，把整個黑暗的大地照成不夜的世界；尤其在公會堂開演的「好來劇團」，更吸引了大批民眾前往觀賞，擠得水泄不通。

當時在台灣《新生報》擔任記者的王白淵（詩人、美術家、評論家），以「一記者」之筆名，在報上寫了一篇題為〈痛定思痛國慶之感〉的報導。當時同在該報工作的作家吳濁流，在二十年後所寫的回憶文章中，仍記道：「他那標題『痛定思痛』幾個字，雖然經過了二十年的現在，還是很新鮮地留在我的心版上」。王白淵的報導文這樣開始寫道：「雙十節已經達到了三十四次，但我們台灣算是頭一次，這是多麼可恨可痛之事，五十年來之壓迫與榨取，使我們不能慶祝同族之喜」。在文末，他舉了林茂生的講詞：「我們因為受異族統治五十年之故，使發生一種口說之混迷，但今天可以證明，

我們的中國魂以日人之壓迫，還不能消滅，使我們有光復之一天，這亦是我們漢民族可以世界誇耀之事」，接著他寫道：「記者在這從來未有之感激與興奮裡，感著綿綿不絕的我們的歷史與文化」。

王白淵也在同日該報新創設的文藝欄「詞華」上（也是八·一五以後最早創設的中文文藝欄），發表了一篇詩作〈光復〉，詩寫得簡短但感情深刻：

小兒離開了母親

夜裡不斷的哭著

兒在險暗殘暴裡

慈母為兒斷心腸

求不得 見不得

暗中相呼五十年

夜來風雨而已散

一陽來復到光明

啊！

光復 我父母之邦

附記：王白淵的這篇詩作一直未曾出土過，也沒有人提到過，筆者為紀念「八·一五」六十週年首次再披露。

《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〇〇五年秋季號）

.....
【五】

奪回我們的歷史

追悼台灣革命先烈

台灣光復之初，民間對過去欺壓台灣民眾的日本人施行報復是相當普遍的事，報復的對象大多是日本警察。相對於個人的報復行動，以集體的或團體的行動對殖民歷史進行清算或舉行台灣抗日烈士追悼會等活動，也都相當熱烈地進行。這些團體大多是日據期抗日或反日社會運動團體成員在光復後的再集結。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間，爆發過大小無數次的武力或非武力抗日事件，犧牲不下數十萬人，是中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曾被日本殖民者稱為「匪」的抗日犧牲者，在殖民者倒台後，被追悼為革命先烈，可以說是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從殖民者手中奪回自己的歷史。

譬如，在日本投降不久後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還未成立之前，台灣的律師協會便自主著手調查戰前因政治思想問題被日本警察檢舉、慘刑，屈打成招而入獄或致死者的事蹟，並希望本人或遺族至急通知律師協會。

一、成立「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

接著，在舉行了台灣光復典禮後不過幾天（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前台灣文化協會、農民組合、民眾黨、工友會及其他原革命團體幹部，都齊聚到劉啟光寓所舉行座談會。到會者有連溫卿、鄭

明祿、張信義、簡吉、王萬得、蔣渭川、張士德等二十餘人。會上議決組織「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並推選連溫卿為總會長，鄭明祿為秘書。該會決定，全力調查五十年來為反抗日本統治而犧牲的所有先烈事蹟及遺族狀況，並編印紀念冊、發動全島舉行追悼會，並請求政府在原台灣神宮舊址上建忠烈祠，舉行春秋二祭；且設立革命先烈遺族教育基金，獎助、撫卹先烈遺孤遺族等。

在這同時，全島各地也紛紛舉行「台灣革命先烈追悼會」，通過追悼會除了平復日據期間受欺壓的怨氣之外，還彰顯台灣的抗日革命歷史，發揚台灣的民族正氣。

原《民俗台灣》編輯池田敏雄的《敗戰日記》中，對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變化有很生動的紀錄。在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記中他記道：

今天在大稻埕有「台灣革命先烈追悼會」，遊行隊伍會來到榮町，恐怕會加害日人，要注意！

隔不了幾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新竹市的新世界戲院也舉行了一場「革命先烈追悼會」。為了追悼一九二六年「新竹事件」的犧牲者和五十年來的抗日犧牲者，由三青團台灣區團第二科科長洪石柱和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會長連溫卿，以及新竹市代理市長陳建文等人的共同主持下，有許多先烈

遺族出席，盛大舉行了追悼會和演講會。

二、「瑞芳慘案」追悼會

接著，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在瑞芳舉行了「瑞芳慘案」追悼會。「瑞芳慘案」與「東港慘案」（或稱高雄、鳳山慘案，因該案擴及高雄、鳳山、東港等地）一北一南性質類同，都是在戰爭末期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一九四一年），日警特高為在台灣製造恐怖氣氛，刻意捏造出來的大規模冤案。瑞芳慘案是日警捏造稱瑞芳台灣人透過中國政府要人，秘密組織抗日軍，待中國軍隊登陸時裡應外合攻打日本。於是日警在瑞芳抓了七百多人，嚴刑逼供，凌虐致死者有七十多人。「東港慘案」則是日警捏造稱：台灣人密謀乘英美攻台之時，發動暴力革命打倒日本政府實現台灣獨立。日警發動了大規模搜捕，被抓的人擴及台灣各階層，除醫師、律師、地方士紳等「有力人士」外，還有一般民眾百姓數百人。惡毒日警施以殘暴絕倫的偵訊逼供，有四人被刑求致死；該案持續了二年之久，使台灣南部地方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在「瑞芳慘案」追悼會上，除了有「台灣革命先烈事蹟調查會」代表王萬得，三青團代表陳逸松等人出席之外，還有「東港慘案復仇會」受難者代表郭國基特地從高雄趕來參加。他在席上激動地說：「我們的仇必定由我們來報，英靈呀！請安息！」

三、成立「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新竹縣縣長劉啟光在縣政府樓上成立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有六十多位先烈遺族親友與會。該會任務主要在獎助先烈子弟升學、就業、緊急災難救濟，扶助受刑致殘廢的老邁失恃之志士等，使死者得含笑九泉，而生者免受痛苦。該會會址設桃園，全島各地都設有分會。

四、六·一七「恥政紀念日」

六月十七日，原本是日帝殖民者於一八九五年佔領台灣開始殖民統治的日子；日本殖民者特別把這一天定為「始政紀念日」，五十年間每年逢此日都舉行盛大紀念。但對被殖民者的台灣民眾而言，卻是一個痛苦、恥辱的日子，台灣抗日者痛恨稱之為「恥政紀念日」；因為日文的「始」與「恥」發音相同。作家楊遠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台灣新生報》寫的〈六月十七日的前後〉中說道：

「當他們意氣洋洋地紀念這個日子時，我們的志士們總是內心哭泣著紀念這一天。對他們來說燦爛光輝的這個『始政紀念日』，對我們台灣人而言卻是一個慘澹的『死、政、紀念日』。」

同一天，作家賴明弘也寫了〈六一七有感〉，該文開頭便說道，

「『六·一七』是台灣人最傷心痛苦的日子，不僅是台灣的恥辱，而是我們中國的國恥日」。

五十年來令台灣民眾傷心痛哭的六月十七日，光復後成了「死政紀念日」或「恥政紀念日」、「國恥日」；為了追悼抗日犧牲者，為了奪回我們的歷史，許多團體在這一天的舉行了盛大的集會。

五、新竹縣忠烈祠革命先烈奉安典禮

六月十七日在新竹縣忠烈祠（原桃園神社舊址）舉行了盛大的台灣革命先烈奉安典禮。有新竹縣各局科人員、省黨部人員、各機關、各學校學生，以及「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會員、遺族丘念台、簡吉等五千人參加。典禮上把七十二位台灣革命烈士入祀忠烈祠。典禮結束後舉行大遊行，有各種陣頭、獅陣、音樂團以及學生、警察、軍隊的化裝遊行，隊伍綿延數里長。桃園的市場、大廟口也演戲放電影，人山人海熱鬧非凡，據說這是桃園鎮有史以來最熱鬧的一天。

《新生報》記者「菱舟」以〈淒風冷雨弔忠魂〉為題，記實報導了新竹忠烈祠奉安典禮的情形。文中描述了一則革命烈士的感人事蹟。

六月十七日一大早，記者與另一位同事一起從台北搭火車到桃園鎮，準備採訪奉安典禮。他的同事還帶著小孩戈民一起去，記者奇怪地問他為什麼帶小孩，同事沉鬱地答說：

「讓他有這此刺激。」

下面是記者「菱舟」在文中寫到同事為什麼帶小孩參加奉安典禮的經過，茲抄錄如下。

我說：

「這麼小的年紀會感受到刺激嗎？」

「不，他今天是遺族代表，帶他去看看他為民族殉死的父親。」

他不給我因駭異而提出詢問的機會，源源不斷地告訴我這件事：

當九一八事變爆發，他們便聯合在日本留學的台灣人組織了一個台灣革命黨，後來該黨便漸漸地減少到只剩兩個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另外一個人便是現在被安置在忠烈祠牌位中的陳哲生（本名義

順)。他倆在日本站不住腳，便跑到上海，又由上海跑到香港，在香港的台灣黨部籌備處工作。陳哲生還潛入日本人辦的香港日報去。以後機關暴露，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陳哲生與其他兩個同志同時被捕，日寇一直要他招出同黨，可是陳哲生不但不招，還把責任集在一身，解救了那兩位同志。以後日寇把他關在台灣，嚴刑拷打，可是得不到一句供詞，陳哲生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六日給日本人打死了。

一種含恨的聲音在喉嚨裡。陳先生指著小孩說：

「為了革命，他沒有想到家，他到死是個光身漢，我因為和他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所以把我這孩子過繼給他。」

除了嘆息之外，還能說什麼呢？車中又是一場沉寂，不久我們已經到了桃園站。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的《人民導報》刊登了「新竹縣忠烈祠本年度入祠台灣革命先烈芳名」，陳哲生名列其中，芳名錄上簡單記載著他的革命事蹟：

「民國三十一年擔任前中國國民黨台灣黨部籌備處組織科長，民國三十一年被捕受刑致死。」

當天下午，「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招待前來參加先烈奉安典禮的遺族們，舉行了茶話會。包括曾經從事抗日的老同志在內共有百餘人參加。會上，劉啟光縣長報告了籌辦先烈奉安典禮的經過，他說：修建新竹忠烈祠是為了彰顯民族正氣，選定先烈先賢入祠特別是以其革命意識、行動事蹟為準，且確曾為解放台灣不惜犧牲生命者。而且在修建忠烈祠時，也同時將鄭成功和抗戰中犧牲的將士合祠，因為台灣的光復是犧牲了二十萬尊貴的生命而得的。

同一天，也有另一場追悼會；由省政治建設協會主辦省黨部協辦，在台北市第一劇場召開了「本省革命先烈追悼會」，有一千多人參加。會後接著進行紀念演講，有蔣渭川講〈台灣革命三百年史〉，張晴川講〈台灣革命先烈的血淚〉，黃朝生講〈追憶蔣渭水先生〉等。

同日下午，政治建設協會基隆分會與基隆市婦女會，共同在基隆市聖主廟前舉行了台灣革命先烈追悼會。嘉義法院和第一分監所，也於該日早上在同監獄的說教室內，舉行了「先烈慰靈祭」。

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紀念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是台灣民眾五十年來第一次自主地把日本殖民者的「始政紀念日」改為「恥政紀念日」；並把被殖民者稱為「匪」的抗日犧牲者以「台灣革命烈士」之名奉安忠烈祠，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然而，由於歷史的作弄，這也可說是最後一次了。

實際上，這時候，台灣的知識份子在高昂的民族感情的底層已感受到新時代新矛盾的存在，早已表露出對現實的不滿；譬如，作家賴明弘的〈六·一七有感〉中透露出：

「回顧我國內的情形，更使人傷心。同胞相殘的事實，不斷發生，政治無從走上軌道，民生問題的嚴重已臻頂點。這一切悲慘現實，表示我中國人民對實現民主政治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

台灣不應該有統治與被統治者的存在，再不應該有政治壓迫、經濟壓迫、文化壓迫的現象發生。」

抗戰勝利後，中國社會矛盾深刻，國民政府腐敗貪汙，國共內鬥日愈激烈；這些大陸的動盪不安，也深深影響台灣。

緊接著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新狂嵐襲捲了這一切歷史的新生力量。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八日

《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〇〇七年夏季號）

五、奪回我們的歷史——追悼台灣革命先烈

【六】

來到台灣戰後出發的地方

《一九四五。光復新聲》導言

來到台灣戰後出發的地方

每年的五月八日，包括德國的歐美各國，都會熱烈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日。每年不厭其煩地反復紀念，以汲取歷史教訓；從來沒有人批評過，說這紀念日老舊是無聊的「大敘述」。同樣地，每年，在八月十五日，中國大陸也反覆紀念反法西斯與抗戰勝利的日子。在台灣，兩蔣時期，每年的十月廿五日，也都會紀念台灣光復節，以示不忘台灣戰後的出發點；雖然它早已流於官方老套，喪失了歷史的生機。

從十年前開始，前台北市長陳水扁，在十月廿五日，台北市街頭遍插「終戰」的大旗之後，「光復」被取消了，「終戰」取而代之。風吹草偃，原本就沒有獨立思考的台灣文化界、媒體業，也開始不講「光復」，開口閉口「終戰」，以為是時髦。模倣日本人說「終戰」的這批人，完全不知道「終戰」在日本的實際意義。「終戰」一詞是延續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戰後日本統治者的用語，是為不願意承認日本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且為了否定日本戰敗投降的歷史修辭。有良心的日本人是差於啟口的。一個曾經受過日本五十年殖民欺壓的台灣子民，竟然隨著日本侵略者統治者開口閉口說「終戰」而不自知，在精神上仍受著日本統治者的統治。

造成今天這種荒誕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台灣民眾從來就不知光復歷史為何物。數十年間，國民政府只有官方形式化的紀念光復儀式，從未真正瞭解過光復的歷史真義；再加上狹隘的國民黨式的歷史教育，使光復形骸化，失去了原來生動多彩的歷史意義。

雖然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六十年前的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中，也生活在台灣光復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構造中；但是我們在知識上，特別在歷史意識上，卻被重重的意識形態所障蔽，無法辨識由少數支配者所控制的世界秩序和社會構造的本質。特別在台灣現實脈絡中，歷史意識往往深刻關聯著身份認同或國族認同的問題，因此，歷史意識不再是歷史問題，而成了政治問題。歷史詮釋成了政治的延伸。台灣的光復初期或戰後初期的歷史，更成了爭議的焦點。他們把「光復」顛倒為「終戰」，把台灣復歸祖國顛倒為「再殖民」；把戰後光復台灣的國民政府扭曲成「外來政權」；把二二八事件扭曲為「中國人屠殺台灣人」的政治圖騰。

歷史問題的錯亂，急速地侵蝕著台灣島嶼，分裂著台灣社會。對歷史的無知，就是對未來的盲目；歷史認識的危機，將導致對未來的迷失。

關於台灣光復的歷史，六十年來，除了國民黨或官方出版了一些代表官方或黨方立場的資料集之外，可以說，從來沒有出現過一本比較全面性又有著民間立場的光復史料。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知道出發點，怎會知道現在與將來呢？因此，編者蒐羅了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一直到一九四六年

二月的這半年間，許多有關「光復」這個大歷史變革為主題的文章，編成這本書。本書包括「光復文學」輯和「光復言論」輯兩大輯，共有一百多篇，可簡稱為「光復詩文集」。「光復詩文」這個概念，主要來自前輩台灣史家廖漢巨的一篇小文章〈台灣光復前夕光復詩文〉，該文簡略地介紹了光復時期的一些詩作與文章的篇名。從這個概念出發，編者更廣泛地，更全面地蒐集歷史材料，把它編成一本書，作為認識台灣光復歷史的客觀基礎。

編者蒐集了光復當時的知識菁英、文化人、作家等身臨時代巨變時，在喜歡、激動中所吟頌的古典詩詞、歌謠、文學創作，甚至各團體的口號、標語等。另外也蒐集了許多當時處在新歷史時期開端的許多有關台灣光復的議論文章；有對新時代的歡迎、期許和自許，也有對舊時代的批判等等。可以說每一篇都蘊含了個人在大時代變革中的激動感情，也反映了客觀歷史的一個斷面；總加成起來，就是整個台灣光復歷史的一個無法抹滅的證言。

編者認為，所有有關台灣光復歷史的學習或論議，只有站在這些歷史資料的基礎上，才會產生有意義的認識和辯論。

第一節 光復文學

本書第一輯「光復文學」，收錄了當時圍繞著「光復」這個大時代為主題的作品；包括有光復詩詞、光復歌謠、光復標語，以及新文學作品。從這些作品的內容來看，這個時期的文學的主要特點是古典詩詞占了主要地位，而新文學的作品不算多。

一、迎接了台灣光復的古典詩詞

台灣光復的大歷史巨變中，並沒有出現一定量的白話文新文學作品，誠然可惜；但卻出現了許多古典詩詞，這些作品反映了民眾對台灣光復的喜賀之情，難能可貴。可以說，主要是古典詩詞迎接了台灣的光復。這種文學現象反映了台灣文學的特殊性。究其原因，首先是從一九三七年起日本殖民者廢漢文欄的高壓政策下，白話文作家失去了文學園地，雖然還有尚存一息的《風月報》（後改名為《南方》），但是因其吟風弄月的消極性格，無法提供新文學作家伸展的空間。光復後，失去發表園地長達八年的白話文作家，除了少數幾位如王詩琅、朱點人、楊守愚等人之外，大多已意興闌珊。還有，大多數日據期白話文作家的根本創作動機，是為了「抗日、反殖、歸宗」；日本投降台灣光復的歷史

變革，基本上已達成了個人的宿願，身心鬆懈也就無力創作了。另外，便是時代大轉變中，個人為了生計、生活，也不得不先放下筆來。

在台灣，從事古典詩詞創作的舊文學作家，其基礎是很深厚的。就如黃得時在〈台灣光復前後之文藝活動與民族性〉一文中（《青溪》五十五期，一九七二年）所提及的：

「自從『五四』以後，國內一般人認為舊文學已失去其價值，變成了一種死文學。但是就台灣來說，情形並非如此，毋寧說，它的存在有著特殊的意義。」

黃得時所說的「特殊意義」，就是指在殖民地條件下，台灣舊詩在保存中國固有文化上，以及作為其間接表達反抗日本的祖國意識之情上，有強烈的民族性，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台灣各地都有詩社、吟社，最興盛時曾多達千個之多，其中以台北「瀛社」、台中「櫟社」、台南「南社」最有名。

就是這些台灣舊文學作家（當然，包括許多新文學作家也從事舊古典詩詞的創作）深厚的「民族性」，以其古典詩詞最先迎接了台灣的光復。

本輯收錄了六十七篇古典詩詞，包括林茂生、陳逢源、葉榮鐘等名詩家的作品。這些作品主要搜集自《台灣新報》、《民報》，以及一些新創刊的雜誌。這些古典詩詞大多是如「光復喜賦」之類的作品。本輯也收錄了幾首台灣光復後才得以發表公刊的「獄中詩」，譬如，日據末期因駭人聽聞的東港事件而死於牢獄的名律師歐清石的「獄中詩」。還有，因為光復的欣喜無法完全用白紙黑字表達，故有人創作了慶祝光復的歌謠，流傳於民間讓人傳唱。本文收入了包括作家郭秋生和蔡培火等人的光復歌謠作品共六首。另外，也收入了五首光復標語，這些標語主要來自民間政治團體，如三青團等。這些標語十分集中且總體地表現了這些民間政治團體對大時代的政治要求。

二、新文學作品

關於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總體來看作品量並不多，好的作品更是少。本書先選輯了三篇文學論議文，包括賴明弘的〈重見祖國之日〉，楊雲萍的〈我們的等路〉以及秋鴻的〈我與祖國文學〉，這些文章反映了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台灣文學也復歸了祖國文學的這一個事實。表達了在這個大時代的轉換中，台灣作家內心的感情、態度和新的展望。

散文〈起點〉是省籍新進青年作家的代表作；其情感豐富，文學表現手法亦佳，表現了光復時台灣青年在新時代中重新出發的共同情感和立志。但是，由於殖民地歷史的沉重包袱，他們的白話文運用能力受到極大的限制，這也是當時的省籍青年作家所共同面臨的大挑戰。

在新詩的作品方面，有吳新榮的〈祖國軍來了〉、林荊南的〈久違了島都〉，以及王白淵的〈光復〉。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在日據時期就已經很活躍的作家，而且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都是日文、白話文兼備的作家，因此，光復後馬上可以提筆用白話文寫作。這些詩作都個別反映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到十月廿五日慶祝台灣光復的過程。

詩作〈悼〉和〈台灣我希望你〉，從語言的通達程度看，作者應該是大陸來台的作家；前者是悼念反日而死的烈士，後者表達了對台灣的熱烈期待。這顯示了大陸來台的外省作家，很快就參加了台灣文學的行列，大大豐富了台灣文學的內涵，反映了台灣的光復帶給台灣文學的新變化。

龍瑛宗的〈青天白日旗〉，描寫了日本投降台灣剛光復之時，一個農民阿炳帶著小孩木順仔，上街市集賣龍眼。看到原本沒精神的街市，突然間變得朝氣勃勃，人潮出奇的多，大家臉上都笑嘻嘻；而且牆上電線桿上都貼滿了「台灣光復」、「感謝祖國」的標語。這裡，龍瑛宗對台灣光復初的街頭景象，有十分寫實的描寫。主角阿炳唸著唸著這些標語，難以動搖的實感漲滿了身軀，心想首次聽到台灣光復時不敢太相信，還像做一場夢一樣。阿炳又回想過去常受日本警察無理的毆打，心中充滿了沒有祖國的悲哀。然而，眼前又貼滿了「台灣光復」的海報，唸著唸著覺得身心輕鬆許多。這時看到有人在賣青天白日旗，孩子木順仔吵著：「阿爸，好漂亮！買一隻吧，好不好？」

阿炳拉著神氣地揮舞著青天白日旗的木順仔，一路回家。冷不提防迎面來了一個日本警察，照以

前的自然反應，為避免挨打，必定想方設法避開他。但阿炳又想回來，現在自己已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民，有什麼好害怕？阿炳遂拉著木順仔和旗子，「毫不介意地挺胸昂首，搖搖擺擺走過去，日本警察呆著看他一眼，倒也讓他們走過去。」

龍瑛宗透過這樣的短篇小說，一個簡單的故事情節，傳神地描寫了台灣光復的社會實像，也傳達了他自己久被壓抑的民族情懷。雖然他不得不以日文創作，但其精神卻是中國的。

第二節 台灣光復的意義

一、光復的三大意義

台灣光復，對台灣人民的真正意義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當時台灣知識菁英的代表，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在他的〈祝詞〉一文中，有深刻精要的說明。他說：當此興復之

秋，有三大發見：一是發見我是人，其次是發見社會，三是發見國家。他進一步申述了這三大發見說：

一是，發見「我是人，是自然人」，從來處於帝國主義之桎梏下，我不是人，不是自然之人……今我不然，於光復聲中，舉凡過去所喪失之文化，同時壁返而復我自然人。

二是，發見「社會」，五十年來，我輩無社會，是對立之社會，分裂之社會，強權第一之社會……今也，一民族、一語言、一歷史、利害共通同胞相助，此種社會方是真社會。

三是，發見「國家」，從來之所謂國家者，偽國家也……今同一歷史、同一法制、同一語言、同一傳統之真國家。

同樣地，廖文毅在〈光復的意義〉一文，也說明了他在台灣光復中的四大發現：第一個事實是「民族精神的振興」，第二個事實是「國土重圓」，第三個事實是「家人再集」，第四個事實是「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

因為，在長期的嚴酷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被剝奪了政治權，經濟權和文化權、處於沒有「人

權」的、「非國民」的、殖民地人的地位；民族意識受壓抑，民族社會被支離，更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這就是身為殖民地人的屈辱和真正的悲哀。殖民地人民的最大願望，亦即反殖民運動的最大目標，就在打破這些殖民桎梏，脫離殖民地人的地位，成為一個完整自主的「自然人」，並且做為一個「國民」生活在自己的「民族社會」和「民族國家」中。而「光復」給台灣人民帶來的「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的三大歷史變革，正實現了台灣人民夢寐以求的願望。當時，除了極少數在殖民時代依仗日本統治者維持自己權勢的台灣人大資產家以外，對於台灣人民（不管左中右派）來說，「光復」就是自己夢想的實現，其狂喜和對祖國的熱烈期待是不難想像的。

二、台灣的民族意識

林履信的〈不負了祖國的台灣〉舉了三大理由，說明台灣民眾數百年來堅強的民族意識，即使在嚴苛的異族日本殖民統治下，仍然沒有大的改變。他從「民族血統的保存」、「祖國文化的保存」以及「家族制度的堅守」三方面，分別說明台灣並未負了祖國。苻伊的〈台灣同胞到底給日本同化了多少〉，認為經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從表面上來看，不管在言行舉止或生活習慣上，台灣民眾似乎已被日本同化了。但是，作者並不以為然，他從構成民族要素的血統、語言、生活、宗教、習俗各方面進行了考察。最後，他有一個至今看來仍很新鮮的結論，他認為：因為國家是武力造成的，而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因此，光復前的台灣民眾，國家意識是日本的，而民族意識感情則是中國的。

當時任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的宋斐如，他的〈民族主義在台灣〉一文，論點大致與前述二篇文章類似，都強調台灣的民族主義是堅強的，但也是歷經滄桑的；因此，「祖國接收台灣首先須尊重台灣人此種自尊心」，「任何人不能以歧視眼光治理台灣，應多尊重其自治精神如何」；「要從收攬人心下手」，「運用一視同仁政策」，「爭取內向」。宋斐如的這番話，恰恰說中了台灣光復後不久，開始出現諸多社會混亂的本質問題。

三、御用紳士應退場反省

有兩篇文章在十月廿五日以前，也就是在受降與慶祝台灣光復典禮之前，就已刊載於《台灣新報》的社論；一是〈關於改姓名日籍台胞問題〉，另一是〈新台灣之建設與「御用紳士」問題〉。這兩篇社論主要是對日據時期依附日本殖民者的台灣人御用士紳或改姓名者的強烈批判。警告這些「不能相信自己民族」的人，要退場反省，並說這是「建設新台灣不能免之過程」。而且，也勸告那些「失去民族精神」的「改姓名」或「入日本籍」者，應該「十分反省，徹底清算過去之日本精神」。這種台灣人內部的自我批判，自我「去殖民」，在日本投降光復初期的一段不長的時間，曾經是社會的主要潮流。譬如，作家呂赫若也很快地用不嫻熟的白話文寫了極短篇小說〈改姓名〉，嘲諷了日據末期少數台灣御用士紳的「改姓名」問題。可惜，這種台灣社會內部自我「去殖民」的潮流，卻在陳儀政府的不當施政下中挫了。

第三節 新台灣的建設

如果要以一句話來總括光復時期的精神特徵的話，那就是「高昂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不管曾是御用士紳的人或是反日份子也好，是左派或右派也好，不論階級或歷史背景，高昂的民族意識曾是共同的精神特徵。同時，大家都認識到，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成為中國的一行省的「光復」，只是一個新的起點，再過來還有許多的問題亟待解決。就像林茂生擬孫文遺囑所說的話：「光復仍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也正如林麗明文章的題目——「台灣光復後的新使命」所指的——樣，如何建設新的台灣，是光復後的新時代課題。

一、民族意識之外的科學、民主意識

本書編選的許多議論光復的文章，使我們理解到，當時不論是本省知識人或大陸來台的外省知識人，他們對光復後的新台灣建設的問題，有多元且具進步性、建設性的觀點。他們並非只是被動地接受光復，而是主動積極去思考如何建設新台灣。這些議論並非只有高昂的民族意識，而且還有豐富的科學、民主意識。

三愚的〈台灣光復以後〉，提出了許多對台灣光復後的基本問題的看法。他首先指出：台灣雖已光復，但日本的語言、日本人、日本產業等殖民物還存在，亦即要如何「去殖民」是一個大問題。針對這問題，謝南光在〈光復後的新台灣〉中主張不要留用日人，日人要一律遣還。謝南光的這種意見是當時絕大多數人的意見，然而，陳儀政府卻採取了留用日人的政策，這引起了台灣民眾極大的不滿。關於日資日產，謝南光也主張應該由人民去經營，不要冒充國策維持不正當的經濟利益，不要與民爭利，應該要注意「民族團結」，以防止「政治破局」。然而，國民政府卻逆道而行，其結果，真如謝南光所預言的，終走上了二二八的政治破局。

關於如何看待當時滯留台灣的五十萬日人、日軍這個問題，《新生報》社論〈受降觀禮與慶祝光復〉文中說：國家與個人是兩個不同的範疇，我們仇恨日本國家，但未必仇恨日本人民，但日本人應該要忠實的履行投降條款，且應服膺真理，不必悲哀也不可傲慢，同時更要重新認識中國。對這個問題，《民報》社論〈為在台日人設想〉也有相同的看法。

二、要盡作為主人的義務

三愚文中指出，光復後的台灣同胞要開始盡作為主人的義務，且說：「台灣興亡你們有責任了」，而且要台灣同胞積極關心並參與政治。《新生報》社論〈受降觀禮與慶祝光復〉中也說：「前日我們是奴隸，今天我們是主人，做了主人責任加重了」，要求台灣民眾要警惕與自強不息。針對八

月十五日以後，亦即台灣解放後，有許多台灣民眾過度興奮，歡天喜地以致「花天酒地」的現象，《台灣新報》小專欄就曾警告大家不要過頭而成了「驚天動地」、「呼天叫地」。許多文章都呼籲台灣民眾要「自肅自戒」。介舟（郭秋生）在〈台灣光復歌〉的最後，勸告大家要「著認真、著知足、守禮節、再建設新台灣、莫損青天白日旗」。另外他在〈我們要三大努力〉文中指出，第一要「努力做得國民」，第二要「努力鄉土的復興」，第三要「努力做得四大強國之一國民」。

三、精神上的去殖民

有一些台灣知識份子，除了關心前述關於台人要自我要求要自肅自戒的問題之外，更進一步積極地對台灣社會精神上殘留的殖民問題進行「去殖民」。譬如，林萍心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廿八日，國民政府官員還未來台之前，便寫了〈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台灣智識階級〉，他說：

「現在是『夜』與『晝』交替的時代，是需要我們智識人不辭勞苦為我們的新國家，新鄉土重新建設的時代……舊的還沒有毀滅，新的剛剛誕生……」

他主張台灣知識階級的「新的任務」，就是要利用「國語普及會」或「夜學會」，去做種種街頭

宣傳；通過召開定期宣講，利用廣播、新聞雜誌、小冊子或者流動小劇團，去對台灣民眾進行初步的啟蒙運動。要介紹中國革命歷史、五四運動或三民主義淺說等，或更進一步檢討過去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各方面，如警察、私刑、思想犯或皇民化運動等問題。他認為：「大多數台灣同胞受盡了五十年日本奴隸教育，他們中間大部份已成了機械的愚民，而小部份已成為了極為危險性的『準日本人』」。有些甚至「俱備了最毒最深的頑固日本精神，他們血液裡流著了無數『天皇』、『大和』等等不可救藥的毒」。

他說：「在這版圖光復，鄉土建設的大目標下，我們知識人應是媒介，應是橋樑」，大家要在最短時間去感化這些台灣同胞，使他們認識祖國，改掉「大和魂」思想，個個成為健成的國民，走上建設新台灣，建設新中國的大路去。

當時的《台灣新報》、《民報》或三青團，也不斷批評且呼籲「御用紳士」應該退場反省；且不斷催促改姓名及日籍台胞等「不相信自己民族的」人，要反省並回到民族立場。這些都是屬於光復後進步的台灣知識份子積極去殖民的範例。

第四節 台灣教育的再出發

初被任命為行政長官的陳儀，在九月初於重慶召開的第一次記者會上，有關台灣的施政工作要點，他首先舉出的便是歷史、文化、語言的教育問題。不只是陳儀，台灣菁英也都十分重視光復後的教育問題。譬如林茂生、林獻堂在慶典的致辭中也頻頻強調教育問題的重要性；廖文奎在〈思想光復論〉文中，也強調：「台灣之重建，須以文化教育為本」。林麗明在〈台灣光復後新使命〉文中，首先舉出的「新使命」，便是教育重建與思想改造；他主張要「掃除殖民地教育制度和奴化思想」，「灌輸民主、自由的革命時代思潮和三民主義理論」，「普及教育、尤其注重我國語文的普及」等。

而陳儀等國府官員還未來台之前，《台灣新報》的社論〈教育與民族精神〉，便主張台灣新教育的去殖民化和民族化的重要性，認為「現在教育界的日人、日語，絕對不可再用」，因為這對培養台灣的民族精神有很大的阻害。同報社論〈台灣教育的再出發〉，有七點主張，每一點都是真知灼見，突顯了與過去的殖民地教育完全不一樣的「國民教育」的精神，其內容如下：

徹底理解中國歷史文化，來恢復民族性格。

養成民族自尊，滅除過去之卑屈態度。

使理解中國革命歷史，建設民主民族國家。

振興科學教育

注重婦女教育。

失學同胞的識字運動。

吸收國際智慧，使其理解世界。

學作人、作主人、作中國人、作世界人

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在台北廣播電台的演講——〈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後刊載於《人民導報》）中，說：

「今日，台灣文化教育的改造問題，和國內新收復區，自有根本不同的地方，絕對不是表面的、事務的，或單純的接收問題而已。實際上最重要之點，在於本質的改造，正統的接續、世界新文化的灌注。從此原則出發，台灣今日的文化教育改造的重點，應該放在下列各點，也可以說是三大原則」。

他所指出的三點，要改進台灣文化教育的目標，也就是通過教育要使台灣民眾達到的目標如下：

學習作人、作主人。

作中國人。

作世界人。

第五節 請愛護台灣這片淨土

三愚在〈台灣光復以後〉，對光復後的新使命，另外提出很重要的論點。他指出一個根本問題，他說：

「光復是求進步，並不是復元」，這種說法與楊雲萍在《民報》上的一篇文章，批評世風說：「光復並不是復古」一樣，都指摘了台灣光復後出現的許多落伍的封建事物和現象。

另外，三愚又指出：

「光復不只是復歸到中華民國，而是要建設一個三民主義民主國家，要全民康樂富強。」

他也奉勸來台公務員，不要把中國政治的種種腐敗、貪污、敷衍等惡習帶到台灣來。《新生報》社論〈對來台工作人員的希望〉，也對公務員提出更具體的要求，它說：「要以新人自任，革除內地一切不良習慣……生活要嚴肅，態度要謙和，工作要負責……」。在《人民導報》轉載上海《大公報》的文章〈請愛護台灣這片淨土〉中，對國民政府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諍言，它說：

「要為國家保持這一筆大資本，不要把台灣的力量投入內戰，更不要把台灣人的腦子投入黨爭。」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國民政府不但把台灣當成內戰的資源，更使台灣成了國民黨各派系人馬政爭、黨爭的舞台。不幸的，這些問題在光復的亢奮稍戢的一九四六年，便已經開始出現。

婦女解放運動

隨著台灣的光復帶來的另一片光明的天地，使台灣社會歷史向前踏進一大步的事物，便是與殖民國期完全不同的婦女運動。第一份中文報刊《民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便出刊了史上第一個婦女副刊——「新婦女」。當時最龐大的，最有影響力的民間政治團體——三民主義青年團，它的組織與宣

傳口號中，婦女解放是很重要的一環。當時的三青團婦女股負責人嚴秀峯女士的〈告女同胞〉文中，說：「勝利只是民族上的解放」，而如何建設與創造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新台灣更是重要的工作，其中女性的解放工作，更是重要的構成。他嚴厲地批評道：

「在封建專制下，我們不是「人」，是社會「裝飾品」……要做一個真正人類的「人」……要摧毀封建勢力的枷鎖」

署名若葉的婦女運動者，在〈起來，姐妹們！〉文中說：

「現在天確已亮了，晨曦照遍大地，坦途顯露在我們的面前，正是我們啟程的時候……我們要爭取社會上的地位，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婚姻上、我們要力爭一個人應享受的權利、在權利上我們要求不應有任何的差別，男女的差別，同時我們婦女也要盡每一個人應盡的義務。」

他列舉了在教育上、政治上、經濟上男女平等的具體要求。在文末高呼：

「我們要爭取我們的地位！
起來吧！我們不再是奴隸！」

餘話

想起了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吟唱的一首歌——「最遙遠的路」。從七十年代一路蹣跚走來，一直到頭髮斑白才出版第一張專輯的胡德夫，在吟唱這首歌時，把生命的了悟昇華成簡單而感人的詩，他歌道：

這是最最遙遠路程

來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

你我需遍扣每扇遠方的門

才能找到自己的門 自己的人

六、來到台灣戰後出發的地方——《一九四五。光復新聲》導言

第二輯——

光復文化重建

【七】

新台灣的「文化重建」

七、新台灣的「文化重建」

光復後，甫從戰爭和殖民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並復歸祖國的台灣，文化活動呈現空前熱烈的景象，當時通稱之為「文化重建」。它包括各種文化活動和文化論述，其內容多面而豐富；其中有對過去日據歷史的批判與整理，也有對台灣現實中新產生的中國化、民主化和世界化等問題的議論。

第一節 看到台灣的「中國民族性」和「現代性」也看到其變質

光復後從大陸來台的文化人，雖然因為對台灣殖民歷史的生疏以及地理的阻隔，難免對台灣的社會歷史有若干隔閡；但整體來看，大致是客觀公正的。特別對於台灣的殖民歷史，他們不但看到台灣社會中所謂的殖民化、皇民化的問題，也看到了台灣社會中的現代性和中國民族性的部份。

一、看到台灣的中國民族性也看到它的變質

譬如，魯迅至友，專研法國文學的黎烈文先生，他在一九四六年初就來到台灣，任職長官公署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的中文總主筆。他在一篇題為〈對於台胞的幾點希望〉（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文中，對於台灣的一切，就有這樣的看法：

「剛從內地過來的人，看到經過異族五十年統治的台灣同胞，仍能不屈不撓，保持祖國的方言和一切風格，特別在農村方面，從住宅以至種種生活工具，幾乎和閩粵一帶富裕的農村所見到的無甚差別，更不能不欽佩本省同胞，過去五十年內對祖國文物執著之深和對異族奮鬥之勇」。

在此，黎烈文高度肯定了台灣人民，在殖民高壓下仍固守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亦即，他在台灣的殖民歷史中看到了台灣社會底層堅韌的中國民族性。然而，他也指出了「殖民化」所造成的隔閡部分，他說：

「日本人使用了種種方法，使得台灣同胞漸漸地和祖國生疏、隔閡，以便達到所謂『皇民化』的

目的，而中國本身在這五十年內也有了種種的變革，同時在學術思想方面也有了重大的改革，這一切使得劫後相逢的弟兄，雖然滿懷欣喜，但總不免有著幾分隔膜」。

光復不久，由省內外人士共同組成了半官半民的文化團體——「台灣文化協進會」。該協會的成立大會宣言，對台灣的殖民歷史也表現了深刻的辯證的看法；它一方面指出，在台灣的殖民歷史中有堅強的中國民族文化的抵抗精神，它說：

「五十一年間的異族的統治，終是壓迫摧殘不了我們的文化的本質；不，不，我們竟反把異族的壓迫和摧殘，當作一種的『刺戟劑』，當作精進練磨的『契機』，在含羞忍辱裡默默地培養我們文化的成長」。

然而，另一方面，該宣言也指出了，民族文化受到「破壞」而「變質」的事實：

「不過，五十一年來的歲月，和日寇的設心苦慮，確也發生過相當的『效果』，我們的文化，一部

分變了質，一部分受過了嚴重的破壞，這我們要客觀地坦白承認的」。

這裡所指的，就是受到日本的殖民政策和皇民化政策的影響而「變質」的部分；也就是台灣社會中「殖民化」、「皇民化」的部份。

台灣出生長大，後赴大陸長期投身抗日戰爭第一線工作的宋斐如先生，光復初期返台後，擔任教育處副處長和《人民導遊》社長。他在〈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文中指出，這就是台灣文化的「畸形發展」，並分析道：

「台灣是漢明的正統，只因為離開祖國五十年的結果，致使文化正統起了變化」，由於「日本奴化政策所干涉壓抑禁絕之下，漢明的正統文化自然滯於五十年前的地步，所以沒有趕上祖國五十年來的進步」，並且「日本對於台灣採取殖民地文化政策，殖民地以上的學問和事物，是不能給台灣人民學習的，所以世界五十年來的進步，台灣並沒有充分吸收進來」，受上述因素的影響，他認為：「即今我們不能說台灣五十年來的文化完全停頓了，至少可以說台灣的文化確是一種畸形的發展」。

就像前述黎烈文的想法和「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大會宣言一樣，宋斐如對於台灣的殖民歷史，不但看到它的「殖民化」、「皇民化」，也高度評價了它的「中國性」和民族文化的抵抗。這樣的觀點，在光復初期的時論中並非特例，而是極為一般的看法。它不僅表現在「時論」或「評論」，也表現在各種官民的活動上，譬如，官方和民間共同為日據期的抗日民族運動舉行各種紀念活動；對台灣的抗日民族精神給予高度的頌揚。

當時的教育處長范壽康，就曾寫了〈發揚台灣精神〉一文（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文中所指的「台灣精神」，並非今日台獨分離主義者口號中與中國對立的「台灣精神」，而是指在台灣歷史上，與「中國民族精神」辨證統一的「鄭成功的精神」。再有，省黨部書記張兆煥在《新生報》上發表的〈發揚民族精神〉一文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其所指的「民族精神」，就是指台灣歷史上，郭懷一的抗荷、鄭成功反清驅荷、丘逢甲的台灣民主國運動、武裝抗日運動以及近代政治上的民族解放運動……等等各種歷史事件，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民族精神。

二、怎樣看台灣的「現代化」

當時的長官公署或國民黨省黨部的官員，對於台灣的殖民歷史，不但看到它的「殖民性」，也看到了它相對的「現代性」。譬如，國民黨中宣部台灣特派員盧冠群（此人後來擔任《中華日報》發行人），在《新生報》上發表的〈台灣文化重建之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曾如此說

到：

「說到台灣文化，一般人的觀感，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有的說台灣文化很進步，有的說台灣文化很落後，這兩種看法都沒有錯。因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文化，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現象，一方面相當進步，另一方相當落後」。

行政長官陳儀，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召開的長官公署第二次紀念周上，提到要注意民主精神與科學的發展時，如此說道：

「日本過去對於台灣在政治方面雖然採用殖民政策，使同胞精神方面感著痛苦，但在物質建設方面，卻已有相當基礎，固未可一概抹煞」。

在說到要注重新學術研究時，他說：

「本人到台後感到滿意的，是台灣的學術工作做得很好，學術是為人類謀幸福的，本來沒有國界，因此，吾人對於日本學者的努力，亦應加以重視」。

因此，陳儀才留用了大批日本的學者和技術人員。

魯迅至友，當時應陳儀之邀來台灣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先生，在〈台灣省編譯的設立〉一文（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中，對於台灣的學術文化程度也有很高的評價，他說：

「要發揚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因為本省的學術文化，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可以有為各省模範的資格」。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的《新生報》社論——〈建設台灣新文化〉，也提到了台灣的「世界性文化」，它說：

「台灣之民族文化雖不如祖國，但其世界性的文化絕不低。至於世界性的學術，我們須設法保留，不僅保留，還要使它發展。科學無國界，我們反對的是侵略，是奴役，不是科學及應用技術」。

由上可知，台灣的「中國化」所反對的是「侵略的、奴役的、皇民的日文思考」，而不是「現代的、科學的日文思考」。陳儀等黨政官員不但看到了台灣社會的「殖民性」，也相當務實地評價了它的「現代性」。但是所謂的「現代性」，並不是中性的，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不同的歷史主人下，有不同的意義。在殖民統治下，「現代性」是為了強化殖民剝削的「現代性」，是殖民者的現代性。唯有脫離殖民統治，才能顯露出它（現代性）的積極意義。光復後，台灣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復歸祖國，台灣原有的為了殖民者的現代性，已成了「民族的現代性」，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才得到了它積極的意義。

三、文化官員的「文化重建」觀

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在前述〈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文中，分析了經過殖民歷史後的台灣文化的「正體」；他認為「台灣的文化確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因此，主張台灣文化教育的改進，要循三原則出發：

首先是「本質的改造」原則，要教育台胞變成「主人翁」，學習「作主人」，亦即，從沒有參政權、自主權的殖民地人學習作一個有參政權的國民。其次是要「正統的接續」原則，要教育台胞學習的國內各方面的學識常識，使「歸宗」二字名符其實，並且要跟祖國進步而進步。最後是，灌注「世界新文化」的原則，應該培養台胞成為「世界人」。因此，他鼓勵大家要學習「作人、作主人、作中國人、作世界人」。

宋斐如的真知灼見，即使拿到今天台灣的文化環境來看，仍然如雷灌耳，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和啟示性。

統籌台灣教育重建的教育處長范壽康，在〈今後台灣教育的方向〉（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文中，具體的說明了他的教育方向，他說：

「過去五十年間台灣同胞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平等、不合理的……，而現在台灣光復，台灣同胞都回到了祖國，自然應該徹底推翻不平等、不合理的皇民化教育，用最經濟科學的手段，使台灣教育完全中國化」。

對於今後台灣教育的具體方向，他舉語文和思想兩方面；在語文方面，他認為今天台灣同胞不會中國話或不懂國文，是當然的，並不需要負責任，這「完全是日本政府的罪惡」；但是，任何國家的國民應該說本國話懂本國文，這是很明顯的道理。因此，教育的第一個方向，便是使台胞人人會講中國話寫中國字；至於思想方向，他說：「台灣光復了，過去被日本政府強迫灌輸的帝國主義思想，應該剷除淨盡，我們今後要積極灌輸與培養的，乃是現代中國的三民主義思想。」（此處的三民主義思想，內容與後來在戒嚴時期的國民黨制式三民主義思想是大不同的。）

由上可知，范壽康對台灣的教育方向的見解，重點在：徹底推翻日本的皇民教育建立真正的獨立國家的國民教育，以及剷除日本帝國主義思想建立現代的三民主義思想。這就是光復初在教育上的「去殖民」，重點在除去日本的殖民、法西斯思想和體制的殘餘，建立獨立國家的國民教育。這種針對日本殖民者的「去殖民」，卻被今天的台獨學者扭曲為針對台灣人的「再殖民」，其顛倒是非之甚，真是無以名之。

為了「促進台胞的心理建設，提高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而設立的「台灣省編譯館」，是光復初期台灣文化重建的重要機構。對於編譯館的工作重點，館長許壽裳在前述的〈台灣省編譯館的設立〉文中，提到有二個方面：第一點，在「使台胞普遍得精神食糧，充分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因此，設立了「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和「名著編譯組」，計畫提供中國通史、地理、文選、法令解

釋等國民教養書籍；第二點，是「發提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因此設立了「台灣研究組」，致力於台灣歷史、文化的學術研究。

任職公署機關報《新生報》總主筆的黎烈文，在前述的〈對於台胞的幾點希望〉文中，也提及要去掉「隔膜」，並寄望本省及其他各省同胞要共同努力的目標有：作為一個國民的條件，要盡快學習國文及中國歷史，同時，作為一個現代人，也要盡快學習政治、經濟、法律、國際問題等各方面的知識，還要「發揮自治精神、參與建國工作」，更要「知道棄舊取新，創造新的文化」。

綜合上述內容，當時長官公署負責文化教育工作的官員，對於台灣的「文化重建」，大概有下列幾個特別的觀點：

一、他們都是站在如何使「台灣同胞」從一個日本殖民地的人民轉換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國民的立場出發的。

二、因此，他們主張首先必須從本質上去改造，脫離「殖民地人」的思想，確立獨立自主的精神；不但要變成「人」，而且要「作主人」；不但要發揮自治精神，也要參加整個中國的政治建設。

三、作中國人，培養作中國國民的教養，盡快學習國文、中國文化和歷史，以接續正統，並且要棄舊取新創造新文化。

四、培養作為現代人、世界人的教養，學習民主、民生、科技和政經、法律、國際問題等各方向的知識。

第二節 台灣歷史的整理發揚以及台灣文學的傳承發展

光復初期，有關台灣歷史、文學的整理、評價和傳承的工作，不但沒有「斷裂」、「荒廢」，甚至還呈現了蓬勃健康的發展。其盛況，不但五〇年代以後的反共戒嚴時期不能相比，甚至連八〇年代以後紛紛嚷嚷的「台灣研究」，在視野的廣度和觀點的進步性上，也難以企及。

下面簡單地列舉一些史實便可明白：

一、對台灣歷史進行了有系統的研究和整理

光復不久，新生報有一篇社論〈認識本國與認識台灣〉（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曾經指出：「至於認識台灣，遠在去年四月，政府即在中央設計局成立一個台灣調查委員會，做了許多重要調查、研究和翻譯的工作」。這裡所提到的「台灣調查委員會」，就是指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確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將復歸祖國的事實後，國府成立的統籌收復台灣事宜的組織。該委員會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對台灣進行了整個的調查、研究，並編輯、翻譯、出版了數十種的台灣資料叢書；該叢書總共達兩、三百萬字，對台灣的歷史、社會、政治進行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和整理。

該文接著呼籲，為了增進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完成新台灣的建設，最好設立「台灣研究所」，「編輯台灣叢書」。實際上，行政長官公署的三大文教機構之一的「台灣省編譯館」就扮演了這樣的工作。在許壽裳的策劃主持下，積極推動了對台灣文化、台灣歷史的研究。許壽裳曾在前引的〈台灣省編譯館的設立〉文中表示說：「要發揚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來開創我學術研究的新局面」，可見得他十分肯定台灣文化的特殊成就，主張發揚台灣文化來拓展中國學術研究的成果。因此，該館四組中的一組，便是「台灣研究組」，該組由台灣前輩作家楊雲萍主持。根據許壽裳在上文中的說明，「台灣研究組」的初步工作計劃就包括了：台灣文獻目錄編纂、善本書印行、刊行日本專家著作，日據時代文獻檔案的整理研究以及刊行《台灣學報》。

另外，屬於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的《台灣新生報》，對「台灣研究」也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由台灣先輩歷史家黃玉齋主持，集合了王白淵、吳漫沙、孫萬枝等十多位台籍文化人，共同研究整理並出版了多達一百三十萬字的《台灣年鑑》。該書共分政治、經濟、產業、教育、文化……抗日運動等二十八章，不但包括日據歷史，更上溯到荷據的早期台灣史，可說是一部台灣歷史的百科全書。是台灣知識分子第一次自力自主，共同合作達成的文化成果。不但是空前創舉，恐怕連囂囂嚷嚷十數年的所謂「本土派」的台灣研究，也難望其項背吧！這些工作，正是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文化機構所推動完成的。

二、整理和紀念日據期抗日反殖的民族運動

光復初期，台灣曾經掀起了全面清算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風潮。街頭到處張貼著「打倒三腳仔」、「打倒五十年壓政」的標語；報章雜誌也都站在民族的觀點批判日本的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在殖民統治下受到殘酷鎮壓湮滅的台灣民族運動的歷史，終於得從日本殖民的黑牢中解放出來，重見天日，受到新的民族時代的頌揚。譬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辦了一次紀念「台灣民主國」五十一周年的大會，有千餘人參加，並且在報刊上展開了許多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歷史回顧。還有，過去每年的六月十七日，原來是日本殖民者的「始政紀念日」，但是台灣光復後第一年（一九四六年）的該日，卻成了追悼台灣革命先烈的日子。這一天，由台灣政

治建設協會主辦、台灣省黨部協辦，在台北舉行了一場「台灣革命先烈追悼大會」，並將該日改為「台灣革命日」。另外，由日據期台灣的泛左翼人士和積極抗日的民族運動者，共同組成的「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該會副總幹事就是著名的人民作家、社會運動家楊逵，他到處奔走聯繫抗日犧牲烈士的遺族），也於該日在新竹縣桃園忠烈祠舉行了台灣抗日先烈的奉安典禮，並且在《人民報導》上刊登了包括賴和在內的近百人的「台灣革命先烈芳名及事蹟介紹」。同日，原台灣共產黨員蕭友山，也在人民導報上用日文連載了〈台灣革命運動的歷史〉，並於九月結集成《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一書，由三民書局出版。當日，《和平日報》也刊載了署名楊達輝所寫的〈憑弔台灣革命先烈〉一文，條理清晰地介紹了台灣抗日反殖的民族運動歷史；與該文並列的是台灣作家賴明弘所寫的一篇〈六一七有感〉，賴明弘一開頭便說：「六·一七是台灣人最傷心痛哭的日子，不僅是台灣的恥辱，而且是我們中國的國恥日」，他感嘆道：「台灣在悲哀與苦悶的交集中，復歸中國了，總算找到了分手久別的兄弟了，正在這欣忭流淚的興奮中，迎此『國恥紀念日』，有心的人，那裡不會有「感」呢？」

台灣的光復，可說是實現了這些數以萬計的為抗日反殖民族運動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台灣革命先烈的遺願；也只有台灣的光復，這些被《日本警察沿革誌》稱為「匪徒」的台灣人民，才得以去汙名，恢復他們應有的民族「烈士」之名。而且，只有「光復」的歷史大變革，才得以將日帝的「始政紀念

日」改為「台灣革命日」或「國恥紀念日」；才得以拆除日本的「神社」改為民族「忠烈祠」，為台灣的革命烈士舉行追悼大會、奉安典禮。而這些「奪還我們的歷史」，正體現了台灣光復的「民族革命」的意義，顯示了「光復」在台灣社會歷史中的進步意義。

三、對日據期的台灣戲劇、美術、音樂等文化活動的回顧

由於光復帶來的時代變革的新生力量，再加上與大陸文化交流的刺激與帶動，光復初期的文化活動呈現難得一見的蓬勃氣息。只要翻開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台灣文化》月刊中的文化動態記事，就可以看到當時台灣熱鬧非凡的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這與戰後初期全世界普遍陷於經濟蕭條、文化停滯的情況，形成強烈的對比。譬如，《台灣文化》一卷三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號），就刊載了兩場文化座談會的紀錄，一是〈音樂座談會〉，另一是〈美術座談會〉。王白淵也在該刊的二卷三期（一九四七年三月號）發表了〈台灣演劇的過去與現在〉，都對台灣過去的音樂、美術、戲劇，做了深入而詳實的回顧。

四、對日據期台灣新文學的回顧與評價

光復後，第一位對日據期台灣新文學做了全面論述的人，並非台灣省籍作家，而是上海有名的編輯家、作家范泉先生。他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上海出版的《新文學》雜誌上，就發表了〈論台灣文學〉一文，對台灣文學的歷史做了全面的評述和深刻的分析。他把過去、現在到將來的台灣文學分

作三個時期：草創期、建設期與完成期，並指出日據期的「台灣文學始終在它的草創期」；在結論中他前瞻地說道：

「重入祖國懷抱以後的台灣文學……已進入建設期的開端了，我們將眼看著台灣文學站在中國文學的一部位裡，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中國文學的古有傳統，從而建立起新時代新社會所需要的，屬於新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

這篇文章立即得到台灣作家賴明弘的熱烈回應，賴明弘很快寫成了〈重見祖國之日——台灣文學今後的前進目標〉，發表在《新文學》第二期上，對范泉的〈論台灣文學〉一文表示了「極大的敬意與感謝」。范泉的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也曾以〈台灣文學的回顧〉為題，被重刊於台灣出版的《民權通訊社》刊物上（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還有，在一九四八年的《新生報》〈橋〉副刊上進行的台灣新文學論爭中，歐陽明和楊達的文章中也都引用了范泉的觀點。可見得，范泉的〈論台灣文學〉一文廣被台灣作家閱讀，大大地鼓舞了光復後台灣的作家。

楊達在他主編的《和平日報》副刊「新文學」第三期（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上，發表的

〈台灣文學停頓的檢討〉一文，也簡明地回顧了日據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他，如楊雲萍在《台灣文化》創刊號（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上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也詳細介紹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史料。甚至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這種討論也未曾停頓。譬如，王詩琅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連續發表了幾篇有關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史料性文章。及至一九四八年前後，在新生報「橋」副刊上的「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中，其中心論題之一，就是有關台灣新文學的歷史評價。正如范泉在〈論台灣文學〉文中所說的，台灣光復使台灣新文學從草創期進入建設期的開端；在這特殊的時期，回顧、檢討、總結日據期的文學歷史，自然是建設期再出發的前提。

五、在精神上、語言上復歸民族文學

一直在日本殖民者的文學和皇民文學壓迫下成長的台灣文學，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這樣的文學本質的轉變，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光復後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精神的復歸；首先，在與慶祝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四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突遭日本憲警拘捕後，在獄中所寫的。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不幸，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瀕臨崩潰前夕，在最瘋狂且最黑暗的一九四三年一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而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完

成」前，一直被幽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了天日，重回到了台灣文學的史冊。除此之外，楊逵也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作品和精神，從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來，經過了八年的囚禁，隨著台灣的光復再度的復活。另外，楊逵在光復後不久，也出版了他的名著《鵝媽媽出嫁》和《送報伙》（該小說在日據遭禁）；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生於日據末期，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流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編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也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問世，這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作品得以在台灣光復後問世與台灣讀者見面，正象徵台灣文學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在語言上，白話文創作也恢復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回復了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到六個月的時間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二篇白話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該小說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的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即便在光復後，仍然不得不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作

品中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

「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揚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材，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那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恭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

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原刊於曾健民著《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人間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三月）

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復原與轉換

【八】

前言

台灣社會的語言問題，和台灣的近現代史一樣，充滿了闇暗曲折、矛盾和複雜的內容，至今仍爭議不休。它又特別和台灣的政治歷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百多年來台灣歷經了日本的殖民主義、軍國主義，中國內戰和東亞冷戰，及至冷戰結束進入全球化單極世界的今天，每一個時代，政治力量都不時操弄語言問題。譬如今日台灣在語言、文化上的去中國化風潮，顯然是當今台灣執政者政治操作的結果。

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更是近百年來的語言歷史中，最複雜、最難釐清、最有爭議的部分。也許是受到近二十年來政治風潮的影響，迄今對這時期語言問題的論述，普遍存在幾個偏頗和謬誤的觀點。它包括下面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日本殖民統治所遺留下來的日語普及問題。論者大都過度強調台灣人普遍日語化的程度。譬如，有論者說：「日語已是台灣知識界最普及的用語、日文已成為共同的書寫文字」，或「日語普及率已達70.3%」等說法^①，把這個70.3%的日文普及率當作一般民族國家的語言普

及率，而不深究這個普及率的具體內容，以及它的殖民歷史性格。因此在論述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時，直接就把它當作前提。最令人不可思議的莫過於日本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他把日據終末日本軍國主義高壓下產生的畸形的高日語普及率，說成台灣已形成了「台灣公民」社會，甚至牽強附會說，高日語普及率已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起源動力²。為了矯正這樣的論點，本文首先深究了從一九三一年起的日本侵略戰爭中，殖民地台灣在「戰爭精神總動員體制」下的「日語普及率」的真相。

第二個問題：便是把光復初的「國語運動」非理化、汙名化。相對於上述的把日據末日語普及政策美化合理化的傾向，有些論者則黑白顛倒地說光復初期的「國語運動」是「外來」的、「壓迫性」、「歧視性」的語言政策³。針對這問題，本論文先簡單考察民國初年到抗戰勝利為止的中國國語運動的歷史，再進一步討論，作為中國國語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台灣光復後的國語運動。光復後的「國語運動」，不但繼承了中國國語運動進步的、民主的、科學的思想，而且能站在台灣的現實出發，以「復原台灣話，從台灣話學習國語」基本方針，推動「國語運動」；當然，本文也討論了它在現實政治中的挫折。

第三個問題：就是把語言的主人——台灣人「悲情化」。不知是史料不足或者是意識形態的障蔽，許多論者只強調台灣人如何受壓迫、受歧視的悲情面貌，以及台灣話如何被排除、被壓抑的一

面，而看不到光復後台灣人如何自主地追求歷史和語言解放的那一面。本論文通過史料論證，初步整理了這方面的史實，亦即：日本投降後，台灣民眾如何自主推動台灣歷史、台灣語言的復原運動的實際情形。

第四個問題：是有關光復後「廢止日文版」的問題。一般的論者，大多把它簡單化為長官公署的「惡政」，台灣人的語言「受難」。實際上並不全然如此，譬如當時《民報》上許多台灣有識之士是贊成廢止日文版的。而且，當時的反對者也都提出了各種觀點為自己的日文觀辯護，而這些觀點，顯然與今日論者的說法有很大的出入。關於這問題本文蒐集了當年的資料，對比討論，希望能復原當年的歷史現場。

本論文以「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復原與轉換」為題，是要強調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光復初的語言運動，除了有由「偽國語」（日語）轉換為「祖國語」（國語）⁴的重要面向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一直受疏忽的面向，也就是：它同時也是「台灣話（方言）的復原運動」。

第一節 戰爭精神總動員下的「日語普及」真相

日據末期的台灣日語普及率，原來在一九三〇年只有12.36%⁵，到了一九四二年卻急速成長到58%⁶；依據許多相關論述的資料，到了日據終末的一九四四年，日語普及率竟達到70%左右⁷。由上述數據可知，在日據後期的短短十五年間，日語普及率竟膨脹了六倍之多。另一方面，從懂日語的總人數來看，在三〇年代的「台灣話文論爭」中，論爭的要角郭秋生在〈建設「台灣話文」——提案〉文中提及，從日據初到一九二八年止，受過日本初等教育的人口只有二十多萬人，同期間，受過中等教育的也只要一萬多人⁸。依此可推測，在一九二八年，也就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達三十年之時，懂日語者還沒超過三十萬人，台灣話還是一般通用的語言，文化界的書面語言也還是白話文。然而，到了一九四二年，懂日語的人數卻急速膨脹高達三百多萬人之多⁹。由這些數據我們可以認識到一個令人驚駭的事實，那就是：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短短的十五年的時間，日本殖民者竟然向三百萬的殖民地人民強力灌輸了殖民者的「國語」，這是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在全世界的殖民地歷史中，也是少見的例子。譬如，英國對印度長達數百年以上的殖民統治，其英國的「國語」在印度的普及也僅止於少數上層菁英階層。

日本對台灣的五十年殖民統治，其核心目的，除了榨取經濟利益這個全世界殖民歷史的共同特徵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獨特的部分，那便是以「一視同仁」的美名，對台灣民眾進行「皇民化」——精神上的同化。特別在日據後期，日本軍國主義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動侵華戰爭起，直至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十五年戰爭期間，在台灣的殖民者便以「社會教化」為名，透過各種普及國語（日語）的手段，向台灣民眾灌輸崇拜日本神社、國體觀念、忠君愛國等皇民意識，企圖改造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成為日本的法西斯意識，以便動員台灣民眾的「人心」「人命」投入日本的侵略戰爭。而普及「國語」便成為「皇民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戰爭的精神總動員的最佳工具。

一、「國語中心主義」的教育

由台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藤修二，所奠定的台灣殖民地教育基本方針，便是「國語中心主義」的教育，也就是以「國語」的教育為教育的中核。前輩作家楊雲萍，在光復初期的《民報》上刊出的〈奪還我們的語言〉文中，便對日本殖民者以「國語」為中心的教育有很嚴厲的批評，他批評道：

「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一切的教育施設、文化施設の95%、政治施設之50%以上，皆為著

教授、普及、強制日本語而存在的」¹⁰。

矢內原忠雄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¹¹，對殖民地台灣的教育問題曾說到：「教育的中心是國語，國語不但是教育的手段，而且也是教育的主要內容。」，他也提到：「在大多數的殖民地，普通教育的教授用語都使用在地的土語，高等教育則以宗主國語言為之」，而殖民地台灣不但在學校教育全實施日語，連整個社會也強制「普及日語」。矢內原先生間接批評了台灣總督府「國語中心主義」的教育政策。另外，他在書中也引用了蔡培火的〈給日本國民〉文中的一段痛心話：

「官僚以一視同仁之聖旨為名，將同化主義作為治台的方針，而其政策之第一為採取國語中心主義，在政治上及社會上先封住我們的嘴巴，使我們成為沒有能力的人……將我們的心靈活動拘束抑制，將所有的人無能化……我們不容許有個性，我們的語言成了廢物。」¹²

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國語中心主義」的政策畢竟只限於學校教育，並沒有大幅滲入台灣社會，

因此，一九三〇年的日語普及率只有12.3%¹³。因為在這期間日本殖民者施策主要著眼於對付台灣人的武裝或非武裝抗日活動，維持治安，以及建立殖民經濟的榨取制度；亦即，這期間的施政在擴大經濟上的掠奪。另一方面，因為台灣強固的傳統的台灣漢民族意識和文化，再加上，從二〇年代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社會運動和民族運動，同時產生的各種語言運動，如漢文復興運動、白話文運動、台語羅馬字運動、台灣話文運動、世界語（Esperanto）運動等等，這些在日本殖民體制下蓬勃發展的台灣社會自主的現代化運動，大大阻擋了日語對台灣社會的滲透，甚至產生了「反國（日）語普及運動」的效果¹⁴。在這期間，雖然也有些州、廳地方政府與台灣地主士紳等有力者團體（如同風會、戶主會、婦女會……等），共同組織了一些如國語練習會、國語普及會、講習會等的普及國語（日語）活動，但效果不彰。

二、戰爭精神總動員

一九三一年爆發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日本在台殖民者為配合其國內的侵略戰爭總動員，開始針對與中國同文同種且有深厚漢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識的台灣民眾，積極推動改造台灣「人心」的各種施策，而普及國語便是其中心工作。它企圖透過普及國語灌輸台灣人皇民意識，使台灣人成為帝國順民，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總督府發布了「關於台灣公立特殊教育設施令」。用總督府和州廳的公庫經

費，在市街庄各村落普設「國語講習所」，以十二—廿五歲失學青少年為招收對象，修業年限為一到四年；另外普設「簡易國語講習所」，以失學青少年以及一般民眾為對象，修業期為三到六個月，利用農閒和夜間上課六十日以上。從此國語講習所成了公立的社會教育設施，遍佈台灣社會末梢各村落，形成了嚴密的「國語普及」網，最高所數曾達一六、二二八所（一九四一年），最高學生數曾達九二四、二〇四人（一九三九年）¹⁵。這些設施成了學校教育之外推動普及日（國）語的最大力量，使懂日語人數激增。

然而，殖民政府大力推動的這種普及日語的政策，並不是一般意義的語言學習，也不是要透過學習語言普及現代知識或進行思想啟蒙，而是企圖透過普及日語進行精神上的皇民化。換言之，用政治的強制，在學校教育之外推行普及日語，是日本十五年侵略戰爭中，在殖民地台灣推動戰爭精神總動員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皇民化運動的最大支柱。

一九三四年，隨著日本本國逐步強化社會統制而走向法西斯主義的同時，台灣總督府也成立了「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其「台灣社會要綱」把獎勵國（日）語和崇敬神社並立，自此日語和崇拜神社成了教化台灣民眾的兩大支柱。

一九三五年，又成立了「民風作興協議會」，企圖進一步深入掌控台灣社會內部，企圖打破其推動戰爭精神總動員的最大障礙——也就是牢固的台灣漢民族社會的宗教語言、習俗、習慣和日常生活。

它以改革宗教寺廟、打破迷信、改善陋俗之名，進行皇民化；其徹底實行「同化」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台灣民眾同化於他的「崇敬神社」、「皇國精神」、「常用日語」、「尊崇國旗」等日本法西斯式的國民生活。¹⁶

在普及國（日）語方面，除了普遍設立國語講習所之外，也強制規定在官公衙、銀行、公司等公共場所只能講國（日）語不能說台灣話；新聞雜誌、電影廣播等傳媒要用國（日）語；公司團體應以會說「國（日）語」為優先雇用條件；公務機關對講國（日）語者應給予「方便」等等。以獎懲並施的方法，驅逐台灣話，使日語成為日常公用語。¹⁷

在爆發「七七事變」之前的一九三七年一月，殖民政府廢止了公學校的漢文科，四月廢止了報紙雜誌的漢文欄。自此，台灣話、白話文、漢文完全被逐出台灣社會的公共領域，僅存在於家庭生活中。

一九三九年，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宣稱，在日本新的戰爭局勢中，台灣應致力「南進基地化、工業化、皇民化」等「三化」；台灣人應徹底「皇民鍊成」，成為「忠良」的日本帝國臣民。¹⁸這時，在「普及國語」方面，則進一步深入了台灣家庭，實施了「常用國語（日語）家庭」的制度：在街、莊、村各地設立「常用國語家庭」的審查委員會。台灣人經認定為「國語家庭」者，除加以表揚外並給予各種「特權」，包括給予「國語家庭」子弟就讀專收日人的小學校和中學校的特權，並可優先擔

任公職，且可得到與日本人同等的「食物配給」量。殖民者企圖以恩賜特權的作法，進一步深入台灣家庭強力「普及日語」。在物資匱乏的戰爭時期，施行日、台不平等的「食物配給」制度，突顯了殖民者不時高喊「一視同仁」、「內台一如」、「徹底同化」的欺騙性；而推行「國語家庭」的歧視性作法，更加深了台灣人內部的分化和對立。

對於日本殖民者的這種欺騙作法，法學家戴炎輝先生曾說過：

「是語言精神的同化，但政治經濟的不同化」。

在日本的十五年侵略戰爭期間，不管是普及日語也好、皇民化運動也好，只是企圖改造殖民地人的精神成為與日本人一樣的「皇國赤子」，為其侵略戰爭效命，而殖民地人民的實際政治經濟地位卻絲毫未改變，一點也沒有同化。

十五年戰爭中，對台灣民眾施行的這些精神總動員，給戰後的台灣留下了深刻的難以清償的負債。

三、70.3%的真相

雖然在日據終末期，日語普及率曾高達70.3%，但是其實際的內容如何？有必要進一步探究。依據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台灣社會教育》，書中把占總人口58.3%的懂日語者進一步分成三類；其中，常用日語者佔19.63%，普通會話沒問題者佔19.23%，只會在左右近鄰講簡單會話者佔19.23%。由此可知，真正的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公私都慣用日語者，不超過總人口的19.63%。

前輩作家葉石濤先生，在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五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演講——〈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中，曾提及在日據期他與父母親的會話情況：

「父母親會讀、說、寫日語；即便如此，我們兄弟姊妹在家中整天說日語，但父母親一句也不說，我用日語和他說話時，父親只用台灣話回答。我推斷父母親有民族的自傲，但卻是錯誤的自傲。」¹⁹

不管葉先生如何評斷他父母親的民族自傲，但從他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知道，葉先生及其兄弟姊妹屬於慣用日語的19.63%，而其父母則應屬於占19.23%的普遍會話沒問題但在家中不講日語者。

從一九三六年起擔任台灣總督的小林躋造，在一九三九年的極祕件〈支那事變與台灣〉中，揭露

了「同化」台灣人的困難，他說：

「無論如何，台灣人是涵育於有四、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原文為「支那」）文化中，一般民眾從內心深處就有牢固的中國祖國意識，也就是嚮往所謂的中華民國。」²⁰

因此，在常用日語的19.63%中，到底有多少人打從心底成了天皇的「忠良臣民」，鍛鍊成了「皇國赤子」呢？這是很值得懷疑的。再從另一個角度看，在一九四二年，全台灣列名「國語常用家庭」的只有九、六〇四戶（七七、六七九人）²¹；且改姓名人數只佔全人口的2.063%，全戶數的1.693%（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改姓名者卻高達83.8%）²²。可見得，真正已皇民化的台灣人在人口比例上很少。何況絕大部分的人，都只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而加入的。這顯示了日語普及率與精神上已皇民化者之間有很大的落差。就如矢內原忠雄在其名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指出的：

「不可將語言之同化與民族之同化視為同樣的東西，這在殖民地之理論和實踐上是不容置疑的事實」²³。

怪不得，日本戰敗後，過去的殖民者，看到原本忠順的台灣御用士紳一夕間轉變態度成為攻擊日本的急先鋒而哀嘆不已。²⁴

第二節 奪還我們的語言

一、自主的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運動」

實際上，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八月十五日，一直到十月廿四日陳儀來台的這段時間，台灣社會早已開始了各種自主的解放活動。原來在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的高壓下，被迫潛隱下去的台灣的民族、民主力量，在日本戰敗後一舉迸發了出來。從各方面自主地展開了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活動；同時也積極地進行祖國化運動。復原運動和祖國化運動兩者是互為關聯的；因為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正是台灣祖國化的重要內容和主體力量。

原本在日據中期蓬勃發展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台灣文藝聯盟等團體成員，在日本殖民政權垮台後不到一個月，九月中就重新集結先後成立了台灣農民協會、台灣人民協會、台灣總工會籌備處、台灣學生聯盟等團體。為爭取人民民主政治的實現，自主地建設新台灣而奮鬥²⁵。在戰爭終末期包括《興南新聞》在內由六家報社整編成的唯一一份戰爭文宣報紙——《台灣新報》，從十月十日開始出現了中文版²⁶；在十月十日同日，第一份繼承日據期《台灣民報》作風的中文報《民報》創刊²⁷。這兩份報紙小專欄或社論、專論，積極地對日據期的「御用士紳」以及「改姓名、講日語」的皇民階層展開了批判；要原御用士紳「退場反省」。同時，兩報也大力介紹中國近代民族運動、孫文三民主義、民族精神以及民族語言。另外，比這兩份報紙更早出版的刊物，是台中的楊達在九月初創刊的中日文合刊《一陽週報》²⁸；該報最早宣揚孫文思想，主張追求人民的自主的解放。

在這同時，也開始了對台灣抗日歷史的紀念活動以及對抗日犧牲者的平反。譬如：由原台共黨人蘇新主編的《政經報》²⁹，在第二期（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五日）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第三期（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也刊登了日據終末期「東港事件」中遇難的名律師歐清石的〈獄中吟〉。還有，許多團體也對日據末期日本憲警捏造的東港事件、汐止瑞芳事件以及學生事件進行了公開悼念。並且組織了「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在報紙上公佈了抗日犧牲者的名單，將其入祠忠

烈祠，並援助其遺族生活。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五日，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黨部、三青團以及其他民間團體共同舉行了「台灣民主國」的紀念大會；同日《民報》社論〈紀念台灣民主國〉記道：「要真實紀念我們的『台灣民主國』，唯有努力推進三民主義的新台灣的建設；在五十二年後的今天，在首次能公然紀念「台灣民主國」的今天，在無限的感慨，無限的悲憤，無限的興奮裏，我們的結論只是如此而已」³⁰。

這些在日本投降後立即湧現的自主的文化、歷史復原運動，《民報》社論〈提議編纂「台灣史」〉中也曾概括道：

「我們現在要遂行『歷史的接收』，從日人手裡奪回我們的『歷史』……就是把日人所湮滅的，使它甦生，日人隱藏的，使它重見天日」³¹。

二、奪還我們的語言

除了要從日本人手裏奪回我們的「歷史」之外，楊雲萍也在《民報》上痛定思痛地寫了〈奪還我們的語言〉³²；該文批判日本殖民政府從未想要教育台灣人們使之實踐人格，

「只想消滅台灣人們的語言，隨之消滅一切歷史和文化，使其成為大日本帝國的順民、奴隸而已」；

他歷訴了日本殖民者如何用殘酷的手段「普及國語」，

「社會上，因不會說日語，而受了非道的待遇，我想不論那一位小百姓，沒有不飽嚙的」，

他沉痛地說：

「事實上，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大成績，就是造成許多的兒童和青年，忘記了他們的母語，最少忘了一部分……台灣光復，河山依舊，而事物有全非者，要算這件『語言問題』最為嚴重，最厲害。何況此問題，不僅是語言的問題而已，實關於『民族精神』之問題」。

楊雲萍在日據中期從一個白話文作家出發，經歷了日文作家，並精研台灣文史。他在這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並批判了日本殖民者奪取台灣人民的歷史、文化、語言以及民族精神的問題，並高呼：要奪還我們的歷史和語言。他所指的「語言」，當然是指「母語」——台灣話和白話文。隨著日本戰敗殖民政權崩潰，台灣社會自主興起的對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運動，和祖國化的風潮是一體的兩面互不相悖的；在去殖民的時代課題上，兩者是一致的。

《民俗台灣》的創辦者兼主編池田敏雄先生，在他的《敗戰日記》中³³，記載了台灣光復後長期被壓迫的台灣話再度復活的狀況。譬如，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二日他記錄了：「這些人本來都一齊喝過酒聊過天的朋友，他們的談話都用台灣話，不知怎樣，總覺得不舒服」；還有，在十月廿一日他寫道：「台灣學生聯盟，有高倡常用台灣話的傾向」。可見得光復後，台灣話很快地，當然也是很自然地，從家庭走回到了公共領域。

當然，在慶祝台灣光復的熱烈感情達到沸點時，也產生了一些急切要求他人「不講日語要講國語」的行為。曾擔任《台灣新報》副社長兼主筆的伊藤金次郎，在他所著《台灣不可欺記》³⁴中，就曾記述了這樣的場面。在台灣民眾熱烈慶祝台灣光復的行列中，他看到了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畫面，他描述道：

「原來有兩位女學生被一個中年台灣人痛罵得幾乎要哭出來了。原來由胸前貼著的名牌一看就知道是台灣女子的這兩個，在觀看遊行隊伍時不覺說出的是日語，而這被旁邊的這個中年台灣人聽到後，對方說出：『你們是哪一國人呢？不是中華民國台灣省民嗎？那為什麼不說國語呢？國語不是指日語，而是中華民國國語啊！』，在眾人環視之前，破口大罵這兩位女學生了。被罵得滿臉通紅的兩位女學生，很快地消失到人群裡去。」

這種場面，也讓人彷彿回到日本殖民下，嚴厲要求台灣人講日語的法西斯行為，該書也描述了這種場景：

「看到台灣民眾在路上或茶館裡用台語交談的情形時，一些日本人實在看不慣而破口大罵，甚至要動手打人——這是司空見慣之事」³⁵。

三、國語熱潮

在脫離殖民統治的解放感和復歸祖國的高昂民族感情中，台灣民眾掀起了熱烈學習祖國語的風

潮。《台灣新報》有生動的報導³⁶：

「私立商工學校取下了原來的『支那大陸進出者北京語講習會』的招牌，從九月十八日開始積極教授國語；共有一八〇〇位學員，其中有台北州知事和日本公務人員，學員從十四歲的少男少女到六十歲的老人都有，講師有北京大學的鄭明祿、北京師範大學的馬笑釗等其他三人」。

這種學習國語的熱潮，分析其動機，有人是出於純真的祖國熱，也有人是想為祖國服務，更有人是想做新官僚。在這股學習國語的狂熱中，許多書房也再度復業開設國語講習班，也有人在街頭巷尾掛起黑板，就地傳授國語，向圍攏來的臨時學員收學費；也有像前述《台灣新報》所報導的，在日據期原本專為訓練「支那大陸進出者」的地方，也換了招牌開始講授國語，大發利市，甚至連原殖民者官僚也加入學習中國國語的行列。在當時，只要有會國語的人，不管標準不標準，都會有人圍著他學習。形成了一股空前絕後的全民國語運動。

同時，也大量出版了有關學習國語的書籍。有中國人編的，也有日本人編的；有文言的也有白話的；有用老國音的，也有用日本「假名」的。總之，千奇百怪，優劣雜陳，呈現混亂的局面。在這樣

的情況下，社會上也形成了一種不正確的語言意識；認為「不說日語就得說國語」，不會說國語的地方就仍用日語。這種混亂的局面，一直到次年（一九四六）「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透過培養正確的學習意識、樹立國語的標準、訓練大量的師資、供應國語教材讀物後，才逐漸改善。

然而，單靠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力量畢竟有限，真正發揮力量的還是台灣民眾自主的熱烈感情，再加上黨、政、軍、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學校、民間社團等各種團體，主動舉辦的各種各樣的國語講習班，才克服了戰後初期匱乏的物質條件，使國語運動浸透到社會各角落。據統計，從一九四六年一月起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止，《台灣新生報》報導的各種國語講習會消息，共有一七三次，而國語比賽有四十五次之多³⁷。

除了上述如雨後春筍般的國語講習會之外，報刊雜誌在普及國語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光復後最早創刊的中文報《民報》，在「冷語」專欄上，說明了它們堅持用中文的態度³⁸，它說：

「民報同仁都在努力使用台灣式的白話文，想給青年諸君容易明白……更希望青年各位，多下點工夫，放棄『跑熟路，看日文』的念頭，這就是諸同人於光復後，即決定發行純國語報紙的心情。日文和日語，於學者作種種的研究上，或者還有存在的價值。至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上，須要拂拭淨盡，才有新鮮的氣象可觀。」

而另一份有影響力的《人民導報》，在它的創刊號上³⁹，也用日文寫了〈本報開闢日文版的宗旨〉，說明開闢日文版的作用，它說：

「台灣已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中國的報紙上出現日文版，站在民族立場似乎不好看……本報創設的日文版，是為了啟蒙尚未懂國文的本省青少年，以及對在台日本人的再教育。」

可見得《人民導報》著眼於幫助未熟習國文的青少年的思想啟蒙，以及受過日本軍國主義洗腦尚未遣返的日本人的再教育，而創設了日文版。該報日文版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廿二日完成使命而主動結束。

第三節 國語運動

一、民國初年以來的「國語運動」

中國幅員遼闊，雖然有共同的文字，但各地方音不同，大家見面語音不通，成了有耳朵的聾子。⁴⁰大家身上流的都是漢民族的血，但我們相對啞然無言，好像碰到的是外國人一樣。這種因為語音不同的隔閡，造成了彼此感情、知識交流的障礙；在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統一國民意志團結人民上，也成了很大的阻力。

清朝末年，中國內憂外患紛至，國力一蹶不振，愛國之士目擊時艱，為了啟迪民智統一國民精神，而有各種改良漢字統一語音的方案。其中有名的如盧懋章的「切音新字」、王照的「官話字母」、勞乃宣的「簡字全譜」等。

民國建立後，認識到統一國語必先由統一讀音入手，因而教育部在一九一二年召集了各省代表，聘請專家學者，再加上部派人員，齊集北京組織了「讀音統一會」。經過三個月的會議，審定了六千多個漢字讀音。並制定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⁴¹。一九一八年教育部正式公佈「注音字母」。並

令各高等師範學校附設「國語講習科」專教字母與國語，以培養國語教師。一九一九年正式成立「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定《國音字典》；並於一九二〇年令全國國民學校，一律將「國文科」改為「國語科」，實施「言文一致」的國語教育。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南北統一，奠都南京，將「國語統一籌備會」改組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自此，「國音字母」實包括二式：「注音字母」為第一式，「國語羅馬字」為第二式。一九三〇年，國民黨中常會議決將「注音字母」改為「注音符號」。一九三二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重修「國音字典」，完成「國音常用字彙」，至此，政府才正式確認國語以北平話為標準⁴²。一九三五年，國語統一的籌備工作已進至推行階段，遂裁撤「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另成立不支薪的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制定各號注音國音銅模，以期注音書報普遍印行。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抗戰軍興，「國語推行委員會」不得不停頓工作。一九四〇年，後方抗戰建國工作加強，教育部為普及國語教育，掃除文盲決定恢復「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且擴大組織，這使國推會的工作，不僅為統一國語與普及識字教育，其他如語文教學之視導與協助、邊疆語文與國語之溝通，乃至字典之編纂等，皆為其工作範圍⁴³。

上面所敘述的，是民國建立以來，政府教育部在推動國語上的幾次重大決策的概要。造成這些國語政策的實施，其原動力主要來自民間社團強力推動的「國語運動」。「國語運動」是個社會性的文

化運動⁴⁴，同時也是從清末民初以來，風雲湧起的中國民族民主運動（或有人說成現代化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它與新文學運動更有密切的關聯，譬如，在一九二〇年教育部令國民學校將國文改為語體文時，提倡白話文的胡適便說：「這一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⁴⁵。在蔡元培、吳敬恆、胡適之、劉復、趙元任、錢玄同……等的倡導下，提倡和推動國語的人日益增多，這些人並非把國語運動當作職業，而是當作文化事業，因為各人各有自己的本業。大家是懷抱改造社會建設民族國家的理想，共同推動「國語運動」。這是民國以來「國語運動」的基本性格。

「五四運動」和「白話文運動」更直接影響了台灣，引發了張我軍等人的新舊文學論爭；白話文成了當時台灣的文化啟蒙運動和社會運動的語言。譬如，《台灣民報》半月刊的創刊號上（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刊登有王敏川等人倡設的「白話文研究會」的宗旨簡章和入會單；到一九三〇年前後，又發生了長達數年的「台灣話文論爭」，有黃石輝等人提倡創設「台灣話文」。其出發點是，考慮台灣特殊的現實，為達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應該用台灣話文（土白話）創作⁴⁶。然而，在這同時，日本殖民政府已開始推動「普及國（日）語」政策，到了一九三七年，已完全禁用漢文、白話文。因此，「台灣話文」並沒有實踐的機會。

台灣光復後，由魏建功、何容等領導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便是民國以來「國語運動」的延伸以及進一步的發展。省籍語言學者吳守禮也說：「我看中國的國語學者可以說是獲得新耕地，

再說是實驗台了」⁴⁷。

二、光復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中、美、英國三領導者共同發布的「開羅宣言」中，確定了日本戰敗後台灣復歸中國的方針。翌年四月，國民政府創設了由陳儀領導的「台灣調查委員會」，統籌收復台灣的研究和設計工作。同在重慶的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也參與了「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並參加了「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指導、研究和討論了未來台灣光復後語文、教育上的許多問題。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七日被任命為台灣行政長官的陳儀⁴⁸，在翌月的九月廿六日，在重慶召開了外國記者會，第一次發表了治台方針。他首先提到的，便是有關光復後台灣的教育問題，強調要「恢復中國國語以及歷史教育」⁴⁹。可見得，推動國語和歷史教育是陳儀施政理念的重要一環。陳儀在還未來台履任之前，已在重慶積極籌劃「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設立，並邀約友人許壽裳來台主持「台灣省編譯館」。

在台灣推動國語運動需要許多專業人才，這些人才絕大多數都要從大陸邀約；然而，抗戰勝利後，全國復員工作本來就須要龐大的人才、人力，而到台灣從事推動國語運動，除了要有國語的專業之外，還要有對台灣的社會歷史有一定的認識，像這種人才真是少之又少。因此，陳儀特別請教育部協助，教育部則派出了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魏建功、專員何容以及委員王炬等三人；

另外陳儀又邀約了孫培良等五人，總共八人。他們帶著注音符號銅模、國語留聲片以及有關國語的法令和書籍，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重慶分三路出發，從十二月到翌年三月陸續抵達台灣。一九四六年一月抵達台灣的魏建功、何容，從二月起開始著手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並研究調查台灣語言環境的特徵，擬定在台灣推行國語的基本方針。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日，在台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下成立了「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因事設置」，也就是因應台灣光復後特殊的語言環境而設立的；而且也是「因制求人」，亦即，國語推行工作人員嚴重不足，只有機構先成立再補足人員⁵⁰。委員會設主委一人，由魏建功擔任；副主委一人，由何容擔任；常務委員五至七人。下設四組：包括調查研究組（有關國語及本省方言之調查研究）、編輯審查組（有關國語教材之編輯審查）、訓練宣傳組（有關國語訓練及宣傳）、總務組（關於不屬其他各組之事項）。該委員會一直運作到一九五九年六月被裁併為止，為光復後台灣的國語普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另外，在各縣市也成立了「國語推行所」。該推行所承公署教育處的命令，受「省國語會」的指導，辦理該縣市的國語推行工作。由該縣市長任主任，設推行員三至七人。在「省國語會」籌組期間，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已成立了九所，一九四六年內增設到十三所；原本預計設立十九所，然而，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國語推行所」被撤銷，原國語推行員留任各縣市繼續工作。

魏建功、何容等人，一方面籌設「省國語會」，一方面不斷從各種管道在大陸邀約人才來台以補足國語工作人員。這些人員，有從廈門來的，也有從北京邀約來的；還有，一九四四年，國民政府在西北師範學院、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等三學院設立的「國語專修科」，其第一屆畢業生，大多數都派來台擔擔任推行國語的工作，替台灣的推行國語事業注入新生力量⁵¹。另外，抗戰勝利後，原居留北平的台籍人士，組織了「台灣省旅平同鄉會」⁵²，同鄉會主要領導人有洪炎秋、梁永祿、張我軍、張深切等人。他們深知北平為國語之鄉，而台灣正缺國語老師，因此在中國大學開辦了講習班，招收大學畢業學生，培養來台國語教師。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共有七十多位國語教師來台任教，在台灣推行國語運動中，更發揮了不少的作用。

由上可知，從民國初年開始經過了五十多年推動的「國語運動」的成果，不論在人才、法規、觀念或者是器材（如國語留聲片、注音國字銅模等）全都應用在光復後台灣的國語運動上。可以說是集中國「國語運動」之大成。

三、台灣國語運動的基本方針——實行「復原台語，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

台灣光復之初，語言混亂有兩大特徵：

首先是，台灣方言已喪失了它應有的地位。由於日本殖民者強制推行日（國）語，使原來通行的

台灣方言停滯在五十年前的階段，退縮在家庭，而沒有吸收新成分，在學術文化上已不夠用。而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又說日語比說方言方便。因此方言喪失了其應有的功能。這成了推行國語的最大阻力。

其次，由於學習國語的熱潮，各種各樣的「國語」流行於坊間；有東北方言式的，有南方官話的，也有藍青官話的，漫無依據各行其是，這也造成推行國語的阻礙。

面對台灣這種混亂的語言現況，魏建功、何容等經過研究調查，斟酌實情，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確立了在台灣推行國語的基本方針，那就是：「復原台語，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以這種基本方針為前提，訂立了適合台灣特殊環境的六條「國語運動綱領」⁵³：

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

注重國字讀音，由「孔子白」引渡到國音。

刷清日語句法，以國音直接讀文達成文章還原。

研究詞類對照，充實語文內容建設新生國語。

利用注音符號，溝通各族意志融貫中華文化。

鼓勵學習心理，增進教學效能。

這六條「國語運動綱領」，它的基礎或者起點，便是「實行台語復原」。這和前述楊雲萍所主張的「奪還我們的語言」（這「語言」是指台灣話）是一樣的；也與魏建功說的：「恢復台灣同胞應用祖國語言、聲音和組織的自由」⁵⁴、「精神的復原」⁵⁵相同；更與一九四八年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中規定的「研究方言以便學習國語」的精神相通。這使魏建功等人推動的國語運動，與省內文化界進行的台灣歷史、語言的「復原運動」有了共同的出發點。

而且，在「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還未成立而魏建功與何容等人還未抵台之前，在《新生報》上就有一篇題為〈國語問題〉的社論⁵⁶，它指出：

「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完全是中國話，比中國國語所帶漢族的古音更多，訕笑『南蠻駮舌之人』是錯誤的……台灣話也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

社論認為學習國語並不困難，因為：

「國語與台灣話的語法相同，文字相同，不過發音變一變而已，日本話是一種外國話，組織與文法和台灣話不同……國語是我們自己的語言，要懂，懂是應該的，並不光榮，不懂也不是可恥……不僅台灣人要學國語，福建人、廣東人也在學著國語」。

這篇社論，反映了台灣文化界很早就對國語、台灣話、日本話的本質有了很深刻的認識。它明白指出，台灣人民不但要從殖民者奪回我們的語言，還進一步與全中國人一樣要學習國語。從「去殖民」同步跨向「祖國化」。

四、台灣國語運動的基本思想

魏建功、何容抵達台灣不久後，經過觀察、調查研究台灣的語言狀況，陸續發表了許多有關台灣「國語運動」的文章，說明了台灣國語運動的基本方針與觀點。下面將概括地，綜合地評述這些專論的要旨⁵⁷：

首先，這些專論扼要地釐清了台灣話和國語的根本性質。它說：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完全是

中國話，且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而國語本身也是一種方言，只不過因為它所使用的人最多且分佈最廣，因此從一個北平的地方方言（土白話）擴大到全國，而成為全國的共同的語言。台灣話和國語都是血脈相通的中國話。實際上，這和世界上所有「現代國家」的形成歷史過程中的「國語運動」是相同的。發生在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其本質就是在創建中國的現代國家過程中，追求全國通用的標準語，使全國「言文一致」的統一運動。關於國語與方言（台灣話）的關係，這些專論都強調：方言（台灣話）與國語是同系的語言，是同一種語言演變而成的不同支派；彼此間，文字、語法相同，語彙、語詞也大致相同，在語音上差別雖大，但也有演變的規則可循；兩者同是祖國的語言。因此，光復後的台灣，從「方言學國語」是學習國語的最佳捷徑。而且，保存方言也能幫助國語的推行，推行國語也能幫助方言的保存，彼此相輔相成。同時，它還強調了，「一種方言在它自己的本區域內，應該是日常生活上的用語」，這是一個淺顯明白但至關重要的觀點。但是這個觀點，在遷徙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的高壓「國語政策」中，長時間被抹消了，被遺忘了，以至於日後國語與方言之間產生了緊張關係，大家對國語與方言的關係只有刻板印象，而無法以科學的、民主的態度去看待。因此，這些專論對今日的台灣人來說，有語言的再啟蒙作用。

在上述的認識基礎上，這些專論認為：初脫離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台灣，台灣話雖然還沒有完全被殖民語言的日本話消滅，但受到日本話的壓迫，已有些變質；與我國其他地區的方言相比，已經喪

失了它在台灣社會應有的方言地位。因此，何容特別主張：首先「應該設法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怎樣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呢？在原則、作法上，他認為：凡是可以台灣話的時候都用台灣話，不用日本話；而且從外省來的不會說台灣話的人也應該學習台灣話，「因為台灣同大陸各地的方言一樣，有被學習的資格」。其次，對於學習國語的方法，他強調要「重拾『從方言學國語』的這把金鑰匙」，絕不可用學外國語的方法去學國語，並糾正說：要用方言的思路寫文章，不可用日語的思路寫文章；只要恢復了方言（台灣話）的能力，用台灣話對照學習國語，自然水到渠成。「三、五年後，我們就可以收拾行李向本省同胞告別了」，何容如此肯定地說。

關於當時的「國語運動」的性格，在由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的《新生報》「國語」副刊創刊號上（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有這麼一段話說明道：「國語運動在我國還算是一種社會運動，始終沒有得到政府徹頭徹尾的，用政治力量嚴厲執行過」。也就是說，一直到台灣光復初期，「國語運動」仍然一直是一種「文化社會運動」，還未成為政府權力強力執行的「國語政策」。事實上，當時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是一個人力、物力很小的機構，各縣市雖設有「國語推行所」，但全省總共只有四十幾位國語推行員。魏建功曾在北平甄選了四十多位（預定二百位）國語推行員，但願意來台工作的只有三十多位。而且一九四七年一月，各縣市的國語推行所被裁撤，使得四十多位國語推行員一度居無定所。總之，當時在台灣推行的國語運動，其主要的目的在去除壓迫台

灣話的日本話，恢復台灣原有的民族語言（包括台灣話和國語）；特別是致力於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然後透過台灣話比較學習國語。這就是台灣光復初期「語言的去殖民」和「語言的民族化」的真精神。

光復初期的「國語運動」，有「保存母語」、「推行國語」的雙重任務，這就自然造成去除日語的結果。由此可知，如陳芳明等所說的：光復後國民政府用「國語」壓迫、歧視台灣人的語言、思維的說法，完全是虛構顛倒是非的謊言。至於採用的學習方法，則是鼓勵「用台灣話學國語」，「用方言的思路寫文章」，這是相當務實的科學態度。主委魏建功還更進一步指出：學習國語不是一個單純的語文訓練，而是關聯到「文化和思路的光復問題」，是文化的復原運動，他說：「不覺得國語普及不普及成問題，日夜焦心的是，如何使得教育文化上促進精神復原的工具，完善而敏捷的使大家能自由運用起來」。由此可知，當時的國語運動，同時也是台灣初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後的文化重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當然，對於「台灣國語運動綱領」第一條，「實行台語復原，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的方針，也並非沒有反對的聲音，只是反對聲音並不大。反對者從各種角度闡述了各自的看法，但爭論之焦點都集中在應不應該復原台語的問題上。譬如，從絕對反對的張方杰⁵⁹，到有條件贊同的宋斐如教育處副處長⁶⁰；還有，與當時任《人民導報》主筆以及建國中學校長的省籍語言家陳文彬打了一場筆戰的李

五、「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工作成果

前面所討論的是有關在台灣推行國語運動的基本觀念和方針；下面將簡單說明其實踐成果。

創設不足一年的「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因為其對台灣國語運動有正確的認識，正確的基本方針和務實的做法，其成果斐然。

在混亂分歧的「國語熱潮」中，首要的工作便是樹立標準和示範標準；「國語會」在這方面的工作有：

讀音廣播示範：從三月一日起，在台北廣播電台作讀音示範。起先，用教育部灌製的趙元任發音留聲片，作注音符號讀音示範。五月一日起，則使用教育處編印的國民學校及中等學校暫用國語課本（省國推會旁加注國音），以及民眾國語讀本（左注方音，右注國音），由齊鐵恨主播。

編印國語參考書：包括《國音標準彙編》、《注音符號十八課》（加注台音漢字，以便對照學習）、《國語台音對照字錄》、《台國通用詞彙》……等等，不下二十本。通過編印這些書籍，實踐了「從台灣話對照學習國語」的方針。

編輯「國語週刊」（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一日起，在《新生報》刊載）。另出版《國語通訊》和

《國語旬刊》。

有關「研究實驗」方面有：從八月起成立「國語會」（國語推行委員會簡稱）的附設實驗小學，研究本省推行國語教育的適當教法與教材，實驗國民小學的「直接教學法」。另，調查研究台省各種方言方音，編印閩南、客家兩大語系的《方音注音符號》。

有關「訓練宣傳」方面：舉辦或協辦各種國語講習會，包括有地方行政幹部、公署員工、國校教員、各縣市國語推行員等。另外，附設「語文補習學校」及設立「示範國語推行所」，推廣對照類推的學習方法。

其他如：視導各縣市國語推行所和學校，輔助各級學校的國語教學等。主辦協辦各種「國語競賽」，發起「國語運動促進會」。甚至「路牌注音」、「灌製「國語留聲片」，「攝製國語影片」等。

62

從青年時即投身中國的「國語運動」、終其一生獻身「國語運動」的何容，以他經歷過在大陸的「國語運動」以及後來主導並推動台灣「國語運動」的經驗，在一九四九年兩岸還未隔絕但即將隔絕的時刻，寫了〈國語運動的意義和目標〉一文⁶³，對「國語運動」做了階段的總結。首先，他還是以為「國語運動」是一種「文化運動」，接著他概括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國語運動」的三大意義和目標：

- 一、是「推行全國適用的標準語」，這是要解決方言分歧的問題。
- 二、是「提倡文言一致的白話文」，這是要解決言文分離的問題。
- 三、是「實行國字注音」，這是要解決國語難學的問題。

以上三點，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範圍的國語運動的意義和目標。而其第四條是「恢復本國語文」，這是針對台灣特殊的語言歷史的獨特目標。因為台灣受日本殖民五十年，造成了日語強力滲透台灣社會的現象，結果是台灣話萎縮而日語通行。因此，在台灣推行國語運動的最後目標，則是「恢復本國語文」。所謂「本國語文」是指台灣話和國語，只要恢復本國語文，日語就會自然消滅。

第四節 日語問題

一、光復初期的日語狀況

日本投降後，最早提出「奪還我們的語言」⁶⁴的楊雲萍，說：「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大成績，就是造成許多兒童和青年忘了他們的母語。」他進一步形象地描述到：「台灣光復後，河山雖依舊，但事物有全非，而全非的事物中，『語言問題』最嚴重、最利害。」，換言之，語言問題是日本殖民者留給台灣社會最沉重的負債。而「語言問題」背後的文化精神問題，更長期困擾著復歸祖國後的台灣。就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在日據終末期的日語普及率曾高達70.3%；其中，真正慣用日語且忘了母語的人大約有19.23%，並且都集中在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兒童。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期間長大，在日本的戰爭精神動員體制下受教育、人格形成的世代。這個世代不只在語言上，甚至在精神、感情、價值觀上，都受了日本法西斯主義深重的影響。

對於光復初台灣語言的實際狀況，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但其中最值得參考的是，當時的省籍語言學家吳守禮在〈台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⁶⁵中的說明，他說：

底下，我把台灣人的語言意識來做個側面觀，按着年紀的大小，台灣人的語言層可以分做三階段。就是老年，中年，少年。

老年級，除了五十年來沒有機會學日本話的一部份不用提以外，智識人的話語雖然大都是台灣話，生活語也是台灣話。但是語彙裡已經摻入不少的日本語和語法了。

中年級，除了一部份人沒有熟習日本話，大都能操日本話，看日本書，寫日文，有的更因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走思路作思想都用日本語的語法。這一層的人，有的雖然會說一口還很流利的母語，可恰因為母語已經由社會上退到家庭的一角落，他們不得不用日語想東西。台灣話的根幹雖沒有搖動，枝葉的作用已經變了。

少年級，這一層，不但學會了日本語言，有的簡直不會說台灣話，實際上最難脫離日本語的一層。

我為甚麼劃這三個時代呢？為的是國語的純化上要認清這狀態，教育技術上更關重要。所以提出來做台灣話復原的參考。不外是拋磚引玉。

當時已升任「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委的何容，在〈闢「台灣為日語環境說」〉⁶⁶文中，反對

「台灣為日語環境」的說法。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台灣並非「日語環境」，他說：

在未到台灣之前，深以不通日語為憾，以為懂點兒日本話，工作纔方便。到了台灣之後，並沒有因為不懂日語而感到不便，能說幾句日本語的朋友，倒反而常碰釘子。對本省人說日本語，本省人常用台灣話或國語回答。儘管本省人之間，為了方便，常講日本話，但他們不喜歡外省人同他們講日本話。還有，不要以為為台北市的人個個能講日本話便以為台灣是日語環境，其實只要走到離市區不遠的地方，在生活上不需要用日本話的人，也不一定會說日本語。就日本話在本省通行的普遍程度來說，台灣不是日語環境。

從吳、何兩人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粗略的結論。那就是：台灣不是「日語環境」，但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學生已徹底日語化。

二、跨越語言的一代

現在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極端誇大光復後台灣知識份子語言轉換的困難，並誇張地斷定他們成了失語症、歷史失憶症。這種說法是沒有客觀依據的。下面舉幾個例子，說明光復後語言轉換的實際情

況。

文學社團「銀鈴會」的成員⁶⁷，可以說都是典型的「皇民世代」，也是「日語時代」；他們在日本十五年的戰爭期間受教育和成長，台灣光復後進入台大或師院就讀。因此，如何從日語轉換成國語，跨越語言的鴻溝，正是他們最大的挑戰。

「銀鈴會」成員林亨泰在〈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從「銀鈴會」談起〉⁶⁸中說：

因此，當他們被迫強制使用日語的時候，他們必須以台灣意識的內涵來超越日語這一工具——即為了掙脫「語言佔領」的枷鎖。但，光復後，當他們不必再被迫講日語的時候，他們卻又面臨喪失已經純熟的語言工具，再度下一番決心另一次的跨越——即重新學習中文，對中文的表達能力作技術性的突破。

「銀鈴會」的主要推動者領導者朱實⁶⁹，在「台灣詩史『銀鈴會』」的研討會上發表的書面報告中，描述了他就讀台灣師範學院時，在國文教授黃肅秋的熱心和細心指導下，努力了一年多，就已跨越了語言轉換的障礙，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中文的文學作品。同一時期「銀鈴會」的同仁也一樣，很快

地就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文學作品。

在同研討會上，蕭翔文的報告中也細述了學習國語的歷程。他說：因為他在光復後第二年才從日本返台，後考入台師院，比一般的同學晚了半年多才開始學中文。起初他連簡單的國語都不會說，因此，躲在圖書館努力閱讀著名作家茅盾、巴金的作品，很快地學會國語並開始了中文創作，甚至還受委託將同仁的日文作品翻譯成中文，在當時著名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發表。有同學還不敢相信，說他不會說國語竟然會用中文寫作甚至還幫人翻譯。

日據末被徵召到東南亞為日本帝國作戰的台灣人日本兵，在年齡上大概與「銀鈴會」成員相同或稍長一點，也是「皇民化」世代。他們在日本投降後，被集中在新加坡的捕虜收容所，等待遣返台灣。在收容所中，他們用油印的方式，發行了《明台報》⁷⁰。該報只發行了五期，且只存續一個多星期，但已出現了許多中文作品。這些作品雖然有些粗糙，但仔細去讀仍能理解其真意。可見得，在日本戰敗投降後，這些被日本帝國拋棄、流落在異域的台灣籍日本兵，在知道了台灣復歸祖國後，就開始用各種方法學習中文。《明台報》的主要成員，詩人陳千武（本名陳武雄），便是在被送往新加坡收容所之前，在雅加達的台灣同鄉會開始學習中文的。據他說，在這裡學習最大的成果是背誦了「國父遺囑」。由此可見，即便在困難的環境中，只要熱心學習，台灣青年必能很快地學會國語。因為要跨越的語言鴻溝，並不是新學外國語，而是民族語言的復原。

題 71 中說：

譬如，有一位署名「深啟」的青年學生，在《和平日報》「新青年」副刊上寫的〈學生的說話問題〉中說：

我於去年八月十五日以前也是全用日本語的，但八月十五日以後，我就全用台灣語了，亦學習著說國語了，我可並不曾感到有什麼困難……台灣語本是祖國語裡面的一系，它的語法的文法差不多是一樣的。因此學習台灣語也可以說就是學習國語的第一個步驟。

當時任教台大的錢歌川，以筆名「味橄」在《台灣文化》上發表的〈台灣的國語運動〉一文，以家中的本省女傭為例說：

「她是一個小學畢業生，說得一口很好的日本語，在光復以後，才從她母親那裏學會了台灣話，到我家裡不到兩個月，又學會了極流利的國語，她有一天好像有什麼新發現似的，自矜地對我說，她也懂一種外國語，那就是日本語。」

從上述受皇化運動影響最深，且日語化最完全的大學生、作家、台籍日本兵和女傭的實例中可以知道：即便是如吳守禮說的「少年級」，且「實際上最難脫離日本語的一層」的青年，只要用心學習，語言的轉換並不是太困難的事。

文學是文字的藝術，作家只有在駕馭文字的能力達到一定的藝術境界，才能創作出好作品。在日據時期以小說「牛車」享譽文壇的作家呂赫若，原本是一位日文作家。光復後，他熱心投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⁷³，且擔任《人民導報》的記者。他在台灣光復後六個月的短短期間，就跨越了語言轉換的障礙重新出發，開始以白話文創作。他很快地就以白話文創作了〈故鄉的戰事——改姓名〉⁷⁴、〈故鄉的戰事二——一個獎〉⁷⁵、〈月光光——光復以前〉⁷⁶等短篇小說，深刻地嘲諷了日據末期皇民化運動中「改姓名」、「國語常用家庭」的荒謬。

還有，光復後曾經在《中華日報》擔任日文版文藝副刊主編的日文作家龍瑛宗，也很快地跨越了語言轉換的障礙；他在一九四九年創刊的《龍安文藝》上，第一次用中文發表了〈左拉的實驗小說〉。在文末的「附記」中，龍瑛宗表示：「這篇評論，在我是用國文發表的最初的東西。當然不無多少感慨……」。可見得，龍瑛宗經過了四年的努力，一定程度克服了語言轉換的困難。

三、關於廢止日文版

由「台灣調查委員會」草擬經國民政府修正通過，而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公布的「台灣接管計畫綱要」，是國府接管台灣的總指導。該綱要的通則第七條，便明確規定：「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然而，台灣光復接收後，行政長官公署並沒有依綱要規定立即實施禁用日文。特別是報刊的日文版，為了現實的需要，大多數報刊在光復初都設有日文版。

當時，任台北市教育局長的姜琦，曾著文〈「偽國語」與「祖國語」〉⁷⁷表示應馬上禁止日語，他說：

國語之所以困難普及，其原因並非在台灣話之存在，乃是在於日本語之流行；論理，在十月廿五日收復台灣政權和治權那一天，就必須雷厲風行使用「祖國語」（按：包括國語和台灣方言），而絕對禁止使用「偽國語」——日本語，萬不可藉各種口實，美其名曰「顧到事實」、「適應環境」而因循苟且。

光復後最早創刊的中文報《民報》，秉持其一貫的精神，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二日的社論以〈須

推行廢用日文運動」為題，主張須與獎勵學習國語的同時，推行廢止使用日文運動。

實際上，在主張立即廢止日文的另一方面，也有另外一股反對禁止日文的力量。首先是各縣市的參議會；早在一九四六年的六、七月間，坊間開始流傳將廢止報刊的日文版的時候，新竹市參議會在七月十七日便首先提議要當局不要廢日文版；接著，高雄、台南、嘉義、台中、花蓮等各地地方參議會也陸續提出延期廢日文版的建議。他們的理由包括：太早廢日文版會阻礙政令的傳達，青壯年人還未完全理解國語等等。但是，行政長官公署卻在八月二日各大報上宣示，廢止日文版已是既定政策，並決定於十月廿五日實施。⁷⁸

對於這宣示，《新新》雜誌第六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二日），有以〈廢止日文時期尚早〉為題的小方塊，批評說：政府決定於十月廿五日廢止新聞雜誌的日文這件事，等於封閉了本省人的耳目。不僅青年層，連壯年層也都為當局過份的做法而怨嘆，反對的聲音浪很高。《新新》第七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在十月廿五日廢止日文版的前夕，刊登了數篇用日文寫的討論廢日文版問題的文章，下面分別介紹如下：

九月十二日，《新新》雜誌社在「山水亭」舉行了「談台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座談會由蘇新⁷⁹主持，與會者包括王白淵、黃得時、王井泉等在日據時期活躍的文化人士。他們共聚一堂討論了台灣文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去路。這個座談會，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的台灣文化人在光復後的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的文化座談會。因為翌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大家各奔東西，緊接著又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來臨，倖存的人如驚弓之鳥，大多數噤聲一生。在這個座談會上，談到了不少關於台灣光復後文化人面臨的新語言問題；包括演劇劇本創作和演出的語言問題、當下各報副刊的語言問題以及學習國語的問題等等，但是並沒有出現直接批評廢止日文版的內容。只有蘇新說了一些，他說：

「雖然，不能說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就不可以用日文創作；但是，如果我們是面向中國民眾而寫的話，就不能不用國文寫作了。那麼，就這一層的意義來說，關於廢止日文版的事，我們是很難反對的。」

在《新新》同期上，另外有一篇題為〈本省人與日本語〉的文章，作者署名張·G·S。該文全面而深入地討論了「在台灣的日本語」問題，並從正面反對廢止日文版。由於其說理深闢，下面將擇要介紹其內容。首先，他歷訴了在台灣的日語狀況，他說：

台灣的日語是過去五十年間日本帝國主義強制施行於台灣的日本文化的殘滓。十幾年來，我們在

與祖國嚴密的隔絕下，不得不接受了日本語教育，以致台灣話地位低下，甚且造成了講日語比講台灣話更方便的年輕世代。光復一年來，這個在年輕知識份子層中，廣泛且深入滲透的日本語，曾經一時，因為大家對「敵性日本」的敵愾心，日語也成了敵性的東西。我們曾經以為日語將會隨著日人的遣返而被遺忘；然而，實際上，由於日語超乎想像的滲透力，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又不得不使用它；再加上大家對光復後現實的冷靜批評，以及當局對一般民眾推動國語運動的力道不夠，使國語熱漸漸冷卻，造成了和一年前一樣的，日文日語仍然在民眾間通用。其實日語的這種潛在力量包藏著三種危機，一是仍存在著嚮往日本文化者；其次是，陷入懷疑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矛盾之中；第三是過低評價日語的滲透程度，而採取了廢日文版的政策，造成省民的痛苦和文化低下。至於廢止日文版，等於奪走了今天仍然是省民的嘴色和耳朵的東西，給省民帶來痛苦，這絕不是民主主義的做法。

該期《新新》的「編輯後記」，也記載說：終於決定了要廢止日文欄，青年層的失望相當深刻，猶如雪片般寄來的投書中，我們可以聽見他們悲觀的呼喊。

同期也刊載了作家吳濁流的〈對廢止日文的管見〉，直接反對廢止日文版。一開頭，他便直接了當地表示：

「本省人與日文的訣別，其實比與日本姑娘的訣別更痛苦。」

他說：

「日文為什麼不好？那是因為它被武裝過，現在它已被完全解除了武裝，日文已回到它原來的面貌，已經不是不好的東西了；被解除武裝的日文，在文化媒介上扮演著很重要角色，特別是，世界各國的文化幾乎都被譯成日文，只要懂得日文，就可以接近世界各國的文化。」

他比擬說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下復歸祖國，等於是留學日本回來。他說：

「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之前，政府還花錢送很多留學生到日本去，今天我國有了六百五十萬的留日學生一舉回到祖國來，對我國而言，應該是可慶賀之事。然而，政府竟然採取了廢止日文的愚蠢之舉，對好不容易留學帶回來的貴重文化，不但不加以培養，竟然還加以踐踏。」

結語中，吳濁流說：為了文化，政府是不是可以再考慮呢？他提議說：

「政府機關的報刊的日文版當然應該廢止，相對的，民間日文報刊雜誌應該允許它永久地自由地出版。」

吳濁流在日據終末期（一九四四年）曾任職《台灣新報》。光復後，《台灣新報》被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後，吳濁流繼續在該報社服務擔任日文版編輯工作，一直到廢止日文版前夕的十月二十三日，才辭去報社工作。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二日《新生報》的一角，刊出了日文版工作者告別日文版的文章。其中有吳濁流的〈辭別之言〉、楊啟東的〈疼痛的話〉、黃巳城的〈與文字奮鬥〉、劉永耀的〈寸觀三則〉等。吳濁流的〈辭別之言〉，並沒有直接觸及廢止日文版的問題，而是針對光復後的政治、社會的整體狀況，表達了他的看法。楊啟東的〈疼痛的話〉中則表示：有許多讀者的投書，認為廢止日文版的時機太早，會造成文化水準的下降，但他認為廢止日文版，起初當然會比較痛苦，但在這混亂渾沌的年代中，採用這種方法，反而落得輕爽痛快；他建議政府在廢止日文版後，應該在推動國語運動上採取更積極的作為，特別在鄉下，青年人都期盼著有才能且親切的國語老師的到來，在國語運動上，有積極的作法，才能防止廢止日文版後造成文化水準的下降。

從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到十月廿四日擔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的龍瑛宗，在廢止日文版前二天，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關於日本文化——今後的心理準備〉（十月廿三日），另一是〈台灣將會怎樣〉（十月廿四日）。這兩篇文章，都沒有直接談到廢止日文版的問題，而是把問題焦點投向十月廿五日以後的更大的問題上。前一篇文章是討論到廢止日文版以後，大家將如何對待日本文化的問題；後一篇則討論在美蘇對立日漸惡化的世界局勢中，以及中國爆發內戰的政局下，台灣未來的命運將會如何？

龍瑛宗在〈關於日本文化〉文中，再三強調：

「我們關心日本文化，並不是醉心於日本文化，也不是贊美日本，或者想成為日本人，實際上，只是想促進祖國中華民國文化的向上和強盛。」

該文強調：

「要通過攝取日本文化促使中國文化向上進步，何況日本的發展和動向，直接影響中國的命運，

因此不能無視日本，即使廢止日文版後，我們依然要關心日本文化。」

另一篇〈台灣將會怎樣〉中，龍瑛宗認為台灣的命運受到全中國的政治所制約，而中國的命運又受到美國蘇聯對立影響；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受到世界政治的影響。如果國共和談破裂，中國內戰長期化，不但台灣同胞，全中國同胞將陷入更悲慘的黑暗日子，中國正面臨著有史以來空前的危機。就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和主張對照聯繫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作家龍瑛宗的思想可以說比同時代作家更開闊、更高瞻遠矚。他在一九四六年末，就預見到世界冷戰和中國內戰的到來，而台灣的命運將深受冷戰和內戰的影響。在十月廿四的《中華日報》上，也刊出了以「再見吧！日文版呀！」為題的專輯，除了龍瑛宗的文章之外，還有六篇日文版同仁的文章，由於篇幅關係，就不再細述。⁸⁰

一貫主張推行廢止日文運動的《民報》，早在八月廿七日，便刊出了社論〈關於禁止日文版〉，該社論表示：

「原則上，廢止日文版是沒問題的，誰也不能夠反對，現在若干方面所議論的是廢止的時間過早，希望延期一、兩年，這種希望值得同情，但我們支持當局措施，堅決地斷行既定方針，沒有延

展的必要。理由有三：一是，日人禁中文版僅是十年前的事，當時會閱讀中文的人現在還在；二是，據學校老師說，只要用功，一年之間學生就會閱讀報紙；三是，容許日文存在，會阻害國語的普及，我們要在好的意義上，把整個台灣中國化，那麼迅速推行國文是重要課程。」

最後，社論說：

「日人禁止中文，這是反動的暴虐政策；我們禁止日文，這是進步的當然措置，在這之間有明顯的區別。」

同樣地，當時中部的第一大報《和平日報》⁸¹，也於十月廿四日刊出了社論〈用自己的文字〉，贊同政府禁日文版的措施。基隆的《自強日報》也於同日刊出了〈告別日文〉的專題後，結束了日文版。

至於青年學生的心聲如何？在《台灣學生》一卷三期（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有謝哲智⁸²寫的〈當今的文學與青年〉，在關於日文問題上，該文說：

「當然日本已戰敗了，我們憎惡他們的政策，但沒必要排斥它的語言。我們要不斷學習國語，同時研究日本這外國的文化和習俗，吸收他們的長處也有助於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或社會賢達能站在更高處考慮這個問題……我們不是無條件擁護日文日語，……不過因不能坐視當今社會的腐敗，所以暫用習慣的日語來發表自己的意見。」⁸³

該文反映了當時一般台灣青年學生樸素的想法。把失去「敵性」的日語，當做吸收日本長處以及暫時表達意見的工具。

在廢止日文版的同時，一九四六年七月，行政長官公署下令自八月起各中小學教師施教應一律用國語（包括本省方言）講授，不准再用日本語。⁸⁴ 這個措施，首次把日語從教壇驅逐了出去。

從上面的資料來看，當時，不管是作家、學生或報社，都是站在台灣已復歸祖國的現實上以及民族的立場上看待日語問題。就像《民報》社論〈關於禁止日文版〉中所說：

「大家都承認：台灣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是中國民族的一部分，中文當然是我們的國文，再也沒有使用日文的必要，這種原則論，誰也不能夠反對。」

大多數人是站在這樣的「原則論」上討論廢止日文版問題的；雖然有人贊同也有人反對，而持反對意見的人，並非反對廢止日文版，而是希望不要太早廢止，要延期實施。特別是對於日文已成了唯一的口舌、耳目的人來說，廢止日文版，將造成極大的不便和痛苦。由此觀之，廢止日文版可能成了四個月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的錯綜複雜的潛在原因之一。

四、逐漸冷卻的國語熱

就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各大報都刊登了當局決定於十月廿五日廢止日文版消息的同時，《民報》的「小乾坤」專欄上，報導說：「學國語國文的人，比前一個時期少得多了，可是研究英文的人卻不少……。」這透露了「國語熱潮」已經開始冷卻，這也意味著台灣的「光復熱」「祖國熱」已逐漸冷卻。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主要來自民眾對光復後時局的動盪不安感到失望，再加上經濟蕭條失業，以及對行政長官公署的施政、官僚貪污腐敗現象的不滿。《民報》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的社論〈勸勉學徒諸君〉中指出：

「青年學生在光復後曾興奮高興，自動禁說禁寫日文，忍受言談不便，廢寢忘食認真學習國語。如果照當時的意氣風發，繼續努力下去的話，必能有所成。然而，由於『外省搬入許多貪污頹廢』的作風，以及侮蔑台胞的言行，把青年學生的熱情吹冷了，憤慨之餘，國文不高興學了，國語不高興說

了。」

《民報》社論間接地批判了施政當局；由於對為政者的不滿，致使學生學習國語的熱情也冷卻了。

作家賴明弘在〈光復雜感〉⁶⁵中，一開頭便不滿地說：

「一提到『光復』二字，使我們感慨萬千。平心說：六百萬的台省人，現在對『光復』不僅不感到興奮，反而個個都有點近於『討厭』的情緒」。

對於國語問題，他氣憤地說：

「有人說，台省人要趕快學習國語國文，才能瞭解民族文化。這是什麼理論？難道台灣話不是中國的地方方言之一？試問廣東人講廣東話，福建人講福建話，浙江人講浙江話，難道他們便不了解民

族精神與文化嗎？會說道地的『國語』的北京人，未必比較任何地方的人更深切瞭解民族文化吧！」

他鄭重地說：

「堅決反對以『不懂國文』為理由，來對台省人加以威嚇的評論家」。

與賴明弘所指的用「不懂國文」為由威嚇台省人的相似情形，也出現在公署當局的作風中。《民報》社論〈國語國文和自治能力〉（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八日），就對陳儀以本省的國語國文能力不足為由否決台省實施縣市長民選的要求，予以批判。社論說：「這種發言，恐怕可能使一部份人們，藉口于國語國文能力，來制止台灣人辦政治。」

同樣地，當公署提出「自治三個年計劃」，預定要到一九四九年才實施縣市長民選時，記者曾向民政處長周一鶚詢問；周處長對這問題有所回答外，還附帶說了台灣省民的「國語國文」能力問題；他說國語國文問題，不只是語言的問題而已，實為國民精神、國家觀念問題。針對周處長的發言，《民報》社論〈『國語國文』與國家觀念〉（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嚴厲批評道：

「對於意識地，或是不意識地忘卻方言是有『民族魂』的事實，藉口『國語』的未普及，而要阻礙民意、摧殘民權的企圖，我們是要澈底的抗爭，要澈底的排擊的！」

隨著政局不安、經濟復原因難、再加上有些官僚顛預腐敗的作風，使光復初的語言問題（包括國語、台語、日語）逐漸染上政治和時局的陰影，而日漸複雜。

完稿於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註釋

1 ·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2 · 藤井省三：《台灣文學この百年》（日本，東方書局，一九九八年五月）。

3 · 陳芳明：〈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聯合文學》第一九七期，二〇〇一年三月號）。

4 · 姜琦：〈「偽國語」與「祖國語」〉，《新生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日。

5 · 參閱註2，該書的三十一頁中的統計數字更低，懂日語者竟只有8.473%。

6 · 劉寧顏、林文龍等：《重修台灣省通志卷六文教志社會教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年六月三十日），頁二二六～二二九。

7 ·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台北：《思與言》第二十九卷第四期，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九〇。

黃英哲：〈戰後台灣における「國語」運動の展開〉（日本：《法學研究》七十五卷一號，二〇〇二年一月），頁四〇二。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二年七月），頁

三六三。

- 8 ·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三月），頁三三三。

- 9 · 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二年七月），頁三六〇。

- 10 · 楊雲萍：〈奪還我們的語言〉，《民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三日。

- 11 ·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岩波書局，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六日），頁一六一。

- 12 · 譯文採用文英堂出版的，伊藤金次郎所著《台灣不可欺記》的中譯本，頁一〇九。

- 13 · 參閱註6，頁二二七。

- 14 · 參閱註9，頁三三六。

- 15 · 參閱註9，頁三五八。

- 16 ·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灣》（東京，刀水書房，一九九六年二月）

- 17 · 同前書，頁二九六。

- 18 · 山本有造：《日本殖民地經濟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一九九三年五月），頁五一。
- 19 · 《新潮》月刊二〇〇二年第九期，日本新潮社出版。頁二六二。
- 20 · 石田雄：〈「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思想》月刊第八九二、八九三期，日本岩波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一月。
- 21 · 參閱註9，頁三六二。
- 22 · 參閱註16，頁一八一。
- 23 · 參閱註11，頁一六三。
- 24 · 參閱註34。
- 25 · 楊克煌：《回憶二二八起義》（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一二〇—一五。
-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頁一一二—一一八。《人民導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 26 · 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舉行了日本受降典禮後，改名為《台灣新生報》。
- 27 · 《民報》社長林茂生，由原台共成員許乃昌和民眾黨黨員陳旺成主編。

- 28 · 《一陽週報》，從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發刊，到當年十一月十七日停刊，共發行九期。迄今已出土公開的，是第九期「紀念先總理誕辰紀念專刊」。
- 29 · 《政經報》為陳逸松出資，蘇新主編的半月刊。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創刊，隔年七月廿五日停刊，共發行十一期，是光復初最重要的政經、文化雜誌。
- 30 · 參閱《民報》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五日社論。社論的最後一句話可能有誤植。
- 31 · 參閱《民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社論。
- 32 · 《民報》社論，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二、廿三日兩天。
- 33 · 「台灣近代史研究」第四号——池田敏雄氏追悼紀念特輯（日本，綠蔭書房，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
- 34 · 伊藤金次郎《台灣不可欺記》中譯本，（台北，文英堂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四月），頁一一八。原著出版於一九四八年。
- 35 · 同前書，頁一一七。
- 36 · 《台灣新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三日。
- 37 · 洪瑞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教育的接收與推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論文，一九九八年六月廿五日）

- 38 · 《民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
- 39 · 《人民導報》，四十六年一月一日創刊。
- 40 · 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台北，國語日報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 41 · 齊鐵恨：〈由國語推行談台灣收復〉（上海，《台灣月刊》創刊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 42 · 何容：〈國音標準的來台〉（台北，《國語文》二十五卷九期，一九六九年九月）。
- 43 · 張博宇：《台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四年）。
- 44 · 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台北，國語日報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 45 · 同前書，頁五五。
- 46 · 參閱註44。
- 47 · 吳守禮：〈台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新生報》，國語副刊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一日。
- 48 · 秦孝儀、張瑞成編著：《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一九九〇

年)，頁一四九。

49．《台灣新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九日。

50．方師鐸：《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台北，國語日報社，一九六九年十二月），頁一四三。

51．參閱註43。頁三九、四一。

52．《新台灣》創刊號，（北平，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頁八。

53．魏建功：〈國語運動綱領〉，《新生報》「國語」副刊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一日。

54．魏建功：〈何以要提倡從台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國語」副刊，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八

日。

55．魏建功：〈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

56．《新生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

57．魏建功：〈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

〈「國語運動在台灣的意義」申解〉《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二月廿八日。

〈國語的文化凝結性〉《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

〈台語音系還魂說〉《現代週刊》一卷十二期，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國語的德行〉《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

〈何以要提倡從台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五月廿八日。

何容：〈論麻胡主義的國語教育〉《新生報》，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

〈恢復台灣語應有的方言地位〉《新生報》，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

〈論加緊推行語文教育〉《新生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一日。

〈方言為國語之本〉《新生報》，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

陳文彬：〈國語與台語〉《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一日。

58．陳芳明：〈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聯合文學》，二〇〇一年三月號。

59．張方杰：〈論從台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國語」副刊第五期。

60．宋斐如：〈如何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

61．李武忠：〈關於「國語與台語」〉，《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

62．張博宇：《慶祝台灣光復四十週年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中），（教育廳，一九八七年）。

63．何容：〈國語運動的意義和目標〉，《國語週刊》復刊第四十八期，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

- 64 · 楊雲萍：〈奪還我們的語言〉，《民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二、廿三日。
- 65 · 吳守禮：〈台灣人語言意識的側面觀〉，《新生報》「國語」副刊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 66 · 何容：〈關「台灣為日語環境說」〉，《新生報》，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
- 67 · 日據終末期，由台中一中的學生朱實、張彥勳共同組成的文學團體，出版油印的同人刊物《邊緣草》。光復後，在楊逵的指導下，從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起，發行油印刊物《潮流》，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共發行五期。另外，他們也積極在《新生報》中的「習作」、「學生世界」、「台灣婦女」、「橋」等副刊；以及《中華日報》的「青年園地」，台中《力行報》「力行」、「新文藝」等文學園地發表中文作品。主要成員有林亨泰、蕭翔文、張彥勳、朱實、詹冰等人。
- 68 · 原文刊載於《笠》雙月刊一二七期，一九八五年六月。
- 69 · 朱實原名朱商彝，彰化人，當時就讀師範學院教育系；一九四九年在他主編文學刊物《龍安文藝》上發表了〈展望光復以來台灣文運〉；同一年發生四六事件時，得知已被列名追捕名單而逃赴大陸。八〇年代後，曾在日本岐阜經濟大學任教，現住上海。
- 70 · 唐立：〈雲間の曙——「明台報」に見られる台灣籍日本兵の戦後台湾像〉，《亞洲非洲文化研究》，第五十一号，一九九六年。頁一三一～一七〇。

- 71 · 深啟：〈學生的說話問題〉，《和平日報》「新青年」第三期，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二日。
- 72 · 味橄：〈台灣的國語運動〉，《台灣文化》二卷七期，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
- 73 · 參閱池田敏雄《戰敗日記》中十月十二日記事。《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四號，綠蔭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日。
- 74 · 原載於《政經報》二卷三期，一九四六年二月。
- 75 · 原載於《政經報》二卷四期，一九四六年三月。
- 76 · 原載於《新新》第七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 77 · 姜琦：〈「偽國語」與「祖國語」〉，《新生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廿日。
- 78 · 張·G·S：〈本省人と日本語〉，《新新》第七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 79 · 蘇新（一九〇七—一九八一），台南佳里人。早在就讀台南師範時就參加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七年到東京留學，參加了籌備台共建黨工作，為台共主要領導人之一。一九三一年被捕，繫獄十二年。光復初期主編過《政經報》、《人民導報》、《台灣評論》、《台灣文化》、《中外日報》等重要民主刊物，並與王白淵、呂赫若、蔡子民等共創《自由報》。
- 二二八爆發後，逃往上海，後轉往香港，創辦「新台灣出版社」，並與謝雪紅等人共創「台

灣民主自治同盟」，出版了《憤怒的台灣》。一九四九年到北京，編纂了《閩南語之形成與演變、語音、語法》，一九八一年過世於北京。

80 · 其他六篇篇名是：

陳金生：〈直到國語熟練為止〉

趙天麟：〈聽聽神明的聲音〉

孫輝瑜：〈再見日文版〉（詩）

陳雲鵬：〈結束日文版之際〉

孫林茂：〈全心全力學習國文〉

孫土池：〈放下臨別之筆〉

81 · 《和平日報》是外省年輕文化人王思翔、周夢江等，得到台中的楊克煌、謝雪紅等左翼力量的協助發行的報紙。因為它敢於臧否時弊，而受到歡迎。它創刊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二二八事件後停刊，由台北軍方接收續辦。

82 · 謝哲智曾在《新生報》，歌雷主編的「橋」副刊上，發表過二篇小說：〈怒吼〉（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拾煤屑的孩子〉（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

83 · 該文是日文、國文並列刊登，因為該文的國文部分生澀、不通順，而日文比較流暢，因此本論

文的摘句，是依其日文內容翻譯的。

84 · 張博宇主編：《台灣地區國語推行資料彙編》（上）（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一九八七年），頁

二〇二。

85 · 賴明弘：〈光復雜感〉（《新知識》創刊號，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

【九】

台灣光復初期的教育

去殖民。祖國化與現代化

一、前言

在台灣教育史中，光復初期是最為重要且最值得深入研究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處於從日本的殖民地教育復歸為祖國的國民教育的歷史轉折時期，不但有豐富的歷史內涵，而且有高度的文化意義。從教育史的層次看，它歷經了國民政府對台灣教育接管的籌劃、接管與重建的複雜變革過程；從更廣泛的文化層次來看，這個教育變革過程本身，就內含了台灣現代文化史中的殖民、去殖民、祖國化以及現代化的幾個基本問題。

光復初期台灣的教育，大略可分為兩個時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時期（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和台灣省政府教育廳時期（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本文主要集中討論行政長官公署時期的教育。本文首先簡單回顧了光復前的台灣教育史，再依時間順序概述光復初期教育接管的籌劃及實施過程，接著，討論當時的教育理念與方針；而包括學制改革、師資補充、擴大就業機會、國語運動、民族精神教育、臨時教育措施等等，在這時期台灣教育變革的重要內容及其特徵，更是本文主要的討論內容。本文主要根據史料進行討論，但也隨處聯繫到

光復初期台灣的去殖民、祖國化以及現代化的幾個基本時代特徵。

由於篇幅限制，本文無法對光復初期的社會教育、教育經費或更細節的教育問題進行討論；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已有許多專著，不需在此贅述。^①

二、光復前台灣的教育

光復前台灣的教育，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荷據算起直到滿清割台為止；第二階段則是日本殖民時期。^② 本文擬先簡略地回顧過去的歷史，以突顯光復初期教育的特徵和意義。

(一) 早期的台灣教育

台灣最早期的教育，始於荷據時期；荷蘭殖民者為教化土著，於一六三六年在新港社開辦學校，教授羅馬字及羅馬字拼寫的新港語，教學的內容則為基督教教義。^③

到了明鄭時期，鄭經循陳永華之請，開設聖廟、建明倫堂，在各里社廣設學校，並延聘中土通儒以教子弟。^④ 在各社設社學、州設州學、府設府學、中央則設學院；並依科歲之例考選學生，州試合格者送府，府試合格者送院，院試合格者准其入學院，由此擢用陞遷。^⑤ 這時期的教育雖然為期不長，但這段時期在台灣首開中土考科教育系統，甚具歷史意義。

滿清時期的教育可分建省以前（1683-1886）和建省以後（1886-1895）兩個時期。前者完全與

大陸中土傳統教育相同，為舊學全盛時代；後者則在劉銘傳領導下開啟了台灣的新式教育。建省以前，台灣的學校類型甚多，有府縣儒學的地方官辦學校、書院、義塾與書房、社學等。這段時期一切學務，均受學政提督統轄監督；不論府、縣儒學，舉凡教授官之任命、秀才之黜陟及府縣之經費，統歸學政辦理；但直接管理者，仍由知府管理府儒學，知縣管理縣儒學。⁶而教育的方針則一如大陸中土，一切以科考為目的。

一八八五年建省以後，台灣巡撫劉銘傳兼理學政。劉銘傳有進步的思想與創業的精神，除舊佈新，在台灣開始了現代化的建設，重大的創建包括：築鐵路、籌辦郵電、建防務、創辦西學等。在教育方面，他創設了西學堂（課程有外語、史地、算學、理化等）、電報學堂及番學堂。⁷

（二）日據時期的殖民教育

日據時期的教育，以一九一九年台灣教育令之發布、改革為界，可分為三個時期：教育令發布之前（1895-1919）、發布之後（1919-1943），以及改革教育令之後（1943-1945）。第一期，日本殖民者尚未確立對台之教育方針，因為這時期台胞抗日事件頻傳，且殖民經濟體制尚未穩固；這時期是以傳習日語為主要教育內容，並初創公學校（台胞）、小學校（日人）及醫學校、師範學校。第二期，因其對台灣的殖民經濟控制已趨穩定，且已有相當發展，再加上日本本國進入了所謂的「大正民主期」，對殖民地台灣的統治也進入了所謂「內地延長主義」的時期，因此採取了相對寬鬆的方針。

在教育方面則是公布教育令，開始確立為進一步發展殖民經濟的教育方針、學制與施設，正式奠定了殖民地的教育系統。其學制以國民學校（分公學校、小學校）為「初等普通教育」；以中學校、高等女學校、高等學校及大學專科為「高等普通教育」；以農工商及水產學校，各種實業補習學校為「實業學校」；以師範學校及臨時教員養成所為「師範教育」，以農、工、經濟專門學校及大學附屬農、林、醫等專門部為「專門教育」；以帝國大學為「大學教育」；以盲啞學校為「特殊教育」等等。

⁸一九四一年，日本侵華戰爭陷入了泥淖，且與美、英對立形勢日益升高，日本為強化在台灣的戰爭動員體制而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且積極懷柔同胞，急將台灣教育令進行修改：廢止公學校與小學校之名稱，一律改稱「國民學校」，美其名曰「一視同仁」，實際上，仍以一、二、三號之不同課程表，繼續其殖民地之種族差別教育；⁹一九四三年，因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日呈頹勢，為了補充軍源不足需要學生從軍，乃將初等教育改為義務教育。

綜觀日據時期的教育，雖其系統完備而且具現代規模，然其本質仍屬於殖民地性質的教育。其教育目的不在發展人的能力，而在透過教育系統來維持與擴大其在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利益及優位性。它以民族的教育不平等為特徵，施行民族差別、民族歧視的教育政策；從初等教育的國民學校起即實施日台差別教育，更限制本省同胞進入中等以上的學校，至於大學專科的文、法、商科，台籍學生更是鳳毛麟角。如此一來，使本省同胞所受的教育，都集中在初等教育和實業補習教育，其教育目的在使

本省同胞有效地供其殖民驅使。而其具現代規模的中等以上學校，幾乎成了培育日人在台子弟的教育機構。

從一九四四年日人高唱「一視同仁」時期的教育統計數字，就可以說明日據時期台灣教育的殖民地性質。¹⁰ 依統計，當時在宣稱「日台共學」實施義務教育的國民學校，其一號表學校的五五、七七八位學童中，有90%以上是日人學童；而二號表學校的八十七萬餘學童中，日人學童卻僅有二十位；這說明從國民學校時期即已開始實施民族隔離教育的實際狀態。至於國民學校教員，也呈現日台不平等現象；因其在師範教育階段即嚴格限制台籍學生入學（台籍生僅占20%），因此，全台教員一五、四八三人中，日籍有八、三二二人，其中六、〇六四人為教導（正教員）；而台籍教員七、一六一人中，卻有四、九五二人是助教（非正教員），只有二、二一五人為正教員。¹¹

屬於中等教育的各類學校中，只有在實業學校台籍學生數超過日籍生（九、一九四對五、三六七）；最突出的是，由郡、街、庄設立的實業補習學校中，90%是台籍生，日籍生則甚少。至於在中學校，雖然台日籍學生數相當（七、八八八對七、二三〇），但若將當時的日台總人口比率（台籍人口六、一三三、八六七人占93.3%，日籍三九七、〇九〇占63%）¹² 換算成升中學校之機會，則日子弟進入中學校的機會大約是台灣人子弟的二十倍，可謂不平等之極。由於這種升入中學校階段之機會不平等構造，更造成了高等教育階段進一步的不平等現象。至於中等學校教職員數，則台籍教員僅十

分之一不到（二、八六〇人中的二四三人）。

其次，包括帝國大學、大學預科、專門學校、高等學校在內的高等教育，其百分之八十是日籍生，而台籍生不過佔百分之二十（六六九人對二、七六一人），其中文理科台籍學生寥寥無幾，法商科台籍學生更少，幾乎都集中在醫科。¹³譬如當時最高學府台北帝國大學中，日籍生有二六八人，台籍生則只有八十五人，而且台籍生中就有八十人就讀醫學部。至於高等教育中的學校教師幾乎全為日人。譬如：當時台北帝國大學的一七三位教師中，台籍教師只有一人。可見日據時期的教育，其特徵在政策性地限制台籍青年就讀高等教育，更限制台灣青年進入文理法商科，抑制台灣高級經略人材的養成，這也清清楚楚地顯示其高等教育的殖民地性格。

對於日據時期高等教育的這種不平等現象，在台灣光復不久後的《台灣新生報》有一篇題為〈台灣的大學教育〉的專文討論了此一問題，該文如此批評道：

但我們可以因此就說日本政府怎樣熱心的為台灣振興學術，培養人才嗎？不是、並不是、決不是。台北大學學生共三五三人，台灣學生只有八十五人，內中醫學部佔八十人，工學部二人，理學部一人，文政學部二人，農學部竟無一人。而日本學生多至二百六十四人。一九四二年統計，日本人口

佔全台人口 6.3%，台灣人佔 93.3%，可是大學學生，台灣人只佔十分之二餘，日本人幾佔十分之八。日本人約每一千六百餘人有一大學生，而台灣人則須七萬二千餘人才有一大學生，相差竟至四十倍之多，這樣的不公平，真可謂不平等之極了……。

14

該專論也同時呼籲：「將他（它）由殖民地性質的大學變為獨立國家的大學」。

15

這種殖民地性質的教育體制，只有等到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才被徹底打破，重建為獨立國家國民所有的平等教育；對台灣人民來說，也只有實現了台灣的光復，原來屬於殖民者且主要為殖民者而設的現代教育和機構，才為台灣人民所用，才有了真正意義的「現代性」。亦即，只有實現了「去殖民」，才能有真正的「現代化」。

三、光復前後台灣教育接管之籌劃及實施

(一) 台灣教育接管之籌劃

台灣殖民教育的終結以及戰後國民教育的出發，並非台灣島內社會的自然演變或島內自主武力鬥爭的結果，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國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的結果；亦是中國現代歷史大變革的一組成部分。關於光復初期台灣教育的徹底變革，也只有回溯這大歷史脈絡，才能全面理解。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廿七日的「開羅宣言」，明白宣示了：「三國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¹⁶ 確定了日本戰敗投降後，台灣將復歸中國版圖。

國民政府乃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內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做為收復台灣之籌備機構，並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該會的主要工作包括：擬定「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著手蒐集台灣資料、分類編輯台灣概況（包括教育、財政：…等十九種）、分類選譯台灣法規，並開辦「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儲備收復人材。¹⁷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正式公布了「台灣接管計劃綱要」，其中第四條及第四十條到五十一條，總共有十三條項是有關台灣教育文化之接管綱要。其特點在採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之方式，以祖國國民教育體制取代日本殖民教育體制；並特別強調「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亦強調了普及國語、普及教育及教育區域均衡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通過了「台灣教育接管計劃草案」（附錄1），比較原則性地規定了教育行政機構的接管方式，及改革台灣學制的內容。

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正式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復歸祖國。八月廿九日，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八月三十日令派趙迺傳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九月一日，在重慶正式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辦事處，教育處也同時開始辦公，籌備台灣

的教育接管與重建。同年九月廿日，國民政府頒布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設祕書、民政、教育等九處。¹⁸十月廿五日，陳儀正式就職，並在台灣民眾、士紳、公署官員及盟軍聯絡組等數百人的觀禮下，在台北市公會堂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率文武百官簽署受降書，俯首投降。受降典禮後，陳儀即席發表廣播演說，鄭重宣告：

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報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¹⁹

這個宣告是台灣歷史的里程碑，也揭開了台灣教育史新的一頁。

(二) 教育接管

受降後，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成立，教育處亦同時成立辦公，掌管全省教育行政及學術文化事宜（縣市教育行政組織系統，請參閱附錄2）。十一月一日起，依照陳儀行政長官指示「行政不中斷、工商不停工、學校不停課」的原則，²⁰一面進行教育接管，一面繼續工作；並於十一月七日頒發「台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辦法」（附錄3），明確劃分教育接管的權責。當時，公署

依日據時期的行政系統五州三廳，分別成立了八個接管委員會，受公署「省接管委員會」指揮（台北市則直接由台北市政府辦理），接收完成後直接改制為縣市政府。依據「教育接收處理暫行辦法」進行接收的概要如下：由省教育處負責接收的有：前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台北經濟、台中農林、台南工業等三個專門學校、台北市內州立中等學校以及社會教育機關（包括神社及社教團體）；而由各州廳接管委員會或市政府接收的有：原各州廳及各市之教育課或教育系、台北市以外的中等學校、國民學校、實業學校及實業補習學校，各州廳立社教機關；至於台北帝國大學，則由國民政府中央教育部派特派員進行接收。²¹

四、光復初期的教育理念與方針

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年，國民政府即已預先將光復後台灣教育的重建理念，提綱挈領地反映在「台灣接管計劃綱要」第一項通則的第四條中，該條文明確記載：「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²²由於「台灣接管計劃綱要」是由台灣調查委員會擬定，並依據當時全中國的戰後「復員計劃綱要」修正後定案的，是有別於全國其他收復區或後方區的光復區復員計劃；²³因此，它含有全中國戰後復員計劃的一般理念，也有基於台灣特殊現實而擬定的方針。該條文前半段的「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應是針對台灣（或東北）光復區的特殊現實而定的教育文化綱領，而後半段「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其重點在使台灣的教育

復歸到全國性的教育文化宗旨。

當時國民政府的教育宗旨是：「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至少從這項宗旨看來，當時國民政府的教育理念有相當的進步性與現代性。實際上，接管計劃綱要中有關文化教育教育的四大方針，是不可分割的，它就是要使台灣殖民地的教育文化變革為獨立自主的中國教育文化，這是一個最根本的時代課題的指導方針；這四大方針，也體現了光復初期台灣去殖民化、中國化與現代化的主要文化潮流。

在許多陳儀的施政講話中，經常把概稱為「心理建設」的文化教育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並列為三大建設；也經常把教育工作列為施政首位；譬如：在他就任台灣調查委員會主委不足一個月，在為台灣光復後的師資問題致函陳立夫時，便曾如此說道：「台灣收復後，應該做的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為最重要的一種卻是教育。」²⁴一九四五年九月廿六日，陳儀在重慶外國記者會上，第一次發表了治台方針，他表示：「收復台灣後，首要考慮的是教育問題，要充分發揮台灣人的能力。」²⁵此外，在他就職後第一次擴大紀念週的講話中，開題便舉出要「增加台灣同胞受教育及服務的機會」，同時強調：「日本統治台灣用愚民政策，不許台胞受高等教育，不許台胞做高級公務員，現在在台灣則要實現教育機會平等、工作機會平等。」²⁶

根據陳儀在一九四五年除夕廣播的內容可知，²⁷他稱為「心理建設」的文化教育建設的具體內容，包括了下列幾方面：1. 通過著重國語文和歷史教育，以增加民族意識。2. 通過大量培養師資、擴大招生，以普及教育，實現教育機會平等。3. 充實專科以上學校及研究所、圖書館、編譯館，以提高文化水準。²⁸上述陳儀的這些教育理念，實際上與前面所提的台灣接管計劃綱要中的四大方針若合符節。

第一任教育處處長趙迺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辭職），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的廣播稿〈台灣教育設施的趨向〉中，²⁹指出了光復後台灣教育的六大方針，這六大方針一直被沿用為光復初期的教育指導，它包括：1. 闡揚三民主義。2. 培養民族文化。3. 適合國家和本省的需要。4. 獎勵學術研究。5. 增加教育機會。6. 推行教育法令。而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就任第二任教育處長的范壽康，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廿五日召開的全省教育行政會議的開會致詞中，則十分扼要地陳述了他的三大教育方針，³⁰其大要如下：1. 今後台灣本省的教育，是獨立國家的中華民國的教育，自然要一反過去日本在台灣所施的教育；因此，為推動中華民國的教育方針，應該普及國語、培養民族精神、發揚三民主義思想、擴大教育機會平等、培養台灣青年從事台灣教育工作。2. 要使台灣教育現代化，要加強科學和工業教育。3. 使教育跟經濟建設與政治建設取得密切的配合，培植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人材。

從前述陳儀以及前後任教育處長三人有關光復後台灣教育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在基本理

念上，彼此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不過范壽康更強調教育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的密切配合，以及科學和工業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說更完整地表達了現代教育理念。他們的教育理念包括了去殖民、中國化與現代化的思想內容，這代表台灣的教育正由殖民地教育邁向一個獨立民族國家的正常教育，奠定了未來台灣的教育發展方向。

五、光復初期台灣教育變革之具體內容和特徵

(一) 學校之改制

日據時期的台灣學校制度，本質上是依日本殖民統治的需要，為鞏固其殖民統治、擴大其殖民利益而設立的。它與為了陶冶現代國民，發展人的能力的一般國家的國民教育，在本質上有天壤之別。光復初期，著名的民主報刊《人民導報》有一篇社論〈從民主教育上著眼——獻給教育行政會議〉，就曾精闢地指出殖民教育的本質，它說：

日本五十年的台灣統治，它在教育上有兩點在矛盾的路線上進行，其一，它要利用台灣的勞動力，便利它的榨取，所以在基本教育上給台灣人一個普遍的機會，兒童入學率達7%，其二，它生怕台灣人知識覺醒，阻礙它的統治，所以在中學以上的學校，採差別教育，使台灣同胞無法向上，特別

在文法科上給台灣同胞以阻難。

這篇社論進一步對光復後的教育改革提出了看法，它說：針對日本在台灣過去的措施，我們得平衡此一教育差別，使大中小學平均發展，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拉平，其他教育措施也應同樣的開展出去，其秉持的最大原則是：「敵所欲者，我不為；敵所不欲者，我為之。」

因此，台灣脫離殖民統治並復歸為中國的一省後，徹底改革舊有的殖民地教育制度，使其成為真正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學制，亦即中國教育的一環，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當時隨著教育機構的接管同時進行的殖民教育體制改革，其改革方式，簡單地說就是依照當時國民政府的教育方針及學制，並參酌原各級學校的實際情況，將複雜的殖民地學制改造為歐美各國行之有年，且在中國各地實施十多年的「六三三四」學制。

針對此一學制，當時有一位署名何木南的教育工作者，曾在《人民導報》的「星期論文」專欄刊出〈釋本省現行中學學制〉一文，³²此文認為：「六三三制是經過本國和美國實驗多年，認為最能適應個性的一種制度。六三三學制是我國採行多年，全國教育界認為最合中國需要的一種制度，自從頒佈新制以來，中國並沒有發現什麼不良現象，所以行了十多年，都沒什麼改變，現在本省重歸版圖，

教育制度採用國內定制，似亦合理。」該文認為六三三制的優點包括：適應個性，各階段銜接密切，可以發展中學教育，提高國民教育水準，增進教育法，合乎國家需要，適應本省需要。

下面將分別概述以六三三學制進行台灣學制改革的實際內容：

1. 初等教育之改制：

將原來的國民學校、國民學校分教場以及由警察擔任教師之原住民教育所，一律改為國民學校；並廢止帶有嚴重民族歧視和差別待遇的一號表、二號表、三號表課程，各學校一律授予同樣課程，使合乎平等原則；同時，也廢除日人為限制台灣子弟升進中學校而設的國民學校附設高等科，另設初級中學。國民學校校長一律由國人擔任，並積極甄選台籍師資。其精神在廢除民族歧視的殖民地學制，回歸人人平等的國民教育。

2. 中等教育之改制：

日據時期的中等教育，主要分為公立中學校、公立高等女學校、實業學校等三類；而師範學校和高等學校則屬高等教育範圍；另外主要附設於國民學校的高等科，則屬於初等教育。其學制錯綜繁雜，這使光復後的學制改革顯得更為龐雜。

光復後，依照中國中等教育學制分為中學、職業、師範三類的原則進行台灣學制的改革；這使原屬高等教育的師範學校和高等學校被改制為中等教育。

中學教育之改制：原有公立（如州、廳立）中等學校一律改為省立三三制的中學，各招收初中、高中學生（中學校改為省立中學、高等女學校改為省立女子中學、台北高等學校改為台北高級中學），均按照中學法實施。

職業教育之改制：將原有各種公立實業學校（分農、工、商、水產）依其性質改為省立某科職業學校，修業年限亦改為初級三年和高級三年。而日據時期的各種實業補習學校，它與高等科一樣，原為日人為限制台籍國民學校畢業生進入中等學校而設立的；光復後，則依其師資和設備狀況，分別改制為初級職業學校、初級中學，合併於省立職業學校或停辦。

師範教育之改制：依教育部頒訂之「師範學校法」，將原屬專科教育的師範教育，改隸中等學校教育，並改為省立；但原日制師範學校肄業生則仍依舊制直到畢業為止。當時為解決教師荒問題，為快速培養師資以供一時之需，因而擴充師範學校，將原四校二預科改為五校（分別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屏東等師範學校）；並特別於花蓮中學、花蓮女子中學、台東中學、台東女子中學各附設師範班，而在師範學校則分設普通師範科、簡易師範科以及師資訓練班，大量招收舊制學生進行師資培養。

3. 高等教育之改制：

光復後，省教育處依照教育部之規定並參酌本省實際情況，訂定了高等教育的新學制；將原有的專門學校改為專科學校或獨立學院，惟原有舊制學生仍准予照舊制畢業。³³原台南工業專門學校先改制為專科學校後，復改制為台灣省立工學院；原台北經濟專門學校亦經改制為專科學校後，再改制為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原台中農林專門學校也經改制為專科學校後，再改制為省立台中農學院。另外，為了解決各學校師資急需，而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另新創設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且為了培植本省中級工業人材，將原台北工業實業學校改制為台灣省立台北工業專科學校。

戰後，教育部設置「台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負責接收，該會派羅宗洛、陸志鴻、馬廷英為特派員來台接收原台北帝國大學，³⁴並將之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而且將其原有的五個學部改為六個學院，大學預科改為大學先修班。

至於高等教育改制前與改制後之學制比較，請參閱附錄4、附錄5。

(二) 師資之補充與培養

陳儀在就任台灣調查委員會不到一個月時，便已體認到台灣光復後將面臨的最大問題必是人材的補足問題。他在致陳立夫函中，就特別指出：³⁵

台灣收復後最困難的問題是人員問題，因為台灣各機關高級人員幾乎都由敵人担任，收復以後，立刻須由中國人接任，這一大批人員的補充真是問題。

因此，他希望及早準備的是：第一「師資的師資」，即師範學院、師範學校的教員；其次是，中等學校之行政人員（校長、主任）；第三則是國語文、史地的教師和教材。

對於當時師資荒的問題，在光復初期的報章雜誌上，也經常有報導討論；如《人民導報》的社論〈台灣教育界五個問題〉³⁶，就把師資問題列為第一位；該報上也常出現如〈論台灣師資的危機〉、〈論中等學校及國民學校師資問題〉³⁷等論文。

光復後，實際面臨的師資不足情況如下：據一九四四年之統計，全省國民學校教員原共有一五、四八三人，其中台籍教員有八、三二二人。台灣光復日籍教員遣返後，至少尚須補充七千以上的台籍教員。中等學校方面，原共有教員二、〇三三人，本省籍教員僅約百人，扣除日籍學生遣返約可減少六百至八百人之教師需要，因此，至少尚須補充一、一〇〇至一、三〇〇位中等學校教員。至於專科以上學校，原計有教員一五四人，台籍僅有十一人，今後專科以上學生當隨中等教育本省學生之激增而激增，隨之師資需要亦會倍增；除一部分專門之學科暫徵用日籍教師外，主要部分只有由省內外延攬補充。³⁸

因此，為了維持「學校不停課」的原則，如何補充師資便成了光復初期教育行政工作的一大挑戰，這個工作也是這時期教育工作的第一大特色。

1. 師資之補充：

省教育處鑒於師資情勢之急迫，乃採取下列措施以謀補救：

39

(1) 徵用：由於日據時期中等學校以上之數理專門科目教師，絕大多數由日人獨占；光復後，省內一時無法遞補，乃准予留用日籍教師。同時亦向大陸徵聘，然大陸亦正值全面復員時期，人材需求量亦甚大，再加上來台交通不便等因素，故應聘來台者不多。

(2) 徵選：教育處在重慶成立時，已分別向渝、閩各地邀約一部分教員來台任教；政府來台後，復派員分赴平、滬、閩各地徵選教師來台。至一九四六年九月底，共徵選國民學校教師六百人，中等學校教師四百人，其中以國文、史地科教員最多。

(3) 甄選：教育處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訂定「中等國民學校教員甄選辦法」；在教育處成立「中等國民學校教員甄選委員會」，甄選省內人士充任中小學教員至一九四六年九月止，經甄選合格之中學教員有六七〇人，國民學校教員達四、四七四人。

(4) 考選：由於國語教員的需要補充迫切，仍舉辦「國民學校國語教員考選」；並特訂「中等及國民學校教員試驗檢定辦法」，舉行檢定考試，廣羅教師人材。

(5) 訓練：另訂定「國民教育師資短期訓練班實施辦法」，令各縣市分別設立「國民教育師資短期訓練班」。規定訓練期間為六個月，畢業後派充各國民學校担任代用教員。

2. 師資之培養：

(1) 關於國民學校教師之培養，乃採取擴增師範學校及班級，並另設簡易師範班及師資訓練班，擴大師資之培養。根據統計，日據時代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原有台籍師範生僅五百多人，到了一九四六年則擴增到二千多人。

(2) 關於中等學校師資之培養，除了在一九四六年六月成立省立台灣師範學院積極培養師資外，亦在台中農專附設博物師資專修科，台南工專附設理化師資專修科等，以應急需。⁴⁰

(三) 積極推行國語運動與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日據時期，特別在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在台日本殖民者為了動員台灣人為其侵略戰爭效命，開始有計劃地消滅本省同胞的漢民族意識，並灌輸皇民意識。其具體作法就是透過嚴密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系統，進行禁用漢語、強力推行日語等皇民化運動。這使本省同胞不但在語言上，甚且在深層心理上，與祖國的一切產生了很深的隔閡與偏見，這就是前輩作家楊逵在光復初期所說的「五十年的澎湖溝」。⁴¹

抗戰勝利不久，教育部在重慶召開的「全國教育善後復員會議」上，教育部長朱家驊在開幕詞中

即表示：「如何肅清收復區、光復區內敵偽奴化教育之流毒，及如何逐漸恢復正常教育」是會議的重要議題。⁴²另外，在前述之「台灣接管計劃綱要」第四條，亦明確記載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光復後，不管是陳儀或前後任的教育處長，都不斷闡述注重國語文和歷史教育以培養民族精神的教育施政理念。甚且，在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尚未正式來台接管之時，《台灣新報》即在社論〈教育與民族精神〉中主張：「此異族執教育之利害也，可不警哉，從此以去，果若注重省民之教育，喚醒民族精神，則現在教育界上之日人日語，絕對不可再用，方可完成。」⁴³可見當時台灣有識之士亦強烈主張禁用日人日語，以喚醒民族精神。

1. 加強民族精神教育：

光復後，教育處即通令各級學校廢止原有日人之修身、國（日）語、史地、武道等皇民化課程；改授本國國語文、史地、公民，並增加教學時數。譬如：國語文每週授課時數即達十二小時左右。並規定中等學校三十四年度第二學期（一九四六年二月）新招之學生，一律補習一學期，以加強語文史地之教學，至三十五年第一學期始編入第一學期。⁴⁴

在國語文、史地的教材方面；光復之初，由於本省學生均未學習過，教育部的國定本和審定本並不適用於台灣，故教育處特別成立「中等學校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自行編印了適合本省學生之教材。⁴⁵該會於一九四六年八月擴大為由許壽裳主持之「省立編譯館」，下設學校教材組進行中小

2. 積極推行國語運動：

光復後，立即掀起了一股學習國語的熱潮。各公私團體皆自動自發熱心地舉辦各種國語講習班、學習班；同時，各級學校亦加強國語文之教學，增加國語文的教學時數。因為語言文字乃民族精神之要素，更是溝通觀念、通達政令之必要工具。日據五十年之台灣，一旦復歸祖國，不論在解消隔閡、疏導意義或培養民族意識上，積極推行中華民族的共同語言——國語，仍為當務之急。如果說，台灣光復後教育問題即居於首位重要，那麼，推行國語運動則屬於教育的最重要環節；因此，台灣的光復應從語言的光復做起。

行政長官陳儀在來台接收之前，便認識到光復後本省推行國語運動的迫切性和困難度；必須有組織、有系統地加以推動。因此，陳儀在重慶時便邀請專家設計商討，向教育部商調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魏建功等三人，並在重慶邀請國語專家數人來台主持推動國語運動。可是，由於交通上的困難，邀約人員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才得以陸續抵台。⁴⁷三月九日，行政長官公署公布了「台灣省各縣市推行國語實施辦法」，並依據該辦法，於四月二日成立「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該會在行政上隸屬教育處。並通令各縣市設置「國語推行所」，由縣市教育行政機關主持，並由公署遴派國語推行員分發至各縣市，推動國語之訓練與傳習。⁴⁸

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如下：⁴⁹ (1)國語之訓練傳習：對全省行政人員及學校教師進行國語之訓練講習。(2)樹立標準國語：包括語文教材之注音（注音符號之應用和推廣）、國音示範廣播、編印標準國音參考書、編印國台對照學習用書。(3)理論和方法之研討。(4)關於宣傳活動：負責教育廣播節目、舉辦國語演講競賽、與省黨部共同發起國語運動促進會等。

陳儀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在外籍記者招待會上說明了光復後施政上遭遇的五大困難，其中一項就是「語言及文字的隔閡」，他說：「台灣人原操閩南語通曉國文，但近二三十年來，經日人強迫日文日語，到台灣光復之日，台人習用日文日語，能讀寫國文、聽講國語者已寥寥無幾。給予各級行政工作人員以不少意外之困難。然幸台人愛國心切，熱烈學習國文國語，稍假時日，此一困難必能消除。現在的中學生，已能聽講十分之六的國語，本人相信明年此時，全省學生必都可以用國語教授聽講。」由此亦可見，當時國語運動推行成效之一斑。當時的國語運動熱潮幾近於全民運動，推動的團體黨、政、軍、學等公私團體皆有，但是，國語推行委員會仍然發揮了最大的功能。

(四)留日返台學生之臨時措施

日據時期的殖民教育，對台灣籍學生升入中學以上學校，有嚴格的種族差別，許多台籍學生只得前往日本或大陸升學。根據調查統計：一九四二年就有台灣籍學生七、〇九一人在日本求學，其中男生六、三三二人，女生有七、四八八人；其中以肄業於中學校和專門學校最多，僅有三、二九人就讀於大學。

50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估計尚有留日學生五千人滯留日本，但由於日本生活困難，日台交通不便且家長匯款不易，因此有許多學生陸續返省，但也有部分仍滯留日本。因此，教育處對這些返省學生和滯日學生加以輔導處理，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公布了「台灣省留日返省學生處理辦法」和「台灣省留日學生處理辦法」。⁵¹

對於滯日學生，則依後一辦法，函請美軍駐台聯絡組轉東京盟軍總部查照施行；⁵²該辦法規定：除專科以上志願繼續留日肄業者外，其餘均以返台為原則，並函東京盟總代辦學生之調查登記。然而，該年六月二日，教育處又公告留日學生家長，應令子弟從速返台。⁵³

對於留日返省之學生，教育處則成立留日返省學生審查委員會，接受登記，審查合格者分發省內各級學校轉學。自辦理登記以來，總計分發一、四〇〇名，其中以專科以上學校最多，所習科系則以醫科最多；至法商各科無適當科系可以轉學者，則由省立法商學院開設政治經濟等特別班予以收容。⁵⁴

又為使青年學生認識祖國大陸，增進台灣與祖國大陸各省之文化交流，教育處也採取了獎勵本省學生升學大陸專科以上學校的措施。特考選公費生一百名及自費生赴大陸專上學校就學。⁵⁵

（五）擴大就學機會

陳儀在一九四六年的除夕廣播中，對於一年來在擴大學生就學機會的成果上，曾經如此說道：

在一歲之末的今日，我們應該把今年的工作，算一次總帳……在教育方面，中小學普遍招生，增設一師範學院，添設許多專修科，選送進省外各大學學習，而國立台灣大學，兩次招生，設先修班；因此本年七月間的學生數，如與民國三十三年日本占領時代比較，中學生增加一萬五千餘人，專科以上學生增加二千五百餘人，台胞受教育機會，現在大大增加了。⁵⁶

實際上，光復初期本省學子就學機會呈倍數增加的情形，遠遠超過陳儀的報告數字（因他引用的數據是依三十四學年度的七月為準）。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台灣光復日籍學生陸續遣返後，原來幾乎由日籍生獨占的中等以上學校之空缺，全部成為本省學子就學的機會，這是台灣光復後在教育方面去殖民的最實際成果；其次，便是在教育政策上積極擴增學校、增加班數，以擴大台灣學生就學機會的成果。

依據台灣省教育廳編印《十年來的台灣教育》（一九五五年十月出版）及《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二書所錄之統計圖表，⁵⁷把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六年度（三十五學年度）的本省籍學生數進行比較，可發現光復後第一年台灣學子倍增的情形如下：

- (1) 本省就學兒童數：
707,343 人比
823,400 人，增加了一萬多人。

- (2) 本省籍學齡兒童就學率：71% 比 78%，上升了 7%。
- (3) 本省籍中學生數：12,816 比 40,725，增加近四倍（學校數由 45 所擴增為 132 所）。
- (4) 本省籍職業學校學生數：9,040 比 23,316，增加近三倍（學校數由 27 所增加到 76 所）。
- (5) 本省籍師範學校學生數：522 比 1,221，增加近四倍。
- (6) 本省籍大專學生數：543 比 2,983，增加近七倍。
- (7) 本省籍國立台灣大學學生數：85 比 1,296，幾乎增加了十五倍。

這個客觀的數據，再次雄辯地說明了所謂「殖民地的現代建設」，對台灣人民而言，只有等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徹底的去殖民化，一切回到本民族的手中後，其「現代化」才是有真正意義的「現代化」，才是真正自己的現代化，也才能為自己所用，否則永遠是異族殖民者所享用的現代化。

六、結語

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有超過半數的土地、近百個殖民地獨立，其追求民族解放的過程充滿了血淚和辛酸；許多國家在政治上雖然獨立了，但在經濟、文化和思想上，殖民主義的幽靈仍如影隨

形，很難徹底的進行去殖民化，求得真正的現代化。這也是近年來後殖民主義理論所探討的課題。台灣的光復，也是這種世界歷史的一部分，它有與世界一般殖民地相同問題，也有它獨特的性質。其最獨特之處在於：由於台灣原來是中國的一省，因被割讓而淪為日本殖民地，並非如朝鮮等是整個民族淪為殖民地，因此台灣的去殖民化，是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同時復歸祖國，而非如朝鮮是脫離殖民統治後獨立。因此，台灣的去殖民與祖國化（即等於「中國化」，以下亦同），是一物的兩面，兩者同時進行；去殖民的大部分是以祖國化為實際內容。所謂「祖國化」，簡單地說，就是把中國近百年來，在付出巨大的犧牲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現代化的歷史中所建立起來的政經、文教制度，在光復後去殖民體制並施行於台灣。這一方面免除了台灣像其他殖民地一樣必須從頭自力摸索的坎坷，另一方面，卻也因為當時中國仍處於民族現代化的艱辛進程中，一切都摻雜著落伍與進步的要素，而使台灣光復後的祖國化隱含著許多複雜的問題，在光復後的台灣投下濃厚的陰影。

台灣光復以後，文化教育的接管與重建比起政治及經濟的接收與重建（因牽涉到太大的實際利益而矛盾重重），相對較為順利和平穩。整體來看，值得正面評價之處應比負面之處多；其值得正面評價之處有下列幾點：

（一）在方法上：其最大特點在遵循全國復員綱要，而且適應台灣實情因地制宜，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下列事宜：1. 接管前之計劃擬定與準備。2. 接管與重建並進。3. 迅速建立獨立的教育

行政系統。4. 實行「學校不停課」的原則，迅速補充師資教材。5. 訂定各級學校新舊學制的過渡調整辦法。

(二) 在實際的成果上：把台灣的殖民地教育變革為正常國家的國民教育，初步實現了去殖民化，中國化與現代化。1. 實現教育機會平等（包括男女教育平等與原住民的教育平等）。2. 擴大就學機會。3. 施行祖國教育（推行國語和史地教學）。4. 力謀全省教育之均衡發展（劃分學區）。5. 施行專科視導制。

至於其負面的問題，則有下列幾點：

(一) 師資荒問題嚴重，缺乏合格教師，教師質量皆不足。

(二) 文史教科書奇缺，使民族精神教育不易全面推行。

(三) 過度擴增學生數量，造成學生品質低落。

(四) 未充分重視社會教育。

(五) 教育經費不足。

(六) 學潮頻發。

這些負面問題，大多是由於戰爭後及殖民復歸後所必然來臨的經濟蕭條、社會混亂不安所造成的青黃不接的暫時性問題；而且這些問題並非台灣所獨有，而是戰後初期世界的共同現象。

即便如此，譬如學潮頻發等，亦反映了光復初期的教育仍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學潮的原因與當時社會的一般矛盾大致相同，不外乎是省籍隔閡以及貪污腐敗、經濟復原不易等問題。進一步深究，首先是殖民地的皇民化教育在精神層次的影響，這在短短的一年中不可能有太大的改變，經常成為衝突的根源。其次，牽涉到「祖國化」的本質問題，戰後的國民政府仍有很深的官僚、腐化與顛覆的成份，在台灣教育的去殖民化、祖國化、平等化的進展中，一旦落實到學校教育的現場，這種落後的成份便成為學生對學校或老師的不滿與矛盾之根源。此外，受到戰後全國風起雲湧的「民主化」風潮的影響，復歸祖國的台灣亦不能例外，校園亦不可例外地成為民主化風潮的重要據點。

附錄 1：台灣教育接管計劃草案——民國三十四年⁵⁸

一、教育行政機構：原有總督府文教局改為省政府教育廳。各縣縣政府設教育科，台北市設教育局，台南、高雄二市設教育科，各鄉鎮公所設文化股。

二、原有小學一律改為六年制國民學校。原有日語講習所改為國民學校成人部或民眾學校，以教授國語國文為主旨。

三、原有尋常中學、高等女校改為縣或市立初級中學、女子初中。每縣市以設立初級中學一所為原則，但該縣市原無中學者暫緩設置。帝大預科及高等學校改為高級中學或完全中學兩所，高中及職業學校由省主辦，單獨設置之職業、補習學校由縣辦理。原有之職業學校視其設備及學生程度，分別改為高級或初級職校。師範學校六所，改為省立，暫不增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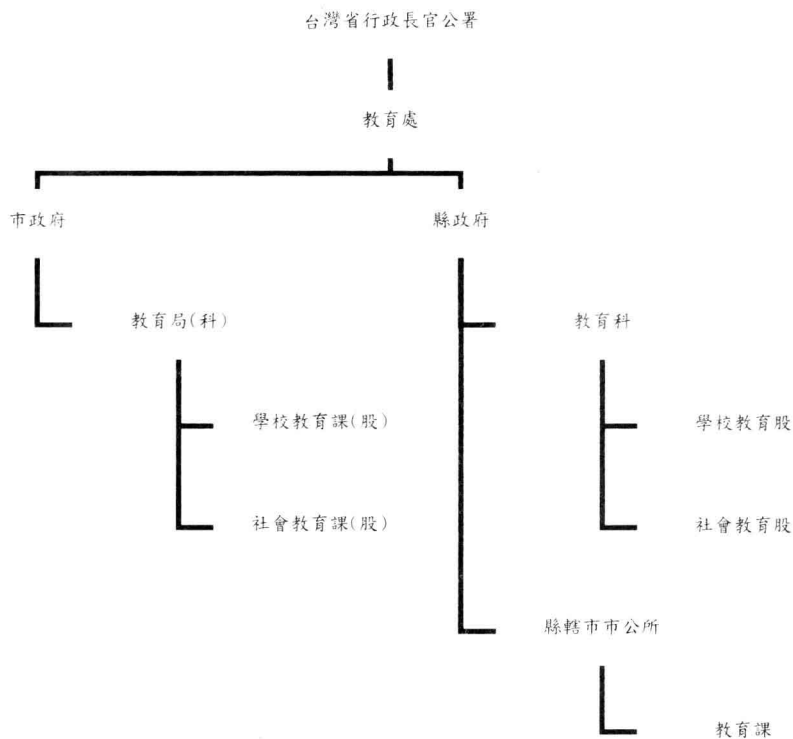
四、原有帝國台北大學改為國立台灣大學，其醫學專門部改為省立台灣醫學專科學校，農林專科部門改為省立台北農林專科學校。原有台南高等工業學校、高等商業學校改為省立工業商業專科學校；台中高等農林專科學校改為省立台中農林專科學校。

五、原有熱帶病研究所、天然瓦斯研究所、工業研究所，均由中央接辦。農業、林業、

糖業、水產、衛生各試驗所，由省府接辦。

六、原有總督府圖書館改為省立圖書館，其餘州立、市立及街立之圖書館一律改為縣立或市立。文教局附設之博物館，改為省立博物館，其他改為縣立或市立。直屬總督府之商品陳列館，改為省立，其館改縣立或市立。青年團、少年團及青年訓練所一律裁撤。（錄自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庫藏史料）

附錄 2：台灣省光復初期縣市教育行政組織系統 59



附錄 3：台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辦法⁶⁰

一、公立國民學校、實業補習學校，由各州廳接管委員會或市政府直接接收。校長一律派由國人接充。暫就原校教職員中遴選學識能力較優或當地具有教員資格之台胞，委派代理校務，並取具學歷證件，報候審核。

二、台北市區內之州立中等學校，由本署直接派員接收整理。各州廳立之中等學校，概由州廳接管委員會先行接收，暫就原校或鄰校教職員中遴選學識能力較優之台胞，委派代理校務，並負責保管所有設備及財產，聽候派員接辦。

三、台北市區內之州立社會教育機關（包括神社），由本署直接派員接收整理。各州廳公立社會教育機關（包括神社），由各州廳接管委員會，或市政府，分別接收，暫行派人維持業務，報候核定。

四、青年學校及青年鍊成所，一律停辦，所有設備及財產，暫由州廳接管委員會或市政府，派員保管，另定處理辦法。

五、台北、高雄、基隆三市役所之教育課，由各該市政府，分別接收。各州廳市郡教育課，係由本署教育處派員協助州廳接管委員會接收，另訂調整辦法。

六、上列接管之學校及教育機關，除國語、國文、公民、史地教育，應由國人充任外，得酌量暫時留用日籍教職員，以免業務停頓。

附錄 4：光復前之學制（日本學制） 61

備註	入學資格	年限	修業	種類	學校
	大學學部畢業	二年		大學院	大學院
	一、大學預科畢業 二、高等學校畢業 三、專門學校畢業	三年		學部	大學
		四年		醫學部	
戰時縮短為二年	中學畢業	三年		預科	大學
戰時縮短為二年	中學畢業	三年		學校	高等
	一、中學畢業 二、實業學校畢業	三年		本科	專門學校
		一年		專修科	

附錄 5：光復後之暫行學制（銜接新舊學制過渡期之學制）

62

備註	入學資格	修業年限	學校種類
<p>在校修習四年，實習一年</p>	<p>一、高級中學畢業 二、高級職業學校畢業 三、舊制五年制中學或實業學校畢業後繼續在較高級學校肄業滿一年或補習一年者。 四、同等學力（修畢高二課程而失學一年以上者）</p>	四年	<p>大學</p> <p>文法商理工農學院 (獨立學院)</p>
		五年	師範學院
		五年	醫學院
	<p>舊制五年制中學或實業學校畢業</p>	一年	<p>大學先進班</p>
	<p>一、高級中學畢業 二、高級職業學校畢業</p>	三年	<p>專科學校（或學院附設）</p> <p>本科</p>
	<p>一、舊制五年制中學或實業學校畢業。 二、舊制四年制中學或實業學校畢業後繼續在較高級學校肄業滿一年或補習一年者。</p>	四年	<p>四年制三年制專修專修科</p>
		三年	
<p>師範學院曾招生一班後停辦</p>	<p>一、舊制高等學校或專門學校畢業。 二、本國制大學肄業滿二年者。</p>	一年	<p>一年制專修科</p>

註釋

1. 相關重要著作可參見，徐南號：《台灣教育史》（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一九九九年）。劉寧顏、林文龍、程大學、胡鍊輝：《重修台灣省通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年）卷六〈文教志·社會教育編〉。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八年）。汪知亭：《台灣教育史》（台北：台灣書局，一九五九年）。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2.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頁一。
3.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頁三～五。
4.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頁八。
5. 黃玉齋主編：《台灣年鑑》（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二〇〇一年），頁九七〇。
6. 黃玉齋主編：《台灣年鑑》，頁九七一～九七四。
7. 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頁二十。

8．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印：《台灣省教育概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一九四六年），頁十三。

9．黃玉齋主編：《台灣年鑑》，頁九七九。

10．相關統計數字詳黃玉齋主編：《台灣年鑑》，頁一〇三〇～一〇九六。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印：《台灣省教育概況》，頁十三。

11．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印：《台灣省教育概況》，頁三十一。

12．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一九四六年），頁八八～八九。

13．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印：《台灣省教育概況》，頁三十二。

14．一知：〈台灣的大學教育〉，《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15．同上註。

16．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誌》四八（台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一九八〇年），卷十〈光復志〉，頁八。

17. 秦孝儀、張瑞成編：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第四集：《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一九九〇年），頁一四四。

18.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印：《台灣省教育概況》，頁四十三。

19. 《民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廿六日。

20.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印：《台灣省教育概況》，頁二一〇。

21. 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三～四。

22. 秦孝儀、張瑞成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一〇九。

23. 鄭梓：《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台中：新化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頁五十一。

24. 秦孝儀、張瑞成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五十三。

25. 《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九日。

26. 《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日。

27. 陳儀：〈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三十四年除夕廣播〉，《陳長官治台言論集》第二輯

（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一九四六年）。

- 28．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六。
- 29．《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
- 30．《台灣新生報》，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六日。
- 31．《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六月廿七日。
- 32．《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
- 33．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頁十二。
- 34．陳鳴鐘、陳興唐主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南京：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頁三九六。
- 35．秦孝儀、張瑞成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五三、五六。
- 36．《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
- 37．《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
- 38．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頁七、八。
- 39．詳參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頁一八一；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

十三。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頁十九。

40·汪知亭：《台灣教育史料新編》，頁一八二～一八三。

41·陳映真、曾健民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台北：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頁一四一。

42·葉憲峻：《二次世界戰後初期台灣之中國化教育》（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三年六月），頁五三。

43·《台灣新報》，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三日。

44·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省教育概況》，頁九三。

45·同上書，頁一〇二。

46·許壽裳：〈台灣省編譯館的設立〉，《現代週刊》二卷十一期，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

47·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頁九九。

48·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二二二。

49·詳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頁一〇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教育處編：《台灣省教育概況》，頁一〇二。

50．詳細統計資料參見黃玉齋主編：《台灣年鑑》，頁一〇二八。

51．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省教育概況》，頁一二七～一二八。

52．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頁十七。

53．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二五。

54．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台灣一年來之教育》，頁十七。

55．同上書，頁二十。

56．陳鳴鐘、陳興唐主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頁三二三。

57．詳細統計資料參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頁一二〇九～一二一〇。

58．引自秦孝儀、張瑞成編：中國現代史史料叢編第4集：《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一九九〇年）。

59．資料取自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四一。

60·資料引自洪瑞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教育的接收與推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八年。

61·資料取自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一八九。

62·資料取自何清欽：《光復初期之台灣教育》，頁一九〇。

初稿發表於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光復初期的台灣（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學術研討會（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六日）

【十】

「光復文學」的出發點

談台灣光復後最早的報紙文藝副刊

一、多餘的前言

在並不算長的台灣歷史中，最有爭議性的部分，就是從甲午割台以來的近百年史；而其中的四十年代史，更是紛爭不斷。四十年代史，由於踏實的研究不足，史料闕如，斷簡殘篇，因而容易為有心人所趁。這個歷史的荒蕪地帶，與其說有爭議性，倒不如說容易被偽造假、扭曲。特別在台灣的特殊政治、文化環境中，從八十年代以來，所謂的「台灣史觀」（所謂的本土論）一直都是台獨勢力的政治先鋒；他們透過「建構」台灣史觀煽起台灣民眾的歷史感情，取得政治支持；並透過政權的文化、教育、宣傳機構進一步改造民眾的歷史意識以及民族、國家的認同。周而復始，不斷進行台獨歷史意識的再生產，而使台灣社會瀕臨分裂的危機階段。

面對這種危機，治本之道，在紮實的歷史研究，努力出土整理史料，依據史料進行論辯。

對台獨勢力而言，所謂的「台灣文學史」更是其「台灣史觀」的前鋒。他們依靠以意識形態所建構的所謂台灣文學論述打下了一半天下。這只要從台獨政府數年來急速在各大學增設「台灣文學系」多達二十多家來看，就可以知道。因此「文學台獨」早已是「文化台獨」的核心，這是一個明白

的事實。

就像台灣史一樣，台灣文學史中的四十年代，一直是處於比較空白的地帶；因此也一直是「文學台獨」們喜歡反覆作偽造假扭曲的地帶。特別有關台灣光復初歷史，他們把台灣「光復」顛倒為「終戰」；把台灣復歸祖國顛倒成「再殖民」；把戰後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扭曲成「外來政權」；把「二二八事件」歪曲為「中國人屠殺台灣人」的政治圖騰；把新生報「橋」副刊有關「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論爭，誤導為中國作家與台灣作家之間的矛盾對立。所有的論述都在強化「台灣與中國」對立的意識，都為現實的台獨運動服務。

面對這種排山倒海的逆流，作者與陳映真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共同出土並編著了新生報橋副刊文學論戰的史料集（《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並得到廈大朱雙一先生和日本橫地剛先生的大力合作，共同努力，在「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光復初期文學史的研究成果。而且，二〇〇〇年由中國作協與江蘇省作協、江蘇省社科院共同在蘇州舉辦了一次「台灣新文學思潮（一九四七—一九四九）研討會」，許多當年參與那場文學論爭的作家們也出席，在會上做了令人感動的歷史證言。通過這場研討會大大鞏固了這段文學史的客觀基礎。

去年（二〇〇四年）作者與藍博洲、橫地剛兩位先生，又共同出土編著了《文學二二八》一書，基本上解決了二二八前後的文學問題，期望透過這些在事件前後的文學作品的公刊，以扼止「文學台

獨」在二二八問題上扭曲、作假。

然而，過去的這些工作，只處理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前夕到一九四九年之間的文學狀況，依然留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一九四六年年終的這段空白時期；這段時期是光復後台灣文學再出發的原點，雖然並沒有豐富的創作，但卻是一個關鍵的時期；在這時期，台灣文學如何由殖民地的文學轉換成完全的民族文學，其轉換過程如何，其具體內容如何，卻是非解明不可的工作。今年適逢台灣光復六十周年，作者在八月十五日先出版了《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八月十五日後激動的一百天》，這本書首先解決了台灣光復早期的歷史空白；接著作者又編著了一本《一九四五·光復新聲——台灣光復詩文集》，它是一本資料集，蒐羅了台灣光復時作家以及文化人，在歷史的大變革中所寫下的文學作品和思想言論。

作者在本文想討論的問題，是有關台灣光復文學的出發點。所謂「光復文學」，依作者的見解，就是台灣光復這個大歷史變革時期的文學；而其出發點，在時間上是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該年年末；而這個出發點的刊物，就是台灣光復後最早出刊的兩家報紙的文藝副刊（或文藝欄），一是《台灣新生報》的「詞華」和「藝文」欄，另一是《民報》的「學林」副刊。

二、《台灣新報》

一九四四年，日本的侵略戰爭已呈頹敗之勢，但是日本軍國主義仍然在欺騙人民，瘋狂叫囂進行

「本土決戰」；為了榨盡日本人民的血和汗投入戰場，還進一步強化法西斯的統制。當時被役使為日本「南進基地」的殖民地台灣，也不例外；為了加緊思想言論的控制，壟斷信息，進而強化軍國主義的戰爭宣傳，台灣總督府把當時台灣的六家報紙（《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報》、《台灣新聞》、《東台灣日報》、《高雄新聞》以及當時台灣人創辦的唯一一份報紙原名《台灣新民報》的《興南新聞》）合併為一家，名為《台灣新報》，從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開始出刊。當時，這唯一的一份報紙的唯一任務，便是進行戰爭宣傳、鼓吹日本「聖戰」，欺騙台灣百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落為敗戰國國民的原《台灣新報》日本人指導層，已自顧不暇，報紙經營權逐漸轉移到原《興南新聞》的台灣人員工手中。隨著台灣光復的大變革，該報也逐漸轉型，表現出自由、和平、民主的新時代風格。因此，從日本投降的八月十五日起，一直到十月十日第一份由台灣文化菁英所創辦的中文報《民報》創刊為止的五十天，《台灣新報》是台灣唯一的一份報紙。在這期間，台灣民眾的消息來源，除了《台灣新報》這份報紙之外，只有依賴收音機廣播。

日本投降後，該報還一直以日文出刊；進入十月，終於開始出現中文欄（十月二日）；到了十月十日歡慶「國慶」之後，就完全轉變成以中文版為主、日文版為輔的局面了。自此，高昂的中國民族主義成了該報的基調；從社論、專論到專欄，都反映了新時代的氣息。該報從十月十一日起特別連載了〈中國民族運動〉一文，介紹了中國近代革命的歷史，從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到五四運

動；也登載了〈國民革命和台灣〉及〈國定紀念日介紹〉等文；另外，也開闢了充滿批判色彩的小專欄，如「新聲」、「民鋒」、「前進」、「藝文」、「詞華」等，對殖民者以及本地御用士紳展開了猛烈的批判。該報在短短的三週內，特別在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台灣從殖民地復歸祖國的關鍵時刻，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啟蒙角色。當時在該報社任職的幾位重要台灣作家、評論家，如王白淵、呂赫若、吳濁流等，在這段時間起了一定的作用。

該報於十月二十五日被接收後，隸屬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由李萬居擔任社長，並以《台灣新生報》的新名稱重新出發。正如其名，該報自此又為建設新生台灣而繼續前進。

三、用古典詩詞迎接了台灣光復——《台灣新報》的「詞華」、「藝文」欄

由於作者手中欠缺十月三日和十月十日的《台灣新報》，因此這八天的動向不可知。僅就手中的資料來看，十月十一日該報熱烈報導了十月十日台灣五十年來第一次慶祝「國慶」的消息之後，在報紙下面一角就開始出現了以「詞華」為名的小專欄。就如其名，這個專欄主要是刊載新創作的古典詩詞；其主題大多是歡賦台灣光復之喜。譬如，十月十一日的「詞華」欄，除了刊載了王白淵的自由詩〈光復〉之外，另外也刊出張天春的〈祝光復〉，該詩的前半部如下：

白日青天幟遍翻，天教台土得還元，
萬民大慰雲霓望，四海均霑雨露恩，
地賜省口欣特別，文興漢學慶長存，
今朝舉國家家祝，結綵張燈喜莫言。

這個「詞華」欄，從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起一直存續到十月二十四日，該報被公署宣傳委員會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為止，每天都有刊出。其大多數作品都是如「台灣光復喜賦」之類的古典詩詞。在日本投降台灣光復的這個歷史巨變的時刻，最早反映在文學上的作品，大多數是這類的古典詩詞；不但出現在《台灣新報》、《民報》等報紙上，當時新創刊的雜誌，如《新風》、《台灣月刊》等，也有許多這類作品。可說是「光復文學」的重要構成。作者蒐集到的這類慶祝台灣光復的古典詩詞，大約有六十首之多。

另外，從十月十三日起，《台灣新報》也出現了以「藝文」為名的小副刊；它一直刊出到十月二十四日，總共只有了六回。其內容分別是：黃得時的〈岳武穆的滿江紅〉（十月十三、十四日）、黃得時的〈唐景崧與牡丹詩社〉（十月二十、二十一日）、林金莖的〈論省教育的特殊性〉（十月二十二日），以及最後一次黃瓊華的〈台灣光復與女性〉（十月二十四日）。該欄雖然取名為「藝

文」，但由於刊出次數不多，無法充分顯示其性格。這四篇都是論說文，沒有文藝創作出現；而且這四篇中，只有黃得時的兩篇與中國古典詩詞有關，勉強可歸為藝文類。另二篇只能算是時評，與文學無關。因此，「藝文」欄雖有「藝文」之名，卻無文藝創作，因此只能算是一個早夭的文藝欄。

台灣光復的大歷史巨變中，沒有出現一定量的白話文新文學作品，誠然可惜，但出現了許多古典詩詞，反映了民眾對台灣光復的喜賀之情，也難能可貴。這種文學現象反映了台灣文學的特殊性。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從一九三七年起日本殖民者廢漢文欄的高壓政策下，白話文作家失去了文學園地，雖然還有尚存一息的《風月報》（後改名為《南方》），但是因其吟風弄月的消極性格，無法提供新文學作家伸展的空間。光復後，失去發表園地長達八年的白話文作家，除了少數幾位如王詩琅、朱點人、楊守愚、楊雲萍、黃得時等人之外，大多已意興闌珊。還有，大多數日據期白話文作家的根本創作動機，是「抗日、反殖、歸宗」，日本投降台灣光復的歷史變革，基本上已達成了個人的宿願，身心鬆懈也就無創作動力了。另外，在時代大轉變中，作家心情動搖未定，再加上作家個人為了生計，生活也不得不先放下筆來。

在台灣，從事古典詩詞創作的舊文學作家，其基礎是很深厚的。就如黃得時在〈台灣光復前後之文藝活動與民族性〉一文中（《青溪》五十五期，一九七二年）所提及的：

「自從『五四』以後，國內一般人認為舊文學已失去其價值，變成了一種死文學。但是就台灣來說，情形並非如此，毋寧說，它的存在有著特殊的意義。」

黃得時所說的特殊意義，就是指在殖民地條件下，台灣舊詩在保存中國固有文化上，以及作為其間接表達反抗日本的祖國意識之情上，有強烈的民族性，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台灣各地都有詩社、吟社，最興盛時曾多達千個之多；其中以台北「瀛社」、台中「櫟社」、台南「南社」最有名。

就是這些台灣舊文學作家（當然，包括許多新文學作家也從事舊古典詩詞的創作，如賴和等）深厚的「民族性」，以其古典詩詞最先迎接了台灣光復的第一道曙光，為「光復文學」留下了一個章節。

四、五十年來的第一次「國慶」

日本宣佈投降後的第五十天，早在九月一日就在重慶成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終於派遣了前進指揮所於十月五日抵達台北。這是八月十五日後第一批正式來台的國民政府官員，雖然全體人員不過八十人，但是其象徵意義是很大的。它的主要任務是「注意日方實施（按語：即是受降、接收）情形，調查一般狀況，並準備接收工作」。在陳儀履台之前（十月二十四日），前進指揮所的到來，有

宣示「台灣光復」的實際作用，安定了台灣民心，並且有效地嚇阻了多達五十萬的日軍、日人心存觀望的僥倖心態。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以林獻堂、林茂生為代表的台灣士紳所發起，台灣民眾自主舉行了台灣五十年來的第一次「國慶日」；當日，全台民眾歡天喜地，張燈結綵，各戶懸掛「國旗」，各處搭建歡祝牌樓。被壓抑了五十年的民族感情以及國家認同，一夕間如地底岩漿般爆發了出來，氣勢萬千。當時擔任《台灣新報》記者並親自到慶典現場採訪的詩人、評論家王白淵，在翌日的《台灣新報》「詞華」欄上，寫了一篇簡短但感情深刻的白話詩〈光復〉，其原文如下：

小兒離開了母親

夜裡不斷的哭著

兒在險暗殘暴裡

慈母為兒斷心腸

求不得 見不得

暗中相呼五十年

夜來風雨而已散

一陽來復到光明

啊！

光復 我父母之邦

五、《民報》——第一份中文報刊

同一天，也就是二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台灣光復後第一份中文報《民報》誕生了。該報由林茂生擔任社長，許乃昌（早年曾留學上海、莫斯科，台灣最早的社會主義者）擔任總編輯，主筆是陳旺成（日據期台灣民眾黨的中堅幹部）。該報以繼承日據期的重要台灣人報紙《台灣民報》的精神自許；特別在社論、小專欄（「冷語」、「熱言」）、以及讀者投書（「檢查衙門」、「茶館」、「自由論壇」、「民眾論壇」、「新婦女」）等小方塊上，即時反映了光復初期變動快速且充滿矛盾複雜的社會現實，並適時予以揭發批判。不但做到了「為民喉舌」的任務，甚且擔任了「為民前鋒」的啟蒙角

色。因此也得罪了當權者，遭惡勢力的忌恨，而於二二八事件中遭到停刊的命運，社長林茂生也不幸在事件中罹難。

該報除了是光復後最早創刊的報紙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從創刊到停刊一貫堅持用中文，不另設日文版。而其他的報紙如《台灣新生報》、《人民導報》等，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禁止日文欄之前，都特設有日文版。《民報》的這種作風突顯了該報堅定的民族立場。對於這種立場，該報於十月十八日的「冷語」欄上，有簡單的說明，它說：

「民報諸同人，都在使用台灣式的白話文，想給青年諸君容易明白。日文和日語，於學者作種種的研究上，或者還有存在的價值，至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上，須要拂拭淨盡，才有新鮮的氣象可觀。這就是諸同人的光復後，即決意發刊純國文報紙的心情。」

剛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長達十五年的「國語（日語）普及運動」，以及八年的「皇民化教育」後的許多台灣青少年，不用說不懂中文，甚至連母語的台灣方言（閩南、客家話）也不會說。據日本殖民者官方的說法，台灣的日語普及率已高達70%；不管殖民者官方的說法有無誇大之嫌，脫離日本殖

民統治後的台灣社會，日語確有相當程度的普及，特別是學生青少年層幾乎只會講日語，許多人不懂台語。從這樣的特殊語言環境的現實來看，《民報》一貫堅持使用中文的作風，的確令人佩服。《民報》可說是台灣光復初期「去殖民」與「祖國化」的時代風潮中的最典型楷模。

六、《民報》「學林」副刊

《民報》除了有許多簡短雋永的批評時政臧否人物的小專欄之外，從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起創設了文藝副刊「學林」。它由著名作家、歷史學家、《民報》社論委員楊雲萍所主編，總共刊出了三十四回；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刊出了林拱樞的〈一個回憶（上）〉後結束。

「學林」的創刊日是何日，由於資料佚缺無法判明。依現有資料判斷，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的「學林」，刊出了吳漫沙的連載長篇小說〈天明〉，且註記有第二回；還有另一篇劉家謀的〈海音——據楊氏習靜樓鈔本〉，也註記有第二回，由此可推定，「學林」不是創刊於十二月一日，就是創刊於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底。

「學林」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學副刊，只可以說是以文學為主的副刊。因為它也刊載了許多思想、議論文章，如石朝桂的〈教育與政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秋鴻的〈談自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呂伯陽的〈台灣新文化〉（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何里的〈現代青年〉（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張翔的〈我們要認清國家與國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等等。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或許這些文章的觀點略嫌拙稚不成熟；但是站在當時的時代氣氛來看，剛剛脫離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及法西斯主義重重壓迫的台灣，在思想甫解放的時刻，像這些有關政治、教育、自由、國家等的思想論題是新時代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大家所關心的。同時，它也反映了台灣復歸祖國進入了民族國家時代的精神特徵，因為這些論題，在過去的殖民、法西斯統治下是絕不可能存在的。

在文學創作上，「學林」從第四回開始分三期重刊了賴和的小說〈辱〉。編者在刊頭上記有「台灣小說選」的字樣，而且在「編者記」上也說明了：

「這《台灣小說選》原來是日據末期李獻璋所編的一本小說集，其中收有幾篇賴和的作品，可恨在剛組版付印時，橫遭日警禁止出版；現在台灣光復了，編者依據當時的『校樣』刊載以廣流傳。」

雖然編者也說：「有機會時，想再登刊」，但卻一直未實現。在「學林」重刊賴和作品的不久之前，剛創刊的《政經報》一卷二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就已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它是賴和在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當日被日警拘捕入獄時的日記。就像「學林」編者楊雲萍所說：

「先生不只是台灣的代表，文學作家而已，他生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卑鄙殘暴，沒有絲毫妥協，反抗到底，尤令人敬佩」。

為〈獄中日記〉的刊登寫序的作家楊守愚，也指出刊出〈獄中日記〉的意義在「當著這歷史的轉換期，為紀念故人生前的功績，為激勵文學同志的奮起」。由此可見，在台灣甫光復之初首先刊登賴和的作品，除了有紀念故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喚起民眾精神的意義之外，還有「激勵文學同志奮起的作用」。這也是台灣光復初期，文化界普遍地把過去被日本殖民者長期壓抑隱蔽的台灣反帝、反殖的歷史，予以復原、正名一樣，都屬於楊雲萍所說的「歷史的光復」的一部分。

「學林」中的大多數作品，都是青年新進作家的創作；這些作品最大的缺憾，除了文學藝術的表現手法尚未成熟之外，就是中文語言的運用生澀、不通。譬如吳瀛濤的短篇〈起點〉，其感情豐富，文學表現手法亦佳，準確地表現了光復後台灣青年的共同感情，但可惜語言初學，生澀不通之處甚多，大大妨礙了文學的基本功能。中文語言運用能力的問題，並非吳瀛濤個人的問題，大多數青年作家作品都有這問題；如周傳枝的連載小說〈災殃〉或周遭的〈可憐的她〉等等都如此。然而，這些青年作家在嚴厲的「皇民化」教育下仍能保有漢文的根底，而且通過私底下閱讀中文作品，而得以在光復後馬上運用白話文創作，其對文學的熱誠和勇於使用初學的白話文創作的精神，令人敬佩，也是難

能可貴的。這種現象，是台灣光復初期普遍的也是特殊的文學現象——語言轉換或適應的問題；譬如日文作家呂赫若，在光復後半年就以初學的白話文寫了〈故鄉的故事〉一樣。而「學林」副刊中的這些作品最早反映了這樣的文學現象。

另外，「學林」的青年作家大多是省籍青年，但也有一小部分是外省籍青年；從作品的內容來看，他們或許是以基層公務員或士兵的身分來台的外省籍青年，譬如，發表了〈台灣我希望你〉（十二月二十六日）、〈愜念〉（十二月二十七日）、〈寄語〉（十二月二十九日）等作品的侯耀華，或〈流亡人〉（一月九日）的李雲，他們的作品中文語言運用嫻熟，主題鮮明，唯一的缺點是文學藝術性不高，還停留在初寫作的階段。光復後，外省籍作家的加入，豐富了台灣文壇的內容；不論在語言，或表現上都有促進台灣文壇進步的作用。「學林」首先反映了這種新的變化。而這種新的變化，到了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創刊的《人民導報》「南虹」副刊，則完全顯現了出來。「南虹」是由大陸來台木刻家黃榮燦主編，該刊大量引介了大陸進步作家的作品，把進步的抗戰文藝帶進了台灣。它對剛脫離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台灣文化界來說，有很大的啟發作用。

「學林」也刊登了不少新詩，大多是青年作家的試作。這些作品語言生澀、文學性不高，有點像日記的分行。它們把充沛感情直接抒發於作品上，這在瞭解光復初青年作家的感情傾向上，倒不失為一手的好材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是二、三十年代台灣白話詩運動的另一次出發。

然而，該刊也出現了一些好作品：包括吳漫沙的連載小說〈天明〉，以及鐵漢的〈魯迅的詩〉、新人的〈阿Q性〉、秋鴻的〈我與祖國文學〉，以及楊雲萍的〈我們的「等路」——台灣的文藝與學術〉等，都是十分成熟的白話文作品。不論在語言、主題或民族感情、表現形式上都是百分之百的中國現代文學，同時，它也充分展現了台灣的歷史特色。台灣新文學本來就是在二十年代從白話文學出發的，譬如賴和就是台灣白話文學的開拓者；經過十年的發展，到了三十年代上半，已形成了一支小小的白話文學隊伍；然而，隨著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日本殖民者惡毒地禁絕了台灣白話文學的發展。失去了發表園地的台灣白話文學，忍辱負重了八年，終於迎來了台灣光復之日。在日本殖民統治垮台和台灣復歸祖國的大歷史轉換期，「學林」副刊的出現以及這數篇作品的出現，預告了台灣白話文學傳統的復歸。作家秋鴻還在〈我與祖國文學〉的文末呼籲大家一起推動「祖國文學啟蒙運動」，它指出：

「過去我們同胞，皆受日人不健全的教育，從中舞弊，封鎖我們接觸祖國固有的文化，所以一切無從知曉，文學是文化的源流，若要明白祖國一切的事情，非從文學做起不可。」

秋鴻此文主張要推動透過引介、閱讀祖國新文學，來認識祖國。

七、其他雜誌上的文藝狀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後，最早出版的刊物是楊遠的《一陽週報》。由於該報佚失不可查，只能經由旁證得知它大約創刊於九月十日左右，共出版九期（十一月十七日）。迄今只可看到第九期的目錄；從該目錄可知，該期是「紀念先總理誕辰專刊」，有胡漢民、蕭佛成等人的紀念文，還有楊遠的作品（犬猿鄰組）和茅盾的〈創造〉等。可見得，該刊應該也關有文藝園地。

從十月一日創刊的《台灣民主評論》開始，就陸陸續續有雜誌創刊；一直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底為止，已知的光復後出版的雜誌有下面這些：

一、《前鋒》（光復紀念號）（十月二十五日），月刊，由「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理事長廖文毅）所出版。

二、《政經報》（十月二十五日），半月刊，是「政治經濟研究會」的機關刊物。社長：陳逸松，主編：蘇新，編委：王白淵、顏永賢、胡錦榮。

三、《民生》（十月二十五日），旬刊，發行人：苗栗謝增德、魏金俊。

四、《時潮》（十月二十五日），綜合雜誌，吳漫沙主編。有評論文如〈關於御用士紳與漢

奸》、〈光復後的婦女問題〉、〈台灣學生運動〉等，都是當時的重要問題；另外也有文藝創作，如林荊南的〈有一天〉等。

五、《新青年》（十月），半月刊，主編方慶清，發行人：郭啟賢。

六、《新風》（十一月十五日），月刊，編輯兼發行人：王清焜。第一期有作家龍瑛宗的光復小說〈青天白日旗〉。共出版二期。

七、《台灣青年》（十一月十二日），半月刊，三青團台灣區團部籌備處發行。發行人：李友邦。共出版十期後停刊。

八、《新新》（十一月二十日），月刊，綜合性雜誌。編輯：黃金穗，發行人：吳享霖。共發行八期後停刊。

九、《現代週刊》（十二月十日），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出版，主編吳克剛（公署參議）。

十、《台灣月刊》（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台灣革新協會」出版，編輯：王鍾麟。

十一、《台灣雜誌》（一九四六年一月），月刊，台北文化運動委員會指導，編輯：林知命。

十二、《中華》（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月刊，主編龍瑛宗，發行人：陳國柱。共出版二期後停刊。

十三、《台灣畫報》（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出版，主編：藍蔭鼎，社長：林紫貴。

十四、《新台灣畫報》（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月刊，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出版，編輯：白克、柳健行，發行人：夏濤聲。共出刊十期。

這些雜誌或多或少都刊有文藝創作，一般以自由詩較多，且大多以台灣光復為主題。譬如《前鋒》光復紀念號，便有三首詩；介舟的〈台灣光復歌〉，孔乙己的〈台灣光復〉以及林耕南的〈八月十五以後〉。《新風》創刊號上有「新風詞苑」，全都是慶祝光復的古典詩詞，如林述三的〈慶祝台灣光復賦〉，李慶賢的〈台灣光復喜賦〉等。以光復為主題的隨筆也不少，但是有日文的也有中文的作品；譬如，《新風》創刊號上，有陳氏董的〈歡迎喜慶之日〉、野馬的〈被祝福的存在〉、賴起鑑的〈光復雜感〉等人的作品。

至於小說創作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龍瑛宗的兩篇日文短篇小說。它分別發表在《新風》創刊號上的〈青天白日旗〉，以及《新新》創刊號上的〈汕頭來的男子〉。

〈青天白日旗〉描寫了一個農民阿炳帶著小孩木順仔，上街市集賣龍眼情形。父子倆看到原本沒

精神的街市，突然間變得朝氣勃勃，人潮出奇的多，大家臉上都笑嘻嘻；而且牆上電線桿上都貼滿了「台灣光復」、「感謝祖國」的標語。這裡，龍瑛宗對台灣光復初的街頭景象，有十分寫實的描寫。主角阿炳唸著唸著這些標語，難以動搖的實感漲滿了身軀，心想首次聽到台灣光復時不敢相信，還像做一場夢一樣。阿炳又回想過去常受日本警察無理的毆打，心中充滿了沒有祖國的悲哀。然而，眼前又貼滿了「台灣光復」的海報，唸著唸著覺得身心輕鬆許多。這時看到有人在賣青天白日旗，孩子木順仔吵著：「阿爸，好漂亮！買一隻吧，好不好？」

阿炳拉著神氣地揮舞著青天白日旗的木順仔，一路回家。冷不提防，迎面來了一個日本警察，照以前的自然反應，為避免挨打，必定想方設法避開他。但阿炳又想回來，現在自己已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民，有什麼好害怕？阿炳遂拉著木順仔和旗子，「毫不介意地挺胸昂首，搖搖擺擺走過去，日本警察呆著看他一眼，倒也讓他們走過去。」

龍瑛宗透過這樣的短篇小說，一個簡單的故事情節，傳神地描寫了台灣光復的社會實像，也傳達了他自己久被壓抑的民族情懷。雖然他不得不以日文創作，但其文學精神卻是中國的。就如他在《中華日報》「文化」副刊（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上的一篇用日文寫的極短詩〈心情告白〉所透露的心情一樣，他這樣地表白：

「我雖然是

用異國的調子

歌唱

我是

真正的中國人

真正的中國人

我在

心中哭泣

是為了老百姓

是為了老百姓」

龍瑛宗的作品和文學感情，是光復文學出發點的最佳代表。

原作發表於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主辦的「海峽兩岸台灣文學史學術研討會」（二〇〇五年十月

十六・十七日）

十、「光復文學」的出發點——談台灣光復後最早的報紙文藝副刊

【十一】

談「魯迅在台灣」

以一九四六年兩岸共同的魯迅熱潮為中心

兩位錢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剛才錢先生謙虛地表示說，他講太多了，好留一點時間給大家；但是我在下面聽錢先生的精彩演講，真希望他繼續說下去，好讓我少說一點。因為，接在他博大精深、引人入勝的演說後面，我的報告只會相形見绌。

剛剛在聽錢先生的演講時，我深受感動，也不禁有滄然之感。魯迅對錢先生來說，或者對大陸的知識界來說，就像空氣一樣自然，也像自己的骨、自己的肉一樣；大陸的知識界吸收了魯迅的精神養份，在火熱的現實中刮骨剝肉，然後又長出健康的骨肉來，創造出新文化。這種情形，對於我們這些出生長大在台灣（這個中國現代史中十分特殊的島嶼）的人來說，既感到羨慕，又不免有複雜的歷史感懷。因為魯迅這樣一個巨大的文化和精神資產，在台灣直到今天仍然不是骨，也還不是肉，甚至有點陌生；但是，它在六十年以前的台灣並不是這樣的。

這次的論壇能夠用「與魯迅重新見面」這樣一個題目，我覺得十分適切且有意義。它突顯了一個事實：在台灣的文化歷史上，也就是在台灣的一九四九年之前，魯迅曾經是很親近的，一直是台灣文化的重要精神要素；然而在那之後，不但遙遠了甚至還成了一個負面的形象。因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台灣內戰和冷戰體制，造成了文化和思想的重大的斷裂和橫逆，包括魯迅在內的大部分中國新文化，成

了禁絕的對象。從一九四九年算起經過六十年的今天，能辦這麼一場與魯迅重新見面的論壇，是很有意義的。因為，重新與魯迅見面，重新學習魯迅，也意謂著我們將跨出一九四九年後的內戰和冷戰體制和意識形態，重新與斷絕六十年的歷史與文化接頭。

下面我將向大家報告，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魯迅在台灣文化、文學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受敬仰的情形；報告將依時序作史料性的介紹，時間從一九二〇年代到一九四九年，特別著重在一九四六年兩岸共同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時的熱潮。

一、台灣新文學啟蒙中的魯迅

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化的啟蒙時期，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萌芽的時候，魯迅的作品就廣被刊載介紹到台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前後，在台灣人創辦的唯一報紙《台灣民報》副刊「學藝」欄上，就刊載了七、八篇魯迅的作品，如〈狂人日記〉、〈阿Q正傳〉、〈鴨的喜劇〉等。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魯迅的賴和，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逗鬧熱〉就發表在這一年。可見得，魯迅與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是分不開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逝世的時候，楊逵主辦的《台灣新文學》，也推出了魯迅紀念號。有兩篇悼念魯迅的文章，一是該刊主編王詩琅寫的〈悼念魯迅〉，另一篇是黃得時寫的悼念文。一九三七年之後，因為日本的侵略戰事，台灣進入戰爭總動員時期，雖然表面上大家不再談魯迅，但

魯迅的地下水脈還是一直延續著。

魯迅對台灣的文化青年的影響，就像楊雲萍在一九四六年的《台灣文化》魯迅逝世十周年專輯上的〈紀念魯迅〉文中所描述的：

「民國十二、三年前後，本省雖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割下，也曾經掀起一次『啟蒙運動』的巨浪。而對此次運動，直接地，間接地影響最大的，就是魯迅先生。他的創作如《阿Q正傳》等，早已被轉載在本省的雜誌上，他的批評、感想之類，沒有一篇不為當時的青年所愛讀。現在我們還記憶我們的那時的興奮。」

二、台灣剛光復時魯迅的復現

日本戰敗不久，在舉行台灣光復慶典的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前鋒》雜誌「光復紀念號」上，就刊載了一篇木馬（本名林金波）寫的〈學習魯迅先生〉。這是一篇魯迅逝世九週年的紀念文，作者不但對魯迅有深刻的認識，而且全文洋溢著對魯迅的熱情和敬意，譬如他說：

「我讀他的每一本的著作，我愛他的書，愛他的為人，愛他充盈了『民族魂』的戰鬥精神。在這艱難的人生路上，我能夠得到一點兒教養和不動正義的信念，得一點兒做人態度，可以說都是從先生的著作裡受到了無數的啟發，無數的教導。」

台灣光復後，最早創刊的報紙，是一份全用白話文而拒用日文的《民報》。該報的白話文副刊「學林」，很快就刊載了兩篇有關魯迅的文章；一是新人寫的〈阿Q性〉（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另一篇是鐵漢寫的〈魯迅的詩〉（十二月二十一起連載四天）。鐵漢的這篇長文，深入分析了魯迅的舊詩，其對魯迅作品的理解之深刻，已超越泛泛之論而臻專家的境界。在其前記中如此說道：

「魯迅先生的詩，無論舊的或新的，並不怎麼多，但我們要知道，魯迅先生是一位超越脫俗、氣魄四橫的詩人，他很有迫力地唱出時代的激盪和光輝。」

這幾篇在台灣一光復就出現的有關魯迅的文章，可以說是在日據期被侵略戰爭所壓抑的魯迅水脈

的復現。它體現了魯迅對台灣文化的深刻影響，同時，也顯示了台灣知識人對魯迅的感情和認識，已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三、一九四六年兩岸共同的魯迅熱潮

一九四六年是魯迅逝世的第十週年，全中國掀起了紀念的高潮。這一年，全中國正式發表和出版的紀念文章和研究論著，據不完全統計，有四百餘篇之多，當然這還不包括台灣的在內。其中，比較值得一提的著書有：何幹之的《魯迅思想研究》、王任叔的《魯迅先生的治學方法》、小田岳夫的《魯迅傳》（范泉譯）、馮雪峰的《魯迅回憶錄》、許廣平編的《魯迅書簡》……等。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二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總會」特為魯迅逝世十周年發出了〈怎樣紀念魯迅先生〉的通告。該通告指出：魯迅逝世十周年，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但和平、民主的要求仍遭受挫折，民族與人民解放事業面臨嚴峻危機的情形下到來的；紀念魯迅先生是為了更加闡明魯迅的道路，發揚魯迅精神，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制度誓不兩立，和勞苦人民共生共死；在當前就是要在爭和平、民主、改革、建設的運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該通告號召全國一切人民團體、文化文藝團體、教育團體發動這個紀念，各自斟酌情形，以十九日前後一周或一句為紀念期間，各刊物各報副刊出版紀念特集或專刊。

響應「文協」的號召，十月十九日，在上海、重慶、北平、蘇聯，國內外文化界都舉行了盛大的

紀念會。在上海辣斐大戲院（今長城電影院）由十二個文化團體聯合舉行了紀念會；應邀出席大會的周恩來、郭沫若，在會上巨幅魯迅像前進行了激昂的演說。

次日，早上十時，上海各文化團體，文藝作家均前往萬國公墓祭掃魯迅墓。郭沫若、茅盾、葉聖陶、胡風、雪峰等，先後在魯迅磁像下發表了演講。

「文協」的通告發表後，《文匯報》、《大公報》、《時代日報》、《文藝春秋》、《文萃》、《群眾》、《文藝復興》等為代表的各報刊雜誌，紛紛發表了紀念文章和有關消息報導。

復歸祖國恰滿一年的台灣文化界，也響應了「文協」的號召，重要的報紙雜誌也同時熱烈刊出了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紀念文章。包括《自強報》（基隆市）、《中華日報》（國民黨省黨部）、《台灣新生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平日報》（台中），以及《台灣文化》（月刊，台灣文化協進會）等報刊，前後共刊出了近四十篇的紀念文章和木刻畫，可以說是台灣光復後的唯一一次，如此大規模紀念魯迅的活動。這些紀念文章可參考文後的附錄。

其中，以《和平日報》和《台灣文化》最為熱烈，都分別刊出了紀念專輯。

1. 《台灣文化》紀念專輯

《台灣文化》是台灣光復後最重要的文化團體「台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刊物；而這個「台灣文

化協進會」，是由當時最重要的省內、省外政界、文化界人士所共同組成（如林獻堂、林茂生、游瀨堅、范壽康等人）。該月刊的主編為蘇新、王白淵和楊雲萍；蘇新為原台共成員，王白淵為日據期重要詩人、文化評論家，楊雲萍為日據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台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十一月一日出刊），以魯迅像作封面，刊出了「魯迅逝世十周年特輯」。在編輯「後記」中，編者如此寫道：

「本省在日人時代，我們不能公然追悼魯迅，雖是去年，因大家忙於慶祝光復，想到魯迅忌日的人很少，今年我們公然紀念魯迅，可說光復後第一次」。

特輯刊出了八篇文章，同時還有魯迅像、筆跡、魯迅最後一次攝影等插圖。

特輯的第一篇文章，是楊雲萍的〈紀念魯迅〉。作者是一位日據時期就從事文學、文化運動的作家，在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他面對新的動盪的現實，懷著複雜的心情向魯迅痛訴，情真意切。他說：

「所謂真理的尊嚴，以及正義的力量，還未完全回復；魯迅所疾惡的『正人君子』還得意登場，魯迅所痛恨的『英雄豪傑』，還要霍霍磨刀，準備著第幾次的大屠殺。而魯迅所最關懷，所最摯愛的我中國民眾，現在過著流離顛沛的慘無天日的生活。至於魯迅盡其一生的血淚，所奮鬥爭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民主』的實現，卻還在遠處的彼岸。

台灣的光復，我們相信地下的魯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省的現況，不知要作如何感想？我們恐怕他的『欣慰』，將變為哀痛，將變為悲憤了……

十年的歲月，似箭如梭地流過去了，可是，我們的對於魯迅先生的愛慕和追念，是和時間的過去而愈深的。」

在這次台灣的魯迅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中，魯迅生前的摯友，當時在台灣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後擔任台大國文系系主任）的許壽裳，發表了最多文章。他在《台灣文化》上前後共發表了四篇，另外在《和平日報》副刊「新世紀」上，也刊出了《魯迅和青年》以及《魯迅的德行》兩篇，因此有關魯迅的紀念文章共有六篇之多。而且，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台灣出版了《魯迅的思想和生活》（台灣文化協進會出版，楊雲萍主編）一書，該書收錄了他在台灣發表的新作四篇，再加上以前的舊作六篇。接著，他又在該年十月由峨嵋出版社出版了《亡友魯迅印象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

二月十八日不幸遇害於台大宿舍之前，他在台灣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全力完成了大量有關魯迅的思想、人格、生活等各方面的重要闡釋和回憶的文章。由於他是魯迅最親近和知己的好友（同鄉、同學、同道），因此寫來真實又深入，留下了有關魯迅的第一手資料，十分珍貴。

「特輯」刊出了萬歌譯自美國記者斯萊特萊的《中國的戰歌》中，有關魯迅的一章——〈斯萊特萊記魯迅〉。該文生動地記述了三〇年代初，斯萊特萊與魯迅的相交的情形。對於魯迅處於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以及激動的文學、藝術抵抗潮流中的工作和思想，有很深刻動人的描寫。

「特輯」也刊出了兩篇由木刻家寫的紀念文章。一是，直接受教於魯迅的第一代木刻家陳煙橋所寫的〈魯迅先生與中國新興木刻藝術〉；另一篇是，屬於第二代的木刻家，抗戰勝利後從重慶經上海來到台灣的黃榮燦，所寫的〈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新思想家〉。陳煙橋全面而詳細地介紹了魯迅如何推動和指導中國新興木刻藝術的情形；並且引述了許多魯迅的作品和書信來闡釋魯迅的文藝觀，譬如：有關藝術的題材、技巧、內容和生活經驗的問題；或者是有關中國精神、地方色彩和世界性的問題等等。黃榮燦是台灣光復期最重要的木刻家和藝術理論家；他積極引介中國新興木刻到台灣，並傳播魯迅的思想和藝術觀，是台灣木刻藝術的開拓者。他在《和平日報》主編的「每周畫刊」（第八期十月二十日），推出了「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木刻專輯」；刊出了兩幅魯迅的木刻畫，一是野夫刻的「安息吧！導師！」，另一幅是陳煙橋刻的「高爾基與魯迅」。在該專輯上，黃榮燦自己發表了一篇

題為〈中國木刻的保姆——魯迅〉的文章，文中他指出：

「今天在此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較以往有意義，在台灣首次紀念、介紹、認識他，是台灣文化發展重要的一面，可惜的就是這初先的新文化，失去他偉大正直的指導，不然，鮮明的行動，速度是可觀的」。

德國的凱綏，珂勒惠支是魯迅先生最讚賞的版畫家。魯迅還曾在病中自己編印了「珂勒惠支版畫集」送給朋友，據說發賣的沒有幾本。也許是受魯迅影響，黃榮燦也在台灣積極介紹珂勒惠支；在《和平日報》的「每週畫刊」十二、十三期（分別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及十二月一日）刊出了「珂勒惠支版畫專輯」，介紹和刊載了許多珂勒惠支的版畫作品。另外，他在《台灣文化》（二卷一期，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新生報》副刊「橋」（第一六一期，一九四八九月六日）上，也先後發表了珂勒惠支專論。

2. 《和平日報》紀念專輯

《和平日報》前身為軍方的《掃蕩報》，戰後改名為《和平日報》。台灣的《和平日報》原本是

台中駐軍七十師的「掃蕩簡班」，後擴大為日報；它創刊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的三月初停刊。由於時代機緣，該報由三位大陸來台的進步青年作家王思翔、周夢江和樓憲所創刊，並且取得台灣中部的本地文化界人士如葉榮鐘、楊遠，以及左翼的謝雪紅、楊克煌等人的協助；因此，該報表現了敢講敢批評、敢於揭露社會不公不義的民主報刊的風格，得到了大眾的好評和支持，發行量僅次於《台灣新生報》。

該報副刊「新世紀」，從十月十九日開始，連續三天（第六十八期到第七十期）刊出了魯迅紀念專輯。總共有十二篇文章（篇名請參考附錄），二幅魯迅木刻像（分別為黃榮燦和戎戈的作品）。專輯中除了胡風、景宋（許廣平）、柳亞子的作品為轉載之外，幾乎全是新創作的文章。許壽裳的新作〈魯迅和青年〉中提及，有一次魯迅聽了台灣青年張我軍說的「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一語後，「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該文接著說：

「本省台灣在沒有光復以前，魯迅也和海內的革命志士一樣，對於台灣，尤其對於台灣的青年從不忘記的，他贊美他們的贊助中國革命，自然也渴望著台灣的革命，這是不言而喻的。」

楊達共寫了二篇題為〈紀念魯迅〉的短詩，一篇用中文刊登在《和平日報》的「新世紀」上，另一篇則以日文刊載在《中華日報》龍瑛宗主編的「文藝」副刊上（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同名的兩詩內容有相同之處，也有很大的差異。中文詩的最後一段，如此寫道：

「魯迅未死

我還聽著他的聲音

魯迅不死

我永遠看到他的至誠與熱情」

而日文詩的末段，則這樣表達：

「如今到處聽到魯迅的聲音

繼承者的心中

看見魯迅的至誠與熱情

魯迅是人類精神的清道夫

永不磨滅的革命精神的標竿」

楊逵的詩表達了魯迅在他心中，以及在無數的台灣青年心中，是永不滅的精神標竿。

除了「新世紀」副刊之外，《和平日報》的「每周畫刊」，也推出「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木刻專輯」，這在前面已有提及，不另贅述。

由此可見，《和平日報》以更為生動、活潑的方式，結合省外、省內作家的熱情，共同紀念了魯迅的偉大精神。

3. 《中華日報》、《新生報》以及《自強報》

上面三份報紙，也分別刊出了紀念專文。

龍瑛宗主編的《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副刊，除了刊登了前述楊逵的紀念魯迅的日文詩之外，還刊出了他自己寫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始祖〉紀念魯迅，他在該文的起頭這樣寫道：

「今天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始祖，光輝偉大的世界文豪魯迅先生的逝世十週年紀念日。今天在上海，文化界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會，各新聞報紙也推出了魯迅紀念特刊。然而，由於許多我們的台灣同胞對魯迅的事蹟知道的不多。因此，在此簡單地介紹魯迅先生。」

該文在介紹了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白話文運動的先驅實踐家」、「普及木刻畫」以及「積極介紹世界被壓迫民族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等各方面的貢獻後，龍瑛宗在文末如此說道：

「魯迅的肉體已死滅，但他的精神仍活著，它是呼喚民族精神的覺醒的永遠的聲音。」

在《中華日報》日文版副刊「文化」上，龍瑛宗也曾以李志陽筆名寫了〈中國文學的動向〉。該文指出：現在魯迅文學依然是中國文學的主流，而這個主流與高爾基的「為了民眾的藝術」相通，是屬現實主義的文學；魯迅的文學的一生，忙於用腳流離的時間比用手寫作的時間更多，因此大多是如匕首般的短文，雖然在藝術上未完成，但其文學精神是不滅的，將來必對中國文學有甚大的影響。

龍瑛宗與楊逵、楊雲萍等台灣省籍作家一樣，對魯迅的文學不但有深刻的認識，在精神和感情上

都有很深的共鳴。

屬於台灣省政府機關報的《台灣新生報》，也在十一月四日推出了兩篇紀念魯迅逝世十週年的文章；一為朱嘯秋寫的〈魯迅孤僻嗎？〉，另一篇為外省籍詩人雷石榆所寫的詩〈你所痛恨而又熱愛的〉，該詩還配上木刻家黃榮燦的作品「魯迅像」。雷石榆的詩對於戰後的中國仍處於魯迅所「痛恨的墮落」、「最難醫治的精神病毒」的狀況，用熱情而沉痛的筆調呼喚道：

為了愛而戰鬥，為了愛而死，

我們心愛的巨匠啊！

十年了，

你永訣了這世界，

你永訣了最痛恨，

而又最熱愛的祖國，

你所期盼的民族自強，

又變為你痛恨的墮落，

正如你身前所感知的，

最難醫治這精神的病毒，

我們今天悼念你，

更感覺世界的人類，

應該緊握你留下的，

為了靈魂的改造而戰鬥的匕首！

由基隆市政府發行的《自強報》，其「寶島」副刊的文章大多反映了許多來台外省籍小公務人員的心聲。在十月十九日，該副刊刊登了荒漠的〈從阿Q的死想起〉，以及鐸的〈阿Q與羅亭〉二篇文章。雖然刊頭沒有紀念魯迅的字樣，但在編者語中表達了編者紀念的心意。

前一篇文章認為，阿Q的奴隸性來自其「自以為是」的半自覺性的可憐認識，想跳出悲慘的奴隸命運，可是重踏進了毀滅的境途。後一篇認為，魯迅創作出來的阿Q與屠格涅夫寫的羅亭，同樣都反

映了現實世界，「不想小說中的人物，竟會在今日孕育出無數的子孫」，作者坦承：「我寧可擁護阿Q型的呆子，不喜歡羅亭型的聰明人」。

台灣光復後，以阿Q為題的文章很多，因為與魯迅的代表性作品有關，現舉些例子介紹如下：

(1) 〈阿Q性〉，新人，（《民報》副刊「學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該文以嘲諷的筆法，托出了現在中國人心理中普遍存在的「精神勝利」。「有些法寶，就是作奴隸也是愉快的……寫到這裏不由的喊句口號，神聖的阿Q性，阿Q性萬歲」，該文以這樣的話作為結語。

(2) 〈阿Q正傳〉，龍瑛宗，（《中華日報》副刊「文化」，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這是龍瑛宗在該副刊上，系列介紹世界名著「名作巡禮」中的一篇。該文指出：「阿Q性也並非中國人所特有的性格，這種可悲的存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它們都曝露在強者的嘲笑中」。

龍瑛宗在文末話重心長地說：「中國的命運、中國文學的前途，暗澹而困難，然而也透出了一點的光明，它雖然微弱但正在燃燒著。」

(3) 曾經是「左聯」成員的著名文藝批評家林煥平，當時在上海出版了《文藝欣賞論》一書；該書的一部分章節，被刊登在《中華日報》的副刊「新文藝」上。一篇題為〈看了阿Q，不知阿Q的為

人》（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另一篇是〈阿Q相〉（十一月七日）。兩篇都是以阿Q為例子討論文藝欣賞的問題。譬如〈阿Q相〉的結尾中，林煥平說：「欣賞是不能抹煞，或不能離開理智的思維的，尤其是對於典型人物的了解。」

(4) 〈阿Q新種〉，太壁，（《新生報》副刊「橋」，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

該文仿阿Q正傳的筆法，描寫一位大陸來台的低層小公務員的形象。文章雖短，也並無特別的創見，倒是以阿Q新種的角度來看大時代中的小人物的寫法，別有新意。

四、一九四七年以後

一九四七年七月，國共內戰已在長江以北激烈開打，國府頒布了一系列戡亂總動員的命令。政治恐怖使上海的文化活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文化人紛紛南下廣州、香港。緊張的局勢使一九四七年的魯迅逝世十一週年的紀念活動，零落而寂寞。台灣則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再加上內戰局勢，文化上則更為緘默噤聲。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台灣紀念魯迅逝世十一週年的文章，只剩一篇。它刊登在《新生報》副刊「橋」上，題名為〈魯迅——中國的高爾基〉（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刊頭有一幅陳煙橋的木刻畫「魯迅與高爾基」。這是由一位署名歐陽明的人所寫的。在這前後，除了許壽裳繼續在《台灣文化》寫了三篇有關魯迅的文章之外；還有，高雄的《國聲報》副刊「南光」，曾刊出了〈魯迅遺囑〉（保魁，一九四七年八月八日）的短文，以及《新生報》副刊「橋」，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七

日刊出了呂宋的〈承繼魯迅精神——讀魯迅全集後〉。從此之後，在台灣有關魯迅的介紹、紀念或討論的文章，可以說幾乎看不到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間，在台灣曾經出版了五本中日文對照的魯迅小說集；它使剛光復不久的台灣青年、學生，容易從閱讀中日文對照的魯迅作品中學習中文，同時在普及魯迅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五本書分別是：

- (1) 〈阿Q正傳〉 楊達譯 東華書局 一九四七年一月
- (2) 〈狂人日記〉 王禹農譯 東方出版社 一九四七年一月
- (3) 〈故鄉〉 藍明谷譯 現代文學研究會 一九四七年八月
- (4) 〈孔乙己·頭髮的故事〉 王禹農譯 東方出版社 一九四八年一月
- (5) 〈藥〉 王禹農譯 東方出版社 一九四八年一月

這種以中日文對照的方式出版的文學作品，除了魯迅的作品之外，還有其他中國作家的作品，如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楊達翻譯，東華書局「中國文藝叢書」）等等。台灣當局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下令報刊雜誌禁用日文後，這些書便成了台灣民眾學習中文和接近中國文化的最佳工具。但是這種情況到了一九四九年後，完全逆轉，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新文學新文化的作品和思想，完全

成了禁書和禁忌。

五、一九四九年的斷絕。查禁和肅清

一九四九年國府兵敗如山倒，五月下旬上海戰役勝負已見，上海即將隨著南京「淪陷」。台灣陳誠當局於五月二十日宣布台灣戒嚴；接著，在五月二十七日頒定了「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對新聞雜誌圖書實施嚴密的檢查制度。十一月二日，陳誠公布了數百種禁書的書單，開始在台灣查禁「反動書籍」。長達三十多年的台灣「禁書」歷史從此開始。被列名為反動書籍的「禁書」，包羅萬象；分十大類，包括史學類、政治經濟類、文藝類傳記類……等等。其中有關魯迅的作品有：

《魯迅全集》

《魯迅書簡》

《魯迅傳》（范泉譯）

《魯迅事蹟考》（林辰）

《魯迅先生二三事》（孫伏園）

自此，魯迅的作品、思想和人，不但成為禁絕的對象，甚至成為反共文人口中的「千古罪人」、「陰謀家」、「中共同路人」。

包括魯迅作品在內的數百種「禁書」，幾乎包羅了中國現代史中最重要且影響最深遠的著作。查禁這些書籍，等於切斷了台灣與中國新文化新思潮的關係，實現了陳誠所說的「隔絕共產毒素於彼岸」、「阻止共產思想越過海峽進入台灣」的反共政策。

國府的反共戒嚴體制，不但查禁書籍，還肅清人和思想。前面提及的，許多在台灣光復後熱心介紹魯迅思想的作家、文化人，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白色恐怖中，不是遭到逮捕、逃亡、坐牢，就是遭到槍殺。譬如：黃榮燦、藍明谷遭到刑殺；楊逵坐牢；雷石榆、李何林、樓憲、吳忠翰、鐸、呂宋則先後逃出台灣回到中國大陸。許壽裳不幸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在台大宿舍遭到殺害。

查禁了魯迅作品，肅清了魯迅思想的敬仰者、傳播者之後的台灣，在長達數十年的反共戒嚴時期，只剩下右翼反共文人陳西滢、蘇雪林、劉心皇、梁實秋等人主導的反魯迅風潮。

自此，白色的、荒涼的、閉鎖的反共文化，長期間籠罩著這個海島。

附錄：一九四六年台灣紀念魯迅十週年各報刊主要文章

一、《台灣文化》一卷二期「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

〈紀念魯迅〉 楊雲萍

〈魯迅的精神〉 許壽裳

〈斯萊特萊記魯迅〉 高歌譯

〈魯迅先生與中國新興木刻藝術〉 陳煙橋

〈漫憶魯迅〉 田漢

〈他是中國的第一位新思想家〉 黃榮燦

〈魯迅舊詩錄〉 謝似顏

〈在台灣首次紀念魯迅先生感言〉 雷石榆

其後，《台灣文化》上有關紀念魯迅的文章還有：

〈魯迅的人格和思想〉 許壽裳（二卷一期·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

〈魯迅和我的交誼〉 許壽裳（一卷五期・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魯迅的遊戲文章〉 許壽裳（二卷八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

〈讀「魯迅書簡」〉 李何林（二卷二期・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

二、《和平日報》副刊「新世紀」和「每週畫刊」（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

〈魯迅和青年〉 許壽裳（十月十九日）

〈關於魯迅精神的二三基點〉 胡風（十月十九日）

〈紀念魯迅〉（中文） 楊逵（十月十九日）

〈魯迅先生略傳〉 穎瑾（十月十九日）

〈忘記解〉 景宗（十月二十日）

〈追念魯迅〉 作者不明（十月二十日）

〈我所信仰的魯迅先生〉 秋葉（十月二十日）

〈田漢先生的「阿Q正傳」劇本〉 楊蔓青（十月二十日）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為魯迅先生六十六歲生朝紀念敬獻一律〉 柳亞子（十月二十日）

〈魯迅的德行〉 許壽裳（十月二十一日）

〈像這樣的戰鬥〉（日文） 樓憲（十月二十一日）

〈兒時〉 魯迅（十月二十一日）

〈中國木刻的褫姆——魯迅〉 黃榮燦（十月二十日「每周畫刊」）

〈讀「魯迅書簡」後感錄〉 吳忠翰（十月二十日起連續三天）

三、《中華日報》日文版副刊「文藝」

〈中國現代文學的始祖——逢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日〉 龍瑛宗（十月十九日）

〈紀念魯迅〉（日文） 楊遠（十月十九日）

四、《新生報》副刊「新地」

〈魯迅孤僻嗎？——為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而寫〉 朱嘯秋（十一月四日）

〈你所痛恨而又熱愛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 雷石榆（十一月四日）

五、《自強報》副刊「寶島」

〈從阿Q的死想起〉 荒漢（十月十九日）

〈阿Q與羅亭〉 鐸（十月十九日）

初稿發表於二〇〇九年十月三十日，「台灣社會研究」主辦「與魯迅重新見面」論壇（清大月涵堂）。

完稿刊登於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月刊》（二〇一〇年第三期，總第三三五期）。同時，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二〇一〇年三月）。

【十二】

《雷雨》讚歌

記相隔六十年的兩場《雷雨》

《雷雨》讚歌

雷石榆

滾吧，時代的渣滓啊！

我們看厭了

假面具的尊嚴，

虛偽的道德倫常，

我們看透了

保守的腐敗，

大家庭的罪惡；

一切為了自私，

生存於狹隘與墮落

喝，滾吧，時代的渣滓啊！

我們聽厭了

病態的呻吟，

無助的呼喚，

我們預料到

黑夜裡的怪狀奇形

不會生存到明天

而且那封建的活屍

在顫抖，在動搖的舞台，

到了最後的一瞬，

預言者的雷雨啊，

給與了無慈悲的裁判。

讓新生的力量，

純真的愛，

通過雷電的鞭鞋，

暴雨的掃蕩，

鋪上真理的光明之路吧！

一九四六年，卅一日，台北

這是台灣光復初期，在文化界最活躍的詩人、文藝評論家雷石榆（一九一一—一九九六，廣東台山入），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卅一日為曹禺名劇《雷雨》在台灣上演時所寫的一首詩。這首詩同時發表在十一月四日的《和平日報》和《中華日報》；是為了「台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演出雷雨特刊」而寫的。不需多說，該詩直接而有力，也表現了詩人對時代如《雷雨》般的感受。

是的！這是六十年前的事；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歸祖國剛滿一年不久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曹禺的名劇《雷雨》已在台北市中山堂上演，轟隆的雷雨響徹台灣文化的上空。它並不是由職業團體演出，而是由「台北市外勤記者聯誼會」的記者們自己導自己演自己推出的，可說是半職業劇團的演出。當時各報的大陸來台記者許多人在抗戰中都曾投身戲劇運動，參加過如「青年藝術劇團」

的戲劇團體。據「外勤會」的說明，他們演出《雷雨》的目的，是在「推動台灣的話劇運動」、「鼓起台灣新的劇運浪潮」，以及「為外聯會募點基金」。這次演出除了在台北演出三場（十一月四日—六日）外，在台中也演出了三場（台中戲院十一月廿五—廿七日，據說反應熱烈加演了一場）。

在當年的六月，簡國賢、宋非我的《壁》公演造成轟動，卻遭公署當局禁演，台灣戲劇界一度沈寂。這時，再度由「外聯會」推出的這場演出是第一個驚雷。當時，光復只不過一年，但是社會狀況已極度動盪惡化，米荒、失業、貧腐、貧富不均、大陸內戰的影響……等正撕裂著人心。這從簡國賢在六月上演《壁》時，在《新生報》上所寫的〈被遺棄的人們〉（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一文的開頭，便可知道：

「由於現實的錯綜複雜，即允許一夜發費數萬，沈迷於花天酒地的人，也冷漠地面對徬徨於飢餓邊緣的人。當酒家與舞廳上謳歌著自由與歡樂時，居住於低矮屋簷下的勞工正呻吟於生活的重壓下……」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中，接著《壁》的演出之後，《雷雨》在台灣的第一次公演，有很大的意義；當時的《和平日報》編輯周夢江，在一篇〈觀客無言——觀「雷雨」上演後〉（《和平日報》「新世

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有鞭辟入裡的想法，茲抄錄如下：

「在台灣，在這剛剛開始接受祖國文化的台灣，一切舊中國的低級，庸俗的文化，正在這裡找到新地盤開始猖狂的時候，有這麼好的劇本——『雷雨』適時的演出，是有著不可估計的意義的。第一：它可以改變本省人過去對祖國文化的印象，不以為中國的文化都是舊垃圾，因為本省同胞在日人的教育下，很多是受過西洋文化的薰陶，而日本最近百年來的文化，也可說是西洋文化的模倣者，追隨者，不管是本省同胞鑑賞能力夠不夠，藝術的修養如何，接受得多少，「雷雨」的演出，總算是提供了中國新藝術的一面，使本省同胞注意並且覺得值得作為榜樣。第二就劇本的內容說，它暴露出中國舊封建家庭的黑暗，很可以給本省同胞作一面鏡子。因為本省雖曾走上了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化的道路，就是因為殖民化的緣故，到今天仍舊殘留很多的封建家庭和封建道德的。

更難得可貴的，有了這麼好的劇本，配合了這麼好的舞台佈置，好的劇員加以演出，是現階段文化荒涼的台灣的奇蹟，也是本省同胞的眼福。」

從一些歷史資料，我們可以知道《雷雨》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譬如，影劇史家呂訴上，在《台灣新劇發展史》上描述當時上演的情形：「當時一般人士都給予極好的評價，在可容約二千多觀眾的

中山堂連賣了三場九成座，可以說是空前的了。」還有，當時參與演出的記者張南雷，也如此報導：「許多台灣省同胞對我們演得並不好的戲也竟是那樣熱烈認真，他們會帶著原文的或甚至日譯本的劇本到劇場去，隨着隨讀地看兩場三場不覺厭煩。」實際上，《雷雨》原作是在一九三四年第一次發表在《文學季刊》；而其第一次公演，是在日本，由中國留日學生團體「中華話劇同好會」在日本東京神田一橋講堂上演，造成了大轟動。當時在「東京左聯」活躍的雷石榆、林煥平等，和創刊《福爾摩沙》的台灣留日學生吳坤煌、張文環之間，因為同是在日帝壓迫下的同胞，互相之間有很活潑的交流，因而都直接或間接參與了這次戲劇活動。對這些台灣文化人來說，許多人早已讀過日本劇評家的《雷雨》日譯本，對《雷雨》並不陌生。這就是為什麼《雷雨》在當時會受到台灣觀眾歡迎的原因之一。

《雷雨》的劇情真實而慘酷；劇中的人們：

「盲目地爭執著，泥鰍似地在感情的火坑中打著昏迷的滾，用盡心力來拯救自己，而不知千萬劫的深淵在眼前張著巨大的口……愈掙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裡」。（曹禺自序）

他們的希望一個個幻滅，他們掙扎著要走「光明」的路，掙扎著要拯救自己，然而卻在新生的憧

憬裡滅亡。曹禺用「雷雨」般的熱情暴露了當時中國封建家庭與社會制度的罪惡，暴露了這個制度下無恥而可憐的人們；他們的掙扎、絕望、救贖、悔改與滅亡。曹禺以摧枯拉朽的「雷雨」粉碎、洗滌這一切。這時的台灣社會，在光復一年中已積累了深厚複雜的矛盾，希望與絕望交陳，大家正陷入極端焦燥、憤恨的深淵，有一種期待來一場大雷雨洗淨一切的集體心理。《雷雨》公演正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前三個月，是台灣社會暴風雨來臨的前夕。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雷雨》會被上演，並受到歡迎的原因。

恰好過了一甲子，相隔六十年的今年，《雷雨》再度響徹了台灣文化的天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最新版的《雷雨》（建國迄今共排演過三次，一九五四、一九八九、二〇〇四三版，共上演了四百三十九場），在台北「國家劇院」上演了（五月三十日—六月四日，另外，六月六日、七日在中壢藝術館上演二場）。這是值得大書的文化大事；特別是，跨越了一甲子的時空，在台灣再度上演的意義，更是重大。

六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雖然只是一瞬間，但對人生來說卻是「世事滄桑」；兩岸的社會、政治經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數次的「雷雨」，比舞台上的《雷雨》更狂烈的狂暴風雨，吹颳、洗滌、摧枯拉朽地摧毀舊秩序，新的生命誕生了，但舊根仍依附在新生命中發芽。

六十年前《雷雨》在台灣上演時，在蒸悶的社會空氣中，預告了「二二八」的暴風雨將來臨。

在二二八的雷雨中，參與上演《雷雨》的青年記者文化人，有人死亡了，有人逃亡了，參與了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解放事業。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戰爭摧毀了以國民政府為代表的中國舊封建勢力，建立了人民共和國；而遷逃台灣的國民政府在美國的世界冷戰戰略的扶殖下重獲新生，在台灣進行了慘酷的白色恐怖，對島上的進步力量（包括人和思想）進行了徹底的肅清。包括了如《雷雨》的新中國藝術、文學和思想，也都成了被禁絕的對象；長期間，在絕望的白色化的島上，成了不可摸觸的令人戰慄的禁忌。其後，在白色化島嶼的母胎中，誕生了以「去中國化」為標誌的政權，以及半依賴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再加上反共、親美的社會意識，這就是今日台灣社會的基本特徵。最近，獨派政府執政，其意識形態與台灣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極度的乖離，經濟停滯衰退，政商財團爭相食島內公共資產，金融寡占化財團化快速進行。結果是，數年之間私人資本財團急速肥大化、壟斷化，相對的社會資產快速萎縮貧困化，造成貧富不均，全民負債化；個人看不到前途，失去了展望。再加上最近貪腐弊案連連，人心積憤已深；由於政治過度操作，使社會倫常價值快速地崩解，罪惡橫行天下。這使整個社會陷入極度焦燥不安的狀況，渴望狂風暴雨來臨，讓《雷雨》橫掃一切的心情正逐漸蔓延開來。

在這樣的時局中，《雷雨》超越六十年的禁忌歷史，再度來到島上公演，有它特殊的時代意義。除了顯示《雷雨》本身強大的藝術性，再度展現中國的新藝術的成就之外，在轟隆響徹「國家劇院」的雷雨中，舞台上敗德、貪慾、懦弱連同腐朽的支配者，在火坑中打滾，在互相殘害中自救的幻滅，

逐步在掙扎中深陷入死亡的泥沼；《雷雨》顯示的藝術形象也超越時代，震懾了今日台灣觀眾積鬱無所渲洩的感情，搥擊著閉鎖的心靈。

七十多年前，曹禺在他的自序中曾說過：

「我誠懇地祈望著看戲的人們，也以一種悲憫的眼來俯視這群地上的人們。」

也正如文前所引的六十年前雷石榆的詩句：

「讓新生的力量，

純真的愛，

通過雷電的鞭撻，

暴雨的掃蕩，

撲上真理的光明之路吧！」

這應是相隔六十年，兩場《雷雨》給我們的共同啟示吧！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七日完稿

發表於《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〇〇六年夏季號）

第三輯——

新二二八史像

【十三】

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社會

百病齊發的春天

十三、二二八前夕的台灣社會——百病齊發的春天

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個複雜而有重層原因的事件，並不是以單一面向就可究其全貌的。台獨勢力一直用單一的省籍（或被稱為「族群」）矛盾來扭曲它宣傳它。其實，省籍矛盾只不過是表象，而當時的不平等不民主的政治經濟關係才是事件的根本原因。本文認為，當時台灣的「反壓迫」和「民主」的要求才是事件的基本動力和原因；而它又是和當時中國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要和平、要民主」的民眾運動同一潮流，也是它的特殊一環。

迄今，有關二二八事件本身的調查研究已不少，可謂汗牛充棟；本文則把重點放在事件發生的前夕，釐清事件前夕台灣社會的真實動向。希望把事件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理出頭緒，揭露其複雜多面又充滿矛盾的原相。

一、司法的諸面相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台北地方法院對聳動全台的員林警察槍殺法警案，進行了判決。教唆殺人的警局長江楓居然被判無罪，一時全台灣議論嘩然。這個案件發生於去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間，「警察槍殺法警」的案件，在純樸的台灣社會本來就是前所未聞駭人聽聞的大案。從案發到起訴開庭

審理過程，全台都關心注視，各報都逐日詳細報導。《民報》還為此寫了一篇社論《守信的觀念》，（二月四日），對於被告的警察局長刁頑的強辯（硬拗）態度，感嘆道：「人心一至於此，信用何從說起，政治又有什麼辦法。」該社論又進一步引申道：

「台灣人本來很尊重信義，一如孫先生所說的。可是光復以來，由省外移入不少不良風氣，耳濡目染，容易學習不良習慣，現在對於守信觀念，不無動搖。」

社論把問題歸咎於「省外移入的不良風氣」，有其真確的一面，但也有過度解釋、簡單化之虞。然而，不可否認的，台灣光復一年後，結果不是繁榮與安定，而是後退、貧困與混亂；因此社會上產生一種普遍的心理，認為所有不好的事物都是「省外移入的」。發生天花、霍亂等流行疫病是「省外移入的」；貪官污吏、封建作風也是；連大吃大喝、在公共場所高談言笑，也都成了「外省人帶來的不良風氣」。

這個員林警察槍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案，又牽涉到省籍問題。因為警察方面從局長到警員都是外省人士，而台中地方法院方面由庭長到法官幾乎都是本省人，因而使原本的警察法紀問題蒙上了原來

就已相當嚴重的省籍情感。這次判決的結果，警察局長竟然無罪，這如火上加油，更加深了省籍間的怨隙。

然而單單從司法部門來看，並不是只有這樣的負面案件，也有一些正面的事件。譬如：從去年一九四六年六月間開始纏訟的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筆禍案」，原本被地方法院判決有罪，造成了全台輿論界的議論與恐慌。但經上訴後，在高等法院審理時，檢察官於一月二十九日撤回了告訴，全案順應輿論界的期望而圓滿結束。另外，當時還有一眾人矚目的省公署控告蔣渭川「侮辱公署、煽動犯罪」案，結果檢查處不予起訴（一月十五日），這也突顯了當時台灣司法仍有其獨立辦案的那一面。

還有，在一九四七年一、二月間，當時報紙多次報導了行政院飭令省方要遵行「保障人民身體自由」的消息；中央司法行政部通令各地司法機關「處理案件要減少株連」，「傳喚、拘提、訊問、羈押時應注意被告權益」等等，展現了比較開明的司法作風。譬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九日的《人民導報》也報導了行政院通令各級政府，要勵行「提審法」尊重人民身體自由，且省署法制委員會通飭各機關遵行的消息。實際上，台灣在光復後不久，全省各地就已紛紛自主地成立了「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台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還出版了由省籍法官王育霖（後二二八事件中遇難）所著的《提審法解說》，書中詳細說明如何保障人民權益的內容。可見得，一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國民黨政府與司法界，仍有其開明和寬容的那一面。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國民黨政府公佈了《中華民國憲法》，同時宣佈將於當年底十二月廿五日「行憲」。同時，為了慶祝「行憲」，宣示開明作風，還頒佈了全國司法「大赦」，台灣當然也不例外。從一九四七年一月起，司法單位便忙著準備「大赦」，結果台灣的「大赦」釋放了四、四九二位罪犯，佔六千多位在監罪犯的百分之八十八，可以說大多數關在監獄的罪犯都被釋放出來了。雖然台灣有關機關也倉促組織了這些釋放罪犯的「司法保護會」，但恰逢物價狂漲、米價恐慌、一般市民都買不到米糧、社會極度動盪不安的時機，這個原本慶祝「行憲」、誇示民主開明的「大赦」，卻得到相反的作用，使社會現況更加惡化。當時有一位創辦「人民法律事務所」和「人民法學出版社」的省籍法學家盧鴻飛，在《人民導報》上，從一月三十一日一直到二月七日，連日在刊頭半版刊出了〈大赦與司法保護——向當局呼籲〉一文強力批評司法「大赦」，該文用鮮明的標字反諷地寫道：

「慶祝憲法公佈 犯罪專科大學提前畢業 畢業生計四千餘人 分發各地實習」

的確，在大赦釋放的第二天，就有一外省籍竊盜犯顧振湘，因為再犯盜竊而被捕再入監。對於這個問題，報紙有題為「新人入舊獄」的短評。盧鴻飛認為：「大赦而引起的問題本係全國性，台灣問題較他省嚴重」。在上海黃金風潮所引起的台灣經濟恐慌，弱勢者都處於飢寒交迫無得溫飽的慘況中，

大赦「等於分發四千五百殺人專家，竊盜專家到各地實習」。

這四千多位同時提前畢業的罪犯，在不足一個月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似乎沒人注意過，實在值得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

在這慶祝「行憲」，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人民自由」的另一面，國民政府的軍警特，卻到處打人、抓人。二月十七日的深夜，北平市出動了大批軍警，藉「戶口檢查」之名逮捕了二千多人，其中，包括學生、教授、耆紳。針對這嚴重的問題，三月一日的香港《華商報》社論〈抗議泛濫全國的暴行〉批評說：

「你們不是說要實行『民主』？實施『憲政』嗎？難道這就是你們的『民主』和『憲政』嗎？」

這時候的台灣，雖然正處於物價飆漲買不到宿糧的經濟風暴中，但大多數市民仍熱烈歡迎「行憲」，大家都面紅耳赤地論辯著要如何行憲與民主化。特別是大多數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在這樣的困境中仍抱著對國民政府的希望。然而，對於許多站在大眾中間的人來說，卻有另外一種感受。譬如在二月十五日的第四屆「戲劇節」，恰好歐陽予倩率領的「新中國劇社」正在台灣公演「鄭成功」、

「日出」、「牛郎織女」等劇目，因此省內外戲劇工作者在台北市的「省電影攝影廠」舉行了紀念會。會上歐陽予倩講了「中國戲劇史」，而省籍戲劇界代表人物，去年六月間曾推出《壁》一劇造成社會大轟動但遭禁演命運的宋非我，也上台用生澀的國語說了一段話，他說：

「今天我有點恐怖心理，日人時代的常被追究，光復後想可以自由了，但我在廣播電台講『土地公』就被人注意監視。後來排演《壁》，又不知道被哪方面的人禁止。所以我很害怕，在講話以前請讓我祈禱（宋氏接著向上帝祈禱）……。」

站在台灣戲劇運動前端的宋非我，「我很害怕」的這段講詞，顯示了二二八前夕的台灣在行憲、民主的熱鬧口號下，卻正處於複雜詭譎多變的形勢中，一個隱形的黑暗勢力時刻威脅著藝術的良知。使這位生活在台灣的庶民百姓中間用民間形式表達人民聲音的傑出劇作家，感到「我很害怕」的勢力，是一股「反民主」、「反人民」的勢力。這股勢力也逼使《人民導報》創辦人宋斐如先生，不得不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人民導報》上，刊登被辭去教育處副處長「免職另候任用」的啟事。二星期後在二二八事件中喪命的宋斐如，國民政府給他的罪名之一是：「利用報級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點」。可見得台灣社會內部的反動勢力，在「行憲」、「民主」的熱鬧表象下，

早已在黑暗中記下了閻王「生死簿」。

二、民族經濟的重建與危機

五十年間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在產業經濟上，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米倉糖庫」和「南侵的軍需工業基地」。在日本投降殖民統治終結台灣復歸祖國後，這種極端的殖民地經濟也隨之崩潰；譬如一九四五年的稻米總產量就萎縮到戰前最高產量的40%以下，連供給全島民的消費都不夠，一度引發了米荒（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四月間）。這是日本殖民統治留給台灣的最大「負債」。因此，光復後省公署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便是如何把台灣崩潰的殖民地經濟重建為民族經濟；使台灣作為中國的一省從貨幣金融、貿易、產業、法令規章等整體的經濟制度，重回中國經濟圈。

陳儀領導的行政長官公署，一面進行政權、行政機關的接收以及日資日產的接管，還要負責五十萬日俘日僑的遣送；一面又要重建台灣的經濟、社會。況且，除了產業經濟的重建工作之外，還有教育、語言、民意機關等全體政治社會制度的重建，這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少見的艱鉅事業。

光復不久的一九四六年年初，馬上面臨了米荒、米價高漲的大挑戰，這是「大兵後的大凶」問題；也是日本殖民和戰爭體制「竭澤而漁」後留給台灣的「負債」。經過台灣官民努力，到了

一九四六年終，稻米產量已恢復到六百多萬噸，足夠全省消費還有剩餘；煤炭的產量也達到每月十萬噸，其中四萬噸出口上海，彌補了上海地區因為東北華北戰亂而燃料供應短缺的問題。進入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的《人民導報》報導了幾則產業經濟的消息：南部三個製糖廠的煙囪已冒煙，糖業開始復甦；製鹽業也開始增產，且輪往日本四萬二千噸；高雄糖一萬六千袋輪往上海、台南蕃薯大增產等等。總體而言，一九四七年的年初，生產已逐漸恢復。另一方面，社會組織也日臻穩定不斷發展中，據民政處的報告，全省民間公司的登記（主要是有限公司）已達七百多家，且已登記的省級人民團體也已達四十三單位（包括商會、婦女會等）並繼續快速增加中。譬如，二月十五日成立了「台北市報業同業公會」（宋斐如、張兆煥發起人），一月十六日成立了由王添灯領導的「人民團體聯誼會」等。還有，「省參議員聯誼會」、「國民參政會台灣省參政員聯誼會」也在此時成立。另外，在二月十六日當日，台北市便成立了「市汽車司機業工會」、「市木工職業工會」；二月六日成立了「市印刷職業工會」、「市土水職業工會」以及「人力車工會」等工會團體。

在這同時，以省營印刷廠工會為主，也展開了反對貪污舞弊和改善待遇的罷工。二月二十日的《民報》社論〈工人運動在展開〉，也針對進入一九四七年來，大量產生工會組織和罷工的現象，作了深刻的說明：

「光復對於工人階級又予與一個轉機，最近又因為經濟恐慌的來襲，工人階級的生活面臨重大的危機。這種客觀條件，又是促進工人運動復興的因素。」

該社論進一步分析指出：

「再者台灣的工人運動，在現階段又面臨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他們除為當前的待遇改善問題而奮鬥外，他們應該又是爭取民主的一支生力軍，一切的經濟鬥爭，都必然地發展到政治鬥爭。政治的民主，是全體人民當前的要求。」

社論中所說的「經濟恐慌的來襲」，就是指舊曆年關前後，台灣受到上海的黃金風潮波及，所造成的物價飆漲和米糧恐慌；而該社論所說的全體人民對「政治民主」的當前要求，就是指進入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一面公佈《憲法》並言明「行憲」，一面卻繼續進行國內戰，打壓民主勢力；而且在馬歇爾離華、美國又停止調處中國內戰的局勢下，「和平、統一、民主」已經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特別在台灣，針對省公署的一元集權制度，以及上級官吏大多由省外人士擔任的省

籍不平等結構，光復以來本省籍人民都以「民主化」為中心口號，對抗這種不合理的制度。此刻，在經濟恐慌來襲和國共內戰轉劇的局勢下，「民主化」的要求更形迫切更趨劇烈。

三、國民教育與學潮

光復後，台灣教育的變革重建，把台灣的殖民地教育轉型為民族國家的國民教育，這一直是省公署施政的重點；在教育普及、教育機會平等以及擴大教育機會方面的確取得一定的成就。譬如，中小學擴大招生，增設師範學校，創立師範學院、法商學院，添設許多專科學校等等。據一九四六年七月的統計，光復後，中學生增加了一萬五千多人，專科以上學生增加二千五百餘人，有八千多名省籍青年成為小學老師。原本日本人青年獨占的台灣帝大改制為國立台灣大學後，完全成了培養台灣省籍青年人才的搖籃。即便有這麼巨大的教育改革，但是在社會變革的矛盾以及動盪的政經局勢中，學潮仍然頻發；據統計，光復後至少發生了二百次的學潮。學潮主要起因於校方的舞弊、管理失當，以及省籍文化摩擦等三方面，這與當時大陸各地的學潮有許多不同的內涵。根據《民報》的報導，台南一中的罷課事件（一月十九日），是起因於該校校刊登載了一篇由該校老師吳乃光所寫的〈論台灣當前的教育與語文問題〉。學生認為該文有歧視台灣學生，指責台灣學生「奴化」的問題。同一天，台南省立工學院（現在的成功大學）也發生學潮，因該校寄宿學生在舉行慶祝新年晚會上，高唱日本歌並跳舞助興；該校孫秘書對此甚不滿，對學生說，要唱日本歌，須退學回去日本；學生們對此十分憤慨，

認為這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待殖民地台灣人一樣。兩者互鬧不休，終致釀成學潮。對此，一月二十一日目的《民報》社論〈台灣人要歸哪裏去〉對此批評道：

「至於孫秘書的說話，不特失去了理性，完全是犯著征服者對待被征服者的錯誤。昔時日人如遇台胞中有不聽其『皇民化』的言動時，輒以『你們如不願意作日本國民，可速回支那去』之言加之，話中充分含有侮辱的意思。」

「試看光復初時，台胞們滿悅之餘，誰也厭說日語，至於日歌實無從而聽。迨後由內地來的同胞，不肖多於賢達，而又佔了優越的地位，以致台胞們大形失望，終至內外省人的感情隔膜，日趨深刻。於是反動的，緩和了對日人的惡感。不客氣地說，說日語、唱日歌，這是台灣的實況，很值得憂慮的。」

最後，社論要孫秘書「衷心向學生道歉，取消失言」。

但是在行文中，社論也主張：

「大家放棄日語日歌，來學習國文國語，並唱中國歌曲，我們所深惡的是自私自利貪污冥頑的敗類，並與一家人同胞交遊的喜悅，不該有所動搖，對於這點，我們同胞要互相警惕，不可弄錯。」

社論全文的基本立場，主要在批判一些有優越感並以征服者的態度對待同胞的外省人；認為因為有一些自私自利貪污冥頑的敗類，致使同胞大形失望，而產生了省籍隔閡。作為一種反動，台人緩和了對日人的厭惡，再度講起日本語、唱起日本歌來。對於這種現象，論者表達了憂心的態度，並主張應該要講國語、唱中國歌，同胞間親和的立場不可動搖。像這種對待省籍摩擦的態度和立場，也是當時台灣文化人和知識份子的普遍態度；他們嚴厲批判政府不合理的施策以及一些不平等相待有優越感的外省人士的作為，但絕不逾越民族的立場，完全是站在民族國家內部矛盾的立場進行嚴厲的批判。

在一、二月間發生的學潮的有：台中工職、法商學院、高雄二中、高雄商校、嘉義農職校等學校。

四、兩次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遊行（抗議日本澁谷事件和美軍強暴事件）

除了上述頻發的學潮之外，在二二八事件的前夕，台灣爆發了二次以學生為主體的大規模遊行示威。一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的抗議日本澁谷事件判決不公的遊行示威；另一是，

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抗議美軍暴行的遊行示威。

兩者都起因於美國和日本對台灣同胞和中國人民犯下的暴行和侮辱事件，所激起的全民族的憤怒。在台灣，連續爆發的這兩次的大規模街頭遊行——抗議日本澁谷事件和美軍暴行，可說是二個月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的先聲。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日本警察在東京澁谷區公然開槍射殺請願歸途的台灣僑民，有四人喪命二十多人受傷。消息傳到國內，台灣全島激憤萬分，全中國輿論也都齊聲嚴辭譴責日本：《大公報》發表了〈抗議日警槍殺我同胞〉社論，指出：

「這挑釁是向中國，這恥辱是在中國……是未死的日本法西斯向中國人民開槍……中華民國應為新回來的兄弟，挺身負起保護的責任。」

台灣作家賴明弘，也在台中的《和平日報》著文〈澈底消滅日人黷武主義〉，滿腔憤慨地說：

「八年來的血債，和五十年來的血債，我們對日本人尚未發出聲討，還未找它清算的今日，我們

同胞又再被其公開屠殺，這還有值得討論的餘地嗎？」他公開呼籲：「如日本政府無適當表示，我們有權將此批在台灣日僑囚禁，作為人質。」

從該文，可以感受到曾受日本長期殖民壓迫的台灣作家，對這件事情所發出的深沉的中國民族情感性的怒吼。

然而，這事件卻沒有因為中國、台灣人民的譴責抗議而有所改變，居然朝向更惡劣方向進展；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實際由佔領日本的美軍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出了極不公平的判決；宣判槍殺台胞的日警無罪，而被拘捕的台胞卻被判二到三年的苦刑，刑滿後驅逐出境。

上海《文匯報》為此事第二度發表了義正詞嚴的社論〈再談澁谷事件〉，直指這事件的判決是：

「對於中國，對於中國人民，是侮辱之上又加上侮辱。」

「美國政府為了袒護日本，並不惜忽視中國的正常權益……侮辱中國。」

該社論進一步質疑，美國以及美國豢養的戰後日本，為什麼會如此侮辱中國人民呢？它指出那是因為：

「政府要乞援美國，以進行內戰，國內戰亂，始終沒有實現一個和平民主的安定局面。」

社論最後進一步舉出，不只在日本，在東南亞各地的華僑也因為同樣「國內戰亂，沒有和平民主的安定局面」的原因，受到各國的欺侮和不平等的待遇。

滬谷事件，不但造成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民族屈辱感，同時也激起了人民的覺醒；認清到美國以及美國扶植的日本繼續把中國人民踩在腳下的真面目，更看出了問題的根本所在，是因為依賴美國的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只知打內戰。

而直接受害的，是在一年多前才剛脫離日本五十年殖民壓迫的台灣人民。因此更使台灣民眾怒火高漲，而在十二月二十日，由各校學生自治會和「政治建設協會」發動了五千人參加的大演講集會，並到美國領事館示威抗議。這是台灣光復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街頭遊行。

接著，在五天後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北平天津發生了二起的美軍暴行事件，其一為北大女生沈崇

遭美軍強姦案；這事件馬上引起了全國各地反對美軍暴行的大示威。在呈燎原之勢的抗議活動中，十二月三十日的《文匯報》社論〈我們沉痛抗議〉嚴厲地指出：

「他們是否把中國看成是他們的殖民地，把中國人民看成是他們侮辱的奴隸？」

在全國反美軍暴行、反內戰、要民主的怒潮中，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灣也爆發了抗議美軍暴行的遊行。《文匯報》（一月十七日）的報導形容這遊行像「台北一條鐵流」，學生、工人、公務員萬餘人參加，到處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而當時台北市的人口還不足三十萬人。

由此可知，光復後，國民黨政府統治下日愈惡化的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情況所激起的怨憤，已與全中國反蔣民主民族運動匯合在一起。

不管是澁谷事件或是美軍暴行事件，都反映了戰後西太平洋國際局勢的新變化，以及中國動盪不安的局勢。《文匯報》社論〈煙雨太平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集中地指出了前者的特徵，它說：

「這次戰爭，如果說太平洋的國際形勢上起決定性的變化，那麼第一就在美國代替日本，掌握了這個橫貫東西半球的太平洋……她一面控制了日本，而在另一方面比日本當年更有力、更周密地控制了中國的經濟、政治甚至一切。……戰後中國並未自主，並未民主，並未因勝利而強大，中國至今僅僅只換了一個控制者，從前是日本，現在是美國。」

社論一語道出了戰後中國再度陷入了美國控制的局面。這就是為什麼看戰後台灣歷史的時候，不只要看到中國，更要看到她背後的美國的道理所在。

而國內呢？國民黨政府在「內戰第一，反共優先」的最高政策下，在全國（包括台灣）加緊抽丁、徵糧、徵捐打內戰，使原本蕭條的經濟雪上加霜，民不聊生；再加上帶著封建性的官僚主義，貪污、腐敗橫行，獨裁無能當道，這更加劇了人民反抗的怒火。

五、歡迎「憲政」與要求「民主化」

進入了一九四七年，中國的政局與社會經濟狀況急速的惡化。它表現在三方面；首先，是國府在去年十二月，不顧共產黨與民盟的強烈反對，強行召開了「國民代表大會」，並通過了以「五五憲草」為本的《憲法》；並於一九四七年元旦公佈《憲法》，宣布於年底「行憲」。這個作為，完全

違背了去年一月舉行的包括國共兩黨的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的共識，使中國政局急速朝向分裂、對立、內戰的方向進行。人們嗅到了國共內戰已不可避免的煙硝味，國統區的市民、商人、文化人、知識青年，從抗戰勝利以來一直對國家「和平、民主、團結」的熱望瀕臨破滅。其次是，一月八日馬歇爾離華，月底美軍撤離「軍調處」，美國務院宣布退出軍調處，一年來美國與國共雙方調停內戰的努力完全失敗，國共內戰的激化已不可避免。雖然南京國民黨政府表面上不斷釋出有誠意恢復國共和談的消息，並提出和平方案由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奔走兩方，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無法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回到去年年初政治協商會議共識原點的條件，和談終告破裂。第三，隨著國共和談破裂，人心不安甚至絕望，再加上國民黨政府為遂行內戰軍費大幅增加，財政快速惡化，並大量印發鈔票，貨幣發行量數以百倍遽增，從去年年底起便開始發生通貨膨脹現象，物價步步高升。終於從舊曆年初開始，以上海為中心發生了搶購黃金美金風潮，物價呈現一日數市，並以數十倍的速度飛漲，引起經濟風暴。

剛復歸祖國一年的台灣，當然也受到這三大變局深刻的影響；只不過初回歸祖國的台灣，因為特殊的社會歷史，而有其不同於大陸的特殊反應。

一九四七年元旦，南京國府公佈《憲法》並宣稱將進入「憲政時期」的消息傳來。台灣社會輿論，特別是政治界、文化界、知識界，都大表歡迎欣喜萬分；各報刊廣告頁，每天都擠滿了由官方機關、

民間團體具名的「慶賀憲政」之類的祝詞，這個慶祝憲政的熱潮一直延續了一個月之久。即便到了報紙上開始出現斗大的「物價飛漲」、「米荒」等字體標題，這些慶祝憲政的廣告仍然並列著，呈現了一種怪異的氣氛。這種現象與大陸各地，特別是上海的民眾對「行憲」的冷淡態度有很大的不同；這是因為大陸民眾直接經歷了國民黨政府的長期統治，並親身感受到政局的動盪，「行憲」與否對他們而言，已是遙遠不重要的事；大家憂心的是國共內戰的戰火，以及每分每秒承受的通貨膨脹，毫無展望的生計前途。而台灣民眾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大多數人對中國的革命歷史和政局並不了解，雖然台灣現況也已經逐日惡化，省籍摩擦也日日升高，但仍保有一份純潔的民族感情和對民主憲政的熱望，仍然奉南京國府為正朔。再有，由於台海遙隔，以及特殊化的長官公署體制，台灣民眾直接面對的是省長官公署的統治，南京的中央政府卻是「天高皇帝遠」。

光復以來，一元集權的長官公署，不但全面接收掌控了原來的殖民政府機關，還增設了如貿易局等的經濟統制機構；而且與國府中央的資源委員會共同全盤接收了龐大的日資日產，完全漠視在地台灣人的權益。再加上，各機關單位的中高級權位幾乎全部由省外人士擔任，絕大部分的台灣人只能擔任中低級公務員，這對本省人來說，這樣的權力結構與殖民時期無異。這種權和利的省籍分配極端不平等的制度性問題，以及外省人獨占優越地位的人事問題；再加上許多有權力的外省籍公務員、警察貪污腐化、態度傲慢、行為無知不檢的風氣問題；甚至由於社會歷史（台灣五十年殖民歷史和中國

五十年的革命歷史)的差異而生的文化價值差異問題，這層層相因的複雜因素，終至演變表現為省籍隔閡和省籍摩擦。本省人認為外省人有「優越感」，而外省人則認為本省人「排外」、「自大」。

處於這種制度性的省籍不平等關係下的本省人，光復不久就以「民主化」為中心議題，要求改變現況。省參議員、《人民導報》社長王添灯(二二八遭難者)，就不斷著文要求只有「民主化」才能根本解決台灣的政治、經濟和省籍問題。

因此，一九四七年元旦國府宣布將實行「憲政」的消息，大大受到本省人的歡迎。因為該《憲法》的條文內含有資產階級民主的精神，特別是有關地方自治的部分，它比較於台灣一元集權的長官公署體制有相對的進步性，也有符合台灣資產階級要求的地方。因此從元旦起，本省人的政治團體、報紙、輿論以及個別關心政治的文化人、政客、知識人，都紛紛以推行憲政與民主為議題，發表評論、社論，甚至到處舉行演講會、座談會。特別又恰逢公署民政處推出了「台灣省地方自治三年計畫」，計畫台灣三年後才實施自治民選縣市長；這個計畫完全與本省人士主張的立即「行憲」、馬上自治、立刻民選縣市長的熱切民主要求背道而馳；因而進一步把「推行憲政與民主自治」的活動與要求燃燒起來。這個活動與要求一直持續到爆發二二八事件，並如實地反映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三十二條要求中。譬如以《民報》社論為例，一、二月間有關要求實施憲政與民主化的論題，就有：〈慶祝公佈憲法的元日〉、〈大勢的推移〉、〈憲法公佈後應有的作風〉、〈掃除封建作

風〉、〈談談政治人材〉：等。《人民導報》也推出了一系列的「專訪」〈憲法與台灣政治前途——本省社會賢達的觀感〉，專訪了王添灯、陳逢源、杜聰明等人。省參議員聯誼會，也提出要求「速行地方自治」。還有，《民報》與「政治建設協會」也共同舉行了「憲政推行座談會」。當時本人不在台灣的省籍菁英謝南光在《民報》發表了〈民主與建設〉，主張「和平統一」與「民主建設」是今年共同努力的目標。前鋒社與自由報社共同舉辦了廖文毅兄弟的「憲政問題演講會」，當時的廖文毅提出了五大主張：

1. 趕快實施「憲政」
2. 聯省自治
3. 打倒官僚資本
4. 台灣要塞化抵禦外人侵略
5. 以台治台。

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的年底開始轉向主張台灣獨立，但是這時候他還未偏離民族立場，只不過比較傾向地方分權。

台灣信託常務理事陳逢源（一九二六年曾與許乃昌在《民報》上展開一系列「我的中國改革論」的社會論爭），在「憲政與台灣政治之前途」專訪中說：

「從憲法內容看，我中國是落後的國家……我們要真正出發於『民主精神』的發達，若只看現象的產業發達、衛生、治安、教育良好，便指為『模範省』，那是不對的……從前的『德國現象』，可

不是樣樣都很發達，但它是『法西斯式的發達』……」

六、滬台同步的經濟大恐慌

在台灣稻米開始恢復了自足有餘的產量，且製糖製鹽煤炭等開始復工有輸出能力，百業復甦的一九四七年前後，台灣卻發生了經濟恐慌。黃金、物價、米價一起奔漲，「米倉」台灣卻有錢買不到米，沒錢的只有挨餓；靠薪資生活的公務員、公司工廠員工的薪水趕不上物價米價的狂漲。經濟恐慌從根本撼動了原來就脆弱的社會安定，暴露了當時台灣的核心問題，把民眾隱藏的憤怒以極端的形式爆發了出來。飢寒交迫與個人前途的絕望，容易使長期蓄積下來的整個社會的基本矛盾（權力與利益的省籍不平等關係），超越理性的論辯而以極端的感情表現出來。

到了一月底舊曆新年（一月二十二日）過後，米價飛漲的問題便日愈嚴重。《民報》的小方塊「熱言」感嘆道：

去年過年的門聯清一色是：

「家居白日青天下，春在和平博愛中」

而今年的新貼門聯卻是：

「勤口天下無難事，百忍堂中有太和」

這表現了政治的動盪和經濟的窘迫已迫在眼前，台灣光復的欣喜，也已經被現實的困境取代。

年初，國民政府開始在台灣設師管區，準備在台灣徵兵；天花、霍亂等本來早已在台灣絕跡的流行病，又開始有蔓延之勢，在在都顯示了退步與窮困的跡象。

一月三十一日米價已經由原本的一斤十六元漲到廿六元，幾乎漲了一倍。二月一日，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參謀長柯遠芬、以及糧食局長李連春，召集了糧商、大戶、記者，在公署召開抑平米價座談會。李連春認為台灣糧食生產已達自足，今日的米價暴漲，絕非由於糧荒，而係大戶糧商的囤積居奇所致。柯參謀長警告糧商大戶：「要用革命手段，對於不拋售糧食的大糧戶，政府不予保護……」。這種警告立即得到了輿論的支持，贊同柯參謀長的高壓態度，說柯遠芬說得「有聲有色」、「對症下藥」。評論道：

「在殺人的米價、米暴漲的情況下，省署對大地主、糧商囤積行為超越法律的措施，得到人民的贊同。」

二月四日，台北街頭出現了以「台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之名散發的傳單，警告奸商、巨賈、地主、囤戶，應該糶出囤糧，不然將採取有效行動……。

二月十二日的《人民導報》報導，「高雄餓莩倒斃街頭，省垣米糧黑市價格繼續上揚，物價扶搖直上，市民如臨大敵。」

二月十三日，千名民眾遊行到台北市政府前，呼籲從速解決米荒。

二月十四日，陳長官宣布九項「安定管制物價緊急措施」，包括：收回銀行放款收縮通貨、提高台幣法幣匯率、公營事業不准加價、火車票自來水電費減價一成、限制進出口貿易等緊急措施。

二月十五日，由柯遠芬參謀長主持，緊急成立了「糧食調劑委員會」。省署和警備總部當局指派高級人員，於日內分五區出發到各地方，全權處置一切糧食事務，調劑糧食。

二月十六日，國府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要案採取了緊急措施，禁止黃金買賣、禁止外幣流通、人民的國外存款要申報等特別行動。經過中央政府和省公署採取了一連串的強力措施，才稍稍抑止了

米價和物價無止境的狂漲。

但是，這波經濟恐慌，已經把許多原本就處於社會邊緣的民眾（失業員工、原台籍日本兵，剛由省外回來的台胞、學生，以及大赦出獄罪犯等），推到無宿日之糧的地獄，逼到走上街頭。這些民眾帶著憤恨的拳頭，遇到被認為等於是統治者的外省人便打。

為什麼有餘糧的台灣會米價狂漲，買不到米呢？大多數人都認為是糧商、大戶、奸商「囤積居奇」所致，因此都主張以阻止商人囤積居奇的手段或以平糶的方式抑制米價。實際上，商人囤積居奇是表象，是果不是因，不是根本原因；真正的根本問題在人民普遍對幣值的不信任，有了這種心理才會預期物資漲價而集體走上競買商品的風潮。而造成這種心理的形成其原因又有二個層次：有台灣本地的特殊原因（如財政收支不平衡、銀行放款擴張、通貨發行量大增等）；另一根源還是來自中國大陸以上海為中心的黃金風潮所引爆的經濟恐慌的波及。由於國共內戰已不可避免，為了內戰軍費而大量增發法幣，導致民眾對法幣信心崩潰；大家競買黃金、外幣、囤積商品保值或投機，致使通貨大膨脹。而上海的經濟恐慌，進一步透過國府中央與省署之間的特殊經濟關係，法幣與台幣的匯率，以及民間台滬經貿往來，迅速波及台灣；再經過台灣本身經濟失衡的增幅作用，就造成了台灣的經濟恐慌。

省署為了抑制通貨、米價上漲所採取的經濟統制措施，雖然抑制了經濟風暴，卻加大了與民間企

業的矛盾，如管制進出口，管制銀行放款：等。這等於是擴大了壓迫面，加深了民怨，終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七、百病齊發的春天

從當時上海的《文匯報》和香港的《華商報》我們可以看到，已逐漸成為「國統區」的台灣島，雖然是二月的春天，卻已百病齊發。

在〈祖國啊！祖國〉（《文匯報》，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一文，作者嘆道：

「我們收復台灣一年，也失去了人心大半。」

該文結語指出：

「只有祖國的民主進步的勝利，台灣才不致再是無『光』未『復』的『光復』，而是自由幸福的澈底解放。」

〈台灣歸來〉（《文匯報》，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一文，是記者揚風於二月二十八日寫於上海的報導，該文刊出時已是二二八爆發數日後。該文可說是二二八發生前夕有關台灣真象的第一手報導，他描寫道：

「國內經濟浪潮，帶給台灣米荒和飢餓。」

「台灣徵實的米全部都運到蘇北和華北充軍糧，米倉空了，自然會鬧飢餓米荒，這飢餓是整個國家的經濟浪潮帶給台灣的。」

文中也報導了二月中發生的「日產房屋標售風波」，這風波激起了台灣城市占有日產房屋的眾多中產民眾與陳儀政府之間的嚴重對立。該文預言道：

「這積壓在台灣民眾心裏深沉的恨，會像火山一樣的爆發，到那時，將弄得整個的周圍難以收拾。」

果如其言，當作者揚風正在上海寫下這句話時，遙遠的台灣已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而當時的大陸呢？

在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的隔天，三月一日的《華商報》社論〈抗議氾濫全國的暴行〉，一開頭便說：

「今年二月，真是天下開始大亂的月份。」

該社論在羅列了二月份大陸發生的各種抗爭與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事件後，大聲指責道：

「真正非把全國人民都逼死殺死不可嗎？……一年以來，政府口講『和平』，卻在全國打內戰，口講『民主自由』，卻在全國打人殺人捕人。」

接著，上海的國民黨特務在三月封閉了《民萃》雜誌並逮捕了負責人；五月又封閉了《文匯

報》，完全扼殺了民主報刊。自此，國統區已失去了言論自由。

同在二月二十八日台灣島上發生「二二八事件」那天，國民黨政府下令駐在南京、上海、重慶的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國統區，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為非法的政黨。針對這件嚴重的事，《華商報》社論〈半個中國黑暗了〉批評道：

「國民黨一口氣吞滅了，被視作和平民主希望的燈塔……正式宣告今後的政策是反共、內戰、反人民、獨裁……國民黨統治區現在完全是一片黑暗了。」

「國民黨當局對全國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獨立的人民團體，將實行大搜捕、大屠殺。事實上，這種搜捕和殺戮早已經開始了！」

這句話，不幸言中。當時，國民黨當局正在對台灣要求民主自治的運動，進行著「大搜捕、大屠殺」。

可見得，台灣發生二二八的那個月，全中國也進入了「天下開始大亂的月份」。就如前輩作家、評論家王白淵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新新》雜誌上的一篇短文〈給青年諸君〉所指出的：

「台灣現在處於中國的一隅……台灣的現實就是中國的縮影，中國的一斷面。」

就在百病齊發的春天，大陸的黃金狂潮迅即波及台灣；大陸經濟的狂亂，馬上引起了台灣的金融恐慌，引起了米荒，物價一夕數漲；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橫掃一切，造成了人心恐慌，民眾被逼迫得無以為生，只有起而反抗。

一聲的槍響，使台灣人民都站出來了！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五日完稿

原文發表於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主辦，「海峽兩岸『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十四】

談「查緝私煙」的社會實相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

大家都知道，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乃起因於查緝私煙案件。但很少人去究明為什麼查緝私煙會引爆那麼大的事件；在當時，查緝私煙的政治經濟本質是什麼？而它的實際狀況又如何？

查緝私煙是屬於「台灣省專賣局」的工作之一。專賣制度乃沿襲日本殖民政府的特殊經濟制度；日據時期的專賣物品包括鴉片、鹽、樟腦、火柴、汽油、度量衡器、煙、酒、酒精等九大商品。光復後，長官公署沿用此專賣制度，但只把火柴、煙草、酒、樟腦、度量衡五大商品列為專賣局壟斷。專賣制度實際上就是政府壟斷特殊經濟商品，特別是民生必需品的制度；其主要目的，在維持政府財政的收入。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專賣局營業收入佔總督府財政收入的35%以上；光復後百業蕭條，公署財政困難，專賣制度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更高達50%，佔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因此，專賣局的營收直接關係著省公署財政的死活。

光復後，台灣原有的殖民地經濟完全崩潰；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重建民族經濟就是恢復兩岸貿易；特別是台灣與上海之間的貿易更是其重心，滬台貿易愈見繁榮。台灣的專賣制度就形成了台滬之間煙酒的特殊價格差距，從上海走私香煙進台灣販賣利潤大，好賺錢。再加上，戰後物美價廉的美國商品大量傾銷中國，廉美的美國香煙就從上海以私煙的形式大量流入台灣。當時台灣失業嚴重，許多

婦孺老弱得依靠在街頭販賣這些私煙補貼生計，即使專賣局火力查緝，但為了生存生計，社會弱者仍必須鋌而走險。

為了維持穩定的財政收入，查緝走私專賣商品成為專賣局，也是省公署的重大工作之一，也成了省公署與社會弱者之間的尖銳矛盾。於是公署便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在專賣局中成立了「查緝室」，組織查緝隊（經濟警察），並定有「查緝人員服務規則」；查緝人員配有查緝證，隨時可出示證件查緝，如有「線報」，可請當地軍、警、憲、海關派員協助。但是，由於戰後混亂期，政府弊端叢生，作偽作假濫用權力，貪污舞弊情形嚴重。原本為了維持財政收入為目的的「查緝私煙」，經常變質為軍警欺壓社會弱小者，斷絕百姓生計的戲碼。經常在街頭巷尾上演的這種悲劇，每一幕的查緝行動，在社會百姓眼中，都令人咬牙切齒憤恨不已。

查緝私煙工作，經常與靠販賣私煙的民眾發生摩擦；如五月二十四日台北市就發生一起，沒有佩戴緝私證數人，沒收店舖和街頭小販的私煙且未開收據的情況。六月五日，台中發生了查緝隊拘捕民眾並予私刑的事件。

隨著景氣不斷惡化，查緝私煙工作與民眾之間的衝突便日愈升高。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基隆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會議進行中，突聞民眾騷動群呼聲，原來是今晨旭町發生了緝煙衝突，查緝員取締時開槍誤傷了民眾。實際情況是，查緝員沒收私煙時，有人喊叫專賣局押收私煙後私自賣出，以

致私煙小販群集查緝隊汽車邊，緝私員對空鳴四槍，一槍不幸擊中十一歲小孩林國連的右腳。

接著，在十二月十三日，有一批查緝員，在中山路大正路市場邊裝著要買私煙，誘捕賣私煙女子：當查緝員要沒收私煙時，女子拚命緊抱私煙在懷裡不放，一面流淚一面說道：「林先生、王先生，我死不要緊，香煙不可押收去，否則我要走去死在你家裡，我啊做鬼也一定要把你提去」。她被捕後好像失了常態，在分局狂哭了一個多鐘頭，終於被查緝員沒收了六條香煙，時價三千元。當查緝員上車要回去時，她瘋狂地追來，查緝員從車內開了三槍揚長而去。旁觀民眾說：他媽的，小小事情就開槍。對此開槍事件，一般民眾都很憤慨。

十二月十二日《民報》「熱言」欄對這問題嚴厲批評說：

專賣局為禁絕私煙，特置查緝員，取締攤販，由專賣性質上說，似或無可厚非。

今寬於檢查進口，而嚴於緝拿攤販，是不是本末顛倒的措施？

攤販有幾個不是失業的窮人，他們的全家財投資在私煙，甚至有起債的。

一旦被抓住，私煙遭沒收，有時要受毆打，一樣同胞也有這般苦命的人。

甚至有武裝帶槍，如臨大敵，對付這些世間最弱者，何必如此做作呢？

像小說情節的專賣局帶槍查緝為生計而販賣私煙的弱小者的衝突事件，並非特殊的例子，而是經常發生的事。因此有位作家楊思謙，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寫了短篇小說〈阿貴的悲哀〉，發表在《人民導報》的「人民副刊」上；其主題和情節都與前述的緝煙事件相類似，都是弱者的悲哀。另外，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的《新新》月刊上，也刊登了作家「踏影」的散文〈賣煙記〉；該文記道：

「失業，台灣現正釀久了這一大群生活苦聲，賣煙原來是由這裏產生出來的，所以路巷所見的其他們簡直使人家難免不深切地想到那麼暗慘的民生現實啦。失學的小孩們，靠著賣煙，扶養著他們的一家貧苦的世界。」

散文的結尾，提到了第一屆台灣省美術展金潤作的入選作品「賣煙」，該畫作所表現出來的是：

「描寫了兩個少年排著小小的煙攤，一個大概是為疲倦吧，白天底下，一向在貪著睡覺，他一個

站著好像等客的樣子，可是他的臉上有了好像含點怒氣或好像嗟怨什麼的表情，如實地表現出灰色的憂鬱，啊，賣煙，你們的憂鬱確實是個民生主題啦。」

同樣是二月的最後一天，每天都會發生的查緝私煙的行動，竟然引爆了二·二八事件。「賣煙」畫作中表現的少年的憂鬱，終於爆發成群眾的憤怒。二·二八事件進行中，有一位大陸來台的木刻家黃榮燦，偷偷刻下了一幅「恐怖的檢查」，這幅畫刻下了查緝隊正強行押收一位背著孩子的賣煙婦女的私煙，場面充滿了驚駭憤怒與恐怖。

原文發表於《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〇〇七年春季號）

【十五】

為了前進的紀念

《新二二八史像》序文

從上世紀的八〇年代起，隨著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展，政治禁忌和歷史禁區不斷受到挑戰和衝撞；其中，對於深深影響戰後台灣社會走向的「二二八事件」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這兩大歷史事件，其真相的解明和追究，可以說直接挑戰了當時國民黨政權統治的正當性；其本身就曾經是「民主化」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經過許多人的努力發掘、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逐漸為世人所知；特別在一九九一年，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正式成立了「二二八研究小組」，由官方主動推動歷史文件的解密和研究後，二二八研究遂成了「顯學」。然而，整個九〇年代，以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為職志的政治力量，取代了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而成為台灣政治的主流後，在這政治勢力急速膨脹的過程，「二二八事件」更加脫離了它原本屬於「歷史課題」的範圍，而成為宣揚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熱門議題」，不斷地被人為地政治地建構成「外來政權∥國民黨政權∥外省人∥中國人」鎮壓台灣人的論述。它不斷說二二八就是省籍衝突、中國人打台灣人的事件，以激起省籍矛盾，呼喚台灣人的歷史悲情，強化所謂「台灣人意識」。因此，炒作二二八事件便成了最廉價且無往不利的政治手段。政權輪替後，二月二十八日取代了原來十月二十五日的「光復節」成為「國定假日」——成了所謂的

「台灣國殤日」。

由於今日二二八歷史真相的追究，大多由追求「新而獨立國家」的政治黨派或其文化人所主導，因此有被導向「孤島式」研究的隱憂。從史料的蒐集、文件解密、人物證言到論述，絕大部分局限在島內的小範圍；或者只把精力、焦點放在國民黨政府如何進行鎮壓行動的枝微細節，而完全看不到事件與當時的整個世界潮流或全中國局勢的關連。這種看不到台灣島以外的歷史世界，看不到事件的「前因與後果」的二二八研究，當然會一直停留在像犯罪事實的刑事調查層次，而很難上升到「歷史研究」的範疇。

然而，歷史決不是孤立的，而是整體的連續的，有前後左右關係。只要摒除迄今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把二二八事件放回歷史現場來考察，就不難看出迄今二二八研究和論述的偏向及其問題所在。首先，它缺乏把事件與前後歷史關係的研究；特別是它與日據歷史關係的研究，在脫離了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後不到二年所發生的這事件，到底與日本殖民的遺害有什麼關係？這是很重要但少人研究的課題。還有，事件被鎮壓下去之後，狂風暴雨般的反抗力量哪裏去了？它絕不可能就此消失，在表面的平靜下，反抗到底轉化為怎樣的形式？有什麼新發展？也就是事件後，台灣人民的新出路是什麼？

其次，就是缺少了二二八與當時全中國的動盪局勢的關係的視野。道理很簡單，因為當時台灣已

復歸中國近一年半，是國民黨政權統治下（中央政府在南京）的中國一省，二二八事件當然是中國現代史的一章，且是一個激動的篇章；它處於當時全中國各地紛亂的歷史脈絡之中。因此，二二八事件是無法與當時全中國的動盪局勢切割、孤立起來看的，只有把它放回全中國的同時代史去考察，才能更客觀地掌握二二八的實像。

一、「二二八」與當時全中國的動盪局勢

抗戰「慘勝」後的中國，在被戰火蹂躪過的殘破大地上，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結構依舊，獨裁腐敗的官僚政治仍在；唯一不同的是，美國取代了日本獨占中國的利益。慘勝後的一點歡樂和平的希望，很快地被國共對立、內戰的現實所破滅。這使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國民眾要求和平、民主統一的願望和力量，與內戰第一、獨裁腐敗、依靠美國的國民黨政府之間，形成了激烈的對立、抗爭。可以說，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一樣，在戰後世界的經濟衰敝、復原混亂、失業的生活困境中，面臨著國民黨政府「接收」大員的貪污和「劫收」，以及為了遂行內戰的徵糧、徵捐、徵兵的壓榨，同時處於同樣的大政治經濟結構中。就如當時台中的《和平日報》上刊出的，大陸來台作家王思翔先生所寫的〈我看台灣〉所指出的：

「但『中國的問題』又是什麼問題呢？表現於台灣的，是封建體制面對帝國主義殖民地台灣的無能、顛覆與腐敗，這個『整個』的體制在『整個的』中國，收復區和後方所表現的接收的悲喜劇，是全面的，所表現於政治的混亂和經濟的瓦解也是全面的，而且十分的徹底。這種情勢，決不是台灣所能倖免的。」

在這樣的情勢下，全中國各地到處爆發反蔣反獨裁爭民主的抗爭事件以及國民黨政府的鎮壓事件。譬如，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的同时，香港《華商報》〈抗議泛濫全國的暴行〉的社論，嚴厲批評了國民黨政府到處用暴力鎮壓頻發的抗爭事件；它一開頭便如此說道：

「今年二月，真是天下開始大亂的月份，從『二·五』到『二·九』，重慶上海連續發生特務暴徒毆打愛國學生和愛國職工的暴行，二月十日以上海為中心，發生全國金融的大風潮，二月十八日夜開始，北平軍警舉行大搜捕，到前天（二十七日）止，已經逮捕了兩千以上的北平市民了，其中包括學生、教授、學者、書畫家、耆紳與一般和平居民。……真正非把全國人民都逼死殺死不可嗎？」

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期間，上海《文匯報》一篇題為〈邊疆政治的嚴重危機〉的社論指出：與台灣一樣，新疆、內蒙古、康藏都同時發生了嚴重的騷動事件，危機四伏，因此，「只有立刻停止內戰，實行民主化」才能解決問題。由此可知，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並非台灣獨有的，是當時全中國動盪局勢的一部分；而其根源在國民黨政府的內戰與獨裁。如果把眼光再放大大一點，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九四八年韓國（當時稱朝鮮）更發生了「濟州四·三」大慘案，死者高達三萬人；日本也發生了大罷工，民眾三餐無以為繼；而越南人民正拿起武器對抗法國殖民政府，追求民族的獨立解放。

二二八民變爆發當時，以及其後的蔣軍武力鎮壓，接著進行綏靖、清鄉的肅清行動期間，整個台灣完全籠罩在恐怖氣氛中，完全處於音訊斷絕的孤島狀態。不但敢言的報刊被禁，平日勇於批評時政的民主人士也被關、被殺、逃的逃、噤默的噤默，人民的聲音完全被滅殺；在台灣島內有關事件的報導、評論是完全不可能的，只剩下清一色官方的說辭和宣傳。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當時同處於蔣介石政府的高壓統治下，同樣反蔣反獨裁要求民主、和平、自主的大陸文化界、輿論界，一同站在台灣人立場在報刊雜誌上大量報導、評論二二八事件，熱烈聲援了二二八的行動；這是唯一的最感人，最真實可靠的歷史證言。更有甚者，從事件爆發一直到七〇年代的近三十年間，二二八民變也一直是台灣島內的政治禁忌，更不要說公正的評論報導了。只有香港和大陸，幾乎每年都舉行二二八的紀念會。

可惜的是、可悲的是，在今天台灣堆積如山的二二八史料或論述中，居然看不到這部分的歷史證言。使得有關二二八的歷史論述一直局限於如前面所說的「孤島式」的情況。不但無法完全還原歷史真相，更由於現實政治力的推波助瀾，二二八事件被無限上綱成國民黨外來政權（「外省人」中國人）武力鎮壓台灣人民的事件，被扭曲成「族群矛盾」事件，甚至被極端建構成「民族矛盾」（中國人對台灣人）的事件。不斷被渲染的這種歷史觀點，也就不斷複製、擴大台灣島內部的紛擾裂痕和與中國大陸的對立局面，使台灣永無和平安寧之日。

為了打破這種有害無益的「自我複製」的歷史虛像，作者在研究光復後五年史的工作中，蒐集了大量當時大陸、香港報刊上有關二二八的珍貴文章，編集成這本書，希望讓史料說話，把事件還原到歷史現場，冀望提供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視野走出「孤島」的歷史意識。

本書分為三輯。第一輯〈血紅的愛〉，收錄了至今不為人知的事件前後創作的文學作品。有許多詩、小說和報導文學，它以文學的真實記錄了二二八。第二輯〈祖國啊！祖國〉，包括有二二八前夕台灣情勢的報導，二二八民變中的報導，以及大陸各報聲援二二八的社論；更有二二八後的台灣實情報導，以及謝雪紅等領導台灣民變的民主人士在大陸、香港總結二二八繼承二二八精神，繼續奮鬥的珍貴文章史料；本輯為了更全面地呈現二二八當時全中國的動盪局面，也選編了大陸各報代表性的有關時局的社論。第三輯〈為了前進的紀念〉，主要選編了二二八民變一週年以及二週年，在香港的紀

念特輯和文章；參加紀念的作者包括有，在香港成立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重要成員如蘇新、楊克煌、李純青等人，以及許多中國著民的民主黨派人士如郭沫若、鄧初民……等。

二、「二二八」前後的文學創作

到今天為止已出土的二二八史料中，已知的文藝作品並不多。只有不久前由日本學者橫地剛先生完全出土解明的大陸來台木刻家黃榮燦的木刻畫「恐怖的檢查」（人間出版社出版《南天之虹》），以及大陸來台劇作家陳大禹在二二八後不久編寫上演的「香蕉香」（可惜原劇本已佚失）。至於文學作品，則有大陸名詩人臧克家先生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在上海發表的短詩〈表現——有感於台灣二二八事變〉；這首詩在數年前已為人知，但卻少有人提及。本書把它放在最前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對臧先生為代表的許許多多當時大陸進步的文化界人士以熱烈的同胞愛和正義感，為二二八受難的台灣人民說話，表達敬意；另一方面，臧先生的這首詩和黃榮燦的木刻畫，可以說是當時以藝術形式為台灣人民表現和控訴二二八的創作中，最高水準的作品。同時，本書也得到作家陳映真先生的慨允，把他最近拜訪了高齡的臧克家先生後所寫的一篇感人的文章〈母親的叮嚀〉，作為本書的序言。

但是，如此激烈而全面的「民變」，在文學的表現上絕不可能只有一首詩一幅畫。經編者數年來研究、蒐集，終於出土了許多二二八前後創作的文學作品；當然，在當時，這些有強烈控訴性的二二八文學作品，是不可能出現在台灣的報刊上的，它們都刊載在大陸、香港的報刊上。

〈台灣，美麗的島啊！〉是寫於二二八後的一九四九年，分二天刊載在報紙上的長詩。從詩的內容來看，作者好像是曾經歷二二八的外省籍作家。這首詩除了反映二二八之外，也表現了二二八後台灣的反蔣民主自治運動在一九四九年的新發展；當時的國共內戰進展，人民解放軍基本上已取得了勝利的局面，因此，該詩呼喚「台灣人民與阿山人民共同起來，打倒蔣介石國民黨」。

在二二八前後的動盪時代中，台灣民間（當然，大陸也一樣）產生了許多諷刺時局的歌謠。本書選刊了有代表性的二首。實際上，當時的大陸和台灣，以民間歌謠形式的諷刺詩是文學創作的主要形式，譬如當時大陸最有名的文學作品就是袁水拍的《馬凡陀山歌》，由於它的大眾性和戰鬥性，使民眾「喜聞樂見」，反映了民心，也揭露了時代的真相。

〈台灣島上血和恨〉是迄今發現唯一的以二二八為主題的小說；它發表於事件後的二個月，字裡行間仍透著未消的恨未乾的血；從內容、情節，以及文字並不很順暢這點來看，應該是參加了二二八的台灣青年所作。

大陸知名作家、編輯家范泉先生與臧克家先生一樣，在事件發生後一星期之內，便在上海出版了《記台灣的憤怒》這本報導文學作品。因為他長期關心台灣、研究台灣文化，並且有許多的台灣友人，台灣光復後，他成了台灣與上海之間文化交流的中心人物；因此，台灣爆發了二二八民變後，他馬上連夜趕寫出版了這本小冊子，嚴厲批判了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的作風，為台灣人民說話。

〈台灣的真相〉一文，在八〇年代曾重刊在美國出版的《台灣與世界》雜誌，戴國輝先生也曾為此文做了批註。由於它對二二八前後的台灣有詳實入扣的報導，至今仍有極大的參考價值。還有，由於該文是在二二八後不久，刊登在被上海國民黨特務禁刊後仍秘密發行的《文萃》雜誌上，對當時大陸的反蔣民主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故本書把它全文重刊。

〈台灣之春——孤島一月記〉是《文匯報》在台記者以日記方式寫下的親身經歷的二二八。由於作者是來自大陸的記者，對國民黨政府的本質、作風有深刻的了解，對全中國的局勢也有全面的認識，故對事件的觀察和評述深刻感人。他以充滿感性的、無做作的日記方式，記錄了二二八後一個月間每一天的變化。充分反映了一個同樣反蔣追求民主且站在台灣人民立場的外省知識分子，親身經歷二二八的觀感。讀此文，有助於從更廣闊的視角看二二八。

三、美國支配、中國內戰與二二八前夕的二大抗爭事件

從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起，戰後世界和平的展望逐漸黯淡，美蘇的對立和衝突成了世界的新問題。在東亞，美國以其唯一勝者的超強實力取代了原日本的支配地位，不但獨占了日本的利益，也在背後控制中國的局勢，介入朝鮮半島。在中國，以美國為靠山的國民黨政府，悍然撕毀了各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再開內戰。戰後全國民眾對和平、民主、建設的期望徹底破滅了；再加上經濟破敗、接收復原的混亂，全中國陷入了內戰、獨裁腐敗勢力和反內戰、爭和平要民主、要統一的力量之

間的對立和抗爭局面。

光復後的台灣，自不能例外。

二二八事件的前半年，有二大事件引發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屈辱與憤怒，爆發了街頭抗議示威；一是「澁谷事件」，另一是美軍強暴北大女生案。兩事件都起因於美國和日本對台灣同胞、中國人民的暴行和侮辱，激起了全民族的憤怒。在台灣，連續爆發的這兩次的大規模街頭遊行、抗議澁谷事件和美軍暴行，可說是二個月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的前聲。

四、百病齊發的二二八前夕

本書第二輯選選編了當時的《文匯報》在二二八前夕有關台灣的報導。因為當時台灣的言論自由已受到很大的限制，台灣的報刊要真實地報導嚴正地評論時局幾乎已不可能，只有上海的《文匯報》的報導能提供一個比較客觀的參考。由這些報導，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台灣實像。

在〈祖國啊！祖國〉一文，作者嘆道：「我們收復台灣一年，也失去了人心大半」，該文結語指出：「只有祖國的民主進步的勝利，台灣才不致再是無『光』末『復』的『光復』，而是自由幸福的徹底解放。」

〈台灣歸來〉一文，是記者揚風於二月二十八日寫於上海的報導，該文刊出時已是二二八爆發數

日後了。該文可說是二二八發生前夕有關台灣真相的第一手報導，他描寫道：

「國內經濟浪潮，帶給台灣米荒和飢餓。」

「台灣徵實的米全部都運到蘇北和華北充軍糧，米倉空了，自然會鬧飢餓米荒，這飢餓是整個國家的經濟浪潮帶給台灣的，也是內戰帶給台灣的。」

文中也報導了二月中發生的日產房屋標售風波，這風波激起了台灣城市中占有日產房屋的眾多中產民眾與陳儀政府之間的嚴重對立。該文預言道：

「這積壓在台灣民眾心裏深沉的恨，會像火山一樣的爆發，到那時，將弄得整個的周圍難以收拾。」

果如其言，作者揚風正在上海寫下這句話時，遙遠的台灣已爆發了二二八。

而當時的大陸呢？

在台灣二二八爆發的隔天，三月一日的《華商報》社論〈抗議泛濫全國的暴行〉，一開頭便說：

「今年二月，真是天下開始大亂的月份」，該社論在羅列了二月份發生的各種抗爭與鎮壓事件後，大聲指責道：「真正非把全國人民都逼死殺死不可嗎？……一年以來，政府口講『和平』，卻在全國打內戰；口講『民主自由』，卻在全國打人殺人捕人。」

接著，國民黨特務在三月封閉了《民萃》雜誌並逮捕負責人，五月又封閉了《文匯報》，完全扼殺了民主報刊，自此，國統區已完全先去了言論自由。

也同是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國民黨政府下令駐在南京、上海、重慶的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國統區，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為非法的政黨；針對這件嚴重的事，《華商報》社論〈半個中國黑暗了〉批評道：

「國民黨一口氣吞滅了，被視作和平民主希望的燈塔……正式宣告今後的政策是反共、內戰、反

人民、獨裁……國民黨統治區現在完全是一片黑暗了。」

「國民黨當局對全國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獨立的人民團體，將實行大搜捕、大屠殺。事實上，這種搜捕和殺戮早已經開始了！」

這句話，就像不幸言中的預言；當時，國民黨當局正在對台灣要求民主自治的運動，進行著「大搜捕、大屠殺」。

可見得，台灣發生二二八的那個月，全中國已進入了「天下開始大亂的月份」。就如前輩作家、評論家王白淵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的《新新》雜誌上的一篇短文〈給青年諸君〉中所指出的：

「台灣現在處於中國的一隅……台灣的現實就是中國的縮影，中國的一斷面。」

同時，大陸的黃金狂潮迅即波及台灣；大陸經濟的狂亂，馬上引起了台灣的金融恐慌。進而引起了米荒，物價一夕數漲，通貨膨脹如脫韁野馬橫掃一切，造成了人心恐慌；民眾被逼迫得無以為主，只有起而反抗。

一聲的槍響，使台灣人民都站出來了！

五、在半個中國已黑暗中，爆發的「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消息很快地傳到了大陸；上海《文匯報》首先在三月二日第一版登出了「台灣發生騷動」的消息，而香港的《華商報》也於同日刊出了「台北暴動」的消息。該報同日同版面的社論就是〈半個中國黑暗了〉。當時的中國，由於國共內戰的全面爆發，已陷入了政治經濟總崩潰，社會千瘡百孔的地步；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而言，如何壓制各方反對力量，進行全國總動員，加緊徵兵、徵糧、抽稅打內戰，是唯一的至上的目標，是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就像前面說過的，當時百病齊發的問題，包括有：與美國、日本有關的澁谷事件、美軍暴行事件到通貨膨脹、黃金風潮、千千萬萬的抗議與鎮壓事件、扼殺言論自由……等等，無一不與「打內戰」有關，其根本原因就是為了「打內戰」。因此，在蔣介石眼中，如何繼續掌控一個安定的內戰「米倉」——台灣，是其最高方針；當然他會不顧一切地用武力去「救平」他認為的台灣「叛亂」事件，這就是蔣派兵鎮壓二二八事件的總的根本原因；這也是蔣介石政權在當時全中國的動盪局勢中的一慣作風。這種統治方式，隨著內戰不斷擴大而更為瘋狂。到了一九五〇年，在大陸內戰中敗退台灣的蔣政權，再度得到美國冷戰的支援後，為了百分之百控制作為「反共、反攻復國」基地的台灣，在島內進行了連根挖除的針對異己的大肅清——「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近萬人被刑殺，數萬人被監禁，這是比「二二八」更大規模的更長期

的恐怖鎮壓。其後更施行了人類史上最久的，長達三十七年的軍事反共戒嚴體制，在台灣社會的心靈的最深處，烙下了一時無法滌清的白色的、反共的印記。今天，以省籍矛盾、族群分化、民族自我仇恨為實質的所謂「本土化政治」，不也都是來自這個白色印烙的轉化嗎？只有以這樣的歷史眼光來看二二八以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降的台灣當代歷史，才能認清歷史以及現實問題的本質。

本書第二輯，選編了十一篇當時大陸各報章有關二二八經過的報導；當然，現在為止在台灣出土的各種公開史料，對事件本身的經過已經有了相當詳細的呈現，這些報導資料可以更進一步提供大家一個回到更開闊的歷史現場去考察問題的角度。同樣地，本輯也收錄了二二八爆發後，從《華商報》最早刊出了〈台灣人民的抗爭〉為題的社論後，一直到四月為止，大陸各主要報紙連續刊出的十篇聲援台灣人民的社論；由此可見「二二八」是當時全中國反蔣民主浪潮中最激烈最突出的部分。「二二八」的二週年，香港《大公報》刊出了題為〈台灣民變二週年〉的社論；該社論在回顧時指出，「二二八」的「深長的意義和價值」在於：

「二二八民變，正是象徵國民黨政權傾覆的開始。」

「事實昭示，國民黨政權，不僅漸漸失去台灣同胞的信心和支持，就是全國大多數人民，也和台

胞一樣，從最初的擁護，開始變成怨望和憤慨了。這是國民黨失盡民心的開始；也就是國民黨政權全面傾覆的開始。所以在二二八事變中，犧牲生命的台胞們，不僅是表達人民怒火的前驅，而且是反抗國民黨極權統治的楷模。」

六、沉悶中的火種——二二八後的台灣

現在為止的二二八研究或論述，雖然有人論及事件「前因」（但是，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遺害與「二二八」的關係卻少有人提），卻沒人談到「後果」；似乎國民黨軍在「救平」了「二二八」、「綏靖、清鄉」後，台灣便一切歸於平靜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樣的。二二八後的反抗仍然繼續著，只不過轉為島內地下黨的方式，或轉往大陸、香港繼續反抗。這是當今「二二八」研究的另一大盲點。當然，今天希望把「二二八」定位為「省籍衝突」、「中國人鎮壓台灣人」這種歷史觀點的政治勢力，也樂見於把「二二八」的研究完全聚焦在如何鎮壓的細節研究，把歷史圖像停格在鎮壓的殘酷場面以及受害的悲情上，最好不要觸及社會結構與時代特徵；不要與中國、世界歷史有關係，更不要把研究延伸到事件後的進一步發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繼續獨占、享有以「二二八」歷史議題來鞏固其現實權益的蜜汁。

實際上，歷史從未間斷，現實的人為的政治力無法永久遮斷歷史的發展軌跡。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本書各處蒐集了可以呈現事件後，抗爭的新變化新發展的史料。

〈台灣的暮春〉，把經過清鄉後的台灣社會真貌，以文學的筆觸報導了出來，他形象地寫道：

「二等車裏，少數的台灣人佻促的沉默的坐著，冷冷地瞧著多數的外省人豪啖大談，如果是年青的台灣人，在無表情的臉上，你可找到冷漠以外的陰森。」

這是一個多麼強烈對比的內心畫面，而且：

「每個人充滿了戒懼，台灣人怕官署的肅清『暴徒』，外省人怕謠傳的『暗殺團』出現。」

另外，表面的世界卻是：

「夾在這『致敬』、『慰勞』中間，是各地『綏靖』、『清鄉』的新聞。」

大多數的民眾是：

「台灣人已自比於被征服者，沒有了自己的報紙，沒有了自己的聲音，冷漠的臉、陰森的表情，接受著政府的『再教育』。」

然而，該文進一步描寫道：

「一個台大學生說『我們相信台灣的革新運動，會更猛烈、更激烈的再來，沉悶裏面有火種……』。」

〈民變後台灣人民的傾向〉文中，把「二二八」後的民眾傾向分為五大類，有「為虎作倀者」，

有「悲觀失望卻逃跑者」，也出現了「托管共管論者」，最後一類是「自治運動的先覺者和執行者」。最後一類就是「沉悶裏有火種」的，二二八後仍然繼續追求反蔣、反獨裁、台灣民主自治的新發展。

刊出了〈台灣의 暮春〉的《文匯報》，也在同月（五月）二十四日遭到了國民黨政府「封閉」的命運。

一九四七年的七月十八日，國民黨政府發布了「戡亂總動員令」，自此，包括台灣、上海在內的國民黨統治區，所有的民主聲音被扼殺，完全進入了黑暗期。國民黨政權準備以美國為靠山掀起一場大內戰，中國只剩下國共兩黨生死激戰的局面；包括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人，不是站在國民黨政權的那一邊，就只有站在反蔣的這一邊。接著，當年的十月二十八日，國民黨政府又宣布了「民盟」為非法團體，更逼使所有的民主黨派和人士完全站到反蔣的這一邊，紛紛逃離「國統區」南下匯集到香港；在一個不是國統區也不是解放區的地方，繼續從事反蔣的民族民主運動。這就是為什麼，「二二八」後離開台灣的鬥士們，都轉移到香港，與大陸的民族民主運動攜手公開奮鬥的原因。

「二二八」後，由魏道明取代陳儀的台灣政治情勢有了怎樣的新變化呢？〈內外煎迫中的台灣〉一文有一針見血的報導，它說：

「儘管『台灣省政府』的改組成立，以示『台灣特殊』的沖淡；儘管魏道明以『開明的自由主義者』的姿態出現，企圖欺騙人民的眼睛，台灣的反動黑暗統治，國民黨獨裁政府對台灣的銖求剝削，是一點都沒有更易，也一點沒有改變。」

文中舉出了許多政治經濟上「黑暗統治」的實例，並指出了這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在「內戰」，它說：

「在一切為了『內戰』，把台灣當作『內戰的倉庫』的原則下，『安定』究竟有多少可能？」

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黑暗的統治」一點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卻有了新的變化，那就是新的外國勢力——美國開始介入了台灣問題，它特別指出：

「魏氏上台不足二月，台灣到處便可看見大腹便便的美國人。」

美國的企業資本進入了台灣，美軍協助擴建基、高兩港；舊日統治過台灣的日本人，包括原總督長谷川清，都在美軍的保護下，秘密回到台灣（同樣署名「楊群」的作者，也在香港《群眾》周刊上發表了一篇台灣通訊，題為〈日本人又來了〉，對這問題有更詳細的報導）；最後，該文清楚地分析了這個動態後面的新事實、新變化，它說：

「這說明美帝國主義竭力要把台灣這塊比較的『乾淨土』，從動盪的中國割裂出來，視為琉球第二，並著意使之成為美帝國主義反蘇的世界基地的一環。」

同樣的看法，也出現在〈民變後台灣人民的傾向〉中，該文說：

「台灣又被反動者出賣了，它將成為美國在這遠東尤其是控制南中國沿海的基地，與菲律賓、沖繩諸島連成一氣……進而可能成為華南反民主反人民的前哨據點，退後亦可成為老蔣的最後堡壘……大批的日人又捲土重來替美國建設軍事基地，替老蔣練兵……。」

不幸地，這篇在「二二八」過後不久的分析報導，相當有遠見的、正確地指出了台灣的新變化——「美蔣共治」台灣的事實。實際上，在這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內戰中敗退台灣，美國引爆「韓戰」後的第三天，便派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使東亞冷戰進入台灣。此後，這個「內戰加上冷戰」的「美蔣共治」體制，便長期地支配了一九五〇年後的台灣歷史。

作者楊群預言到：

「這是半世紀來台灣悲劇的更淒慘的演出。」

七、台灣人民的出路——謝雪紅《告同胞書》

謝雪紅的《告同胞書》，是她在領導「二二八」武裝鬥爭失敗後轉往上海，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所寫的。它先發表在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後轉載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機關刊物《新台灣叢刊》第二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它是實際參加了「二二八」的台灣左翼，在事件後不久所做的第一次政治總結；並在新的形勢中提出了往後奮鬥的目標，對澄清「二二八」的歷史意義有正本清源的作用。這篇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告同胞書》，經過半

個世紀以上多舛的歲月，五十六年來第一次在本書上與台灣人民見面。

首先，該告同胞書對二次戰後的世界做了提綱挈領的描敘；它認為二次戰後，「世界充滿了和平、民主的歡聲……世界上數世紀被壓迫、被榨取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民，到處都在爭取獨立、民主、自治」。然而另一方面，美國帝國主義卻「在世界上到處霸占和建設了無數的軍事基地，另扶植德、意、日，和中國的殘餘法西斯分子」，使「整個世界變成人民與反人民，民主與反民主的兩大陣營」，而「國民黨獨裁政府的延長統治，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壓迫，與對全國人民的進攻根本是一樣的」。謝雪紅在做了這樣的世界與中國的根本形勢分析後，強調台灣的「二二八」民變的基本性質是：

「和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的路線相符合的。」

可見得，實際領導了「二二八」鬥爭的謝雪紅，把「二二八」的根本性質定為「反獨裁爭民主自治」，而不是什麼「反中國人」、「反外省阿山」的鬥爭。

對於這問題，〈新台灣〉一文說得更清楚、更生動，它寫道：

「全省民眾一致起來的二二八民變，已不是反抗異民族的鬥爭，亦不是企圖獨立的革命，而是完全反抗法西斯獨裁的暴政，反對封建官僚的貪污劫奪，反抗蔣軍官兵的殺戮姦淫，反抗徵兵、徵糧、徵捐去內戰，要求和平獨立，要求政治民主，地方自治，要求人民有自由，百姓有飯吃，農民有田耕工人有工作，子女有教育機會的起義。」

接著，謝雪紅在《告同胞書》分析了後陳儀的魏道明政府的本質，她說：

「前者是政學系的舊軍閥，後者是親美的大財閥大買辦的代表，手段雖然有差，但對台灣的壓榨是沒有差異的……亦加緊對台灣人民徵兵、徵糧、徵捐以供養南京，驅逐同胞到祖國來殘殺同胞破壞宗廟。另一方面，魏道明必然要勾結美帝國主義者，甚至可能允許日寇回台灣。」

由此可見，當時謝雪紅十分深刻認識到只要國民黨政府繼續進行內戰的大格局下，必定會加緊對台灣的控制和榨取；同時美國和日本勢力必然進入台灣，形成台灣「美蔣共治」的局面。這觀點，與前面介紹的〈內外煎迫中的台灣〉的觀點是相近的。

她接著用感性的口吻說：

「在這封信上，我很誠懇地和大家把這次起義的成就和失敗的教訓加以檢討」，因為「這對我們今後須要進行的路線有重大的關係。」

這個「今後要進行的路線」就是：

「為著新台灣的建設……要求最澈底的民主自治，反獨裁、反內戰、反對封建的保甲制度，反對連保聯坐，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實施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消滅日本對台灣的野心，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台灣的國際托管，反對任何某一國對台灣有特殊權利。」

這時謝雪紅提出的「今後的路線」，比起「二二八」當時由「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有了更廣闊更全面更根本的內容。她不只要在政治上台灣的高度「民主自治」，也提出了站在台灣的工人農民立場上的要求；特別是提出了當時台灣社會改革的最根本問題——土地改革；更把反

對美日帝國主義、反對國際托管的新問題，作為奮鬥的目標。

這代表了「二二八」後，台灣的「反獨裁爭民主自治」運動進入了新的時期、新的目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來到香港的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籌組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作為推動新路線的組織；它的基本綱領是：「團結本省全體人民，為爭取台灣省自治及影響全中國人民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之奮鬥為目標。」

另一方面，在「半個中國黑暗了」的大背景下，二二八之後，許多台灣青年投入了紅色祖國在台灣的地下黨，獻身反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浪潮。據作家藍博洲的研究，「二二八」之前台灣地下黨員只有七十多人，而「二二八」之後的五月則驟增到二八五人。譬如，作家呂赫若原本是一個活躍的文學家、音樂家、記者，「二二八」之後突然拋棄了原有的社會生活，銷聲匿跡潛入了地下黨，最後喪身台北深山的鹿窟基地。再如著名作家朱點人、劇作家簡國賢等人，也是受到「二二八」的衝擊，對國民黨政府的「白色祖國」澈底的絕望，只有投入全中國的「反獨裁爭民主」的洪流，追求台灣人民的出路。就像〈內外煎迫中的台灣〉一文中的結語所指出的那樣：

「台灣真正的出路，與整個中國的民族民主出路是不可分的，他們正在跟大陸上的民主勢力攜

手，加速獨立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國的誕生。」

在〈十二月的台灣〉，記者報導說：「踏進去年十二月（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台灣完全陷入了黑暗與恐怖，逮捕虐殺無日沒有。」並舉了幾個國民黨特務抓人的例子（包括大陸來台的外省人）。同時，他也報導了在一些公開場所出現了「打倒蔣政權，要求高度自治、反對托管論」的宣傳單；最後他描寫了與一位「懷有這樣堅硬的信心的台灣人」之間的對話：

「他們幾乎以同樣的口氣和用語問我：

『喂，中共有海軍沒有？——』

不等我回答，他們立即回答了自己：

『莫要緊，我們台灣人自己（拍）（按：台灣（拍）即（打）的意思）』。』

八、為了前進的紀念

在香港成立的「台盟」，一方面與大陸的民主黨派攜手共同推進全中國的民族民主運動；另一方面，繼續聯繫團結島內、大陸以及海外的民主力量，追求台灣的高度民主自治。

本書的第三輯，收錄了二二八滿一週年和二週年時，香港各報刊推出的紀念二二八的文章。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出「二二八」在一週年、二週年後的發展。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香港《華商報》推出了〈台灣二月革命週年特輯〉。為這個特輯寫紀念文章的，包括有郭沫若、鄧初民、沈鈞儒等在香港的反蔣民主派人士；也有如方方的中共香港工委會的領導人。他們都一致對「二二八」死難的台灣人民表示無上的敬意，稱「二二八」民變是「七日民主」。同時，他們也都警覺到，因為國民黨政府的反共內戰已居劣勢，已開始將台灣出賣給美國帝國主義，作為國民黨政府最後掙扎和美國侵略中國本土的根據地，「今天的台灣已是美蔣合謀中國最後掙扎的場所」（鄧初民）。因此，郭沫若說：

「我要向台灣同胞和全中國同胞忠告：我們不僅要紀念著流血的『二二八』，還要警惕著天天是不流血的『二二八』（編按：意指用『援華』的字樣，實際上是『美帝的侵略』）。」

民盟領導人章伯鈞說：

「我們現在要號召中國人民一致奮起，和台灣同胞站在一條戰線上，把蔣美的反動勢力完全肅清。」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盟」總部發表《台灣恥政三週年告同胞書》的同時，蘇新以莊嘉農筆名發表了〈台灣的前途〉。他說：

「在解放軍不斷勝利之下，台灣問題已逐漸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問題了。」因為「台灣目前可說是蔣管區中最『安全』的後方。同時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官僚也選擇台灣做為逃避的地方……國內游資亦蜂湧來台……」，同時「美帝也正在台灣陰謀準備開闢自己的道路。」

他預測，在解放軍在大陸打垮蔣政權時，可能有兩種局面發生：

一、台灣可能與全國同時解放。

二、蔣政權垮台時，預先準備退到台灣，同時美帝也出兵台灣，因而台灣的解放可能慢一步。

蘇新正確地指出了國共內戰三大戰役前夕台灣的新變化。此時，台灣已完全籠罩在國共內戰的暴風圈中，而美國在東亞的冷戰布局也正逐漸向台灣推進……。

蘇新更有先見之明，他預見了蔣政權在大陸垮台後，會退據台灣，把台灣當作其「反攻復國」的基地的可能性；也預見了美國將出兵台灣，把台灣當作它在東亞圍堵中國大陸的冷戰前線基地。

然而，出乎蘇新意料之外的是，台灣的「解放」並不只是「慢一步」，而是過了漫長的半個世紀仍未實現。實際上，一九五〇年後，「美蔣體制」把台灣與大陸不但完全隔絕，而且使兩岸仇恨對峙了將近半個世紀，至今仍深刻地左右著兩岸的關係。而「二二八」的歷史，以及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也隨著「美蔣體制」的長期支配而成為台灣社會的禁忌。今日，「美蔣體制」雖已退出了台灣的舞台，但它仍深深占據著囚禁著台灣社會的心靈，使人們無法正視「二二八」歷史的真相，認識它的歷史意義。

九、結語

希望本書二二八的新史料，有助於超越過去長期的「美蔣體制」所造成的兩岸隔絕對峙的社會結

構與社會意識，重新回到歷史的原點。站在更寬闊的歷史視野去認識「二二八」的歷史意義——一個追求台灣高度「民主自治」的新民主運動。從根本上認識歷史問題，如此才能夠真正的跨出迄今只有複製紛爭與對立的二二八紀念，走出歷史陰霾，追求真正的和平。

在此，首先要感謝日本友人橫地剛先生，數年來提供的珍貴史料和意見；沒有他的協助，這本書是不可能這麼快問世的。其次，要感謝青年友人宋文揚幫忙蒐集史料，以及其他有緣提供資料的朋友。還有承蒙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同仁們，在出版中出錢出力，併此致謝！

更要深深感謝妻子麗英數十年來縱容我的「無作為」與「自我」，並從旁協助我，得以在極有限的資源中推出這本書。

摘錄自曾健民編著《新二二八史像》序文（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十六】

《南天之虹》

湮滅和再生的歷史

「在這裡，一個世界落幕，另一個世界誕生」

——畫家魯奧特的「六十四幅『受難』組畫」的旁白

一、懸掛在「二二八紀念館」中的歷史迷霧

走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二樓，可以看見一張巨幅的複製木刻畫，題名是「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從它大尺寸和陳設的位置來看，顯然館方製作者有意突顯它的意義。

畫，是以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黃昏的台北街頭查緝私煙的暴力現場為題材，用新現實主義的木刻藝術高度地表現了「二二八事件」的恐怖瞬間；生動的畫面，似乎仍響徹肅殺的槍聲，以及台灣民眾驚恐、倉皇、憤怒的嚎叫，穿過五十年的歷史時空，強烈地衝擊觀眾的內心。是怎樣的一位藝術家，會在二二八事件的恐怖時刻，冒著生命危險一刀一刀刻下令人震撼的控訴呢？畫作的旁邊

只簡單地寫著創作者的名字「力軍」。然而，「力軍」是誰？並沒有詳細的說明。再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到該幅作品的線條粗糙不夠清晰，顯然不是直接從原版複製出來的，而是經過無數次反覆拷貝流傳出來的影印件；可見得，館方的製作單位也並不清楚該作品的原版流落何方？以及該作品的來歷和創作者的生平。因此，它就像一幅被懸掛起來的台灣戒嚴時期地下流傳的反抗文化一樣，大家只管飢渴地吸吮它的精神或感情的養分，誰都無暇顧及它的作者是誰，來歷如何？然而，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十五年當中，「二二八事件」已得到了政府的平反和補償，也出版了大量的有關「事件」的研究、調查和證言；「事件」真相不但已大白，甚至到了被誇大扭曲，政治「圖騰化」的地步。但是，這幅當時直接見證並控訴了「事件」的唯一藝術作品的來歷及其作者，卻仍處於戒嚴時期的迷霧中，至今未獲紀念館的調查「平反」，卻已被放大作為現實的政治控訴，這可說是一大憾事。

二、另外一面的戰後台灣史

事實上，只要長期關注台灣的「民主化運動」的人，對這幅畫，可能都會有一點印象。它是在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民主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出現在運動中；由於它強烈的控訴內容和主題，正可以作為控訴國民黨政府反民主作風的象徵圖像，因而不斷地在運動中流傳刊布。但是，誰都不知道它從什麼地方來，作者是誰？

直到九十年代，才有研究者解明了該木刻畫的作者「力軍」的本名就是「黃榮燦」，也約略地知

道了他是光復初期從大陸來台的木刻藝術家，是當時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之一；然而，不幸地，他在一九五二年的白色恐怖風暴中仆倒在馬場町的刑場。直到今年，一位日本民間學者橫地剛先生，經過數年的研究調查，才把黃榮燦的生平和作品，包括他的思想和時代完全出土復原，並結集成《南天之虹》一書出版。這才使五十多年來，一直徘徊在台灣海峽上的「黃榮燦」的魂魄得以安息。

事實上，這幅作品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中誕生後，還未來得及和台灣民眾見面，便被湮沒在時代的暴風雨中了。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反共恐怖年代的鎮壓，直到八〇年代初，才又以「作者不詳」的身分重回台灣的「民主化運動」。長期間，大家都不知原作者是誰，但是卻一直使用著這幅木刻作品的控訴力量；算起來全面解開原創作者的滄桑歷史竟然費了五十年的時間——半個世紀的歲月。可見得，要揭開台灣戰後歷史的真相，並不容易。

它的誕生、湮沒、流離、回歸和再生的歷程，正是時下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另外一面的戰後台灣史；同時，也是戰後中國大歷史悲劇的一個縮影。

三、在「內戰和冷戰」中湮滅、流離和再生的歷史

二二八事件後，光復初期曾經是文化思想舞台的重要報紙雜誌，幾乎瀕臨癱瘓；特別是如《人民導報》、《民報》、《和平日報》、《政經報》等進步的民主報刊，都被迫停刊；這使台灣文化思想

界頓失「喉舌」。許多進步文化人，如蘇新、陳文彬、黎烈文、王思翔等人，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紛紛倉皇脫離上海或香港。台灣報刊的停刊和文化人的脫離噤聲，使同時處於國府統治下的上海，頓時成了報導二二八事件的中心；如《文匯報》、《光明報》、《大公報》等進步民主報刊，從三月二日起一直到四月底，連續、大量地報導並評論了台灣的二月「起義」。譬如：就在事件後，三月四日的《文匯報》在第一版刊出了〈台灣動亂真相〉一文；香港的《華商報》也在同日（三月四日）的社論以〈台灣人民的抗爭〉為標題，大大報導事件並聲援了台灣人民。在這許多有關「事件」的報導中，四月二十八日的《文匯報》上，由名作家唐弢主編的「筆會」副刊刊出了一幅題為「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木刻作品，也許是為了避開國府軍警的耳目，作者署名「力軍」。這就是黃榮燦在事件中偷偷刻下的作品；當時，他躲開了國民黨軍警特的監視，悄悄地把這件作品從台灣帶到了上海，一心想用藝術的形象向全中國的民眾控訴國府軍警在台灣的暴行。這件木刻畫的控訴，自然也成了戰後全中國風起雲湧的反國民黨強權統治，要求「民主、和平、團結」的大潮流的一部分。然而，《文匯報》在刊出這件作品的一個月後，也在國府的高壓下被迫停刊。

數月之後，黃榮燦本人從上海回到了台灣，在台灣繼續從事新現實主義的美術運動。而這件「恐怖的檢查」作品原版就留在上海，參加了該年年底（一九四七年）「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與其他大陸來台的木刻家描寫台灣景象的十多件作品一同展出。當時，國共內戰戰局日漸緊張，在「國統區」

的自由展出已相當困難，因此，展覽結束後，「中華木刻協會」便把展出的所有作品，贈送給魯迅的日本至友內山完造之弟——中國木刻藝術的催生者內山嘉吉先生，使這些中國木刻作品得以在日本繼續展出；當然，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也是其中的一件。

然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韓戰爆發，使戰後的東亞歷史產生了巨大的「逆轉」；美國主導的東亞冷戰，不但使朝鮮民族南北分裂，也使中國的國共內戰以台海為界長期隔峽對峙；作為美國東亞冷戰中心基地的日本，也走上了扈從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道路。這歷史的「大逆轉」，使原本處於同以一戰後「民主重建」潮流的大陸、台灣和日本，被分割隔離，分立對峙，人民之間也彼此阻離隔絕。這使得原來在日本展出的這批中國木刻作品，包括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只有長期滯留在日本；而回到台灣的作者黃榮燦本人卻在這個歷史大逆流的白色恐怖中被刑殺，棄葬在台北近郊的六張犁的亂葬崗上。自此，黃榮燦的作品和人，分散兩地；作品留在日本，人卻被埋在台北亂葬崗。兩者都分別長期被湮埋在東亞冷戰的歷史暗處，無人聞問。

但，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

一九七一年，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陸，東亞冷戰局勢漸趨緩和，日本與大陸建立了外交關係。在這個大環境下，一九七四年內山嘉吉把他長期保存的三百六十四件中國木刻作品（其中包括了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全數捐給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並在翌年舉辦了「中國木刻畫

展」，也出版了木刻畫冊。

走上開放改革的中國大陸，在一九八一年，「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為了紀念中國新興木刻運動五十周年，出版了《中國新興版畫五十年》；其中，被內山長期保存的「恐怖的檢查」也被收錄其中，同時也附上了作者黃榮燦的生平簡介。長眠了三十年的黃榮燦和他的作品，終於再度見到了日本和中國大陸的陽光，回到了中國木刻的歷史。

然而，「恐怖的檢查」與台灣人民的見面，卻必須等待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展，而遲至一九八四年才實現。

一九八三年，海外著名的左翼民主運動月刊《台灣與世界》，在第四期上（一九八三年九月）以黃榮燦的另外一副木刻作品「收穫」為封面，並簡單介紹了黃榮燦的生平；接著，在該刊的第九期上（一九八四年三月），當年黃榮燦在台灣師院（今台灣師大）教授的學生，也是友人秦松先生寫了〈黃榮燦不寂寞了〉一文，介紹了黃榮燦在光復初期的文化活動，並寫了一首詩追悼他。這是黃榮燦被湮滅三十年後，首次回到人間的世界。到此為止，在海外和台灣雖然黃榮燦本人的生平大致回復了輪廓，但仍未與他的代表作「恐怖的檢查」有任何的聯繫。亦即，在海外和在台灣的反國府民主運動中，還不知道黃榮燦就是「恐怖的檢查」的創作者。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代表台灣左翼民主運動旗手的《夏潮論壇》，刊出了陳鼓應的〈台灣第一個政治暗殺事件——許壽裳〉一文；作為該文的配圖，「恐怖的檢查」第一次被刊載在台灣運動刊物上，回到了台灣。因為當時仍是國府的戒嚴時期，為了避開反共戒嚴的恐怖檢查，編者把題名改為「木刻『台灣二二八』」，也沒有印上作者的姓名。雖然沒有人知道創作者的名字，也不知道它的來處，但是由於作品本身的藝術生命力，超越了時代、政治的限制，與八〇年代台灣反國民黨統治，熱烈要求民主化的心靈產生了激烈的共鳴；自此，這幅木刻畫便成了控訴國府的戒嚴統治、要求民主化的代表圖象，經常出現在「民主化」運動的抗爭現場或黨外書刊上。

戰後初期，它以控訴國府鎮壓台灣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的行動而誕生，但來不及與台灣人民見面，便開始了流離、放逐的歷史。在東西對峙的冷戰時代和狂暴的國共內戰歷史中，三十七年間，它與一大批台灣要求社會正義和政治民主的運動、歷史和人一起，被打入冷戰和內戰歷史的黑牢中，就如它的創作者黃榮燦被棄葬蔓草野山中一樣。但是，歷史絕不會永久在狂暴的統治者掌中，終究要回到人民的手中。木刻畫「恐怖的檢查」，從台灣二二八中誕生，到了大陸上海，再長期滯留日本；然後又由日本回到大陸再回到台灣。這三十七年間的流離歷程，就是戰後東亞冷戰歷史的軌跡；前半段的歷程是席捲東亞的冷戰狂飆，後半段就是冷戰緩和東亞民主力量逐漸茁長的潮流。最後，它由台灣左翼民主運動的手帶回到台灣，代表著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已達到了新的高點。同年，一九八四

年，被反共狂暴的白色恐怖監禁最久、長達三十四年的政治受難人林書揚先生，也被釋放了。但是，當時仍然沒有人知道，木刻畫的創作者黃榮燦本人仍無人知曉地在六張犁山崗上與孤魂野鬼為伍，正等待著文化思想界的努力，為他平冤鎮魂。雖然他的創作已經回到了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大潮流。

一九八七年台灣的解嚴和大陸開放改革的進展，為黃榮燦回到台灣社會創造了條件。一九九〇年開始，大陸的藝術家、評論家吳步乃（筆名吳陟？），在《雄獅美術》等雜誌上連續發表了介紹黃榮燦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這才使大家知道了「恐怖的檢查」創作者原來就是黃榮燦；這終於把作品與作者連繫了起來，把作品歸還給了作者。但是，對黃榮燦的身世仍然只有簡單的印象，只有初步的出土和復原。

在這同時，李敖出版社出版的《安全局機密檔案》，也給黃榮燦的死，提供了確切的證據。根據該檔案，黃榮燦是因「吳乃光叛亂案」而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被警總逮捕，一九五二年的十一月被刑殺。

但是，黃榮燦被刑殺後到底被葬在何處？至少到一九九三年為止，仍然是個謎。但是奇蹟發生了！一個出獄後生活在台灣社會底層的政治受難者，長期間默默燃燒的意志和苦行終於揭開了這個謎。他就是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成員的曾梅蘭先生。曾梅蘭為了尋找同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抓被關，且後來被刑殺的兄長徐慶蘭的屍骨，數十年來以泥水工為業輾轉各地，「全省走透透」，每

到一地便踏遍當地墓地尋找哥哥的葬身處。終於在一九九三年，他奇蹟似地在台北六張犁的亂葬崗上的荊棘草叢中找到了哥哥的葬身之地。他闢開荒煙蔓草一看，居然是一片埋葬了二百零一具政治受難者屍身的亂葬崗，黃榮燦的墓石也與其他的受難同志們一起孤零零地落在陡坡上。近半世紀的風雨浸漫過的、約一尺高的墓石上，隱約可看見「黃榮燦之墓」的字樣，右上方則刻有「歿於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五十年的歲月，六張犁附近已矗起了七橫八豎的公寓群，沸揚的市囂和車水馬籠的基隆路就在眼前，但是黃榮燦和他的受難同志，卻被深深埋在不遠處的暗黑的荒草叢中，在陰間徘徊不見天日不得安息。就像同時被煙滅的台灣的另外一面歷史、文學、哲學與美學一樣。日夜盼著時代的正義力量，闢開歷史的荊棘，洗清墓碑，重回到中國、台灣的現代史冊。

四、使《南天之虹》誕生的力量

也在同一個時期，青年作家藍博洲，從八〇年代中末起，開始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和人物，進行了調查和研究，奠定了可貴的成果。藝術家梅丁衍教授，也投入了對黃榮燦的生平、作品的發掘、搜集、調查和研究，並取得了極大的進展。在這些基礎上，最後，把黃榮燦的生涯、作品、思想和時代全面發掘並整理成書出版的，是日本的良心、友人橫地剛先生。據他說：因為讀到了藍博洲的著作後，「全身像遭電擊般，震顫不已」；後來，在藍博洲的引伴下，一九九七年第一次前往六

張犁的政治受難者墓地時，使他「放眼望去，頓時說不出話來」；看到像黃榮燦一樣的，許多無親無故的外省籍受難者，他說：「他們的魂魄似乎仍徬徨在分隔的台灣海峽上」，「想進一步認識自己來到人世間的戰爭前後的世界，這樣的強烈願望所驅使」，因而毅然投入了對黃榮燦的調查研究。作為一個民間學者，他自費自力地橫跨日本、大陸、台灣三地，點點滴滴地辛勤搜集資料，為此，曾一度因過勞而病倒，幾乎喪命。費了四年的時間，終於完全復原了黃榮燦的生平、思想和時代。使半世紀一直徘徊在分隔的台灣海峽的黃榮燦的靈魂得以安息，並使他的精神重回中國、台灣兩岸的歷史和社會。

就如橫地先生在《南天之虹》書上所舉的，畫家魯奧特的畫作「六十四幅『受難』組畫」中的旁白：

「在這裡，一個世界落幕，另一個世界誕生。」

黃榮燦的生命在半世紀前落幕消失了，經過了暴風雨的長夜，今天，他的作品和精神世界又再生了。

發表於《左翼》第二十五號（二〇〇二年七月三十日）